王柯 著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1930年代至1940年代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王柯 著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1930年代至1940年代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

王珂 著

简介

本书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谢茂松先生的建议，就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对近代维吾尔社会的影响，在重新查阅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充实和改写。在此过程中，我再次感到，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它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大的动员能力和威力，其实就是利用伊斯兰教，让维吾尔族伊斯兰教徒，即维吾尔族穆斯林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再也没有什么比接受“卡菲尔”（异教徒）的统治更让伊斯兰教徒感到屈辱的了。但是，维吾尔民族进入由“异教徒”为统治者的中国，并不是发生在近代以後的事。为了探讨伊斯兰教思想为何能够成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精神支柱，本书增补了第一章“在‘乌玛’与‘中华’之间——清王朝对新疆维吾尔族社会的统治”。其实，通过这一章，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民族问题的产生与前近代国家构造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清王朝处理维吾尔社会和宗教的政策给近代以後的中国留下了什么“遗产”。

版权信息

书名：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

作者：王柯　着

香港中文大学 2013

本书版权为香港中文大学所有。除获香港中文大学书面允许外，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制或转载本书文字或图表。

国际统一书号（ISBN）：978-962-996-500-6

出版：中文大学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学

传真：＋852 2603 7355

电邮：cup@cuhk.edu.hk 网址：www.chineseupress.com

East Turkest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1930s to 1940s (in Chinese) By Wang K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500-6

目　　录

作者简介
地　图
前　言
第一章　在“乌玛”与“中华”之间
第二章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起源
第三章　反日亲苏路线的表与里
第四章　政治权利的双重结构与民族问题
第五章　苏联支持的中国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圣战”
第六章　权威与权力
第七章　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结合点
第八章　国际政治游戏和“共和国”的悲剧
第九章　“民族独立”还是“民族解放”
第十章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後　记
大事年表
更多书籍

作者简介

王柯，1956年生，日本东京大学学术博士，神户大学研究生院教授。研究方向包括中国传统国家构造、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思想、近现代国际关系视野中的民族问题、中国伊斯兰教社会运动和国家认同等。主要着作有：《“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研究——中国的伊斯兰与民族问题》、《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多民族国家中国》、《20世纪中国的国家建设与民族主义》等。其中《多民族国家中国》多次在日本被评为“理解中国必读”。

地　图



地图：1945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控制地区

前　言

2009年7月5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发生了令全世界震惊的事件，大量无辜的汉族，以及从相貌上与汉族相近的回族或其他民族的居民，遭到一部分维吾尔族制造恐怖暴力犯罪分子的暴力攻击，甚至被残忍杀害。按照中国政府的统计，共有197人死亡，其中手无寸铁无辜被攻击杀害的汉族134人、回族11人和满族1人，受伤者几近2,000。尽管官方把它称为“一起由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组织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但是毫无疑问，事件具有大规模民族仇杀的性质。事件参与者所表现出来的残忍，让许多人都难以相信这是发生在21世纪初正在崛起的中国，也让无数的人们开始思考这样一连串相关的问题：首先是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如果说没有问题，那麼为什么一部分维吾尔族居民对素昧平生的汉族居民也会抱有如此大的仇恨？如果说它有问题，那麼，问题的症结又在哪里？

实际上，与这次发生在乌鲁木齐市的大规模民族仇杀类似的事件，当年也曾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喀什市与伊宁市。1981年10月30日，在喀什市内一位汉族青年在与一位维吾尔农民发生口角後持商店的商品猎枪枪杀了对方，马上引起一部分维吾尔族制造恐怖暴力犯罪分子在全市暴力攻击无辜的汉族居民，当场有2人被残忍杀害，262人受伤；在1997年2月5日至7日发生在伊宁市的事件中，同样又是无辜的汉族居民遭到一部分维吾尔族制造恐怖暴力犯罪分子的暴力攻击，7人被残忍杀害。这两起事件与此次乌鲁木齐市事件的性质完全相同，只是规模不同而已。从各种迹象上也可以看出，乌鲁木齐事件实际上也与以喀什为中心的新疆南部的维吾尔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要想真正认识乌鲁木齐事件的性质，就应该思考为什么同样的事件会首先发生在喀什市与伊宁市？

理由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喀什和伊宁曾经分别是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和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发祥地和根据地。所以，要想搞清一部分维吾尔族居民为什么会对汉族居民有那样强的仇恨心理，必先搞清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性质。如果搞清了东突厥斯坦的性质，就会明白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对这些具有东突厥斯坦独立思想的人们来说到底有没有吸引力。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目标就是在新疆建立以维吾尔族为中心的民族国家。第一次东突厥斯坦民族独立运动于1933年在新疆南部的喀什爆发，同年11月12日在喀什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但是这

个“伊斯兰共和国”从宣布成立到崩溃仅仅存续了85天，甚至没有建立一个相对成形的国家权力体制和政府组织体系。1944年，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再次爆发，同年11月12日在新疆北部的伊宁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比起第一次运动来，第二次东突厥斯坦民族独立运动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甚至影响到了当时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局势，也影响到了战後国际秩序的重建。但是，因为这场运动具有苏联背景，并发生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且最後在苏联的压力之下放弃了独立的方针，最终统一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所以1949年以後这场运动在中国被称为“三区革命”。[0-1]其实这一名称只是根据运动的最终结果，并不能反映出这场运动本来的面貌和原初的性质。

投鼠忌器的结果，只是给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留下一块可以温存思想种子的土地。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诞生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运动在毛泽东的时代一度销声匿迹，其原因不言自明。但从1980年代起东突厥独立运动思潮开始死灰复燃，其背景首先是中国对毛泽东时代各种政策的矫枉过正，其次是世界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第三是1990年代初在苏联改革失败以後中亚各国的“被独立”。受到内外环境的刺激，东突厥斯坦独立思潮一浪高过一浪。维吾尔族作家吐尔贡·阿里马斯在1989年10月出版的《维吾尔人》（Uygurlar）一书中，甚至提出一个让任何历史学家听了都会目瞪口呆的说法：维吾尔人自八千年前就居住在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各个绿洲里。[0-2]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不仅是贯穿进入20世纪以後近代维吾尔历史的一条红线，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所以，忠实地还原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真相，尤其是正确认识和评价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性质，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从思想深处理解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在包括“7·5事件”在内的一系列事件中对汉族居民所表现出来的仇恨心理，而且对于把握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的未来图景，也具有深刻的意义。但是遗憾的是，关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研究，一直少有重头作品问世。

较为详细提及第一次和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着作有新疆社会科学院编撰的《新疆简史》第三卷、安德鲁·福布斯的《中国中亚的军阀和穆斯林》（Andrew D.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以及台湾张大军的《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共6577页）。但是，这些着作都是从中国政治史、新疆政治史的角度对运动进行描写，没有能够深入涉及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自身内部。

在作者看来，《新疆风暴七十年》应该是最为详细地叙述了新疆近代政治史过程的一部巨着。它的原型是张大军于1954年出版的《新疆近四十年变乱纪略》（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4），所以在其中较多地涉及到了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两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日本学者中田吉信的《伊宁事变和新疆的民族运动》，可以说就是张大军的《新疆近四十年变乱纪略》的改编。然而，1945年任政府军副团长的张大军也不可能知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治过程，因而不免在事实关系的叙述中出现很多错误，在分析事件性质时也加入了很多的感情因素。

1990年，林达·本森（Linda K. Benson）在美国出版了《伊宁暴动：穆斯林对新疆汉人统治的挑战，1944-1949》（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Armonk, London: M. E. Sharpe, Inc., 1990］）。这本着作当时被评价为“迄今为止世界上论述三区革命的唯一研究着作”。[0-3]然而，触及到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以及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治过程的内容，也仅限于第四章——“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建立”中的寥寥几页（“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ast Turkestan Repablic”, pp. 42-66）。其主要内容仍然是国民政府、新疆省当局的政治、军事应对措施。大约林达自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曾在1991年要求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後期主要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已故）的儿子会面，但却遭到了拒绝。

1990年代以後，中国国内陆续出版了一些关于近代以後新疆问题的着作，例如白振声和（日）鲤渊信一主编：《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黄建华：《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等。虽然这些着作基本上以历史概论性着作为主，但是其中有两本着作在史料和研究方法上对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其一是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的《新疆三区革命史》，该书详细地整理了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过程，但是因为以革命史观来看待这次运动，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深入追究。其二是厉声主编的《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该书虽然也属于概论性质，但是在叙述东突厥独立运动的历史过程的第四章和第五章，以及描述运动发生之前的新疆历史的第三章中提供了很多具有价值的研究信息，尤其是俄文档案的存在及其珍贵价值。然而遗憾的是，之後也许是考虑到政治的需要，俄方拒绝和不再批准开示这批资料，阅览过这批资料的学者们至今还没有详尽地介绍这批资料，使这批

资料的内容成为一个今天无法知道的秘密。

先行研究之所以很少，尤其是缺少从民族问题角度进行的专门研究和对运动政治过程的专门研究，其原因首先就在于资料匮乏，其次在于资料的多元化。要想真正深入研究，必须涉及到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俄语、英语、日语等多语种的资料，这也让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阅览了1944年到1946年期间存在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公文，阅览了“东突厥斯坦革命青年组织”和“东突厥斯坦革命党”的纲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领导人的谈话、文章、信件等数百件重要文献。此外，看到了新疆统治者盛世才和吴忠信的回忆录和日记，收集了大量的第二次东突厥斯坦运动当事人使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汉语所撰写的回忆录，以及有关新疆问题的一部分日本外交资料和美国外交资料，并且有幸采访了数位与当年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领导层具有特殊关系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人士。以上这些收获，构成了本书的基本素材。

本书的主要部分，就是利用这些第一手资料，从新疆地区社会及突厥伊斯兰民族社会的社会结构、民族革命思想的起源与质变、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内部结合原理和共和国的权力构造、围绕着新疆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等四个视角，力图还原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过程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治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性质。

从内容来看，本书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二章是以前近代到近代的社会转型为时代背景，从清王朝传统统治新疆政策的特点和功罪、处于社会转型期中的新疆所面对的严峻国际局势、伊斯兰教在维吾尔社会中的地位及变化、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对近代维吾尔社会的影响、新疆和维吾尔社会的社会结构的问题等角度，分析和探究促使东突厥斯坦民族独立运动发生的原因。第三、四章是通过对汉族统治者——盛世才统治时期的政治过程和民族政策的分析，发现他之所以能够镇压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但最终却造成民族对立更加尖锐深刻的原因。第五、六、七章是在还原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爆发经过、“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成立经过、共和国势力在各地区进行扩张的经过的基础上，探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权力结构上的特徵。第八、九章是通过还原新疆和平谈判的政治过程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消亡的政治过程，从国际政治和民族运动内在矛盾这样内外两个角度探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消亡的根本原因。第十章实际上就是本书的终章，它从政治体制、社会构造、民族关系、经济水平等角度分析“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性质，并探讨第二次东突厥斯坦

独立运动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维吾尔民族史、新疆地方史和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

注释:

[0-1]徐玉圻主编：《新疆三区革命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0-2]维吾尔人作家吐尔贡·阿里马斯，从1986年至1989年10月出版了《维吾尔人》、《维吾尔古代文学史》、《匈奴史》等书。关于其内容，本书主要参照艾买提·毛拉吐尔迪：《〈维吾尔人〉等三本书的主要问题及其思想根源》，新疆社会科学院《西域研究》1991年专集《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第23-26页；阿吾提·托乎提：《维吾尔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同前，第15-22页。

[0-3]王大刚：《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现代新疆之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研究通讯》，第13期（1992），第121页。

第一章　在“乌玛”与“中华”之间

清王朝对新疆维吾尔族社会的统治

与历代中华王朝相比，清王朝曾经统治过最多的民族集团。在中国传统的王朝体制崩溃之後，清王朝的版图由中华民国所继承。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曾经在清王朝治下的边疆地区，尤其是蒙古、西藏以及新疆的维吾尔族地区，为什么在进入中华民国时代以後，会频繁发生民族独立运动？因此，在探讨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与“民族”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分析清王朝曾经在这些地区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清王朝通过战争直接控制居住在塔里木盆地周围绿洲的伊斯兰社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维吾尔族地区，一些学者认为，其背景上有继承前朝旧有疆土的意识。因为当时这一地区在准噶尔汗国统治之下，而准噶尔汗国又一直向清王朝朝贡称臣。[1-1]本章主要通过梳理清王朝统治维吾尔族社会的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维吾尔族社会的反应，从分析清王朝对新疆维吾尔族社会统治政策性质的角度，认识由清王朝所构建起来的这种民族和国家结构，让维吾尔族人形成了什么样的民族、宗教和国家意识？首先要说明的是，尽管从1930年代开始，这里的居民才开始具有“维吾尔”这样一个统一的民族名称，[1-2]但为了叙述方便，本章采用了“维吾尔”一词。

第一节　清王朝的“新疆”

从“招服”到“征服”

1755年（乾隆二十年），位于天山北部的游牧王国准噶尔汗国发生内乱，清王朝乘机出兵消灭了准噶尔汗国。因为准噶尔一边朝贡称臣，一边屡屡侵略清王朝的重要盟友——喀尔喀蒙古，所以彻底消灭准噶尔汗国，是清王朝从康熙时代以来的夙愿。但是，领土的扩大本来只限于征服准噶尔所带来的客观结果，正如乾隆在其《西陲》诗中所表现的“勤远非初意”那样，而对准噶尔周边那些过去曾经为准噶尔所统治的其他民族集团地区，清王朝的最初目的只是进行“招服”，即让他们承认清王朝为宗主国而已。

直接占领准噶尔以外的其他地区，似乎并非清王朝的原意。这一点，从乾隆任命准噶尔派遣军的指挥官为“定边将军”一事上也可以看出。“为我屏藩者，惟哈萨克布鲁特二部落而已”，清王朝将“称臣求属，遣使进贡”的哈萨克和布鲁特（柯尔克孜）称为“疆外屏翰”，即领土之外的藩国。[1-3]而同样为突厥系穆斯林的维吾尔族人所居住的天山南部地区，[1-4]清王朝虽然最终通过军事征服直接占领了该地区，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也并不是清王朝的本意。

在被清王朝占领之前，维吾尔族社会事实上由伊斯兰教苏菲派纳格什班迪教团（al-Tariqah　al-Naqshiban-diyyah）的白山派与黑山派所控制。纳格什班迪教团，是一个诞生在中亚撒马尔罕地区的苏菲派教团。1542年纳格什班迪教团的教主玛合杜木·阿扎姆（Makhdumi-I　Azam）去世，其众多子嗣因争夺教权而产生分裂。长子依禅·卡朗（Ishan-i-Kalan）及其手下形成了“白山派”（Aq-taghlyq），第七个儿子、依禅·卡朗的同父异母弟弟伊斯哈克（Ishaq）及其手下形成了“黑山派”（Qara-taghlyq）。16世纪末、17世纪初，黑山派由撒马尔罕进入了天山南部地区，在当时的叶尔羌汗的支持之下，以叶尔羌地区为中心逐渐成为一股左右叶尔羌汗国政局和维吾尔族社会的强大势力。17世纪中叶，依禅·卡朗的长子和卓·玉素普（Hoja　Yusup），也从撒马尔罕辗转来到了天山南部的喀什噶尔地区，以此为根据地发展自己的势力。黑山派和白山派两派，不仅对于民众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与政治权力相勾结，开始了激烈的抗争。由于两派的首领都自称为“和卓”（Hoja, Khwaja“圣裔”，意即预言者穆罕默德的後裔），又都活动于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地区，所以又被统称为“喀什噶尔·和卓家族”（Kashghar Hoja）。

由于处于劣势，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Appaq　Hoja）通过西藏的达赖喇嘛向准噶尔汗国的噶尔丹汗要求支援。1678年噶尔丹汗出兵天山南部，消灭了叶尔羌汗国，扶持阿帕克·和卓为傀儡对维吾尔社会进行统治。噶尔丹汗死後，其子策妄阿拉布坦（亦称“策妄阿那布坦”或“策旺阿拉布坦”，Tsewang Araptan或Tsewang Rabtan）继位。策妄阿拉布坦企图利用黑山派和卓统治维吾尔族社会，将白山派的和卓们全部带往准噶尔汗国的首都库尔加（Qulja），即伊宁扣押了起来。

当清王朝开始进攻准噶尔汗国後，被准噶尔汗国扣押在库尔加的白山派和卓兄弟，即阿帕克·和卓之孙马合买提·和卓（Mahmat　Hoja）在扣押中出生的两个儿子波罗尼都（Burhan　al-Din）与和卓·霍集占（Hoja　Jihan），自己找到清军，表达了归顺之意。[1-5]清王朝因为原本就没有对维吾尔族社会进行直接统治的意思，因此将归顺的波罗尼都放回天山南部，希望通过他们“招服”维吾尔族社会。[1-6]定边将军兆惠派出副都统阿敏道随波罗尼都南行，其使命为“招抚”，[1-7]而根据《高宗纯皇帝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文》又被说成是“议事”。总之，很明显，清王朝最初的确只是准备通过和卓兄弟对维吾尔族社会进行间接统治。

波罗尼都的弟弟和卓·霍集占，被清王朝暂时留在库尔加，以协助清王朝安定当地的穆斯林社会。但是，霍集占企图实现维吾尔族社会的完全独立，参加了准噶尔首领阿睦尔萨那（Amu'ersana）的叛乱，在叛乱被镇压之後又逃往了天山南部。他说服了其兄波罗尼都，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杀害了阿敏道及其随行的清军百人，向清王朝公开举起了反旗。原本受到准噶尔欺压的和卓兄弟，在被清军从长期拘禁中解放出来、承认他们的地位并将其送回到维吾尔族社会之後，居然恩将仇报，因此引起乾隆皇帝的强烈愤怒。《高宗纯皇帝平定回部勒铭叶尔羌碑文》说道：“准夷……、獾貐其众，豺狼其群，以回为羊。……拘二酋长处伊犁滨，四大回城输租献赋腾格，是供卫拉，是惧茧丝，悉堪沟壑，已遽有面内心其何能诉。准夷既平，诸回见天，谓自今始饱食晏眠，遣厥酋归抚尔土田骨肉，讵疑变迁，德竟怨报，助我叛疆，戕其星轺，是用兴师声罪致讨。”[1-8]於是，乾隆皇帝于1758年5月任命了“靖逆将军”，派出了讨“逆”的军队排除了和卓势力的抵抗，于1759年8月征服了天山南部的维吾尔族社会。[1-9]

以上这一由“招服”到“征服”的变迁过程，对其後清王朝制定对新疆的统治政策，尤其是统治维吾尔族社会的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分割统治与维吾尔族社会的伯克制

在取得了对天山北部的准噶尔地区和天山南部的维吾尔地区的统治

权後，清王朝按照“新辟疆围”的意义，合称这些地区为“新疆”。值得注意的是，清王朝也曾经将其他取得了统治权的地区称为“新疆”，而事实上这些地区在历史上就已经为中国王朝所管辖过。[1-10]也就是说，“新疆”之意并非“新的领土”的意思，而是“清王朝最近新得到的地方”。只是因为到了统治天山南部以後，清王朝再也没有得到过其他地区的统治权，所以“新疆”才变成为这一地区特有的名称而被固定下来。而在公文上，清王朝一直将准噶尔地区称为伊犁、准部或北路，将维吾尔族人称为“回子”，或称其为“缠头回”（头上缠着头巾的穆斯林），以与其他伊斯兰民族进行区别；而对于天山南部的维吾尔地区，在地区的意思上称其为“回疆”，在民族的意义上称其为“回部”，而从地理的意义上称其为“南路”。

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乾隆皇帝任命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通称“伊犁将军”），开始逐步建立“军府制度”，即通过将新疆变为一个军事领地的方式来统治新疆。伊犁将军在管辖驻扎于北路、南路及东路（之前已经为清王朝所统治的新疆东部哈密和吐鲁番地区）的各个地区的清王朝军队的同时，还是新疆地区的最高民政长官。在其之下，南北两路的主要城市，根据其规模大小分别设置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而在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市）设置都统，由他们分别率领驻扎清军，负责各地防卫事宜。清王朝在新疆共驻扎了军队39,726人，而驻扎在南路的部队才仅仅5,185人，大半的部队都被放在了天山北路和乌鲁木齐地区。[1-11]这种驻扎人数上的不同，背景上可能有防备俄国的意识，但主要还是因为考虑到北路过去曾为准噶尔势力的中心地区，以及出于为了对付可能出现的与周围的哈萨克、柯尔克孜之间纠纷的考虑而决定的。[1-12]在这一点上，清王朝与一直以南路为中心的历代中国王朝的西域政策有着明显的不同。

在统治政策上，清王朝政府在新疆地区分别采用了三种不同的行政和官僚制度。首先，在包括乌鲁木齐在内的东路地区导入了与中国内地相同的州县制，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分别设置了道、府、州、县。在这一地区实行州县制的主要理由有以下三点：第一，唐代时中央政府曾经在该地区实行过州县制；第二，从地理上看，该地区因为与内地邻接，以前就有大量的汉族人或说汉语的伊斯兰教徒，即回民居住在这里；第三，从军事战略的意义上来看，该地区位于南北两路与中国内地之间的交通要冲，实行直接统治有利于控制这一地区。从结果上来看，由于清王朝在该地区导入州县制，之後该地区中以汉族人与回民为主体的移民活动更加活跃，到了20世纪初，已经占到了该地区人口总数的70%左右。

第二，在北路的蒙古游牧民社会中及东路的哈密及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社会中，实行札萨克制。出身于满族的清王朝，在与蒙古结为盟友关系之後，将蒙古民族按“旗”为单位进行分化重编，札萨克（Jassag）即为“旗长”。札萨克为军政一致的制度，是一种在中国历史上给予被统治民族以最大自治权的制度。因为哈密的艾伯都拉、吐鲁番的依敏和卓早在康熙和雍正时代，就已经归顺了清王朝，被清王朝封为札萨克，而在清王朝对天山南部即南路的维吾尔族社会进行征服时，他们又积极进行了支援，所以乾隆帝在全盘制定统治新疆政策时，继续承认了他们的这一特殊地位。

第三，在南路的维吾尔族社会——回疆——中采用了伯克制。在突厥语系各种语言中，“伯克”（bek / beg）之意即“头目”，原来就是一种表示统治阶级身份的称号。清王朝将“伯克”解读为“官”，前面冠以维吾尔族社会的传统官职，并且规定各自官品阶级（三品至七品），将其改造为清王朝统治下的维吾尔族社会中的官僚体系，这也就是清王朝所谓的“齐其俗不易其宜”的政策。

伯克分为统括一个地区社会民政的阿奇木·伯克（Hakim beg），类似于阿奇木·伯克副职的伊什罕·伯克（Ishihana beg），负责税收的噶杂纳齐·伯克（Ghazanachi beg）、管理水利的米拉甫·伯克（Mirab beg）和作为伊斯兰法官的喀孜·伯克（Qazi beg）等。除了对外的军事防卫由清军负责之外，这些维吾尔伯克代表清王朝政府分别管理各地维吾尔族社会的地方行政、社会治安、裁判、税收、农业、工商业、教育以及宗教事务等，并且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备有一部分“回兵”。清王朝除了给予这些伯克以政治上的特权以外，还作为俸禄，给每个伯克以“职分田”以及耕种职份田的“燕齐”（yanqi），即专属的佃户。例如三品伯克被授予土地200亩和“燕齐”100户；另外，还以“养廉”的名义每年从国库中向阿奇木·伯克发款铜钱800“腾格”（tangge），伊什罕·伯克为300腾格。[1-13]

清王朝在征服了回疆以後，优先登用以前主动归顺的维吾尔族人，尤其是出身于哈密和吐鲁番的维吾尔族人，以及以前的伯克等当地社会上层。回疆的伯克种类当初只有20种前後，[1-14]其後陆续增补为32种。清王朝将回疆分为4大城、4中城、23小城等合计31个地区，按照其规模在各个地区分别安排了从五六人到三十数人等数量不等的伯克。[1-15]

清王朝之所以征服回部，原本就不是出于经济的考虑，因此用于统治该地域的经费，从最初开始就决定主要由内地调拨。清王朝除了在新

疆的驻军以外，还驻扎了1,400名行政官僚。其俸禄和行政费用每年达到688,900两，其中61万两由清王朝中央政府支出。其余的71,790两在当地调济，主要是通过经营官营旅店和向士兵销售茶叶。[1-16]的确，清王朝政府在征服了回疆以後马上建立了租税制度，所设各种伯克中有许多伯克的职责就为负责税收，但这种向维吾尔族自耕农每年征收的大约60万石前後的谷物，只是为了解决驻扎清军的口粮问题。即使到了末期，清王朝遇到了极大的财政困难，都没有大量增加过对维吾尔族人的税收。[1-17]

详细记录历史上维吾尔族人口的资料不多，其中一说是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时为262,078人，[1-18]另一说1770年代人口为200,277人，1840年代为282,619人。[1-19]除了商业和手工业以外，当时维吾尔族社会的主要经济方式为传统的绿洲农业。清王朝征服後的维吾尔农村，至少存在着三种农民：即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的自耕农、在清王朝政府所有的“入官地”（被清王朝政府没收的和卓和逃亡者的土地）上耕种的雇农，以及由清王朝政府作为俸禄与职分田一起分给伯克的“燕齐”。清王朝政府不对“燕齐”征税，而对雇农征收收获量的十分之一，对在“入官地”上耕种的雇农征收收获量的一半。[1-20]清王朝的这种统治政策，不仅让许多伯克有了一定权势，而且让他们感到了许多清朝的“恩义”。出于对于这种“恩义”的感激，至少有一部分维吾尔上层分子承认了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1-21]

第二节　隔离统治下的满族皇帝之民

与中国主体文化隔绝的维吾尔族社会

清王朝统治维吾尔族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徵，就是对各族人民实施隔离，尤其是断绝维吾尔族人与汉族人之间的交流，以防止维吾尔族人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清王朝在天山北路采用驻防兵制，而在天山南路则采用了换防兵制。驻防兵就是带着家眷，不变换驻防地的部队；而换防兵就是不带家眷，每过一段时期就要改变驻防地的部队。在天山南路各个地区，清王朝禁止兵士与维吾尔族人进行交流和通婚。[1-22]在维吾尔族人居住的“回城”以外，清王朝另外在各地建设了十八个“汉城”，以作为驻在大臣和驻扎军队的驻屯地。这一政策，的确可以起到防止军队骚扰当地民众和防止民众攻击并伤害驻屯军队的作用。但是，从天山南路的清军主要是由汉族组成的绿营兵（由满族等组成的八旗兵只有349名），而且全部都是换防兵来看，清王朝确实是周密地制订了如何在“回疆”地区中根绝维吾尔族人和汉族人之间交流往来的计划。[1-23]

清王朝禁止中国内地的汉族人进入回疆，即使对待要求前来进行贸易的汉族商人也采取了严格的限制，实行了申批制度。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俱令赴驻兵处贸易”，之後又只允许在“汉城”与“回城”之间设立的“买卖街”（bazar）里进行买卖等。[1-24]为了补助驻屯军队的经费，清王朝在新疆各地组织了屯田。屯田的种类分为“兵屯”（由清军组成）、“回屯”（由从伊犁迁来的维吾尔族穆斯林组成）、“户屯”（由从内地迁来的移民组成）、“旗屯”（由八旗军人及其家属组成）、“犯屯”（又称“谴屯”，主要由从中国内地来的刑事犯人组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年间清王朝统治了新疆以後，就开始在天山北路地区大规模地建设兵屯、旗屯，并由内地大量迁徙农民和刑事犯来到天山北路地区组织户屯和犯屯。然而在天山南路，直到嘉庆年末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处兵屯，而主要由汉族农民组成的民屯只是在南路最东边的喀喇沙尔才有一处，[1-25]到了1831年之後在回疆的中心地区才开始有了民屯。[1-26]

事实上，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即清王朝征服新疆的第二年，乾隆帝就已经表明：“当以满洲将军大员驻守”，伊犁将军和乌鲁木齐都统都被规定为“旗缺”（只由以满族人为主体的八旗人员担任的官职）。天山南路各地区的驻在大臣总数虽然达到23个，但是这些大臣的官职也

全部都由满族人和蒙古族人担任。[1-27]这种具有民族歧视意识的统治体制，与其说是出于国家边疆防卫的目的，还不如说是非汉族政权的清王朝出于它统治中国的需要，而在其全盘统治政策中对新疆地区做了特殊的定位。

清军在全国的总数达到80万人以上，但是其中的八旗兵力实际上不超过20万。面对广袤的国土，清王朝只能采取重点防卫，即只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布置最信赖的八旗军队的方法。[1-28]但是，清王朝开始统治新疆，是在清兵入关115年之後，当时能够使用的八旗兵力已经为数不多。但即使如此，清王朝仍然在新疆驻扎了20,990名的八旗士兵，这相当于新疆所驻屯清王朝军队的一半以上。这一切只能说明，清王朝是将新疆当做满族人自己的军事自治领地进行统治。清王朝在全国各个重要地区，一共设了14名驻防将军。但比起其他的将军来，伊犁将军的管辖地区更加广大，指挥的士兵也更多，每年的养廉也高出1,000两以上。[1-29]

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清王朝要想统治中国，如何将汉族以外的民族势力吸收到自己的阵营里来以对人口数量庞大的汉族人形成牵制，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可以看出，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清王朝在阻止维吾尔族人和汉族人之间的交流上花了很大的力气。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清王朝中央政府统一制作了阿奇木・伯克的官印，这些公印上的内容“兼满洲字、蒙古字、回子字”（满文字、蒙古文字和维吾尔文字），却没有汉字。[1-30]清王朝不鼓励驻扎在新疆的八旗士兵学习汉文，反而积极鼓励维吾尔族伯克的子弟们学习满语。[1-31]另外，与强迫汉族人剃头留上满族式的发辫不同，清王朝对于维吾尔族人，不如说是当成一种恩惠，只允许高级伯克留上发辫。清王朝阻止维吾尔族社会与内地进行交流的思想，还可以从他们在新疆实行的金融政策看出：清王朝在新疆发行一种叫做普尔（pul）的特殊货币，这种货币上面铸有维吾尔文字，与内地的货币同价但却异质。[1-32]即使伯克入朝朝拜这种事情，清王朝也会常常精心安排他们避开内地汉族人地区，而通过北部的蒙古地区，到当时还属于蒙古地区的承德去朝拜皇帝。[1-33]“皇帝”在这里对维吾尔伯克以及蒙古札萨克们的“接见”，目的是要确认他们与满族之间的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具有“会盟”的性质。



一位穿着清朝服装的维吾尔伯克

理藩院制度的真正目的

清王朝在对中国的统治政策上，并不要求边疆地区和内地实现同质构造，而是有意识地将它们分为内地，以及由位于内地周缘的蒙古、西藏、回疆构成的藩部两个具有不同性质的地区。但是清王朝时代的藩部，与中国历代王朝的“藩”不同，正确说来，它其实是一个由满族人与西北地区各民族集团构成的政治联盟。清王朝将其统治疆域区分为内地和藩部两个部分的目的，就在于将各民族集团与汉族人相隔离。清王朝之所以在蒙古地区实施札萨克制，在西藏建立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政教一致制，在回疆导入伯克制，利用当地民族社会中的上层人士对当地民族社会进行间接统治，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让他们产生对于满族的民族亲近感。而清王朝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将藩部的各个民族变为满族的盟友，以便通过他们牵制居住在内地的人口庞大的汉族居民。总之，从构造上来看，清王朝对中国的统治，并不是将它从领土上简单地分为两个部分，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清王朝其实具有双重的性质：从国家的意义上来看，它是一个中华王朝；但从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角度上看，它又是一个时刻警惕和防备着汉族人反抗，与其他民族结为政治同盟的民族政权。[1-34]

管理这个民族政治同盟的，是1636年（顺德元年）设立的“蒙古衙门”，之後改名为“理藩院”，是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具有相同地位的中央政府机关。正如康熙帝曾经说过的那样：“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责任重大”，[1-35]在清王朝对中国的统治构造中，理藩院的存在确实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汉代的“大鸿胪”、唐代的“鸿胪寺”那样接待来自于周围民族的使节，元代的“宣政院”那样处理与西藏关系的中央政府机关。但是作为一个直接管理复数的少数民族的中央机关，清王朝的理藩院还是第一个。除了一个额外侍郎（定员以外的副大臣）的官职可由蒙古人出任之外，理藩院的负责人（尚书、侍郎）的职位都被规定为“旗缺”，并由满族人出任。经过顺治、康熙、乾隆时期的改造，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理藩院里设立了专管回疆的徕远司，成为一个由徕远司和典属司、王会司、理刑司、旗籍司、柔远司等六个部门所组成的中央机关，《钦定蒙古律例》（乾隆六年）、《钦定理藩院则例》（嘉庆十九年）和《钦定回部则例》（嘉庆十九年）等相关法律也逐步完备了起来。

为了牵制内地的汉族民众，清王朝感到了保住回疆为满族自治领的必要性。但是，这种彻底断绝维吾尔族人与汉族人之间的交流和往来，让他们直接服从满族的清王朝皇帝的统治政策，并不就意味着清王朝相信了维吾尔族人。为了防止维吾尔族人的反抗，清王朝政府在统治政策上也下了许多工夫。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就是由驻在大臣对伯克进行监视和实施彻底政教分离的政策。

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下定决心征服回疆的乾隆帝指示道：“朕意不必用回人为总管，仍循其旧制，各城分设头目，统于驻扎伊犁之将军。”[1-36]这就是说，在很早的阶段，清王朝已经决定在维吾尔族社会中不设置统一的行政体系，而将各个地区变为互相之间不相所属的关系，并让阿奇木·伯克直属于伊犁将军。各地的驻在大臣，虽然并不直接干涉地方行政，但是让当地的大臣监视当地伯克的体系，却让伯克的权力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清王朝为了防止伯克压榨民众，在抑制伯克在当地形成势力上采取了以下的措施：（1）废除了传统的伯克世袭制度，确立了由驻在大臣决定伯克补充人选，再由清王朝进行任命的制度；（2）确立了不在当地人中挑选三、四品的高级伯克，不许五、六、七品的伯克在当地任官的伯克回避制度；（3）将阿奇木·伯克的权力分散给伊什罕·伯克；（4）建立了伯克到朝廷朝觐的制度；（5）将不信任的伯克与和卓迁到北京居

住。[1-37]

清王朝征服了回疆之後，“因其教不改其俗”，承认了宗教学者（阿訇，ahun）作为维吾尔族人的精神领袖和掌握文化教育事业的现实，允许当地穆斯林进行日常的宗教活动，并且修缮了和卓的圣墓（麻扎，mazar）。但是清王朝认为和卓家族的存在是造成维吾尔族社会政治不安的根本原因，所以首先想到要限制和卓家族的权威与权力。除了逃跑到浩罕汗国的白山派和卓之外，清王朝将其他的白山派和卓全部迁送到北京，将他们隔离在维吾尔族社会之外。而对于黑山派和卓也是同样，清王朝虽然任命他们为伯克，给予他们以特权，但是同时又让他们都离开原籍，即让他们离开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并且禁止教团进行集团礼拜活动。为了弱化伊斯兰教的经济实力，清王朝故意不将清真寺、麻扎、宗教学校征收的宗教税认定为法定税金，而将在瓦哈甫地（信者向清真寺和宗教学校捐献的土地）上耕作的“燕齐”编入普通的户籍，将他们变为清王朝的纳税者。而关于清真寺的新任指导者（阿訇）的人选，也制订了由伯克推荐和作保、由驻在大臣任命的制度。



一位伊斯兰教教职人员

清王朝在回疆实施了彻底的政教分离原则。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清王朝政府任命伯克，乾隆帝规定伯克只对清王朝政府负责，严厉禁止和卓、阿訇干涉行政，剥夺了他们批评伯克的权利。清王朝政府再三强调禁止录用阿訇为伯克和禁止伯克兼任阿訇，甚至禁止清王朝驻在大臣与阿訇私自交往，有阿奇木・伯克因为默认夫人“读黑经”，即参加苏菲教团活动而遭到追查的案例。[1-38]清王朝虽然承认了伊斯兰法裁判官（喀孜）对民事裁判——调节民事纠纷，决定遗产分配，办理婚姻手续等——的权力，却严厉禁止按照伊斯兰法处理刑法事件。在咸丰时

代，叶尔羌参赞大臣英蕴就因为“查经拟罪”，即按照伊斯兰法“沙里亚”（Sharia）断罪，而被判了流刑。

清王朝政府还禁止维吾尔族人与邻接各国之间的往来。其理由主要是因为白山派，即喀什噶尔·和卓家族将浩罕汗国当做了他们反清复辟活动的根据地。浩罕汗国也是一个纳格什班迪教团势力强大的地区。因为宗教信仰的相同和生活方式的相同，当时的维吾尔族人其实并没有特别感到自己与浩罕人之间的区别，很久以前两地区居民之间自由往来，两地区之间存在着经济交流关系。但是因为在征服回疆时逃亡到浩罕汗国的喀什噶尔·和卓家族成员在信徒中依然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因此清王朝必须常常警惕他们的复辟活动。所以，从乾隆时期开始，维吾尔族人与浩罕汗国之间的自由往来遭到禁止；到了嘉庆时期，甚至连阿奇木·伯克与浩罕汗国等各外国之间的通信也遭到了禁止。[1-39]

以正统中华王朝自任的清王朝，出于满族维护其统治中国的民族目的，在政治与经济上对维吾尔族人、尤其是对维吾尔族社会的上层进行优待，但是却实施民族隔离政策，将他们与汉族民众彻底隔离开来。而另一方面，清王朝却一直对维吾尔族人出现分离思想保持警惕，尤其是对各种伊斯兰教活动设置诸多的限制，不允许维吾尔族社会作为一个纯粹的伊斯兰共同体——“乌玛”（Umma）而存在。清王朝统治下的维吾尔族社会，就这样变成了一个既不是“中华”又不完全是“穆罕默德的乌玛”的存在。

第三节　从喀什噶尔和卓家族的“圣战”到“新疆建省”

来自伊斯兰的挑战

1765年（乾隆三十年），即在清王朝征服回疆仅仅六年之後，乌什地区的维吾尔族居民，就因为无法忍受阿奇木·伯克阿卜杜拉及驻在大臣素诚的压榨而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此时，清王朝的回疆统治政策已经开始显露出它的重大缺陷，那就是伯克制造了维吾尔族社会严重的阶级对立。

在《钦定回疆则例》当中，制定了许多对伯克颁发的禁令。其内容之细告诉我们：这些条款都是清王朝因为伯克利用自己的权力压榨维吾尔族民众的现象再三发生而制定的。从其他的清王朝文献中，也可以看出伯克夺人妻女和土地，独占农地用水，肆意增加“燕齐”人数等现象不时发生。清王朝在征服回疆之後，虽然实施了减税，但是由于伯克的压榨，维吾尔族民众的财政负担反而比从前加重了。虽然“民之畏官，不如畏其所管头目”，[1-40]但是在出身于满族、握有代表清王朝政府选择、提拔和监视伯克、阿訇大权的驻在大臣中，也有通过伯克压榨维吾尔族居民，甚至奸淫维吾尔族妇女的现象发生。

进入19世纪以後，清王朝在选择和任命驻在大臣的问题上，逐渐不似以前那样慎重，纯粹是抱着榨取钱财目的而进入回疆的驻在大臣越来越多，驻在大臣的不法行为也就更加严重。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清王朝对维吾尔族社会的统治，开始受到来自当初逃到浩罕地区的喀什噶尔·和卓家族所发动的“圣战”（Jihad）的挑战。

喀什噶尔·和卓之所以会发动“圣战”，与浩罕汗国对他们的支持密不可分。在清王朝征服回疆之後，浩罕政权与清王朝形成朝贡关系，从名义上成为了清王朝的藩国。在这段时间里，清王朝每年给浩罕政权一定经费，让他们监视喀什噶尔·和卓家族。但是在进入19世纪以後，浩罕政权逐渐发展为一个强大的汗国，从1817年开始对清王朝不断提出要求，要求清王朝同意对进入回疆的浩罕汗国商人免除关税，同意浩罕汗国在回疆设置长老（Aq-saqal）独自对本国商人征税等贸易特权，并且以如果清王朝不同意的话就释放喀什噶尔·和卓，对清王朝进行要挟。当他们的这些要求被清王朝拒绝以後，浩罕汗国逐渐改变了态度，开始支持喀什噶尔·和卓回到喀什噶尔地区。由喀什噶尔·和卓成员所发动、旨在恢复他们在回疆统治地位的“圣战”，先後在1820年、1824年、1826年、1828年、1830年、1847年、1852年和1857年发生过八次。尤

其是从1820年到1828年由和卓・张格尔（Hoja Janger，波罗尼都的孙子）所发动的四次圣战，即所谓的“张格尔之乱”时间最长，规模也最大。清王朝共计花费了1,000万两银的经费和投入了36,000人的军队，经过七年时间才最终扑灭了这场叛乱，最後捕获了和卓・张格尔并且押到北京处死。[1-41]

应该注意到的是，1826年和卓・张格尔从浩罕带来的部队不过五百人，但是在进入喀什噶尔地区以後，由于当地维吾尔族居民的参加马上就增加到一万人。这说明，尽管清王朝从各个方面对伊斯兰教进行了严厉的限制，但在维吾尔族社会中，伊斯兰教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势力和影响力。当然，“圣战”之所以能够得到当地维吾尔族人的支持，除了他们对和卓家族的信仰之外，因驻在大臣及阿奇木・伯克的腐败所造成的清王朝威信的低落，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由喀什噶尔・和卓家族成员所发动的历次“圣战”之所以最终都没有取得成功，其原因除了清王朝军队占有绝对的优势以外，喀什噶尔・和卓在进入维吾尔地区以後，因为虐待和虐杀当地的黑山派信徒，从而失去了当地维吾尔族居民的支持，也是造成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在每次圣战失败以後，维吾尔族居民中都有许多白山派信徒随着和卓迁往浩罕汗国。到了1850年代，已经有约五万户的维吾尔族人迁往浩罕汗国，从而形成了喀什噶尔・和卓家族的基本支持队伍。[1-42]

1828年，为了寻找“张格尔之乱”的善後政策而被派遣到回疆的直隶总督、钦差大臣那彦成，在回到北京以後，向清王朝中央政府告发了许多驻在大臣和伯克的不法行为。清王朝政府根据他的意见，决定加强对大臣们的监察，同时增加他们的俸禄以减弱他们压榨的欲望。然而，驻在大臣们的不法行为大多都是通过维吾尔族伯克之手得逞的，比起这些异民族统治者的压榨，维吾尔族伯克对民众的压榨实际上更加苛酷。[1-43]尽管如此，清王朝对这些伯克并没有采取特别严厉的惩罚和监察措施。“张格尔之乱”以後，清王朝政府通过改变伯克的任务划分以强化对维吾尔农村地区的统治，首先是将维吾尔农村地区进行细分，然後将一部分的中下级伯克的职权，从过去各人分管征税和水利等，改成每人管理一个细分化後地区中所有的事务。[1-44]也就是说，在阶级对立变得越来越激烈的时期，清王朝反而增加了伯克手中的权力。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清王朝政府又开始“卖官”，即将各伯克的官职标上价码出售。以上这些措施，让原本功能就不健全的伯克制更是雪上加霜。

但是，喀什噶尔・和卓家族的圣战，也让清王朝开始反省他们在回疆实行的民族隔离政策。清王朝注意到，他们之所以未能将叛乱防止于

未然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他们出于实行民族隔离的考虑而将天山南部的防卫交给了换防兵，1830年的“玉素普和卓叛乱”之後，清王朝从伊犁调来三千名骑兵、从内地调来四千名士兵增派到回疆，从而组织起了新的军事体系。[1-45]

清王朝政府虽然从削减各省军费中筹措到了镇压“张格尔之乱”所必需的经费，但这说到底不过是一次临时性的措施。由于出现了全国性的财政困难，清王朝通过没收“圣战”支持者的家财，增加商业税收，改铸普尔钱，以图增加在当地的财政收入。但是以上措施，由于当地人口的流失，效果并不显着。於是，清王朝允许内地的农民移居到南疆，1832年在巴楚（Barchuk）建立了“户屯”。其後，清王朝考虑到维吾尔族人的利益，一时决定放弃屯田，但是最终由于财政困难，两年後还是决定了在回疆各地建立内地农民（汉族、回族）的“户屯”。

维吾尔族社会统治体系的重建

1864年6月4日，驻扎在新疆库车的清军中的回民士兵，认为清王朝因为担心“西北回乱”蔓延到新疆而在计划着对他们进行屠杀，所以先行发动了叛乱。库车的维吾尔族居民随之趁机起事，他们推举伊斯兰教的指导者“和卓”为领袖，将事件迅速转换为一场针对“不信仰者”（kafir）的“圣战”，并在数日之内先後攻占了赛里木、拜城两座城池，之後又攻下了回疆地区的两座大城——阿克苏和乌什。

以此次库车事件为起点，新疆各地的穆斯林纷纷起事。与库车事件不同，参加者们从最初就将攻击目标定为“不信仰者”，即让起事具有了伊斯兰教“圣战”的性质。从组织特徵上来看，各地的“圣战”可以分为以下三种：（1）由回民所发动的叛乱；（2）由伯克领导的起事；（3）由伊斯兰指导者领导的起事。到了11月间，在伊犁将军驻扎的北路的伊犁地区，维吾尔族居民也起事并占领了伊宁。至此，清王朝的新疆统治体系已经全面崩溃。

伯克制带来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也是让当地维吾尔族民众参加1864年起事的一个原因。[1-46]但是，维吾尔族不是一个单纯的阶级集团，当时能够统合整个维吾尔族社会的只有伊斯兰教，维吾尔族居民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认同都无法摆脱伊斯兰教的影响。也正是因为如此，各地起事才会都变成了“圣战”。而正是因为“圣战”这个名义，1864年的起事才能够很快就聚集起大量的支持者，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的胜利，这在19世纪中期的维吾尔族社会里，也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现实。

但是，也正是因为起事的这一性质，在清王朝的统治体系彻底崩溃、圣战的目标消失以後，维吾尔族社会便开始分裂成各种不同的势

力。各种势力经过数次拼搏，最终库车的和卓政权占领了库车、阿克苏和叶尔羌地区，斯迪克伯克（Sidik Beg）占领了喀什噶尔地区，哈比甫·哈吉（Habib Ghaji）占领了和田地区，他们分别在这些地区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这一点也说明，当时在居住于各个不同绿洲、属于不同的伊斯兰教宗派、没有一个独自统一的行政体系的维吾尔族社会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可以统合所有维吾尔族居民的民族意识。

1865年1月，喀什噶尔和卓家族的布素鲁克汗·和卓（Buzurug Khan Hoja）从浩罕回到了回疆，一说是他此行是因为受到了浩罕将军阿古柏·伯克（Yaqub Beg）的胁迫。[1-47]挂着司令官名义与和卓一起来到喀什噶尔的阿古柏·伯克，一直是一个具有强烈政治野心的人物。此次他趁乱入侵之後，以其独特的军事才能和毒辣的政治手腕，首先彻底消灭了残留在回疆境内的清王朝军队，之後又先後杀害或驱除了以布素鲁克汗·和卓为首的喀什噶尔·和卓家族的所有成员，1866年12月消灭了和田的哈比甫·哈吉政权，1867年6月消灭了库车的和卓政权，并杀害了它们的领导人，最终建立起了自己统治的包括七个城市地区的政权（Yette Xeher）。[1-48]



阿古柏

阿古柏本人并本非维吾尔族，他之所以能够统治维吾尔社会达十年之久，其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他所实施的伊斯兰教政策上。

阿古柏·伯克常常装作虔诚的穆斯林，据说是“不做礼拜就一步不

动”，到各地出访时也一定要给伊斯兰教学校的学生和清真寺的阿訇们捐献金钱和衣物，即使侵略各地时，也一定不忘前去参拜当地的圣人麻扎（墓地），还修缮了他自己破坏了的喀什噶尔·和卓家族的麻扎。除此之外，他还在各地设立宗教裁判所，提高了阿訇的社会地位。[1-49]阿古柏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通过伊斯兰教这条管道消除维吾尔族人对于自己的不信任和反感。这种做法收到了一定成效，维吾尔族社会中的一部分阿訇，最後变得积极协助阿古柏·伯克政权。但是，阿古柏·伯克在他的征服战争中使用了卑劣的手段，消灭了在维吾尔族社会活跃了三百年的和卓家族，还对当地的维吾尔族人进行残酷的屠杀，[1-50]将政权中几乎所有的重要位置都交给自己从浩罕汗国带来的人物担任，这些都引起了当地维吾尔族民众的强烈不满。

阿古柏·伯克统治维吾尔族社会的时期，也是帝俄和英国势力开始侵略新疆的时期。事实上，当初由清王朝统治的新疆，曾经起到了两大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缓冲地带的作用。但是，当1864年的穆斯林起义使新疆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单位後，俄国和英国都开始趁机涉足这一地区。阿古柏·伯克为了取得统治维吾尔族社会的合法性，一面开始向奥斯曼帝国寻求支持，同时还开始接近企图由印度北上的英国势力。1870年和1873年，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向喀什噶尔派遣了以T. D. 弗西斯（T. D. Forsyth）为团长的使节团，答应向阿古柏·伯克提供军事援助，因此得以在1874年与阿古柏政权签订条约，取得了在天山南部地区进行自由通商的权利、居住的权利、最惠国待遇和治外法权。而俄国在1871年5月，借着“替清王朝恢复统治”的名义消灭了伊犁地区的穆斯林政权，在占领伊犁河谷地区之後，于1872年派遣了以卡乌里巴鲁大尉（Kaul Bars）为团长的使节团，与阿古柏·伯克签订了条约，得到了多少年来梦寐以求但一直没能够得到的天山南部的自由通商权、低关税和驻扎通商代表的权利。[1-51]

英国甚至一度通过外交渠道，试图强迫清王朝承认阿古柏·伯克政权。[1-52]恰值在此期间，清王朝又遇到了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的事件。在遭到西方列强侵略的同时，又受到了在清王朝看来曾经是东方小国的日本的侵略，这一现实给了清王朝政府以极大的冲击，政府内部开始出现必须强化中国东南海防的声音。但是由于要向外国支付战争赔偿和国内频繁用兵，清王朝陷入了深刻的财政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政府内部围绕着是否应该收复新疆，展开了一场大争论，这就是所谓的“海防·塞防论争”。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论争，几乎都是围绕着欧洲列强势力对新疆的侵略和渗透究竟能给中国带来多大威胁这一问题所展开的。直隶总督李

鸿章认为，从地政学上来看，新疆始终逃脱不了俄国和英国的威胁，清王朝政府每年花费数百万两的银子来保卫广大的沙漠地带实在是不合算，主张“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防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1-53]

针对这种意见，陕甘总督左宗棠等人则主张应该同时重视西北边疆的陆上防御和海上防御，对于中国来说，俄国与英国同样、甚至是比英国还要危险的国家，强调“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1-54]清王朝皇帝最後同意了左宗棠等人的意见，1876年（光绪二年），清军在左宗棠的指挥下开始了收复新疆的战争。到了1877年12月，清军就已经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之外的新疆全境，阿古柏・伯克本人也自杀身亡。[1-55]从阿古柏政权手中收复新疆的战争结束以後，清王朝政府又通过与俄国政府的长期交涉，在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之後，于1881年收回了伊犁河谷地区。

清王朝总结以往在统治新疆政策上的失败，于1884年在新疆导入了与内地相同的省制。随着省制的导入，新疆全境被编为与内地同样的道、府、州、县，清王朝事实上废除了包括伯克制在内的传统统治体制。然而，“新疆建省”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它还说明了以下事实：在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际环境中，清王朝已经无法只从内政的观点出发考虑新疆的存在意义。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过去的那种思想和由此而来的政治体制，即通过制造一个同时具有民族和国家性格的双重政治构造，对汉族和周边的民族集团实施民族隔离，让内地的汉族居民和周边的民族集团互相牵制，从而让他们能够顺利统治整个中国。

小　结

清王朝当年在新疆所建立的统治体制，并不仅仅是针对新疆，而是从作为一个非汉民族统治整个中国这一实际情况出发而建立的。所以，它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将当地维吾尔族民众看做是满族统治者的属民而禁止他们与汉族社会接触，将维吾尔族民众居住的回疆看作是满族的领地而禁止汉族民众向这里移居，其目的就是为了将维吾尔民众也纳入到为牵制内地汉族民众而建立起来的藩部体制里。因此，清王朝明文规定当地居民不许学习汉文，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向这些地区传播，并且通过各种制度，明示或暗示当地的民族集团：他们与汉族不同但却与满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虽然清王朝为牵制内地的汉族民众而设下了各种繁杂的政策制度，成为它能够统治了中国近270年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毫无疑问，这些让维吾尔族民众实际上身处伊斯兰教的“乌玛”与中华之间的夹缝之中的制度和政策，同时也坚决地阻止了维吾尔族民众形成中国

人和中国国家的意识。

“新疆建省”，具有将新疆从一个满族的军事自治领重新定义为中国国家领土一部分的性质。汉族官僚从此可以成为新疆的最高行政和军政首长，许多汉族官僚被清王朝政府派往新疆各地，政府还积极推进内地汉族农民向包括回疆在内的各地区移居。这样，维吾尔族等新疆当地民族集团的性质也就从“满族皇帝之民”变为了中国国家之民。为了培养当地民族的中国人意识，清朝在各地建立了官费学堂，同时强行推动维吾尔族人学习汉语，由此开始了新疆的内地化和维吾尔族民众的中国国民化进程。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新疆建省”以来清王朝做出的这些努力，在欧美和日本等许多国家早已完成国内政治统一、转型为国民国家的时代，在一个面对欧洲文明的扩张，中国对于周边民族来说已不再是唯一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文明中心的时代，不能不说已是为时过晚。此前百余年中由他们自己培植起来的维吾尔族只属于清王朝、而与汉族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意识，已经变成一个孵化独立思想的病灶，深深地埋植在了维吾尔族社会的肌体里。

注释:

[1-1]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第323页。

[1-2]新免康：《边境的民と中国》，《アジアから考える》，第3卷，《周縁からの歴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第104页。

[1-3]松筠：《钦定新疆识略》，第3、12卷（上海：上海积山书局石印，1894年初版；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1-4]虽然现在这一地区被一部分人称为东突厥斯坦，但事实上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没有任何一位维吾尔人或者清朝的官僚用这一名称称呼该地区。

[1-5]清傅恒等奉敕撰：《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10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772年刊）。

[1-6]清傅恒等奉敕撰：《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14卷。

[1-7]《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第555卷（台北：华联出版社，1964）；松筠：《钦定新疆识略》，卷首。

[1-8]袁大化修，王树枏、王学曾总纂：《新疆图志》，第10卷，天章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11年初版，1992年版）。

[1-9]傅恒等撰：《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第39、44卷。

[1-10]《大清世宗宪（雍正）皇帝实录》，第96卷（台北：华联出版社，1964）。

[1-11]片冈一忠：《清朝新疆统治研究》（东京：雄山阁，1991），第65页。

[1-12]《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第666卷。

[1-13]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钦定回疆则例》，第5卷，《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综合卷（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88）。

[1-14]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乾隆朝理藩院则例》徕远清吏司，《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综合卷（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88）。

[1-15]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钦定回疆则例》，第1、2卷。

[1-16]松筠：《钦定新疆识略》，第8卷。

[1-17]佐口透：《新疆ウイグル社会の农业问题（1760-1820）》，《史学雑志》，第59卷，第12号（1959），第28-29页。

[1-18]童玉芬：《中国新疆的人口与环境》（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第84页。

[1-19]林恩显：《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第104页。

[1-20]佐口透：《新疆ウイグル社会の农业问题（1760-1820）》，第25-26页。

[1-21]滨田正美：《“塩の义务”と“圣戦”との间で》，《东洋史研究》，第52卷第2号（1993），第131-136页。

[1-22]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钦定回疆则例》，第6卷：“禁止换防绿营弁兵及发遣为奴人犯擅娶回妇。”

[1-23]林恩显：《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第170页。

[1-24]《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第746卷；林恩显：《清

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第207页。

[1-25]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第134、164页。

[1-26]林恩显：《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第221页。

[1-27]《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第610、612卷。

[1-28]林恩显：《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第150页。

[1-29]松筠：《钦定新疆识略》，第8卷。

[1-30]苏尔德：《回疆志》，第3卷（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修）。

[1-31]林恩显：《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第302页。

[1-32]林恩显：《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第228页。

[1-33]《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第983卷。

[1-34]清王朝在中国西南地区实施的“土司制”与“伯克制”相似，同样也是一种使用当地民族社会的上层进行统治的体制。但是实施“土司制”的地区属于吏部和兵部管辖，而实施“伯克制”的回疆则属于理藩院和兵部，在国家政治结构中两者的定位截然不同。

[1-35]《大清圣祖仁（康熙）皇帝实录》，第2卷（台北：华联出版社，1964）。赵云田：《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301页。

[1-36]《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第571卷。

[1-37]林恩显：《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第71-85页。

[1-38]松筠：《钦定新疆识略》，第3卷。

[1-39]松筠：《钦定新疆识略》，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钦定回疆则例》，第8卷。

[1-40]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3卷（上海：上海书店，1986）。

[1-41]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0: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I(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366.

[1-42]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0: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I(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359.

[1-43]冯家升、程溯洛、穆广文编着：《那文毅公奏议》，第77卷，《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下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1-44]堀直：《清朝的回疆统治についての二，三问题-ヤールカンドの一史料の検讨を通じて》，《史学雑志》，第88卷，第3号（1979），第16-18页。

[1-45]Fairbank and Liu, Late Ch'ing, p. 374.

[1-46]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新疆简史》，第2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第110页。

[1-47]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日文版，第99页。

[1-48]Molla Musa Sayrami, Tārīkh-ī Khāmīdī ［伊米德史］(Beijing: Millatla Nasriyati, 1988）, p. 362.

[1-49]Molla Musa Sayrami, Tārīkh-ī Khāmīdī ［伊米德史］(Beijing: Millatla Nasriyati, 1988）, pp. 497-503.

[1-50]按照Tarihi　Hamidi等维吾尔文献的说法，阿古柏・伯克为了镇压反抗，屠杀了和田的五万维吾尔人，毒死了白山派的卡他汗・和卓和克其克汗・和卓，将倭里汗・和卓投入井中活埋了。

[1-51]Demetrius C. Boulger, The Life of Yakoob Beg: Athalik Ghazi, and Badaulet; Ameer of Kashgar (London: Wm. H. Allen & CO., 1878), pp. 212-232.

[1-52]郭嵩焘着，陆玉林选注：《使西纪程——郭嵩焘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第123页。

[1-53]宝鋆等编：《筹辨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卷（故宫博物院用抄本影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1-54]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第46卷。

[1-55]袁大化修：《新疆图志》，第116卷。但是，前引Molla Musa Sayrami, Tārīkh-ī Khāmīdī, pp. 490-491等维吾尔语文献认为阿古柏・伯克是被维吾尔人的尼亚孜・伯克所毒死的。

第二章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起源

运动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发生形态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首次发生在1933年。历史上的每个事件固然会有它偶然性的一面，但是从未有过先例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为什么能够突然动员了大量民众，并在新疆境内许多地方同时展开？这些事实只能说明，近代新疆社会里的确存在着诱发民族问题的因素。

本章聚焦于近代新疆的社会结构，通过分析诱发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发现产生独立运动的思想起点，探讨支撑运动的思想体系，并且在分析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组织特徵的基础上，厘清所谓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性质。

第一节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思想体系

“东突厥斯坦”

众所周知，“突厥斯坦”的意思就是“突厥人的地方”，通常被划分为属于中国领土的东突厥斯坦和属于前苏联领土的西突厥斯坦两个部分。但实际上，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原本是表示地理概念的“东突厥斯坦”的内涵都并不明确。

所谓空间上的不明确，就是因为“东突厥斯坦”有时被用来指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有时被用来指包括新疆东部的哈密盆地在内的地区，而有时又被用来指新疆全境。所谓时间上的不明确，就是因为过去对于“东突厥斯坦”（Xarh Turkistan）这个词语何时才出现在维吾尔语中，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而某些文献，甚至将突厥居民迁入前的新疆也称为“东突厥斯坦”。

虽然1878年在伦敦出版的《阿古柏·伯克传》（The Life of Yakoob Beg），已经把新疆南部称为“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Eastern or Chinese Turkestan），[2-1]但我们注意到，维吾尔族历史学家毛拉·穆萨·塞拉米（Molla Musa Sayrami）在他1908年完成的《伊米德史》（Tārīkh-ī Khāmīdī）中依然将这个区域称为“蒙兀尔斯坦或七城地区”（Mogulistan Yurti yaki Yette Sheher）。[2-2]又有资料证明，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维吾尔民众还没有将这个地区称作“东突厥斯坦”。在一份批判维吾尔族国会议员的文件——《北京政府时代之新疆议员》中，维吾尔族作者自称为“南疆人”（新疆南部的居民）。[2-3]以上这些都能说明，即使对当地的维吾尔人来说，“东突厥斯坦”这一地名也是一个进入近代以後才被接受的“外来语”。

到了1930年代，维吾尔族人开始大量使用“东突厥斯坦”一词，这应该与当时开始出现“东突厥独立运动”有关。据日本学者新免康介绍，1933年9月，吐鲁番叛乱的领导人在寄给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书信中，谈到了“东突厥斯坦”和“西突厥斯坦”的现状。[2-4]事实上，英国在“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发生过程中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2-5]这与英语中“东突厥斯坦”一词在维吾尔语中的渗透是否具有关联性，还有待今後继续研究。在1933年11月16日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机关报《独立》上，已经有了这样的表述：“我们的口号是‘东突厥斯坦是东突厥斯坦每个人的东突厥斯坦’。……我们不用他们［汉族］的语言和地名。”[2-6]经过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东突厥斯坦”这个地名终

于渗透进了维吾尔语中。也正是从这种表述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出，“东突厥斯坦”的意识最初就是基于批判其他民族的压迫，以及主张自己的民族意识和领土意识的目的而产生的。而这种民族意识和领土意识的产生，当然与维吾尔民族在自我认识上的变化有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东突厥斯坦”意识与“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之间在思想上的关联。

“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和“泛突厥主义”

1880年代，也就是清王朝实行“新疆建省”的前後，随着平定阿古柏・伯克政权之後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俄国获得俄国商人在新疆地区完全免税和允许“以货相易”、“以各种货物抵账”等特权之後，[2-7]维吾尔族社会与俄国（实际上是鞑靼商人）之间的贸易迅速扩大，出现了因从事工商业、尤其是商业而致富的巴依（bay，富人），也就是工商业资本家阶层。与此同时，随着维吾尔族社会与外部、尤其是外国之间交流逐渐扩大，维吾尔族社会悄然兴起了一场近代文化启蒙运动。

“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是19世纪末由“开始对自己的民族认同抱有深刻的危机感”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和“一部分宗教人士”所开始的以普及新式学校教育（Usul Jadit）——除伊斯兰教育之外，同时教授历史、地理、数学、化学等近代科学知识——为中心的运动。[2-8]而从经济上支持这场运动的，就是上述从事工商业而致富的巴依即工商业资本家阶层。

“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最早开始於天山南部维吾尔族社会文化和经济中心的喀什噶尔地区。根据一位维吾尔族老人的回忆，1883年，在位于喀什城市北面约20余公里处的阿图什县的依克沙克地方，着名的工商业资本家胡赛因・穆萨巴约夫（Husayn Musabayow）和巴乌东・穆萨巴约夫（Bawudun Musabayow）兄弟倡议开办了维吾尔族社会第一座新式学校。“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在1910年代迎来了高潮。例如，到麦加朝觐的知名阿訇阿不都卡迪尔・大毛拉（Abdukadir Damulla），经土耳其和埃及回到喀什噶尔後，于1912年在喀什城里办起了当地第一座新式学校。[2-9]在此前後，伊犁、吐鲁番、奇台、哈密、库车、阿克苏等地的维吾尔族社会里都陆续建起了新式学校。[2-10]

在许多维吾尔研究文献和老一代维吾尔族人的记忆当中，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当中尤其值得关注的内容，是运动中盛行的“国外留学”和“聘请外国教师”风潮。其实，这里的“外国”基本上只限于奥斯曼土耳其和俄国。而且还要注意到，这里关于“国家”的表述方式也并不确

切。因为去俄国留学的维吾尔族人并不是去俄国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而是全部集中在俄国的喀山地区，从俄国招聘来的教师也全都是喀山地区的鞑靼人。[2-11]

由于从喀什城里被招聘前来任教的教员出身于传统的宗教学校，无法满足新式学校的教学需要，穆萨巴约夫兄弟就送七个维吾尔族青年到与自己有贸易关系的俄国喀山地区去留学。这些人回国之後，又回到依克沙克学校，扩大了学校的教育规模，并根据当时喀山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学校的课程设置课程，制订了学校的教学内容。据说到了1892年，由穆萨巴约夫兄弟派遣到俄国和土耳其去留学的人员已达到50名以上。穆萨巴约夫家族负担了留学的全部费用。[2-12]

日本研究伊斯兰问题和当年苏联民族问题最着名的学者山内昌之曾经指出："在19-20世纪初期的鞑靼社会中，学校教育的改革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通过这一改革，喀山在"1905年革命後成为俄国穆斯林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伊斯兰世界中扮演着并不亚于伊斯坦布尔、开罗、贝鲁特的角色"。[2-13]这一点，对于理解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的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维吾尔族社会之所以加深了与鞑靼社会之间的交流，是因为在作为"被统治民族"而寻求民族的未来出路的问题上，这两个社会具有相似的地方。而在这个问题上获得一定成功的鞑靼社会，可以向维吾尔族社会提供一个现成的榜样。

作为唯一一个由突厥人主导的独立国家，土耳其在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疆南部的新式学校曾经聘请过许多土耳其人教师，这已经被很多维吾尔族人士的回忆录所证实。在土耳其留过学的维吾尔族人在启蒙运动中也非常活跃。[2-14]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巴乌东・穆萨巴约夫先後从土耳其聘请了阿巴拜克里（Ababakil）、艾哈迈提・卡玛尔（Ahemet Kamal）、阿布都拉赫曼（Abudu Rahim）、穆凯莱（Mukal）等人来校任教。阿巴拜克里于1905年回国後，艾哈迈提・卡玛尔成为中心人物。应巴乌东・穆萨巴约夫的请求，艾哈迈提・卡玛尔于1907年在依克沙克办起了维吾尔族社会第一座师范学校。[2-15]但是，又有其他人认为艾哈迈提・卡玛尔是因为受到穆萨巴约夫家族的邀请，于1913年3月来到喀什噶尔地区的。当初的设想是在喀什城里建立师范学校，但是因为受到守旧势力的反对，才把校址改在了依克沙克，该师范学校于1913年4月19日开学。[2-16]

应穆萨巴约夫家族的邀请来到喀什噶尔地区办起师范学校的艾哈迈提・卡玛尔在学校中，教育学生们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才是他们的领袖，教学生们演唱土耳其的进行曲，其教育内容具有强烈的泛伊斯兰主义和

泛突厥主义的倾向。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世界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教育唤醒当地的维吾尔族居民的“突厥人”意识，让他们感到对于“突厥人同胞”的责任，支持“伊斯兰世界盟主”的奥斯曼帝国。[2-17]在土耳其留过学的伊犁的麦斯伍德・赛布里，也在新式学校里教育学生说：“我们的祖先是突厥人”。[2-18]



1930年代喀什城内

毫无疑问，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的思想源流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土耳其和喀山鞑靼社会。“鞑靼突厥和奥斯曼土耳其，都是近代突厥民族主义的发祥地。”[2-19]“近代突厥民族主义”就是所谓的“泛突厥主义”。特别是诞生於鞑靼社会的“泛突厥主义”，将加强突厥民族之间的团结，以使“被压迫”的突厥民族能够得以在近代国际社会继续生存发展为目的。[2-20]许多维吾尔族人正是通过与这两个地区的交流，接受了泛伊斯兰主义，尤其是泛突厥主义的强烈影响。

1933年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发生的时候，具有留学土耳其经历的阿图什的新式学校的教师动员学生支持运动。[2-21]从这个事实中就可以看出有着土耳其留学经验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与现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以及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的主要成员，後来大都成为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领导者，这也可以说明两个运动之间的思想联系。

第二节　　第一次独立运动

独立运动的原点

1931年3月的“哈密起义”，拉开了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序幕。哈密起义的导火索是当时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出于扩张权力目的而推行的“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就是废除以前由清政府任命的维吾尔族“王”，将属于王府的维吾尔族农民编入由普通官吏管理的地方行政体系。因为此前维吾尔族农民已经为争取废除“哈密王制”而先後举行过两次起义，所以可以说这一行动原本是顺应维吾尔族农民要求的。但是，这件事不仅让过去与王府有关系的人丧失了政治特权，又因为政府所派军队压榨当地民众，加之汉族移民的不断增加，威胁到了一般维吾尔族农民生活的安定，[2-22]从而引起了维吾尔族社会上层以及一般民众的普遍不满。

从参加起义者杀害了全部汉族移民一事，可以看出哈密起义从一开始就带有“反汉”的性质。若干当事者的回忆文章，指出起义指挥部的组成人员都是与旧王府有关系之人。具有不同目的的两个阶层，能够在反对汉族人的斗争中联合起来的事实说明：对于当时的维吾尔族社会来说，当时，相比起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来，民族之间的抗争显得更加重要，也更有感召力。[2-23]

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由各地维吾尔族人所掀起的民族运动中，从最早的“哈密起义”，直到运动逐渐扩大至天山南部之前，都没有出现“东突厥斯坦”一词。前文已经提到，哈密地区有时并不包括在“东突厥斯坦”的概念之内。这一地区位于中国内地与新疆南部维吾尔族社会之间，因这种地理位置能够与中国内地频繁交流，移居到这个地区的汉族人的人数也无疑多于其他地区。[2-24]因为有这种历史和社会背景，当时哈密地区的维吾尔族居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东突厥斯坦”的意识，确实值得怀疑。

然而，和哈密地区相比，新疆南部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维吾尔族社会。从参加运动者提出的“突厥斯坦是突厥人的故乡，当然要变其为突厥人的地区”，[2-25]和把“经过长年累月而弄脏我们的土地”的汉族人“赶回他们老家去”这些具有强烈独立意识的口号中可以看出，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发生和部分维吾尔族人强烈的领土意识有关。[2-26]因此可以确定，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基本思想，就是“推翻中国的统治”和争取“民族土地的解放”，而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最基本特徵，就是攻击和排除

一切具有“中国”符号的东西。

运动的组织特徵

关于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失败的原因，与其说是来自于敌方的攻击，还不如说是运动内部上层之间的对立。1934年5月，“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和加·尼亚孜（Hoja Niyaz）与新疆省政府达成协议，拘押了总理沙比提·大毛拉（Sawut Damulla）和司法部长并将他们交给了新疆省政府，使“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在省政府军还没有到达喀什噶尔之前就已经崩溃。在此意义上，和加·尼亚孜才是埋葬了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和加·尼亚孜和沙比提·大毛拉同样都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首脑，事实上分别指挥不同的集团。“哈密起义”的领导人和加·尼亚孜指挥着由来自于新疆东部的哈密和吐鲁番地区的起义者组成的、逐渐向西面喀什噶尔地区败退过来的部队，而沙比提·大毛拉则领导着从塔里木盆地南部的和田到喀什噶尔这一地区为中心展开的、以建立民族独立政权为目标的民族主义集团。沙比提·大毛拉才是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精神领袖。

因为在这两个集团中，都有出身于吐鲁番的人和伊斯兰教人士，所以无法完全以地域或宗教意识来判别两个集团的性质。沙比提·大毛拉出身于喀什噶尔地区的阿图什，既是宗教人士同时又是在土耳其等地留过学的一位“接受了近代教育和政治洗礼”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2-27]据称，追随他的人也多是“到外国留过学的青年”。[2-28]所以，可以说沙比提·大毛拉的集团是以接受过近代教育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为核心形成的集团。以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为主要推动者和参加者，这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第一个重要的组织特徵，这个特徵同时也反映出了独立运动与“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之间的传承关系。

被称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之父的沙比提·大毛拉，曾在给印度伊斯兰青年组织的信中，坦率地承认维吾尔族社会的现状严重落後于国际社会。[2-29]“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体制采用“共和制”，政府的运作形式采用“合议制”，这些主张都被写进了1933年11月12日在喀什宣告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建国纲领”里。[2-30]但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建国纲领里还明确提出：“担任政府职务的人必须是熟知古兰经与现代科学之人”，[2-31]就是说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没有提出实行政教分离。从这个“建国纲领”中还可以看出，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政治理想中，除了有消灭来自于汉族独裁者的民族压迫、脱离中国的主张之外，也有推动维吾

尔族社会实现近代化的部分。这也同样反映了独立运动与“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之间的思想传承关系。

受到“哈密起义”的鼓舞，新疆南部，即南疆各地也相继发生了“起义”。从这些“起义”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宗教人士的推动作用，以及“伊斯兰圣战”精神对起义参加者们所起到的鼓舞作用。曾在“起义”指挥部任职的一位人士回忆说，在“吐鲁番起义”时，从指挥部人员到一般参与者都充满了伊斯兰宗教热情。[2-32]据说在“和田起义”前，沙比提・大毛拉用“伊斯兰圣战”的理论动员和田地区的维吾尔族人。[2-33]“谨遵古兰经”也被明确写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建国纲领当中。[2-34]尽管时日不多，但正是因为这种与伊斯兰教的关联，让各地的起义队伍都曾经一度统一于这个“共和国”之下，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之所以要通过“伊斯兰圣战”的口号进行统一，是因为“起义”的参加者原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地区，虽然在反对民族压迫的层面上可以找到共同语言，但各个阶层在参加运动的动机和目标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特别是由于各地区的居民大多从事着自给自足的绿洲农业自然经济，各个绿洲之间的对立造成了维吾尔族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地域意识。[2-35]另外，在各地“起义”中还能够看到来自苏联、阿富汗的乌兹别克人的身影。因此，要想在政治上统一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阶级的不同利益集团，只有“伊斯兰圣战”的“大义名分”才能够将所有的人凝聚在一起，这完全是由当时维吾尔族社会的现实所决定的。利用伊斯兰教的名义动员民众，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第二个重要的组织特徵。可以看到，不仅在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时期，以後历次运动出现时，组织者也都是通过“伊斯兰圣战”的口号来动员民众投身运动，通过伊斯兰教的管道来谋求统一参加独立运动的各种政治势力。

第三节　新疆地区社会的民族压迫

政治上的不平等

从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发展到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过程证明：正是接受国外近代思想和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影响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所抱有的民族危机感，成为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萌发的原动力。这种民族危机感，来源于民族所处的社会现状。20世纪前半期新疆社会中存在的民族压迫问题，就是促使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萌发的最直接的原因。

一位学者把19世纪後半期以前的维吾尔族社会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定义为“朝贡国与宗主国的关系”。[2-36]这种定义有其不恰当的一面，但是毫无疑问，清政府曾经给予维吾尔族社会一定的自治权利。然而，在清朝收复新疆，尤其是1884年实行“新疆建省”以後，维吾尔族社会独特的官僚制度——“伯克”制度被废除，维吾尔族社会被纳入到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之下。随之，大批的汉族人作为官僚和移民等进入了新疆，也进入了维吾尔地区。[2-37]

根据中华民国内政部1928年的国情调查，新疆当时的总人口为2,551,741人，其中维吾尔族人口占70%，汉族人口不到10%。[2-38]但实际上维吾尔族的人口可能更多一些。根据崛直的计算，1940年维吾尔族人口总数为2,941,000。如果利用崛直给出的计算数据做进一步测算的话，当时的汉族人只有234,715人。[2-39]不论这个推算正确与否，新疆当时的汉族人口极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些汉族人，许多都是官僚、军人或商人，新疆地区社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实权基本掌握在这些人的手里。[2-40]

中华民国时期新疆的政治实权掌握在汉族人手中，这一点从当时的行政结构和官员的民族结构中就可以看出。进入中华民国时期之後，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统治新疆的大都是同时兼任行政长官（省长）和军队最高指挥官（督办）、坚持“闭关自守”方针的汉族出身的军阀独裁者。省政府机关的四厅一署（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和外交署）的首长也全都是汉族人。[2-41]由于他们把新疆变成了与中央政府及内地几乎隔绝的“桃花源”，[2-42]新疆最高领导人的更替都是通过在新疆内部的暗杀和政变才实现的。但是就是在这数次政权的交替闹剧中，维吾尔族人也没有能够扮演任何角色。

在地方行政体系中（8个行政区59个县），同样几乎看不到出身于当

地民族的人的身影。在新疆南部，尽管维吾尔族人口的比例达到当地居民总数的95%，[2-43]但是在1912-1922年之间，出身于维吾尔族的行政长官、县长却只有一人。[2-44]“谁有权利说：一个民族应该受少数人的黑暗的压迫？谁能承认，一个民族不应去争生存？站在整个中华民国的立场上，根据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立国的精神去说，新疆脱离中国独立于新疆民族并无好处，但事实告诉我们，这不能怨恨新疆民族。”正如当时两位记述了第一次东突厥独立运动发生过程的知识分子所指出的那样，在分析发生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原因时，不能忽视当时各个民族在政治上不平等的情况。[2-45]据前文所述及的《北京政府时代之新疆议员》一文，1921年从新疆选出来的20人的国会议员中，只有3人是维吾尔族人，而且还都是由省长杨增新挑选出来的傀儡，他们是否能够代表维吾尔族的利益，以及他们个人的政治能力，当然要受到当地维吾尔族民众的怀疑。[2-46]更令人惊讶的是，1915年新疆选出的40名国会代表中，居然没有一位维吾尔族人。[2-47]这些事实都说明，当时，在新疆地区社会中，作为当地的主要居民的维吾尔族完全被排除在了政策制定集团和政策决定过程之外。

经济榨取与文化同化政策

然而，掌握了新疆地区社会中政治主导权的汉族政治上层，对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却几乎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进入民国时期後，新疆的经济状况和清末时期相比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近代工业和交通事业仍然不发达，[2-48]绝大部分的工业品都依赖由国外进口。[2-49]1921年，一位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曾经如此批评统治当局：“进入民国时期後，新疆的最大变化仅仅是在信中写上中华民国某年某月，而就是这一点，我们维吾尔族人也是从汉族人那里学到的。”[2-50]

清朝时期，中央政府尚且每年拨给新疆省政府约300万两的补助经费，即“协饷”，[2-51]但进入民国时期後，连这种补助经费都已不复存在。为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第一任新疆省长杨增新采取了增加税收、超额发行纸币、振兴实业、开垦农田等措施。[2-52]但“振兴实业”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2-53]最终只能是通过对当地人民的榨取以寻求出路。从1912年至1915年，新疆发行了6,232,800两没有准备金的纸币。[2-54]与1884年“新疆建省”时相比，1915年新疆的农业税收中，对小麦的税收增加到2-3倍，对玉米的税收增加到2-5倍，对饲料用草的税收更是增加到了19倍。[2-55]

地方官僚利用特权掠夺维吾尔族居民的情况也屡见不鲜。[2-56]省政府的部门首长希望降职到地方上去任县长的奇怪现象，就反映出直接

管理民众的县长可以从居民那里榨取更多财富的行径。[2-57]当时的官僚们留下的回忆文章中，记载了很多通过征税来进行掠夺的方法。[2-58]尤其是新疆南部的库车、阿克苏、叶尔羌、叶城等维吾尔族聚居地区的县长职位，被认做是“肥缺”。这让人很容易就能够想像到汉族官僚们对当地维吾尔族居民的掠夺。

直到1933年之前，新疆省政府一直实行强制维吾尔族人进入汉语学校（学堂）接受教育的政策。这种教育，原是清王朝为了让维吾尔族居民放弃不同风俗习惯，接受中华风习而开始的，其中原本就隐藏着对维吾尔文化的歧视。[2-59]这种民族歧视政策，助长了住在新疆的汉族人的优等民族意识。1930年代一个由苏联人所作的新疆调查报告中记载，尽管一个汉族老人过去在维吾尔族人地区生活了50年，却完全不会说维吾尔语。[2-60]汉族居民无视伊斯兰教徒对偶像崇拜的反感，在各县政府所在地修建佛教寺院、孔庙、关帝庙等，在维吾尔族地区中也开始形成自己的民族社会。[2-61]

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中严重存在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自然引起了维吾尔族居民对汉族居民的民族仇恨。很多维吾尔族人，“认为统治自己的汉族官僚都是些只知道剥削和屠杀的恶魔，而汉族人也全都同样是恶魔”。[2-62]就这样，维吾尔族居民对汉族居民的民族反感，形成了当时新疆最主要的社会对立问题。

第四节　双重结构的新疆社会与维吾尔族社会公共管理体系

地域社会与民族社会的双重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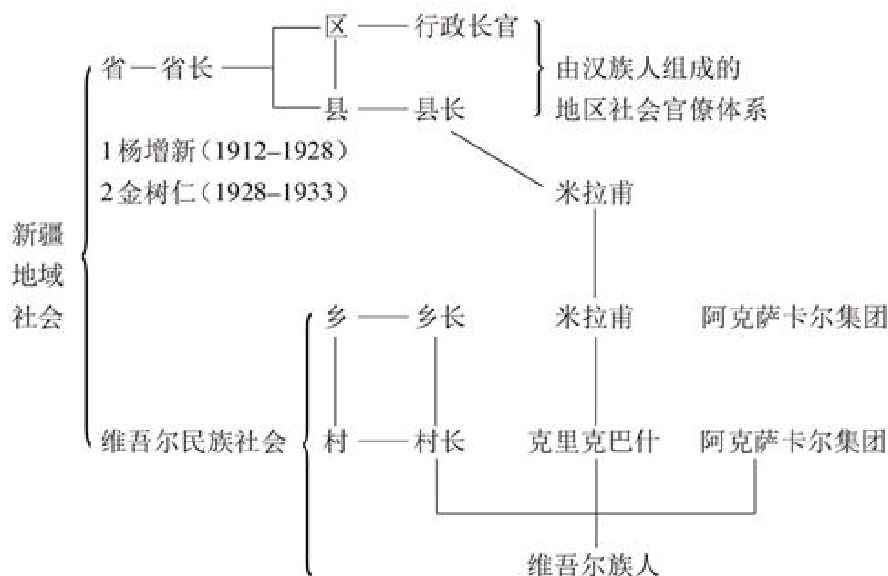
在新疆南部，很多地方都是由一块绿洲成为一个县。县长职高权重，负责征税、城市与道路建设、指挥警察维护治安及法律审判等。[2-63]但是，当时由省政府任命的官僚体系只到达县一级。因此，县级行政成为国家官僚行政体系与维吾尔族社会的连接点，县级以下的行政运作和公共管理只能依赖当地的维吾尔族人。在当时的维吾尔族社会里，县级以下的公共管理体系主要划分为基层行政组织、水利管理组织和宗教审判所等。

由于当时迁居到新疆南部的汉族居民大概只有3,000人，[2-64]从这个数字中可以推测出当时维吾尔民族社会的传统结构基本上没遭到破坏。但是，从下图可以看出，由于当时汉族人几乎掌握了地域社会中的所有行政资源，维吾尔族人实际上是生活在一种由新疆地区社会与维吾尔民族社会所构成的双重结构的社会之中（图2-1）。

能够让我们全面了解20世纪初到30年代维吾尔族社会结构的资料为数极少。以下主要根据1930年代初期苏联人在喀什噶尔地区所作的调查和1950年代初的调查资料，以及维吾尔族居民自身的回忆，尝试复原1900年代前期的维吾尔农村社会体系。

当时维吾尔族人口中有90%的人从事农业。各地称呼多少有所不同，但在各种资料中可以确认存在伯克（也被称作明巴什，Ming bash，即千户长）、乡约（也被称作玉孜巴什，Yuz　bash，即百户长）、米拉甫（Mirap，管理水和水利设施的人）、克里克巴什（Kirik　bash，四十户长）、喀孜（Kazi，审判官）、阿里姆（Alim，学者）、拉伊斯（Rais，执法官）等职位名称。这些职务进一步被分为行政、水利管理、审判三个系统，构成维吾尔农村社会的公共管理体系。

图2-1　新疆社会构造图



来源：笔者制作。

在行政方面，乡的行政长官是伯克，村的行政长官是乡约，其职务主要是维持社会秩序和征税。

为管理水利设施和分配农田用水，县和乡各设一名“米拉甫”，村设1-2名“克里克巴什”。但乡的米拉甫由县的米拉甫任命，克里克巴什由乡的米拉甫任命，这样就形成了独立于行政之外的水利管理系统。[2-65]这种公共管理体系构造上的特点，是因为水利在“灌溉农业社会”的维吾尔族社会中的重要性而形成的。[2-66]

“由县长审理的犯罪事项是杀人罪、危害国家罪、渎职罪、政治犯罪等。”[2-67]此外的民事案件、婚姻、遗产、财产、土地买卖等委托给伊斯兰法院——沙里亚法庭（Mahkima Sharia），依据伊斯兰法律沙里亚来审判定罪。在喀什噶尔的托古扎克乡，有由3名喀孜、1名学者、16名拉伊斯组成的沙里亚法庭。[2-68]这个法院也审理维吾尔族人与汉族商人之间发生的民事诉讼。有汉族商人埋怨说，由那里做出的判决，一定是对维吾尔族人有利的。[2-69]可见，伊斯兰教在精神层面上无疑起到了凝聚维吾尔民族的作用。

有趣的是，尽管清王朝在1885年12月已经正式废除了伯克制度，但在民间，乡级行政的长官仍被称为“伯克”。另外，以“米拉甫”作为长官的水利管理系统也从16世纪以来就一直存在。[2-70]从这里可以看出，即使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後，传统的维吾尔族社会管理体系，即旧的社会

生产关系在维吾尔农村中依然存在。

在维吾尔农村社会中，存在一种特殊的“等分制地租制度”。其内容，就是将佃农向地主交纳的地租等分为谷物与劳役地租两个部分。[2-71]这个制度的目的，明显在于使地主确保劳动力，地主也因此可以将更多的农田置于自己直接经营之下。比起从佃户手中收取地租来，地主更乐于直接经营更多农田的理由是，在绿洲农业中存在一个灌溉用水量的问题。



一位维吾尔农民在耕地

灌溉用水的使用量，基本上是根据每条河流所承担的农田总量之比例，由地区水利管理系统进行协商决定，首先是向各村，然後由各村向各农户进行分配。但在，在皮山县（Guma）的阿萨村，拥有全村土地总面积35.4%的地主，却使用了全村土地用水总量的47.37%。[2-72]与缺乏土地用水的土地相比，能确保用水的土地当然收成更多。也就是说，在维吾尔农村社会中普及的“等分制地租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让地主阶

层能够确保生产资料的特权制度。因为除土地税之外，其他杂税的数额都根据土地用水量决定，所以一般认为，乡村所统计的地主的用水量可能比他们的实际用水量还要少很多。[2-73]这些事例，反映了在当时的维吾尔族农村社会中，地主阶层已经直接介入了社会公共管理事务的现状。

过去的研究，一般认为这种介入是由于统治阶级之间的互相勾结。但仅从阶级的观点来简单解释的话，可能会抹煞维吾尔族农村社会的特殊性。我们注意到，疏附县（Kaxkar Kona Xahar）第一区第三乡的调查显示，在乡级11人的“阿克萨卡尔”中，有10人为“把土地租给他人自己获取地租”的地主。[2-74]这一情况说明，在维吾尔农村社会中地主阶层向社会公共管理事务的介入，实际上是通过维吾尔族社会特有的“阿克萨卡尔制度”来实现的。

“阿克萨卡尔制度”与民族危机

突厥语中的“阿克萨卡尔”（Ak-saqal），原意为“白胡须”，也就是“长老”的意思。阿克萨卡尔的社会权威是基于社会惯例，由“世袭”或个人授受的方式产生的。[2-75]根据资料记载，疏附县第一区第三乡除乡级的11人的阿克萨卡尔外，各个村还各有4-5人不等的阿克萨卡尔，也就是说，乡与村都各自具有不同的“阿克萨卡尔”集团。

当时，阿克萨卡尔在维吾尔农村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为：推荐以“伯克”为首的各种公职的候补人，将上面摊派给乡、村的杂税和劳役再分配给各村或各家各户，审理刑事案件，批准结婚、离婚、遗产继承等民政问题，以及管理土地买卖等。[2-76]虽说按照规定，担任行政、水利、征税等公职的人，是由居民选出後再由上级行政长官任命的，但向上级行政长官推荐的人选却是由阿克萨卡尔集团所决定的。而且大多数的情况都是，由一个阿克萨卡尔就任某职，其他的阿克萨卡尔担当助理。关于伯克、乡约的人名需要经过阿克萨卡尔集团内部的讨论之後再最後任命的习惯，在20世纪30年代初由苏联人所做的喀什噶尔农村调查报告中也有明确的记载。[2-77]据此可以确认，在维吾尔农村社会中，“阿克萨卡尔”已经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并且独占了所有的公职。

大多数的阿克萨卡尔都是地主。所以如果由阿克萨卡尔集团独占公职，行使公共权力，这在给予了阿克萨卡尔集团以管理维吾尔农村社会的正当性的同时，还保障了地主阶层独占生产资料的特权。因此，维吾尔农村社会的公共管理体系虽由行政、水利管理、审判三个系统构成，但由于阿克萨卡尔是作为一个集团而存在，所以三个系统就不可能实现职权的完全分化。这更给作为个人的阿克萨卡尔扩大已有权限，以及给

一部分地主在各个方面都能压榨民众提供了条件。

在这种公共管理体系下，伊斯兰教职人员与阿克萨卡尔勾结的现象也特别明显。如阿克苏县第二区第三乡，约占总数42.4%的乡瓦哈甫地（穆斯林群众施舍给清真寺的土地）的管理权，被交给了不到全乡人口4%的41户地主手中。[2-78]就这样，伊斯兰教一方面在地区社会的层面上变成了吸收维吾尔族社会对于汉族人掌握公共权力的不满情绪的载体，但同时在民族社会内部，却成了维护地主阶层既得利益的工具。

一项调查说明，阿克苏县第一区第五乡的24户地主中，有19户被认为是在进入阿克萨卡尔集团之後经济地位发生变化、成为了地主的。[2-79]所以可以认为，以阿克萨卡尔为核心的维吾尔族农村社会的公共管理体系，实际上起到了促使维吾尔族农村社会中阶层分化的作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土地利用程度较高的地区，土地总数的72.4%已被占人口总数仅仅7.1%的地主阶层所占有。[2-80]另一方面，由于丧失土地，大量农民变成“连与人平等地说话的权利都没有”的长期雇佣者，甚至有卖身成为奴隶的例子。[2-81]在部分地区，文盲率甚至达到96%。[2-82]由于在封建生产关系下经济差异的不断扩大，维吾尔民族已经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

最初意识到这种民族危机的，就是维吾尔族社会中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和“一部分宗教人士”。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支持他们发起“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的，又是与传统的维吾尔族社会构造格格不入的新兴的工商业资本家们。这个现象更加能够说明，“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之所以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对维吾尔族传统社会结构的不安和不满。

因资料的缺乏，我们无法了解20世纪初期维吾尔族社会中工商业资本家阶层的真实情况。据部分维吾尔族人回忆，在19世纪末时，喀什噶尔、吐鲁番、伊犁、迪化等各城市已经汇集了一部分新兴的工商业资本家。引人注意的是，出身于喀什噶尔地区阿图什的穆萨巴约夫家族同时将边境城市——伊犁作为了重要的据点，这说明他们的经济活动内容基本上是出口新疆南部生产的以棉花为主的农产品和进口外国的工业品。这种与国外的接触，不仅让他们了解到维吾尔族社会的落後状况，同时也让他们有了与奥斯曼土耳其，尤其是和俄国喀山的鞑靼人社会之间建立网络、接受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影响的机会，从而为发起“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并为此後的“东突厥独立运动”找到了思想的基础。[2-83]

小　结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发祥于奥斯曼土耳其和俄国喀山的鞑靼人社会的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而让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能够在维吾尔族社会中成长的摇篮，就是大量接受了奥斯曼土耳其和俄国喀山的鞑靼人社会影响的“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维吾尔族社会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一部分宗教人士”和新兴的工商业资本家们之所以要发起“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就是出于对于民族的危机意识。在当时新疆特殊的双重社会结构下，地域社会中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不断加剧；在传统的维吾尔族社会公共管理体系下，民族社会层面上的阶级分化日益严重，所以造成了这种危机意识。

由于“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间的这种思想传承关系，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深受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的影响，它的基本思想就是“推翻中国的统治”和争取“民族土地的解放”，而它的最基本的行动特徵，就是攻击和排除一切具有“中国”符号的东西。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第一个重要的组织特徵，就是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参加者为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形成这种组织特徵的根源就在于“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间的传承关系。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另一个重要的组织特徵为通过“伊斯兰教圣战”的口号来号召维吾尔族民众。形成这一特徵的原因，既有受到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影响的部分，更是缘于当时的维吾尔族社会的现实：只有“伊斯兰”的“大义名分”，才是维吾尔族社会中能够从政治上统一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阶级的不同利益集团的载体。

注释

[2-1]D. Ch. Boulger, The Life of Yakoob Beg, Athalik Ghazi, and Badaulet; Ameer of Kashgar (London: Wm. H. Allen & CO., 1878), p. 1.

[2-2]Molla Musa Sayrami, Tārīkh-ī Khāmīdī ［伊米德史］(Beijing: Millatla Nasriyati, 1986), p. 47。该书主要描述从1864年的库车起义到1884年的新疆建省之间维吾尔族社会的历史。

[2-3]赵瑞生译：《北京政府时代之新疆议员》，《天山月刊》，第1卷，第3期（1934），第33-37页。

[2-4]新免康：《新疆ムスリム反乱（1931-34年）と秘密组织》，《史学雑志》，第99编，第12号（1990），第12页。

[2-5]据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第420-421页称，英国的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外交官

员出席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成立大会，英国的第三任领事到任後向国内建议给予“共和国”以实际的同情和提供援助。

[2-6]郭维屏：《南疆事件帝国主义侵略新疆之分析》，《西北问题研究会会刊》，第1卷，第1期（1934），第51页。

[2-7]“并准俄民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及关外之天山南北两路各城贸易，均不纳税。”——《伊犁条约》，又称《崇厚条约》，1879年10月2日签订，第十二条。此条约因出卖主权过多引起朝野愤怒，崇厚被革职逮捕。清政府再派曾纪泽谈判修改条约，1881年2月24日签订的《改订条约》中将此项内容改为“暂不纳税”。

[2-8]新免康：《新疆ムスリム反乱（1931-34年）と秘密组织》，第12页。

[2-9]Ibrayim Niyaz, “Atux Nahiye Iksahkantida yekinkizaman panni muaripining dunyaga kilixi ［在阿图什县伊克萨克乡近代学校教育的诞生］,”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3 (1984): p. 90.

[2-10]关于各地建立新式学校的情况，可以参考以下文献：Ibrayim Niyaz, “Atux Nahiye Iksahkantida yekinkizaman panni muaripining dunyaga kilixi,” pp. 83-94；以及Ibrahim Mugit, “Marhum maripatparwar Mahsut Mukiyit togursida aslima ［关于已故的启蒙者买合苏提・穆吉特的回忆］,”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3 (1984): pp. 100-115; Xawkat Abdurihim, “Kaxkarda panni maktaplarning xakillinixi wa tarakkiyati tohursida ［关于在喀什噶尔的学校教育的开始与发展］,”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3 (1984): pp. 95-99；另外，塔依尔、杨任志：《塔城妇女教育的先驱》，《伊犂文史资料》，第4辑（1988），第142-144页中，也有关于鞑靼人1914年受聘到吐鲁番地区新式学校任教的记载；阿不都哈的尔・阿不都拉：《奇台民族教育今昔谈》，《奇台文史资料》，第11辑（1987），第125-128页中，有关于鞑靼人于1916年受聘到奇台的新式学校任教的记载。

[2-11]Ibrahim Mugit, “Marhum maripatparwar Mahsut Mukiyit togursida aslima,” pp. 104-105.

[2-12]Ibrayim Niyaz, “Atux Nahiye Iksahkantida yekinkizaman panni muaripining dunyaga kilixi,” pp. 83-94. 阿图什的穆萨巴约夫家族在全新疆也是名望很高的富豪。哥哥胡赛因・穆萨巴约夫以後又在伊犁建立新式学校的事情，在这部文献上也有介绍。但是，依克沙克1985年举行了当地小学建立100周年纪念典礼。也就是说，关于维吾尔族社会中

最早的新式学校究竟于哪一年建立，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关于这一点，参见大石真一郎：《カシュガルにおけるシャディード运动——ムーサー・バヨフ家と新方式教育》，《东洋学报》，第78卷，第1号（1996），第21页。

[2-13]山内昌之：《スルタンガリエフの梦》（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第92-93页。

[2-14]包尔汗：《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兴亡》，《文史资料选集》，第79辑（1982）, 第110页。

[2-15]Ibrahim Niyaz, “Atux Nahiye Iksahkantida yekinkizaman panni muaripining dunyaga kilixi,” p. 85.

[2-16]Xawkat Abdurihim, “Kaxkarda panni maktaplarning xakillinixi wa tarakkiyati tohursida,” pp. 95-99; 大石真一郎：《カシュガルにおけるシャディード运动》，第21页。

[2-17]大石真一郎：《カシュガルにおけるシャディード运动》，第21页。

[2-18]包尔汗：《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兴亡》，第110页。在汉语原文中把突厥写为“土耳其”。

[2-19]富永理：《回教徒民族运动的诸问题》（东京：东亚研究所，1941），第51页。

[2-20]山内昌之：《スルタンガリエフの梦》，第90-91页。

[2-21]Abdukadir Haji, “1933 yildin 1937 yilgiqa Kaxkar Hotan Aksularda bulup otkan wakalar ［1933年到1937年的喀什噶尔、和田、阿克苏各地出现的事件］,”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7 (1986): p. 7.

[2-22]潘祖焕：《金树仁登台和哈密事变的前因後果》，《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80），第11页。

[2-23]出席哈密起义军事会议的14人中，6人是道尔加（dorga），4人是米拉甫（mirap）。Aysa Niyaz, “Kumul dihanlar kozhulingiha dair bazi masililar tohursida aslima ［关于哈密农民起义的若干回顾］,”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2 (1983): p. 13.道尔加是王府属下的各村的首领，米拉甫是水利管理官员。哈密起义的最高指挥者尧乐博士（Yolwas）与和加・尼牙孜两人都是从平民变成王府高官的，因此可以看到作为起义组织者与王府有关的人对因王制废止导致权力丧失的抵触。这种想法跟参加起义的农民没有共同点。

[2-24]汉族人现在已占到哈密地区的人口总数的65%，从这点可以推定1930年代也有相当数量。杨利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第237页。

[2-25]续春、赵瑞生：《新疆民变纪实》之“南疆人民之活动”，《边铎》，第2卷，第1期（1934）；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新疆的革命运动与暴乱事件（1911-1949）》（铅印版，1961），第73页。

[2-26]郭维屏：《南疆事件帝国主义侵略新疆之分析》，第51页。

[2-27]郭维屏：《南疆事件帝国主义侵略新疆之分析》，第48页。

[2-28]贺扬灵：《破碎的新疆》，《新中华杂志》，第2卷，第8期（1934），第29-39页。

[2-29]海维谅：《国人注意不到的南疆》，《新亚细亚》，第7卷，第6期（1934），第57页。

[2-30]参照郭维屏：《南疆事件帝国主义侵略新疆之分析》，第50页。除郭维屏论文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建国纲领（片断），在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新疆地方史志办公室复印版）、《反帝战线》（第7卷，第3期，年代不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新疆的革命运动与暴乱事件（1911-1949）》中也有刊载。但《反帝战线》所刊载的内容，与其他书籍刊物有很大的不同。

[2-31]这里引用的“建国纲领”，来自于《反帝战线》，第7卷，第3期。

[2-32]新免康：《新疆ムスリム反乱（1931-34年）と秘密组织》，第14页。

[2-33]穆罕买提・牙库甫・布格拉：《关于和田起义》，《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1987），第76-81页。

[2-34]郭维屏：《南疆事件帝国主义侵略新疆之分析》，第51页。

[2-35]郭维屏：《南疆事件帝国主义侵略新疆之分析》，第48页。

[2-36]海维谅：《国人注意不到的南疆》，第54页。

[2-37]王柯：《成立期の近代ウイグル社会を巡る国际関系及び新疆省の设置》，《东瀛求索》，第4号（1991），第22页。

[2-38]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626、640页。

[2-39]崛直：《一八——二〇世纪ウイグル人口试论》，《史林》，第60卷，第4号（1977），第114页。

[2-40]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640页。

[2-41]新疆档案局：《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官职表》，《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82），第126页；新疆档案局：《金树仁统治新疆时期官职表》，《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5），第146页；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台湾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第四章第一节第二部分的"省级民政官署及官职"中，也记载了省级官僚的名单。

[2-42]杨增新非常喜欢部下王树枏所写对联："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胜景"，并把它挂在新建的"镇边搂"上。这首诗既能道出他的心境，也可以说是他统治新疆的策略。详见王子纯：《杨增新轶闻》，《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79），第79页。

[2-43]谷苞：《南疆农村的经济结构与阶级情况》，《南疆农村社会》（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53），第110页。

[2-44]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四章第一节第四部分的"省县级行政区划及官职"中，记载了行政区与县级官职所有人员名单。

[2-45]续春、赵瑞生：《新疆民变纪实》之"南疆人民之活动"。该文来自于该文章的结语部分，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新疆的革命运动与暴乱事件（1911-1949）》（油印版），第6-6-19页，前引该书的铅印版中缺少这一部分内容。

[2-46]赵瑞生译：《北京政府时代之新疆议员》，第33-35页。

[2-47]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987页记载了在新疆选出的国大代表的所有人员名单，又在第964-965页记载了在新疆选出的国会的众议院议员、参议院议员所有人员名单。

[2-48]陈慧生：《杨增新主政新疆时的工业交通》，《新疆历史研究》，第1期（1987），第54-56页。

[2-49]通宝：《杨增新时代杂记》，《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1979），第58-59页。

[2-50]赵瑞生译：《北京政府时代之新疆议员》，第35页。

[2-51]陈延祺：《杨增新是如何缓解新疆财政危机的》，《新疆社会科学》，第1期（1989），第100页。

[2-52]陈延祺：《杨增新是如何缓解新疆财政危机的》，《新疆社会科学》，第1期（1989），第100-110页。

[2-53]陈延祺：《杨增新是如何缓解新疆财政危机的》，《新疆社会科学》，第1期（1989），第64-65页。

[2-54]董庆宣：《新疆近二百年前纸币图论・纸币部分》（新疆金融编辑部，1986），第8-18页。陈延祺：《杨增新是如何缓解新疆财政危机的》，第108页。

[2-55]陈延祺：《杨增新是如何缓解新疆财政危机的》，第102-103页。

[2-56]Hawir tumor, “Har kaysi tarih dawirlardiki hiyanatqilik wa uning xakilliri ［各时代的贪污渎职及其形式］,”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3 (1984): pp. 140-146。

[2-57]陈慧生：《杨增信统治新疆时期的财政金融》，《新疆历史研究》，第3期（1985），第113页。

[2-58]柴恒森：《清末至杨、金统治时期的赋税制度与县长》，《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1981），第106-109页。

[2-59]由于这一原因，许多维吾尔族人拒绝将自己的孩子送去入学。详见柴恒森：《清末至杨、金时期的新疆教育制度》，《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1981），第126页。

[2-60]王广智译：《喀什噶尔》（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油印版，印刷年代不详），第112页。

[2-61]Abdurixit Hoja Ahmat, “Qakilih nayisining 1926yildin 1936yilhiqa bolhan 10 yillik tarihidin aslima ［1926年到1936年十年间叶城县发生的历史事件］,”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2 (1983): pp. 205-207.

[2-62]傅筑夫：《新疆民族问题》，《天山月刊》，第1卷，第3期（1934），第3页。

[2-63]参见柴恒森：《清末至杨、金统治时期的赋税制度与县长》；兴亚院政务部：《ソ联の観たる新疆事情——新疆のソヴェーエト化について》（东京：日本兴亚院政务部，1940），第60页。

[2-64]崛直：《一八——二〇世纪ウイグル人口试论》，第114页。

[2-65]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伽师县古莫克村调查》，《南

疆农村社会》，第76页；陈恭鸿：《南疆的水利情况》，《南疆农村社会》，第121-122页。

[2-66]O. T. Crosby, Tibet and Turkistan, 见张之毅：《新疆之经济》（中华书局，1945），第38页。根据《新疆发展节水农业》（《人民日报》，1990年6月8日）的报导，新疆南部年平均降水量仅为145毫米。而倪超：《新疆之水利》（商务印书馆，1948，第8页）更指出，大多数维吾尔族居民居住地区的年平均降水量更低，喀什地区为82毫米，和田地区为47毫米。

[2-67]兴亚院政务部：《ソ联の観たる新疆事情》，第8页。

[2-6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南疆疏附县托古扎克区第六乡调查材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干调查材料编》（未公开出版，1956），第29-30页。

[2-69]王广智译：《喀什噶尔》，第116页。

[2-70]佐口透：《十八——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第111页。

[2-71]谷苞：《南疆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南疆农村社会》，第142-147页。

[2-72]陈恭鸿：《南疆的水利情况》，第122页。

[2-73]陈恭鸿：《南疆的水利情况》，第123-126页。

[2-7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南疆疏附县托古扎克区第六乡调查材料》，第121页。

[2-75]谷苞：《疏附县一区三乡解放前的封建集团与政治组织》，《南疆农村社会》，第187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南疆疏附县托古扎克区第六乡调查材料》，第29页。

[2-76]谷苞：《疏附县一区三乡解放前的封建集团与政治组织》，第188页。

[2-77]王广智译：《喀什噶尔》，第114页。

[2-78]邓力群、谷苞：《南疆的瓦哈甫地问题》，《南疆农村社会》，第102-104页；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研究室：《阿克苏第一区第五乡调查》，《南疆农村社会》，第49-50页。

[2-79]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研究室：《阿克苏第一区第五乡调查》，第50页。

[2-80]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南疆疏附县托古扎克区第六乡调查材料》；谷苞：《疏附县一区三乡解放前的封建集团与政治组织》，第150-151页。

[2-81]王广智译：《喀什噶尔》，第102页；谷苞：《疏附县一区三乡解放前的封建集团与政治组织》，第113页。

[2-82]谷苞：《疏附县一区三乡解放前的封建集团与政治组织》，第113页。

[2-83]穆萨巴约夫家族的胡赛因·穆萨巴约夫（Husayn Musabayow）在伊犁也开办了新式学校。参照Ibrahin Niyaz, “Atux Nahiye Iksahkantida yekinkizaman panni muaripining dunyaga kilixi.”

第三章　　反日亲苏路綫的表与里

盛世才的政治路綫与新疆民族问题

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会迪化再次发生了政变。这次政变的结果，是盛世才继金树仁之後成为了新疆的最高领导人。盛世才执政期间，在新疆提倡和推行他自己发明的所谓“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的简称）、清廉、和平、建设。虽然盛世才在其《六大政策教程》中主张六项政策之间具有相互关联，[3-1]但是反帝、亲苏是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路线，与此相比，其它各项都只不过是一些具体的社会政策，从内容上来说，它们并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问题。1937年，一位在新疆调查并对盛世才的政策抱有好感的大公报记者曾经如此形容“六大政策”之间的关系：“反帝、亲苏像一个人的头，民平、清廉像人的身，和平、建设像人的脚。各有各的地位，各有各的用处。”[3-2]

20世纪30年代，正是中国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所以“反帝”就是“反日”。与日本相距甚远的新疆，为什么要高举抗日的旗帜？而抗日路线，为什么有必要同亲苏路线结合在一起？为了搞清这些问题，本章主要利用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当年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剖析当时新疆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同时以1933-1937年中国和新疆的政局为背景，研究盛世才之所以制定“反帝”和“亲苏”政策的原因和目的。

第一节　近代日本向新疆的渗透

日本向新疆渗透的目的

对于新疆来说，当时是否存在着受到日本威胁乃至遭到日本侵略的可能？当时日本的新疆政策具有什么样的内容和性质？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观察历史上日本与新疆之联系。

日本人开始关注到新疆是在明治时代後期。明治时代就有以下日本人到过新疆地区：

（1）日本驻俄公使西德二郎（1880年）；[3-3]

（2）大谷光瑞和橘瑞超率领的大谷探险队（1902、1908、1910年）；[3-4]

（3）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第二届学生波多野养作、村出贤次郎、樱井好幸（1905年）；[3-5]

（4）参谋总部的军官日野强和上原多市（1906年）。[3-6]

其中只有大谷探险队带有文化方面的目的，其余的人实际上都是奉日本外务省和陆军参谋本部之命，为收集情报进入新疆的。例如，据《进入中亚的日本人》一书作者金子民雄的推测，日野强为了回国後向参谋总部报告而整理了三册《新疆旅行报告》。[3-7]

与日野强同时进入新疆的还有上原多市。[3-8]在日本所公开的档案中没有发现有关上原多市的资料，但是在中国文献中，可以发现清朝伊犁将军长庚于1907年在将军府驻扎地伊宁设立“陆军武备速成学堂”时，曾经任命“日本人原尚志”为军事教官的记载，由此可以知道，上原多市曾经使用原尚志这个中国名字在伊宁担任过军事教官。[3-9]

但是，挂着清朝军事学校教官名义的上原多市，实际上也是日本军队的情报人员。笔者在日本外交史料馆的资料中，发现了当时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副武官斋藤季治郎少将发给陆军参谋总长长谷川好道大将的一封电报。[3-10]其中有“据伊犁上原多市发回的电报得知，伊犁将军已死，在该地区俄国的行动目的是通过借款获得权利”的内容，同时，电报的左上角注有“陆”、“秘”、“禁止报纸刊登”的字样。[3-11]据此可以确认，上原多市当时是携带着无线电联络设备在伊宁进行情报收集活动，并不断将其报告给日本军部的。另外，电报还提到1912年1月伊犁革命时伊犁将军之死，[3-12]从这一点可以推定，上原多市至少是从1906年到1912年之间，在靠近中俄边境的城市伊宁呆了六年之久。

在以上这些人的情报收集活动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徵，那就是他们都对俄国势力向新疆的扩张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集中精力研究其扩张程度和扩张内容。西德二郎虽到过新疆，但是只是到了伊犁地区。[3-13]而当时，伊犁仍处于沙俄军队占领之下。波多野等人的新疆调查，则是根据日英两国外务省的协议进行的："为了对抗俄国对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争夺而建立起来的日英同盟关系，也在这里得到了体现"。[3-14]日野强走遍了以天山为界的新疆南部和新疆北部，最後经由印度回国。上原多市原来也打算秘密潜入俄国，但是因为失败而遭到拘禁。[3-15]另外，从大正初期的1916年到1917年，日本在乡陆军下士佐田繁治伪装成三井物产的职员，以商业调查为由驻在迪化。佐田繁治受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遣的原因，就是要在这里进行间谍活动。[3-16]作为其部下，三个日本艺妓曾经一段时间呆在塔城这座位于中俄边境的城市中。[3-17]

总之，日本人最初之所以进入新疆，都与俄国势力在新疆的扩张有关。换言之，警惕俄国在新疆的扩张，是日本开始向新疆渗透的主要原因。

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与新疆

日本之所以不愿看到俄国势力在新疆的扩张，是因为日本具有将在地理上与新疆相连的"满蒙"地区收入其势力范围的企图，而如果俄国势力向新疆扩张，必将对日本的这一企图产生不利影响。

日俄战争以後，在日本更进一步向大陆扩张的过程中，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曾经制定了一份《俄国对满蒙及新疆之经营、第一号》的秘密报告。[3-18]这份制定于明治四十五年6月12日、目前收藏在外交史料馆的报告，是根据关于俄国在中国东北部、内蒙古东部（以上即日本当时所说的所谓"满蒙"地区）和新疆地区活动的最新情报而完成的。正如标题所示，从日本军方的角度来看，俄国在新疆的势力扩张是与俄国在"满蒙"地区的势力扩张联系在一起的。

而"满蒙"地区，则被当时的日本政府，尤其是日本军方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事实上，从明治後期开始，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後，不论日本政府还是日本军部，都开始积极追求日本在中国"满蒙"地区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益"。[3-19]从同时期参谋本部开始编制此种秘密报告、开始派遣情报人员进入新疆地区等一系列事情中也可以看出，日本军部认为俄国势力在新疆的扩张威胁到了日本在"满蒙"地区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益"。

根据当时日本政府的见解，所谓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和"特殊地

位”，就是“日本根据条约在该地区所拥有的各种特殊权利的综合，加之邻接状态和地理位置以及至今各种交涉中自然产生的结果”。[3-20]具体说来就是：对包括旅顺和大连在内的关东州的租借权，与满洲铁路相关的权利及在满洲铁路沿线地区的驻兵权和行政权，日本国民在“南满洲”的居住、往来和经营各种事业的自由，日本国民对“南满洲”土地的商用租借权、在蒙古东部的合办农业权，在“南满洲”的特定矿山和特定地区的经营矿业权，日本国民的治外法权。[3-21]事实上，这些权利大部分都是日本通过日俄战争的胜利而从俄国那里夺取过来的。因此不难想像，要想维持这些权益，其重要的课题就是防止俄国势力在这一地区东山再起。

那麽，在中国东北地区维持日本的“特殊权益”与防止俄国势力在新疆的扩张之间具有什么关系呢？关于这一点，可以在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内田外务大臣关于支那（蒙满）政策给伊集院公使的训令》一卷中的《阿部政务局长对支那（蒙满）政策概要・关于支那外交政策的纲领・大正元年稿》中找到答案。这份纲领首先指出：“往往有人主张所谓实现满蒙问题的解决就是获取领土，帝国应该割取南满洲及与之接邻的内蒙古东部，从而可以解决该方面的问题”。但是，《纲领》指出：“如果武断施行”，除了会遭到中国及其它各国的反对，导致日本财政困难以外，还会有如下一些担忧：

帝国带来极大拖累和麻烦：

（一）不仅是激起支那军民的反抗，而且还会在中国国内激起抵制日货的风潮，……。这不仅妨碍我们在支那的经济活动及其发展，甚至有让我国工业中把支那作为主要市场的设想遭受最大打击之虞。

（二）我国外交不仅失信於中国，还可能加深盟国的猜疑，……必定会让我国在支那行使发言权问题上遇到更大的不便。

（三）……肇分割支那之端，有最终使多个强国盘踞於这个一衣带水的大陆之虞。

（四）……如果帝国割取南满洲及内蒙古东部，必将导致俄国势力推进甚至可能将内蒙古西部合并到外蒙古中，北满自然不在话下，甚至会窥视到新疆、甘肃、陕西、山西。如果从满蒙中把支那驱赶出去，结果就是让日俄两国在满蒙发生正面接触，因此更加加剧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

所以，当时的日本政府决定在对中外交政策中，“对于满蒙不抱获得新的领土的企图”。[3-22]

当时的日本政府——第二届西园寺公望内阁（1911年8月30日-1912年12月21日）、第三届桂太郎内阁（1912年12月21日-1913年2月20日）和山本权兵卫内阁（1913年2月20日-1914年4月16日）——之所以在满蒙问题上抱着谨慎的态度，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考虑当时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力量对比。但是，如果俄国把新疆纳入其势力范围，并向东面扩展的话，就势必在满蒙地区与日本势力直接发生接触，冲突也就不可避免。而这样一来，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和“特殊地位”也就必将受到威胁。日本的这种担心，以及日本对俄国势力在新疆的进入和扩张绷紧神经的原因，都可以从这个《纲领》中看出。[3-23]

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以後，日本也没有改变注意苏维埃俄国势力在新疆活动的方针。1918年5月，日本与北洋政府缔结了《日华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议》。关于中日两国依照这项协议所开展的活动，两国的记载存在一些差异。中国文献中记载，1918年大潦太吉、大田东阳等六个日本人，在中国军参谋总部职员程浴尘的陪同下，视察了新疆的中俄边境防卫。[3-24]而日本文献中记载，成田哲夫少校、长岭龟助大尉、田岛荣次郎大尉、相场重雄大尉等八位日本军官，于1919年进入新疆，在迪化和靠近俄国边境的城市伊宁、塔城、喀什等地开展了情报收集活动。[3-25]

总之，昭和时期以前，日本对新疆没有表现出直接的领土野心，但是因担心沙皇俄国及苏俄势力在新疆地区的扩张会威胁到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和“特殊地位”，所以一直关注着新疆。

新疆与抗日战争

进入昭和时期以後，主张维持华盛顿体制，不主张干涉中国内政的“币原外交”受到了日本政界和军部的双重攻击。成立不久的田中义一内阁于1927年6月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新的对华外交政策，其主要内容为，决定为维护日本在中国的权益可以采取“果断的自卫措施”，从中国本土分裂“满蒙”地区而置之于日本势力范围之内，由日本负责满蒙地区的治安。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满蒙作为解决日本经济困难的突破口”更被看做为了日本的“生命线”。[3-26]

由于更加重视“满蒙”，新疆地区也越来越受到日本的重视。在日本外交史料馆所收藏的关于新疆的外务省档案中，明治、大正时期的内容不仅量少，还分散在各种不同卷中。与此相比，昭和时期的档案数量巨大，独立成卷的就达十卷以上。[3-27]

在这些资料中，有一份1935年10月24日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南次郎（兼任关东军司令官）寄给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的秘密报告。这份由关

东军参谋部制定的《关于苏联联邦赤化新疆的状况》的报告，在前言里有如下论述：[3-28]

我们现在针对外蒙的各项直接工作，以及日满通过内蒙、绥化、宁夏，从新疆方向威胁苏联腹地的势力进展，与通过蒙古、新疆地区进入中国中原的苏联赤化势力，把蒙古、新疆、中国西北部变为战场展开了角逐，将来还会愈演愈烈。对於苏联在新疆的各项工作，应与支那红军的移动以及蒋介石的亲共容共政策或者回教徒问题联系起来看待，不能等闲视之为隔岸之火。

这个时期中日本关注新疆的目的，仍然在于防止苏联势力南下，以及考虑如何造成对苏联的威慑。但是要“通过内蒙、绥化、宁夏，从新疆方向威胁苏联腹地”，就必须把新疆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个报告尽管没有明确指明，但从中完全可以看出日本军部中的一部分人具有把新疆划入日本势力范围的企图。

但是在1933至1935年之间，日本外务省所收集到的关于新疆的情报，全部都是从新疆以外，特别是由日本驻阿富汗、印度、苏联的大使馆、领事馆从当地新闻报导和通讯社所发的消息中整理编辑出来的。由于从1934年起苏联控制有关新疆的报导，再加上禁止外国人到与新疆接壤的中亚各个苏联加盟共和国旅行，使日本驻苏联的大使馆、领事馆收集有关新疆情报的工作遇到很大困难。[3-29]面对这种情况，1935年12月1日驻新西伯利亚（Novosibrsk）日本领事馆向外务省提出《关于实地调查新疆的意见》。现在被收藏在外交史料馆中的这一文件，强烈主张组建外务省和陆军省的共同调查组织，无论如何也要从中国内地或阿富汗潜入新疆。[3-30]

1933年，有一位日本人，跟随从甘肃攻入新疆的回族军阀马仲英进入了新疆。当时新疆的最高领导人——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曾以此为依据，谴责马仲英是受到了日本的指使才进军新疆的。被盛世才指责为“日本间谍”的人叫大西忠（化名于华亭）。[3-31]据当时在马仲英军——国民军36师中任少校参谋的杨波清回忆，大西是一个身份不明、举止神秘、能解读电报密码的日本人。与其说他是在马军中做事，不如说大西是在去新疆的途中被马仲英军所抓获，之後一起来到新疆的。[3-32]但是当马仲英进入新疆後不久，大西忠就被盛世才的军队抓获并监禁了起来。

另据当时在马仲英军中的武志平，一个自称是秘密检查过大西忠行李的人回忆道：大西忠带着许多日语文稿和一张写有住在新疆的白俄将军名字的卡片（或为“名片”？），他从那个名字推测大西到新疆可能是

为了与此人取得联系。[3-33]但是，在日本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等地所存的历史档案中，至今还没找到能够清楚证明大西忠身份的第一手材料。

自1935年以来，日本势力浸透到中国北部的察哈尔、绥远和山西省。1933年到1934年间曾访问过新疆的瑞典人赫定，根据当时中苏日三国在新疆的情况，做出了以下判断："这些中国北方各省份是对新疆贸易和商队的大通道的出发点。日本人重画亚洲地图，如果在以上地区，按照与现在相同的方向继续扩张的话，新疆就有可能成为引起日俄两国抗争的种子。"[3-34]

对日本来说，如果苏联势力进入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西北部，不仅能够对他们独占"满蒙"地区造成威胁，还意味着一旦中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中国就可以通过这个地区接受外国特别是苏联的援助，因此能够进行长期的抗战。

到了1935年，蒋介石开始意识到一旦中日战争爆发，中国的海岸线必定遭到日本的封锁。到了那时，苏联就可能会成为唯一一个能够向中国提供武器弹药的国家，因为苏联在地理上与新疆接壤。这年年末，蒋介石派出陈立夫去到苏联，就缔结中苏军事协议一事打听苏联的态度。[3-35]事实上，在中日战争发生初期，国际社会中愿意援助中国的国家也只有苏联。关于这一点，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曾于1940年在华盛顿向美国人证实："知识分子的忠实，迫我不得不说出，中国抗战三年来得自苏联物资援助，实较英美方面之总和多至数倍之多。"[3-36]因为从战争初期开始，苏联就积极地支持中国对日抗战，这让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渐渐地和"亲苏"思想结合在一起。

1937年中苏两国经过会谈，决定通过两条线路，将苏联的物资运往中国内地。但是，其中的乌兰巴托—二连—兰州这条主要经过蒙古地区的线路，由于过于接近"满蒙"，事实上无法使用。所以，苏联的阿拉木图—新疆伊犁—迪化—哈密—甘肃兰州这一线路，成为了唯一的通道。从1937年到1938年夏仅仅大约一年时间内，就有大约6,000吨的苏联援助物资（武器、弹药、药品、汽油等）经由新疆运往了中国的内地。[3-37]

由于新疆通道的存在，日本以给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从而迫使蒋介石改变其抗日抵抗政策为目的的、从1938年所开始的"截断援蒋缅甸通道作战"计划，也以失败而告终。在此意义上，对于中日战争初期的中国来说，新疆就是"生命线"和"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根据地"。[3-38]如果当时没有能够起到如此作用的新疆存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就有可能是另

外一种方式。

第二节　　盛世才的反日亲苏政策

盛世才反日思想的根源

新疆的居民大部分属于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在地理位置上又远离日本，所以，新疆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发挥出如此巨大的积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新疆政府的政策都是由汉族军阀盛世才所制定和实施的。当时的盛世才，虽然与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对立，但是为了支持抗日前线，他毫不犹豫地在人力、财力、物资等各个方面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3-39]

关于盛世才之所以积极支持抗日战争的原因，英国驻中国大使馆总领事级参事台克满（Eric　Teichman）在1935年10月与盛世才会面後发表了如下意见：东北出身的盛世才"和其它所有满洲出身的中国人一样，对日本的愤慨之情特别强烈，这一事实导致他更能够高兴地接受苏联的援助"。[3-40]台克满的分析无疑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东北地区居民中为什么普遍存在反日情感，但这一论证如果用在盛世才身上，未免过于简单。

事实上，盛世才与日本有着很深的关系，他在青年时期曾三次留学日本。第一次是在1917年，据说是在明治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3-41]1918年到1919年初，为了抗议签订《日华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议》和凡尔赛和会承认将以前德国在中国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们发起了大规模的归国运动。[3-42]盛世才也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日思想。关于当时盛世才的表现，与他一起留学并自称"在那时成为了朋友"的杜重远在1938年时如此谈到：

他的民族意识非常的强，又富於革命的精神。在东京的时代，每次为中日的问题起纠纷时，总是有他一份。我还记得，在巴黎和会的时候，中国反对承认二十一条，东京的留学生开过几次大会决定一致回国，以示反抗。中间有些意志薄弱的同学们，宁愿读死书，不愿中途辍学。盛先生手拿着一支大棍棒，作过督队官。谁不愿回国，就要吃他一棒。[3-43]

当时的盛世才还被选为留学生归国请愿的代表。[3-44]而且回到中国之後他没有返回日本，而是进入到了云南讲武堂韶州分校。据杜重远说，他的动机是因为发现要改造中国只有从军事开始。据说，盛世才是因为痛感当时中国"海内棼如、列强环伺"，从而投笔从戎的。[3-45]



盛世才（1897-1970）

盛世才第二次到日本留学，是由中国东北军将军郭松龄将他推荐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与郭松龄的相逢，改变了盛世才的人生。杜重远的《盛世才与新新疆》及陈纪莹的《新疆鸟瞰》，都记载了当年盛世才作为郭的部下，得到郭的赏识和提拔之事，郭甚至亲自做他的证婚人，之後又将他推荐到日本陆军大学留学。[3-46]另外，据与入疆之前的盛世才就是至交的周东郊说，郭松龄因为自己没有孩子，一直都把盛世才看成是自己的儿子，还让他和养女结婚并一起送到日本留学。[3-47]也就是说，没有孩子的郭松龄将军将自己的养女介绍给盛世才为妻，可见是对盛世才赏识之极。[3-48]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以五卅事件为导火线，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民主反帝爱国运动高潮。因东北军阀张作霖与日本关东军勾结，受到全国爱国运动影响的东北军将军郭松龄，于11月25日发动了兵变。正在学习之中的盛世才奉郭松龄之命，回国参加了反对张作霖的战争。[3-49]郭松龄所发动的兵变最终失败，本人也被张作霖杀害。但是，很多证据都可以证明，郭松龄的失败与日本的干预有关。[3-50]因此，视郭松龄夫妇为“父母”、而自己又亲身体验了这一过程的盛世才，通过郭松龄的失败与被害，自然加深了对日本的反感。[3-51]

反对张作霖的战争以失败告终後，盛世才只好再次返回了日本。但是由于张作霖从中作梗，盛世才在陆军大学的学业也受到了干扰。据陈纪莹说，盛世才被剥夺了学籍，但据杜重远说，盛世才的学籍虽被保留

但失去了公费奖学金。两人都说当时盛世才曾陷入了“公费中断，告贷无门”的窘境，据说最後是因为得到了孙传芳、冯玉祥和蒋介石的经济资助才得以勉强完成学业。第三次留学生活之所以如此窘迫，说到底还是因日本与张作霖勾结所致。据说，盛世才回到中国之後，再没有和任何日本人进行过任何形式的交往。可见，三次日本留学，非但没有培养出盛世才的亲日感情，反而在近代中日两国关系的背景下，从民族感情和政治立场的角度强化了盛世才的反日情绪和抗日思想。[3-52]

郭松龄的兵变之所以最终遭到日本的暗算，据说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获悉了他与西北军阀冯玉祥将军之间秘密缔结了协议，让日本察觉到了他的反日思想。[3-53]事实上，在郭松龄发动叛乱一个月前，日本已经得到冯玉祥与苏联代理外务人民委员卡拉汗之间缔结的密约内容。主要包括：在中国西北地区试行联邦制，承认苏联人在该地区的居住权和宣传其思想的权利，中国、苏联、蒙古三国合作从新疆和内蒙古地区驱除日本、英国的政治势力等。[3-54]日本当然不愿意看到郭松龄将军——这位有着强烈反日和亲苏思想的冯玉祥的盟友成为“东北王”。

然而，郭松龄的心腹盛世才七年後却成了“新疆王”。[3-55]盛世才让郭松龄将军的弟弟郭大鸣长时间担任新疆省政府的秘书长。[3-56]虽然至今还没有发现直接的证据，但是从其政治主张的相似性，即把“亲苏”与“反日”结合在一起这点上来看，仍然可以看出盛世才在其制定政策时，受到了郭松龄和冯玉祥当年思想的影响。

“四・一二”政变和盛世才的地位危机

回顾从1933年到1934年时新疆的政治过程及社会现状，可以看出，盛世才之所以以新疆社会为舞台实施“反帝”、“亲苏”的政策，其实还与新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有关。

1933年迪化的“四・一二”政变，是由参谋厅厅长陈中、迪化市市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所策划，由“归化军”所发动的。[3-57]其实，盛世才在事前对政变一无所知，[3-58]由发动政变者在4月12日所拟定的“临时维持委员会”的50人委员名单中也没有盛世才的名字。[3-59]

但是，由于站在省主席兼新疆边防督办金树仁一方的杨正中旅于13日发起反攻，使发动政变一方开始处于劣势。[3-60]於是，指挥着“新疆省最强的军队”并驻扎在迪化市郊外乌拉泊（Ulanbay）的盛世才，变成了一个一举一动都会决定局面的力量。[3-61]政变一方和金树仁一方都派出人员前往说服盛世才，希望得到盛世才部队的支持。[3-62]但是，盛世才最终选择了政变一方并投入了部队，使金树仁政权的灭亡最终成

为了事实。於是，在4月14日的临时维持委员会第二次紧急会议上，有强大军队作後盾的盛世才被选举为临时督办，成为迪化政权的最高领导人。[3-63]而发动政变的陈中、陶明樾等人因为没能担任有实权的职务，所以对“坐收渔翁之利”的盛世才非常不满。[3-64]

而南京国民政府方面，也没有马上承认盛世才“新疆边防督办”的地位。许多政府要员开始积极活动，认为可以利用此次政变的机会，恢复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直接统治。6月1日，中央政府派遣参谋次长黄慕松为“宣慰使”，率领多名官僚、党务人员以及专家来到了迪化。黄慕松一到，就设立了“宣慰使署”，与新疆各界人士进行频繁接触，摆出了一副准备接收政权的架势。[3-65]迪化政权内的反盛世才派，在失意之中最终决定与国民党携手，新疆省的汉族官员也渐渐开始倒向“宣慰使”一方。[3-66]



黄慕松（1883-1937）

但是，从很多人的记述中都可以得知，盛世才最初就是怀着强烈的政治野心才来到新疆的。[3-67]因此，盛世才根本不会轻易放弃到手的权力。“宣慰使”以及围绕在其周围的新疆官员的这些行动，当然让盛世才感到了威胁。6月19日，盛世才从前线赶回迪化，在第二天的维持委员会会议上当场枪杀了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人，并软禁了“宣慰使”，从而一举铲除了政权内部的反对势力。[3-68]

但是，巩固了迪化政权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并不等於取得了能够左右新疆社会的权力。“四・一二”政变的诱因，是“哈密起义”等独立运动造成的新疆社会分裂。而1933年以後，由于各个民族集团的反政府势力日益活跃，迪化政权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号令新疆社会的权威。[3-69]

在新疆南部，从1933年1月起，以“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为中心，库车、阿克苏、和田、喀什各地纷纷出现了由维吾尔族居民参加的暴动，新疆南部已不在新疆省政府的指挥之下。[3-70]在新疆东部，应哈密地区维吾尔族领袖尧乐博士的请求，甘肃回族军阀马仲英的部队1月底再次进入新疆，在各地回族居民的支持下，收编了哈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反政府势力，制订了直接夺取首府迪化市的作战方针并连续取得胜利，不久就逼近到了迪化的周边地区。[3-71]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地区，也出现了由哈萨克族牧民参加的暴动。进入4月以後，迪化与各地方上的联系已经中断，新疆省政府当局真正能够控制的，事实上仅仅剩下了迪化及其一部分周边地区。而在北京，甚至已经开始流传马仲英攻陷了迪化的传言。[3-72]



尧乐博士（1889-1971）

这些民族冲突，当然不是通过替换迪化的新疆省政府领导人就能够平息的。马仲英反而将这次政变看作是自己成为新疆最高领导人的机会，因而进一步加紧了对迪化方面的进攻。但在1933年6月的“磁泥泉战斗”中，由于“罕见的天气剧变这种异常的幸运”，以及马仲英阵营中和

加·尼亚孜指挥的维吾尔族部队突然撤退，盛世才才得以击退马仲英部队的进攻。[3-73]但是，当时盛世才的军队总计不到六千人，相反马仲英军队却有一万人左右。[3-74]在那个只有以武力做依靠才能解决纷争的时代，对于受到来自迪化政权内部和政权外部的双重挑战的盛世才来说，民族问题其实才是最重要而且又最难以解决的问题。



马仲英（约1912-约1937）

对于当时的盛世才来说，要想解决民族问题，绝对需要外部的支持。但在8月1日已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疆边防督办”的盛世才，则根本不想考虑要求国民政府的支持。原因就在于国民政府的暧昧态度上：表面上对盛世才的胜负“袖手旁观”，[3-75]而事实上则是一刻也没有忘记制服盛世才。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着一份1933年12月16日张培元（伊犁屯垦使，即行政长官，兼国民军第八师师长）发给中国驻苏联大使颜惠庆的电报，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特使、外交部长罗文干为了主持刘文龙（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张培元的就职宣誓仪式来到新疆，但甚至就在此时他也在算计着让马仲英与张培元联合而推翻盛世才。[3-76]在这种状况下，毫不夸张地说，要想解决民族问题，维持自己的统治，留给盛世才的唯一选择就是寻求与新疆接邻的苏联的支持。

“反日”、“亲苏”路綫的采纳和民族问题的解决

对于持有反日思想的盛世才来说，促使他最终采纳了亲苏路线的直接原因，可能就是他自身实力的薄弱。而从当时的国际局势的角度来看，反日路线与亲苏路线的结合也是一种历史潮流的必然。盛世才本人曾强调：“要想复兴中华民族，必先打倒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的帝国主义。要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依照总理所说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试问世界上真正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除了苏联以外，还有谁呢？”[3-77]以此说明反日路线与亲苏路线之间的联动性和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的正当性。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盛世才在新疆之所以采取亲苏路线的出发点，却并不完全是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据盛世才本人所说，在他所提出的“六大政策”中，最初提出的政策是“民族平等”，之後是“反帝”，再之後是“亲苏”。而盛世才对陈纪莹曾经说过：“帝国主义的勢力要在新疆存在一天，新疆各民族就有被分化离间的危险，新疆境内就一天不会安定下来，新疆土地就有被割裂的可能。”[3-78]以上可以说明，盛世才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民族问题而提出了“反帝”口号的。

《边疆政教之研究》的作者黄奋生曾经分析：“反帝”、“亲苏”，就是要借苏联的力量击退日本、英国的勢力。[3-79]而应该注意的是，在盛世才所制定的政策当中，被当做帝国主义勢力的，实际上是新疆伊斯兰民族的反政府勢力。“某帝国主义曾鼓动南疆独立，日本帝国主义者曾答允帮助缠回，[3-80]设立回回国。若不当头棒喝，予以痛切的打击，使全疆各民族均有所戒备，则一切政令均将受其影响。”[3-81]也就是

说，东突厥伊斯兰共和国已经被认定是“某帝国主义”的傀儡，马仲英被认定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因为把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的反政府势力说成是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势力在新疆的“走狗”和“傀儡”，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借苏联之力镇压其它民族的反对势力。换言之，盛世才所提出的反日、亲苏的政治路线，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需要而提出来的。

但是，从制定政策的角度来看，提出“反日”和“亲苏”，对盛世才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反日”，不仅符合了当时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而且能够赢得近代以来一直与日本进行势力扩张竞争的苏俄的好感；“亲苏”不仅符合了当时中国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扩张的需要，而且符合了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国际潮流。当然，对盛世才来说，最重要的是提出反日和亲苏的口号後，既能够让苏联对他提供援助，也能让他堂堂正正接受苏联的援助以镇压各民族的反抗势力，以落实和维护他刚到手的统治新疆的地位。

盛世才的这种“反日”和“亲苏”政策，不久就见到了成效。1933年12月，马仲英的部队从东南方的吐鲁番方向、张培元的部队从西北方的伊犁方向分头向迪化进发。但在张的先头部队还没有到达迪化地区时，苏联骑兵突然入侵伊犁地区，使张培元的部队失去了根据地，张培元本人被迫自杀。[3-82]而包围了迪化的马仲英部队，于1月15日在迪化西郊的头屯河地方，突然与一支来自西北方向的、由“赵将军”率领的、自称为“阿尔泰归化军”和“塔尔巴哈台归化军”的部队遭遇。[3-83]在连续激战之後的2月10日的大决战中，马仲英终于被这支使用了战斗机、坦克、装甲车和大炮的部队打败，不得不从迪化地区向新疆南部地区撤退。[3-84]

盛世才在其《十年新疆回忆录》中说道，他是在“归化军”到达迪化地区後才由苏联总领事告知，“归化军”原来就是苏联部队的。[3-85]但是，这明显是一个谎言。当时任盛世才政权阿山宣慰使的包尔汉在其回忆录《新疆五十年》中证实，是他接受了盛世才的指示，在塔尔巴哈台的中苏边境上迎接了一千至两千人的苏联红军部队，并让他们换上准备好的中国服装，之後让塔尔巴哈台行政区行政长官赵得寿担任名义上的总指挥引导他们到达迪化地区的。[3-86]可见，苏军之所以出兵新疆并对盛世才施以援手，原本就是出于盛世才的请求。

另一方面，维吾尔族领袖和加・尼亚孜也在苏军的斡旋下与盛世才达成了妥协，接受新疆南部“警备司令”的头衔，退到了新疆南部。[3-87]进入新疆南部的和加・尼亚孜虽然被“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

国”任命为总统，但由于苏联的压力不敢就任，并在後来逮捕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之父”、“总理”沙比提·大毛拉并押送到迪化交给了盛世才。[3-88]而对于与盛世才妥协而回到哈密地区的维吾尔族领袖尧乐博士，盛世才则是通过苏联顾问，任命他为哈密行政区的警备司令。[3-89]



和加·尼亚孜（1889-1938）

受到苏军追击而在1934年4月败退到喀什噶尔、和田地区的马仲英，在扫除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残余势力之後控制了这个地区。此後，马仲英在驻喀什苏联领事的斡旋下与盛世才达成协议，盛世才同意将和田和莎车地区作为马仲英部队的驻地。[3-90]後来马仲英进入苏联的军事学校学习，然而一直没有被允许回到中国，就在苏联度过了他的余生。[3-91]

与此同时，包尔汉的说服工作奏效，新疆北部的哈萨克族反政府势力表示赞成与高举“亲苏”、“反帝”旗帜的新政府合作。[3-92]因此，他们

从苏联获得武器支持，并在与苏联红军合作的基础上，一起歼灭了活动于新疆北部哈萨克地区的马仲英部下马赫英的部队。[3-93]



马仲英骑马照

关于马仲英部队的失败，亲眼见过马军溃逃情形的斯文·赫定有如下描述："打败东干军［即回族军队］的是俄国人而不是盛世才。如果没有俄国的援助，中国与东干的战争肯定会经历完全不同的过程。"[3-94]盛世才本人也承认，在他的统治建立初期，新疆的民族问题之所以能够得到解决，完全得益于苏联的帮助。1935年他对访问新疆的台克满这样说道："我自己对南京政府没有感到什么责任，相反对于莫斯科我却有很大责任。就是因为有苏联的援助，才使得我取得了对马仲英的胜利。"[3-95]当然，台克满的此次新疆之行，虽然挂着取道回国之名，根本的原因却是因为英国政府认为，苏联势力的进入和发展有使新疆成为"第二个满洲国"之虞。英国政府的这一担心，与国民政府不谋而合。尽管盛世才以尚有小股土匪未消、南部喀什地区发生鼠疫等种种借口加以阻拦，台克满的此次新疆之行，却最终在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得以成行。[3-96]

小　结

日本是从明治後期开始关注新疆的。进入20世纪後，日本为维持它在“满蒙”地区的权益，开始对俄国在新疆的势力扩张产生警惕。正是因为这一点，进入昭和时期以後，日本才有了把新疆纳入其势力范围的企图，但最初并没有一个明确和具体的计划。应该注意的是，无论是在哪个年代，处于亚洲内陆中亚地区的新疆之所以能够引起日本的重视，都是以当时的中日关系，尤其是围绕在华利益的日俄及日苏间的对立关系为背景的。而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由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加快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让中国感到了对边疆民族地区加强管理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由于青年时代的日本经历，盛世才具有强烈的反日思想。但他在新疆采纳反日、亲苏的政治路线的最重要目的，还是为了解决对他来说是最大威胁的民族问题。反日、亲苏路线的采纳，对于成为新疆最高领导人不久的盛世才来说是维护权力而所能作出的最佳选择。据此，盛世才得到了苏联的直接的军事援助，平定了新疆社会的民族冲突，从而在政治上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但是，也正是这一点，为新疆此後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埋下了伏笔。

注释

[3-1]杜重远：《盛世才与新新疆》（重庆、桂林、上海、香港、西安、昆明、成都、长沙、兰州、贵阳：生活书店，1939），第73页。

[3-2]陈纪莹：《新疆鸟瞰》（香港：商务印书馆，1941），第20-21页。

[3-3]中田吉信：《新疆ウイグル自治区と日本人》（一），《アジア・アフリカ资料通报》，第21卷，第5号（1983），第33页。

[3-4]大林洋五：《新疆を访れた日本人》（一），《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纪要》，第54期（1974），第156-157页。

[3-5]大林洋五：《新疆を访れた日本人》（一），《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纪要》，第54期（1974），第151-154页。

[3-6]大林洋五：《新疆を访れた日本人》（一），《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纪要》，第54期（1974），第144-145页。

[3-7]日野强回国後的着作如下：《伊犁旅行谈》（上，下），《地学雜志》，第241号，第243号（1911）；《チャイニーズトルキスタンに於ける住民と其の风习》（上，下),《人类学雜志》，第29卷，第1、3号（1914）；《伊犁纪行》（东京：博文馆，1909）。

[3-8]中田吉信：《新疆ウイグル自治区と日本人》（二），《アジア・アフリカ资料通报》，第21卷，第6号（1983），第36页。

[3-9]袁大化修、王树枏、王学曾总纂：《新疆图志》，第51卷，天章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11年初版，1992）。通宝、韩希良：《辛亥革命在新疆的见闻》，《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79），第38页。

[3-10]斎藤季治郎（1867-1922），1897（明治三十）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32年8月作为参谋总部成员到杭州赴任，1937年4月回国後出任满洲军政委员（隶属第二军），1939年8月被任命为韩国驻屯军参谋，1940年就任统监府御用负责人（间岛派出所所长）。从大正二年8月到三年8月任中国公使馆副武官，大正四年7月就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大正五年5月再次被任命为中国公使馆副武官，大正八年4月出任第11师团长，大正十年2月战死于海参崴。参见日本近代史料研究会编：《日本陆海军の制度・组织・人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71），第33页。

[3-11]《陆・秘，二月六日・参谋総长宛・在北京斎藤少将発・支北电一六号》，日本外交史料馆，一门二类一项二十九目，《清国革命动乱後同国辺境二対スル露国ノ态度并行动一件》卷。

[3-12]伊犁革命爆发于1912年1月7日，8日伊犁将军志锐被处死。参见魏长洪：《辛亥革命在新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第43-57页。

[3-13]大林洋五：《新疆を访れた日本人》（一），第150页。

[3-14]大林洋五：《新疆を访れた日本人》（一），第151页。

[3-15]中田吉信：《新疆ウイグル自治区と日本人》（二）。书中介绍说上原多市于1911年2月被捕，1913年2月被释放。但是注11中所引日本外交史料馆一门二类一项二九目的电文提到，直到1912年2月为止上原多市仍在伊犁。

[3-16]《蒙古及新疆地方谍报机関配置の件》（陆军省大日记、大正七年・「密大日记・四册の内一」）；另见王柯：《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历史研究》，第5期（2009），第87-105页（全文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3-17]中田吉信：《新疆ウイグル自治区と日本人》（二），第35-36页。

[3-18]《秘・明治四五年六月一二日・満蒙及新疆ニ対する露国ノ経営・第一号・参谋本部》，日本外交史料馆，一门二类一项二九目，《清国革命动乱後同国辺境ニ対スル露国ノ态度并行动一件》卷。

[3-19]外务省研修所编：《研修参考资料・満洲事変の研究》（东京：外务省研修所，1967），第14页。

[3-20]外务省研修所编：《国际连盟支那调査委员会报告书ニ対スル帝国政府意见书》（东京：外务省研修所，1967），第164页。

[3-21]外务省研修所编：《国际连盟支那调査委员会报告书ニ対スル帝国政府意见书》（东京：外务省研修所，1967），第15页。

[3-22]《阿部政务局长稿対支那（満蒙）政策概要・支那ニ関スル外交政策ノ纲领・大正元年稿》，外务省史料馆，一门二类一项七八目，松元记録《内田外务大臣ノ対支那（満蒙）政策ニ関シ伊集院公使ヘノ训令》卷。

[3-23]但是，这一政策遭到了军人、在野党和政客的批判，被认为是当时处理中国问题实际负责人的阿部守太郎政务局长在1913年9月5日遭到暗杀。参见栗原健：《対満蒙政策史の一面》（东京：原书房，1966），第四章“阿部外务省政务局长暗杀事件と対中国（満蒙）问题”。

[3-24]赵殿诰：《新疆之国际问题及其前途》，《新亚细亚》，第7卷，第6期（1934），第39页。

[3-25]中田吉信：《新疆ウイグル自治区と日本人》（三），《アジア・アフリカ资料通报》，第21卷，第9号（1983），第31-36页。

[3-26]外务省研修所编：《研修参考资料・満洲事変の研究》，第15页。

[3-27]《新疆政况并事情关系雑纂》，日本外交史料馆文书，A门六类一项三目四目。

[3-28]《公・机密・第一九八六号・昭和一〇年一〇月二四日・在満州国特命全権大使南次郎・外务大臣広田広毅殿・「ソ连邦ノ新疆赤化ノ状况ニ就テ」并「西北共産军及剿匪军态势要図」送付ノ件》，日本外交史料馆文书，A门二类二项〇目C/R一——三《苏支蒙疆関系》卷。

[3-29]《机密・公・第三一四号・昭和一〇年八月二三日・在ソヴィェト联邦特命全権大使大田为吉・外务大臣広田広毅殿・最近ニ於

ケル「ソ」联邦ト新疆トノ関系二関シ报告ノ件》，日本外交史料馆，A门二类二项〇目C/R一——三《苏支蒙疆関系》卷。

[3-30]《特号外・昭和一〇年一二月一日・在ノヴオシビリスク日本领事馆・新疆実查二関スル意见》，日本外交史料馆，A门二类二项〇目C/R一——三《苏支蒙疆関系》卷。

[3-31]盛世才：《十年新疆回忆录》，台湾《自立晚报》连载（1952年4月29日-12月11日，1952年9月30日，1952年10月7日）。

[3-32]杨波清：《马仲英入新随军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1986年再版），第106-107页。

[3-33]武志平：《补充〈马仲英入新随军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1986年再版），第275-276页。

[3-34]ヘディン着，福田宏年译：《シルクロード》，上册（东京：岩波书店，1984），第229页。

[3-35]宋春：《中国国民党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第382-383页。

[3-36]李修业：《苏军进入东北前後》，《文史数据选辑》，增刊第1辑（1986），第143页。

[3-37]刘唐领：《赴苏采购抗日武器的回忆》，《新疆文史数据选辑》，第24辑（1992），第14页。

[3-38]邹韬奋：《序言》，载杜重远：《盛世才与新新疆》（重庆：生活书店，1939），第2页。

[3-39]陈纪莹：《新疆鸟瞰》，第8页；杜重远：《盛世才与新新疆》，第33页。

[3-40]タイクマン着，神近市子译：《トルキスタンへの旅》（东京：岩波书店，1940），第118页。

[3-41]陈纪莹：《盛世才小传》；陈纪莹：《新疆鸟瞰》，第8-10页。但1970年盛世才治丧委员会编《盛晋庸先生行述》（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第3174-3177页），记载盛世才是1915年从上海吴淞公学政治经济专业毕业後去日本的。

[3-42]宫地正人：《国际政治下の近代日本》（东京：山川出版社，1987），第161页。

[3-43]杜重远：《盛世才与新新疆》，第32页。

[3-44]盛世才代表的组织，据杜重远记载是留学生全体会议（杜重远：《盛世才与新新疆》，第32页），而据陈纪莹记载是辽宁同乡会（陈纪莹：《新疆鸟瞰》，第8页）。

[3-45]盛世才治丧委员会编：《盛晋庸先生行述》，载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174页。

[3-46]杜重远：《盛世才与新新疆》，第32-33页；陈纪莹：《新疆鸟瞰》，第8页。

[3-47]周东郊：《盛世才是怎样取得新疆统治权的》，《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1964），第211页。

[3-48]又有一说，认为盛世才之妻为郭松龄的外甥女。见白振声、（日）鲤渊信一主编：《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210页。

[3-49]杜重远：《盛世才与新新疆》，第33页。

[3-50]对于这场战争，日本政府最初采取了中立立场。但是，日本关东军判断郭松龄是在为了抵抗日本，而要把苏联势力引入“满蒙”地区，因此制定了“援张排郭”的方针，处处阻碍郭松龄部队的行动。有人指出关东军曾秘密地在弹药补充和作战指导方面援助张作霖部队，还让一部分日本军人伪装成中国人直接参加张作霖部队的作战。12月1日，时任奉天日本总领事的吉田茂致电日本外务省说道：“我认为为了维护我国在满洲的地位，援助处于困境的张作霖并非无益。”在郭松龄部队于连山大败张作霖部队，即将拿下奉天城时，日本政府也放弃了不干涉的立场。日本政府与军部协商後，12月10日以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的名义给郭和张发出不会坐视在满洲铁路及其沿线地区的混乱的警告，言外之意就是不会坐视亲日的张作霖失败而不闻。因此，郭军开始走向劣势，于12月23日败于张军。以上可参见《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十四年，第2册（下）（东京：外交史料馆，1983），904号文书、913号文书、950号文书、997号文书、1018号文书、1019号文书、1056号文书、1057号文书、1068文书等。

[3-51]周东郊：《盛世才是怎样取得新疆统治权的》，第211页。

[3-52]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後，国民政府为了接收苏联的援助在兰州设立了中央运输委员会（简称“中运会”），盛世才亲自就任了新疆分会主任委员（许太河：《在中运会首站绥定亲历记》，《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992］，第46页），并任命沿途各地的最高行政

首长和公安局长为地方分会主任和副主任（傅大正：《记孙科视察玛纳斯中运会汽车站》，《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992］，第64页），连普通的接待人员也都亲自指定（周恒舜：《在七角井难忘的日子里》，《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992］，第102页）。他甚至不顾新疆财政面临崩溃局面，只要与中运会有关的经费不论多少都给予支付（杨再明：《抗战时期的中运会》，《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992］，第35页）。他明确指示沿途县的行政首长，首要的工作是做好中运会的工作，做好军需工作是对抗日战争的最大贡献（吴澍河：《一切为了抗日、一切为了前线》，《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992］，第94页）。除了在哈密地区建立起了苏联支援的战斗机装配工厂以外，从1937年到1938年夏天约一年的时间内经由新疆线路运往中国内地兰州的苏联援助物资有：985架战斗机、82辆战车、1,300门大炮、1,400挺机关枪（王德瑜：《新疆中运会之我闻我见》，《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992］，第55页；杨再明：《抗战时期的中运会》，第37页）。

[3-53]《一一月二五日・在天津有田総领事ヨリ・币原外务大臣宛（电报）・李景林ノ秘书张同礼ガ冯郭密约ニツキ説明ノ件》，《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十四年，第2册（下），885号文书。

[3-54]《一〇月一三日・在中国芳沢公使ヨリ・币原外务大臣宛（电报）・カラハン对冯玉祥密约大纲ナルモノ入手ニツキ报告ノ件》，《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十四年，第2册（下），785号文书。

[3-55]关于“十年新疆王”的称呼，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153页。

[3-56]郎道衡：《〈新疆日报〉的片段》，《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90），第177-178页。

[3-57]归化军，原为1931年後期当时的新疆主席兼边防督办金树仁为镇压哈密地区维族人的起义而组建的白俄人部队，这些白俄人主要是十月革命後从俄国移居到新疆的人，其中有的取得了中国国籍，有的没有取得。

[3-58]周东郊：《盛世才是怎样取得新疆统治权的》，第218页。

[3-59]周东郊：《新疆十年》（钢板油印版，原出版社不明，但是後记写于1948年），第11页。

[3-60]其原因是归化军部队仅仅只有200人（周东郊：《新疆十年》（钢板油印版，原出版社不明，但是後记写于1948年），第12页），而

加入政变一方的东北军纪律差，战斗力不强（吴蔼宸着，杨井克已译：《新疆纪游》［东京：兴亚书局，1943］，第291页）。

[3-61]尧乐博士：《尧乐博士回忆录》（台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第157-159页。

[3-62]据周东郊：《新疆十年》，第12页，为了说服盛世才，13日政变领导人陈中和归化军指挥官一起到了乌拉泊。但是据宫碧澄：《盛世才入新夺取政权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1964］）所谈，李笑天自己也驾飞机前去说服盛世才。另外，金树仁的警卫在回忆文中称自己曾将金树仁的命令送达给盛世才（刘应麟：《新疆“四·一二”政变中的一些问题》，《新疆文史数据选辑》，第11辑［1982］，第69页）。

[3-63]周东郊：《盛世才是怎样取得新疆统治权的》，第218-219页。

[3-64]宫碧澄：《我知道的陶明樾》，《新疆文史数据选辑》，第5辑（1980），第7页；吴蔼宸着，杨井克已译：《新疆纪游》，第255页。

[3-65]蔡锦松、蔡颖：《一九三三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和盛世才争夺新疆统治权的斗争》，《新疆历史研究》，第1期（1985），第73页；陈沣：《黄慕松、罗文干先後在新的活动》，《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0），第104页。

[3-66]为了报告事变经过独自去南京的陶明樾和宫碧澄等，也在途中与黄会合一起回到了迪化，见吴蔼宸着、杨井克已译：《新疆纪游》，第248页。

[3-67]杜重远：《盛世才与新新疆》，第34页；周东郊：《新疆十年》，第20页。

[3-68]盛世才：《牧边锁意》，《五十年政海风云——天山南北》（台北：春秋出版社，1967），第76-77页。但是，根据别人的回忆录，盛世才是通过日本人大西忠解读电报暗号，才得知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与黄慕松秘密串通之事（吴蔼宸：《读〈马仲英入新见闻〉补正》，《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1989年再版］，第277-279页）。周东郊说盛世才是6月25日突然回到迪化，在6月26日的紧急会议上当场枪杀了陈中、陶明樾、李笑天三人，软禁了黄慕松，发起了所谓“二次政变”的（周东郊：《新疆十年》，第16-17页）。

[3-69]周东郊：《新疆十年》，第11页；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新疆简史》，第三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第195-197页。

[3-70]尧乐博士：《尧乐博士回忆录》，第156页。

[3-71]根据高闻天：《马仲英两次进疆及攻占奇台的经过》，《昌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5），第5页，马仲英到哈密後任命尧乐博士和和加・尼亚孜两人为旅长，而以和加・尼亚孜为先头部队，由此可知马仲英与维吾尔族暴动武装联合到了一起。另据殷宗林、王德祥：《马仲英踞奇台十八天见闻》，《昌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5），第47-51页；吴英、丁万福、米万隆、沈德云、丁富海：《马英海骑兵旅》，《昌吉市文史资料》，第2辑（1987），第13-33页；马升、崔万寿：《马仲英的青马队》，《昌吉文史资料》，第3辑（1985），第40-41页等当地居民的回忆文章，马仲英部队军规严厉，不虐杀当地居民。因此，马仲英的军队能够在当地回民社会中吸收了不少新的兵员，如马仲英军队拥有的马英海骑兵旅和青马队都是由新疆当地的回族居民组成的部队。关于马仲英拉拢维吾尔族反政府势力一事，还可以参考尧乐博士：《尧乐博士回忆录》，第156-157页。有关马仲英军队在迪化周边地区的胜利，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记载，本书主要参考了章升保：《马仲英围攻奇台城》，《昌吉文史资料》，第2辑（1985），第31-34页。

[3-72]ヘディン着，田宏年译：《シルクロード》，上册（东京：岩波书店，1984），第10页。

[3-73]吴蔼宸着，杨井克已译：《新疆纪游》，第253页；尧乐博士：《尧乐博士回忆录》，第159页；杨国梁：《记盛、马磁泥泉战役的经过》，《阜康文史资料》，第1辑（1985），第51-56页。

[3-74]盛世才：《牧边锁意》，第75页；包尔汗：《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第187页。

[3-75]韩镇华：《论新疆南部之危机》，《新青海》，第10期（1933），第122页。

[3-76]《张培元致颜惠庆大使电》如下：“自奉罗部长转到中央忠密电令，着培元督师入迪，解决盛世才，肃清北疆，以除祸根，并令与马仲英合作，迅弥作战，救民水火，以维国土，等因。当时出兵乌苏、绥来，将盛逆私购大批械弹扣留……现职部骑兵一旅已进至绥来、乌苏、塔城已派驻重兵，截断盛逆交通，以期迅速解决，早奠胜局。”新疆历史研究所所藏资料4853号，见蔡锦松、蔡颖：《一九三三年南京国民党政府

和盛世才争夺新疆统治权的斗争》，第79页。

[3-77]杜重远：《盛世才与新新疆》，第29页。

[3-78]陈纪莹：《新疆鸟瞰》，第18-21页。

[3-79]黄奋生：《边疆政教之研究》（上海：商务出版社，1946，民国55年台1版），第118页。

[3-80]在20世纪30年代“维吾尔”这个民族名称产生以前，维吾尔人没有一个统一的民族称呼。18世纪中叶，清朝占领新疆南部时，当地居民均是伊斯兰教教徒，所以被称为“回子”。这之後为了与中国内地的伊斯兰教徒区分，把用头巾包头的维吾尔人称成为“缠头回”或“缠回”。

[3-81]杜重远：《盛世才与新新疆》，第73-74页。

[3-82]陈沣：《张培元、马仲英联合反盛失败经过》，《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0），第122页。

[3-83]周鉴金：《马仲英围困迪化时向西迎击阿尔泰军的情况》，《新疆文史数据选辑》，第11辑（1982），第40-46页。

[3-84]此次战斗规模极大，特别是苏联方面直接导入战斗机、坦克、装甲车、大炮等情况，在参加战斗的人的回忆文章中都有记载。本书主要参考了米万奎、苏德彦、马升、马义、马永贵：《头屯河阻击战》，《昌吉文史资料》，第3辑（1985），第21-24页；马义：《头屯河战役亲历记》，《昌吉文史资料》，第3辑（1985），第37-39页；金国珍：《我参加的几次战役实况概要》，《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4），第53-74页；金国珍：《一九三三年冬至一九三四年春保卫迪化省城战役的前後情况》，《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86），第35-44页；戴良佐：《头屯河之战的日期和兵力装备》，《昌吉文史资料》，第3辑（1985），第81-83页。

[3-85]关于这一点，盛世才1952年11月14日在台湾《自立晚报》第三版上发表的文章中有所提及，但是他再次明显地是撒了谎。因为在另一回忆录《牧边锁忆》中，盛世才承认在苏联红军进入新疆以前，苏联驻迪化总领事突然访问他，向他通告斯大林已经决定出兵新疆，请求给苏军预备补给物资之事。盛世才：《牧边锁忆》，第82页。

[3-86]包尔汉：《新疆五十年》，第209-210页；另参见本书第二章。

[3-87]Aysa Niyaz, “Qumul Dihanlar Kozgilingiga Dair Bazi Maslilar Togrisida Aslima ［关于哈密农民起义的若干回忆］,”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2 (1983): pp. 69-71.

[3-88]Hawir Tomur, “Hoja Niyaz Togrisida Aslima ［关于和加・尼亚孜的回忆］,”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2 (1983): pp. 23-24.

[3-89]刘应麟：《尧乐博士夺取哈镇警备司令的经过》，《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0），第168-169页。

[3-90]马霄石：《马仲英退走南疆以後》，《新疆文史数据选辑》，第1辑（1979），第49-50页。

[3-91]王孟扬：《马仲英事变始末》，《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80），第148-149页。

[3-92]包尔汗：《新疆五十年》，第197-126页。

[3-93]关于马仲英的部下马赫英在新疆北部哈萨克人地区及回族地区的活动，在新疆北部各地区、各县的《文史资料》中有很多的回忆文章。如大路：《1933年玛纳斯发生的几件事》，《昌吉文史资料》，第3辑（1985），第30-34页；乃翁：《马赫英在玛纳斯前後》，《昌吉文史资料》，第3辑（1985），第63-74页；陈芝兰、安维霆：《马赫英在呼图壁的覆灭》，《昌吉文史资料》，第3辑（1985），第26-29页；哈米提：《马赫英之死》，《昌吉市文史资料》，第2辑（1987），第34-54页等。

[3-94]1934年3月13日，赫定在库尔勒见到攻击马仲英部队的苏联飞机，3月17日见到追击马仲英部队的苏军。ヘディン着，田宏年译：《シルクロード》，第193-194页。

[3-95]タイクマン着，神近市子译：《トルキスタンへの旅》，第118页。

[3-96]有关台克满新疆之行从计划阶段到最後实现的具体内容和过程，详见现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英人台克满游历新疆案，第1、2卷，档号366.3/0001。

第四章　　政治权利的双重结构与民族问题

盛世才政权时期的政治路綫和民族政策

盛世才统治新疆的时期（1933年4月-1944年8月），恰恰是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1年3月-1934年4月）走向灭亡和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44年8月-1946年6月）开始爆发的时期。因此，至少从时间上也能看出，盛世才政权在其建立初期，逐渐消除了1930年代新疆发生大规模民族对立和民族冲突的因素，但是在其後的时间里又埋下了1940年代新疆发生大规模民族对立和民族冲突的种子。

正如本书第三章所讨论的那样，民族冲突和民族对立其实是盛世才在确立对新疆统治权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大难题。盛世才是通过提出“反日”、“亲苏”的口号而得到苏联的信赖和支持，才得以解决了这一难题的。因此，盛世才应该清楚，要想维持他对新疆的统治，就必须防止出现民族冲突，缓和民族间的对立。那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盛世才把新疆社会带入到又一次的大规模民族对立和民族冲突中去呢？本章通过梳理盛世才政权时期的政治过程，分析各种政治、社会、国际关系因素对盛世才的政治运作和政策制定所发生的影响，探讨盛世才政权何以和如何再一次激化了民族问题，从而找到造成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发生的原因。

第一节　苏联的支持和盛世才统治体系的确立

政治体制、军事体制及经济体制的建设

1933年9月，盛世才以“企图颠覆新疆省政府”为由软禁了中国国民政府任命的省主席刘文龙，并且自己挑选了接任者，从此在新疆政权内部确立起了他的政治独裁体制。[4-1]1934年4月12日，盛世才召开了“第一次新疆民众代表大会”，在会上提出了《八大宣言》，其内容为：一、实行民族平等；二、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三、实施农业救济；四、整顿财政；五、实施清廉政治；六、扩大和充实教育；七、实施自治；八、改革司法。

从宣言内容中可以看出，盛世才政权从建立之初就面临着解决民族问题、经济财政问题以及重构新疆政治体制等几大难题。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盛世才如果想解决以上难题，就需要建立完善的军事体制，设立有效的政治机关，重建新疆的经济财政体制，消除民族间的对立。而以上这几点，可以说盛世才都是在抗日的名义下，通过得到苏联的帮助才得以实现的。

首先是完善军事体制。1935年，盛世才将新疆省的军队（省军）改称为“反帝军”，规定“反帝军”的性质为“反帝反日的军队”、“拥护苏联的军队”、“拥护六大政策的军队”、“保卫新疆作为中国领土的军队”。“反帝军”装备都是苏式的，由苏联顾问负责训练，并由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员进行思想教育。[4-2]

“政治机关”也仿照苏联政治警察的性质设立。[4-3]设立“政治机关”的名义是防范日本间谍，实际上有两大职能：一是在新疆内部消灭政敌，这一职能主要由被称为政治监察总管理局的秘密警察机关执行；二是负责收集新疆以外的情报，这项工作主要由被称为边务处的秘密情报机关来完成的。下文还将提及，政治监察管理局和边务处，都是在1936年时按照苏联的提议并得到苏联的协助而设立的。

内战加速了物资的不足和物价的飞涨，新疆社会的经济严重崩溃。可以说，盛世才在取得政权之初维持财政的唯一办法就是发行纸币。[4-4]

盛世才政权时期新疆经济体制的重建有两大特徵。第一是由苏联的经济专家制定重建计划。[4-5]“斯大林的妻弟斯瓦尼泽［Svanidze］领导的委员会为了制定新疆经济重建计划而被派遣到新疆。”[4-6]第二是得到苏联大量的经济援助。盛世才曾经向国民政府申请经济援助，但遭到

了拒绝。对于财源已匮乏到极点的盛世才政权，苏联于1935年5月和1936年10月，先後提供了500万金卢布和200万金卢布（当时1金卢布＝4.38卢布）两笔借款，并允许以新疆的农业畜牧业产品偿还借款。[4-7]另外，在苏联的同意下，盛世才在1934年冬成立了“裕新土特产公司”，逐渐独占了新疆的对苏贸易，确保了巨大的财源。[4-8]

正是依靠苏联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援助，盛世才得以维持了新疆的政治独立。1936年，新疆省政府制定了新疆进出境签证制度，[4-9]禁止从事新疆和中国内地通商贸易的新绥公司的车辆进入哈密以西地区。[4-10]这件事虽然被解释成是为了防止日本间谍进入“抗日大後方”新疆的对策，[4-11]但是，盛世才在这一年里还查封了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强迫国民政府任命的新疆省民政厅长和建设厅长辞职，[4-12]甚至强烈谴责国民政府讨论建设通往新疆铁路问题，将它说成是日本帝国主义“想要获得入侵新疆的机会”的阴谋。从这些做法来看，毫无疑问，盛世才的真正目的，不过是以苏联的支持为後盾，排挤中央政府势力，在新疆实现自己的“完全自治”。[4-13]

“民族平等”和战争动员

1934年8月中盛世才与马仲英就停战达成协议以後，新疆各地大规模的民族冲突终于平静了下来。但是在经过数年战乱之後，新疆各地区的实权大多为伊斯兰民族领袖们所掌握。虽然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失败了，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运动思想却并没有从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社会中完全消失。在东突厥斯坦运动的发源地喀什噶尔地区，在地方知名人士的带动下，维吾尔族社会再次兴起创办新型学校的风潮。这种行动，其实是在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失败後对民族素质低下的一种反省。[4-14]

各地的民族主义倾向，无疑妨碍了盛世才从政治上统一新疆社会。但是，因为以下两点原因，又使盛世才无法对这些民族主义倾向进行直接的镇压：（1）各地的伊斯兰民族领袖，不是像新疆南部的维吾尔人和加·尼亚孜和麻木提、哈密地区的维吾尔人尧乐博士、阿尔泰的哈萨克人赛里甫汗那样拥有自己的军队，就是像喀什噶尔的尤努斯（Yunus，汉名郁文彬，民族运动领导者）、阿卜杜拉·大毛拉（Abudulla Damolla，阿訇）、伊犁的土地阿洪（Turdi Ahun，工商界领袖）那样深受当地居民的信赖；（2）这些民族领袖们都出于个人的目的，同苏联已经建立、或者正在努力建立某种特殊的关系。[4-15]盛世才投鼠忌器，因为需要苏联的支持以维持统治，所以不敢不顾苏联的意愿而对这些民族领袖进行镇压。同时，如果没有苏联的军事援助，光靠盛世才的

军事力量，也镇压不了这些已经做大了的民族势力。

面对这种形势，盛世才采用了招抚的政策。他通过任命这些人为新疆省政府官员的方法，承认各地民族领袖的权威，从而将他们纳入体制之中，从而收回地方权力。1934年下半年，盛世才先後任命了和加・尼亚孜为新疆省政府副主席，麻木提为新疆省军第六师师长，尤努斯为农矿厅厅长，赛里甫汗为阿尔泰行政区行政长官，尧乐博士为哈密警备司令官。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民族领袖担任了省政府各厅副厅长、行政区公安局长和县长等职务。[4-16]

当时，中国关心新疆问题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盛世才如果不在政治层面上作出巨大的努力，就难以消除新疆社会中汉族和伊斯兰民族之间再次发生民族冲突的隐患。[4-17]如果镇压不了敌对势力时就进行招抚，这是中国历代百试不爽的政治传统之一。而对于盛世才来说，当时他的实力和新疆的形势也让他无法脱离这条“王道”。但不同的是，盛世才在对伊斯兰民族领袖进行招抚时，却将他的这一政治手法表现为“实现民族平等”的努力。

盛世才所提倡的“民族平等”，是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得到理论化、体系化、具体化的。1935年6月，共产国际为了帮助盛世才稳定政权，再次向新疆派遣了十多名中国籍成员。[4-18]至此，共产国际派遣的25名共产国际人员，都在新疆的政界、新闻界和教育界担任了要职。[4-19]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共产国际人员，同时都兼任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以下简称“反帝会”）中的重要职务。因为“反帝会”是盛世才用来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组织。

“反帝会”成立于1934年7月，最初的会员都是省政府的高级官员。据曾任第一任反帝会委员长的何语竹回忆，“反帝会”的设立以及最初的人事都遵从当时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Apresof）的指示。何语竹和“反帝会”的秘书长为了接受指示，每周都要访问驻迪化的苏联总领事馆。[4-20]1935年，随着共产国际人员进入新疆，“反帝会”在12月举行了第一次改组，从委员会制变为了干事会制。盛世才自己担任了会长，同时“反帝会”在省厅、机关、社团、部队及各地都成立分会，工作性质也变为负责所在地区、部门的思想教育工作，入会条件更加严格，部分标准甚至类似一个执政党。[4-21]改组後的“反帝会”，实际上是由共产国际派遣到新疆的中国籍的秘书长和组织部长等负责运作的。

与许多苏联顾问被新疆省政府各机关直接任用相比，中国籍的共产国际人员则更多是到“反帝会”任职。这样做的目的，是出于强调“反帝会”从性质上来说是一个中国人的组织的需要。在“缺乏民族团结精神，

一盘散沙”的新疆社会里，[4-22]“反帝会”为了“对民众进行动员、宣传、教育”，提出了以下的口号：“新疆的十四个民族、四百万民众与中国四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开发西北，收复东北，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法西斯主义，主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4-23]从“反帝会”的活动中可以看出，盛世才所希望的政治局面是：在政治层面上依靠苏联的支持，从而造成摆脱中国中央政府控制，在政治上保持独立的既成事实；而在社会的层面上，则通过“反帝会”的活动，对包括伊斯兰民族在内的新疆各族居民灌输中国国民意识，从而获得进行社会动员的能力。

“25名共产国际人员”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担任了“反帝会”秘书长的王寿成。他对盛世才的迪化政权最大的贡献就是构建了盛世才“民族平等”的理论框架。[4-24]



王寿成（俞秀松，1899-1938）

1935年，王寿成总结出了盛世才政权“以民族文化为形式，以六大政

策为内容”的文化教育方针。[4-25]盛世才政权的目的，是通过统合新疆各民族的文化教育，从民族社会那里夺回日益活跃的民族教育的主导权，以便改变民族教育的民族主义性质。事实上，由于盛世才大力倡导“以加强各民族固有文化为目的的教育”，各民族的学校教育在1935年到1938年的确得到了飞跃性发展。[4-26]

王寿成在1937年4月的“新疆蒙古人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新政府民族政策的报告”，构建了盛世才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并且体系化、具体化了盛世才政权的民族政策。王寿成在报告中指出，盛世才政权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为：各民族地位平等，改善各民族经济生活现状，发展民族固有文化，尊重宗教信仰的自由，保障王公、民族领袖、宗教人士、喇嘛僧人的传统地位和权利等。并且进一步解释说：“民族平等”，具体而言主要是“政治平等”（允许和促进少数民族出身者进入政界）和“文化平等”（允许和促进民族教育）。[4-27]

王寿成的这一报告，到了1980年代仍然被评价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好教材”，[4-28]王自身也成为“第一位在新疆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的人物。但事实上，这一报告当时并非是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做的。报告使用了少数民族出身者进入政界的比例、学校教育的发展程度等大量资料，强调盛世才政权照顾当地民族居民的利益，并且赞美道：在现实世界中除苏联以外，“只有‘四月革命’以後的新疆才实施了正确的民族政策”。也就是说，这篇报告的主要目的，是让汉族以外的其它民族居民接受盛世才政权的民族政策，承认盛世才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功绩。

毋庸置疑，这种认可当地民族居民的参政权以及文化自律的民族政策，与盛世才以前历代政权的民族压迫和愚民政策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也应该看到，盛世才政权时期的“民族平等”并不是无条件和绝对的：进入政界的其它民族出身者的地位大多都是副职；而1936年春盛世才又在喀什噶尔、阿克苏、伊犁、塔尔巴哈台、阿尔泰等民族地区设立了教育局以监督民族教育的实施情况，在向苏联派遣的留学生中，人口不足当地总人口10%的汉族却占到40%——种种迹象都显示了盛世才时代民族政策的局限性。[4-29]

第二节　新疆省双重政治权力结构的形成

苏联选择了盛世才的理由

从许多当时的人或当事人的回忆中可知，苏联在决定支持盛世才之前，曾经与新疆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进行过接触。

据哈密的维吾尔族领袖尧乐博士称，1931年发生“哈密起义”时，苏联的工作人员就来到他那里，想说服他成为苏联支持的势力。[4-30]

而与尧乐博士对立的另一位哈密的维吾尔族领袖和加・尼亚孜，也同样受到苏联的诱惑。社会上广为流传，和加・尼亚孜的武器弹药，至少其中一部分是由苏联所提供的。[4-31]

1934年，苏联也向与和加・尼亚孜对立的吉尔吉斯人领袖乌斯满海（Osmanhal）那里派出工作人员，向他许愿：“只要同我们合作，我们就会承认你的地位并给予援助。”[4-32]

另据记载，1934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为寻求援助向苏联派出了代表团，在塔什干代表团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4-33]

又据盛世才的政敌、1934年前担任伊犁屯垦使的张培元的妻妹李慧英回忆，苏联也曾在1934年向张培元传达过愿意对他进行支援的意向，但为张所拒绝。[4-34]

总之，在1933年11月最後决定支持盛世才之前，甚至开始支持以後，苏联和新疆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先後进行过接触，探讨支援和合作的可能性。这些情况，对于理解苏联的新疆政策，毫无疑问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至少从这里可以看出，苏联并不是基于什么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国家的利益才对新疆发生了兴趣的。所以他们才会同时通过两种管道对新疆进行渗透——既通过援助汉族出身的新疆省统治者来培育亲苏的政治体制，也通过鼓励、支持当地居民的民族运动来培育亲苏的社会势力，以便把新疆完全纳入其势力范围之内。

那麽，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疆，苏联为什么最终放弃了当地的伊斯兰民族领袖，而选择了支持汉族出身的统治者盛世才呢？其理由常常被认为有以下两点：一是盛世才于1933年5月向当时的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表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二是因为盛世才是一位具有合法地位的领导人，毕竟他是由当时的新疆政权选出、并在1933年7月受到中国国民政府任命的新疆最高领导人。[4-35]

的确，盛世才在成为临时督办不久的1933年5月，就向当时苏联驻

迪化总领事表明自己信仰共产主义，以此探讨得到苏联支持的可能性。但是，苏联任命的新任驻迪化总领事和盛世才开始实际交涉是在11月间，即盛世才已在7月被中国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新疆边防督办”之後的事。[4-36]换言之，所谓的第一个理由，即盛世才表明自己信仰共产主义一事，实际上并不在苏联选择究竟该支持何人的标准之内，而因国民政府的任命所赋予盛世才统治新疆的正统性权力，才是促使苏联最後决定支持盛世才的最大原因。

苏联的这种选择标准，应该与当时的远东国际局势有关。日本在继1933年2月进攻热河、3月退出国际联盟、5月签订塘沽协议後，已经明确表现出要将其军事行动从满洲扩大到中国内地及蒙古地区。所以，对苏联来说，日本正在成为它在亚洲的最大敌人。“当时在远东，苏联最关心的是通过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来争取时间。”[4-37]在这种时刻，苏联自然知道，如果支持中国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居民在新疆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正在逐渐转向抗日的国民政府就会产生反苏情绪，并进而威胁到苏联与英美之间的协调关系。

有很多中外研究者都认为，苏联1930年代在新疆的一系列行为的动机，不是“建立堪称第二外蒙古共和国那样的苏维埃新疆”，[4-38]就是“采取与对待外蒙古相同的方式——使其逐渐成为一个加盟国，将新疆变为苏维埃联邦的一个共和国”。[4-39]盛世才本人也在20世纪50年代主张，苏联进入新疆的目的就在于把新疆变成苏联的附属国。[4-40]但是包括盛世才本人，都没能提出确凿的证据以证明：在盛世才时代苏联的政策就是为了把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

据曾和共产国际人员一起在盛世才的迪化政权工作过的中共党员文斐然说，斯大林曾对进入新疆前的王寿成等人直接给予指示：“把新疆作为在第三国际支持下，是属于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它既不属于国民党，又区别于共产党。”[4-41]如果这一证词无误的话，可以确认斯大林的方针就是，通过对盛世才政权的援助将新疆纳入苏联势力范围，但是并没有打算从中国领土中分离新疆。盛世才之所以会将“确立新疆永久为中国之领土”作为“反帝会”的第一宗旨，[4-42]以及敢于公开否认天津《大公报》披露的新疆加入苏维埃联邦的谣言，[4-43]可以成为苏联当时的新疆政策性质的旁证。

据石川忠雄的说法，苏联新疆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苏联的安全保障和获得经济利益。“前者毫无疑问是把新疆作为苏联中亚防御的前沿，後者是借开发新疆丰富的地下资源来帮助苏联的经济建设。”[4-44]笠原正明也指出，20世纪30年代前後苏联进入新疆的具体动机，就是为了获

得新疆的农牧业资源和矿业资源，解决逃亡到新疆的白俄人问题，向苏联领内的西突厥斯坦的伊斯兰民族施加影响，确保对日本、英国及中国的战略地位等。[4-45]

总之，这一时期苏联的新疆政策的目的，是寻找并支持一个势力，能够听他们支使并且最大限度地反映他们在新疆地区的利益、说明他们已将新疆收进苏联的势力范围。正是出于这一目的，苏联在少数民族居民的独立运动和国民党政府任命的汉族统治者之间选择了後者。

苏联势力直接构成的又一个政策决定体系

盛世才之所以能够在新疆社会中逐渐确立他的统治，苏联的支持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苏联势力当然也逐渐并深深地渗透到了盛世才政权的各个部门里。

1934年担任苏联方面援助新疆的实际负责人，後逃亡美国的亚历山大・巴利明（Alexander Barimine），就当时苏联势力渗透到新疆的情况如此证明："从靴子到国民党徽章，我们从头到尾装备了一万人的新疆军队，苏联顾问也被委任为［新疆省的］官员而实际掌握省的管理权力。……我的工作是指挥技术工人在新疆全境修建道路、飞机场和飞机修理厂。除名称外，新疆不久就成为了苏联的殖民地。"[4-46]

苏联顾问被安排到新疆省政府的各个部门。如泰克曼所见，各厅的实权都掌握在苏联顾问手里。[4-47]例如，作为最高财政机关而新设立的新疆财政委员会的决定权，掌握在苏联顾问手中，一切议案及预算支出，没有顾问的签名就不能生效。[4-48]他对军事顾问马利科夫将军的评价是："在军事方面可谓是盛总督的左右臂膀，拥有很大影响。"[4-49]

虽然不能认为这些顾问都拥有在盛世才之上的权力，但同时兼任共产国际代表、并担任盛世才总顾问的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却可以指挥盛世才。[4-50]据说，1936年盛世才编写《六大政策教程》时，每写完一章就会马上通过总领事馆送交斯大林审查。[4-51]被派到新疆的共产国际人员在盛世才的迪化政权中任职的同时，也从总领事处接受指示。[4-52]事实上，新疆已经形成了一个将盛世才排除在外，由苏联势力直接构成的又一个政策决定体系。

在苏联势力掌控的部门当中，尤其重要的是"反帝会"和新疆的秘密警察、情报机关。如前面所提及的那样，"反帝会"是以新疆各族民众为对象的政治动员体系，实际上已经起着执政党的作用。而秘密警察和情报机关分为对内翦除政敌的"省政府政治监察总管理局"和对外负责收集

情报的“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它们成为支撑盛世才政权的重要支柱。

在各个政府部门，苏联人只是担任顾问。但是秘密警察和情报机关，则由苏联势力直接控制。政治监察总管理局在1934年10月改名为全省保安总局，1936年5月改组为全省公安管理处。就其性质，当时任“反帝会”民众部副部长的包尔汉这样描述：“公安管理处和它的前身政治监察管理局，原先不是盛世才的特务机构，而是由苏联掌管的政治监察机构。盛世才为了控制它，与苏联进行了好几年的暗斗。”[4-53]



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

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人也指责“新疆省政府政治监察总管理局”的设立是苏联从政治控制新疆的“第一着棋”。[4-54]这一秘密警察机关原本是按照苏联的倡议而创建的，之後马上被张义吾、王立祥等受过苏联训练的中国籍共产国际人员和苏联人所接收和掌管（图4-1）。[4-55]随着管理局的设立，有中国国籍和苏联中亚的突厥民族的共产国际人员开始

被派往新疆。他们和苏联人一起，仿照苏联国家保安部（GPU）的做法在新疆各地建立起了谍报网络。[4-56]

秘密警察不久便成为恐怖政治的象徵。“保安总局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5月，大约存在了一年零七个月，由于它无孔不入，引起了人们的恐惧和不安。”[4-57]但是，正如王立祥被指责不听从盛世才命令一样，盛世才实际上并不能完全控制保安总局的行动。[4-58]

图4-1　盛世才时期的新疆省警察机关变革图

新疆边防督办公署监察处：	1934年6月在盛世才的苏联顾问提倡下设立 处长——王玉书，副处长——李廷福
新疆省政府政治警察总管理局：	1934年8月改组 处长——盛世才（兼任），处长代理——张文吾（共产国际人员） 副处长——包国定（Alexander Barimine，苏联顾问，1934年底回国） 秘书长——王立祥（中国人，共产国际人员，1935年1月受盛世才邀请从苏联回国） 共设立八个科，第一科（总务科）科长、第二科（政治科）副科长、第三科（军事科）副科长、第四科（民族科）副科长、第五科（外国科）都是共产国际人员。
新疆省保安局：	1934年10月更名，人事不变，在哈密、吐鲁番、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阿克苏、库车等各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分局，并在各地方、学校、部队设情报员。
新疆省公安管理处：	1936年5月改组。吸收一般警察，下设五个分科，由第二科（保安科）继承原保安总局的工作。 处长——张文吾（1937年夏被解职，后被捕，并遣送苏联） 副处长，第二科科长——刘贤臣（共产国际人员，后和张文吾同时被解职，后被捕，遣送苏联） 1937年夏，赵剑峰（新疆边防督办公署副长官）被任命为处长，1938年春转任塔尔巴哈台行政区长官。 1938年春，李英奇（新疆边防督办公署政议处处长）被任命为处长。 1938年9月，哈西姆·哈吉（Hashim Ghaji，共产国际人员）进入新疆目的为重建民族科。 1939年冬，为了孤立民族科，设立收集和分析各地情报的“视察处”。 （1943年1月，重建中国国民党新疆省党部）
新疆省警务处：	1934年7月改组，同“视察处”合并。 处长——李英奇 （1944年9月，盛世才前往重庆就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盛世才时代结束。）

来源：笔者据文斐然：《盛世才特务统治下的新疆》；赵剑峰：《新疆全省公安管理的产生和没落》，《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81）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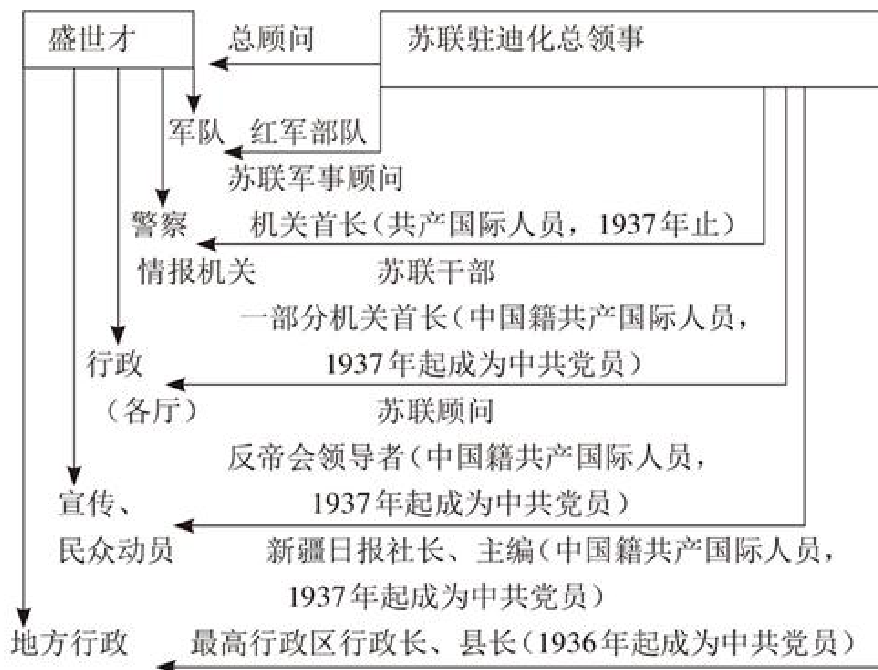
关于边务处的性质，曾任边务处副处长、1949年以後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部顾问的陈培生作过以下说明：“边务处是1936年在苏联的建

议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它的任务是保证新疆的安全，侦察外界敌对势力获取情报。它的主要对象：东面是邻省的军阀马家军和蒋介石的反共军，南边是英帝国主义在印度北部和阿富汗东部临近新疆地区的军事活动。边务处具有高度的机密性，因而它不在督署八大处之内，而由盛世才直接领导。苏联派来一位少将顾问和三位上校情报教官，还有一位德国籍的无线电专家。边务处所需的电讯器材以及交通用的大小汽车，都由苏联提供，因而省界内外的军事情报业务得以迅速建立和开展起来了。”[4-59]

也许是因为陈自身也是从苏联被派到新疆的，他的说明和其它当事人的证言有一定出入。1941年开始在边务处任职，後升为副处长的李国卿回忆说：“边务处虽然是盛世才领导的一个情报机构，但实质上是第三国际情报局派驻新疆的一个军事情报机构”，“边务处的经费，最初由处财务科将年度计划拟好，经副处长核对後，交苏联总教官转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拨付。以後周彬（毛泽民）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长时，边务处财务计划由周厅长审批。财务计划都是保密的，除厅长外，财政厅其它人员均不知道”。[4-60]边务处收集到的情报虽然也抄写一份给盛世才，但是盛世才对边务处并没有直接的管理权。凡是参加边务处工作的人员，都受到严密控制，他们被要求在苏联来的少将总教官监督下进行宣誓：“我参加国际情报组织工作，必须严格遵守执行一切纪律。如有违反，愿受不公开的军事法庭的秘密审判。”[4-61]

1938年，苏联红军一个机械化团（红八团）进驻新疆的东大门——哈密。[4-62]其名义是防止日本侵略新疆，保护支援中国物资的运输线路，但实际上借此机会，苏联也控制了新疆通向中国内地的交通要喉。[4-63]就这样，在新疆逐渐形成了以盛世才为首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权力，和以驻迪化苏联总领事为首的苏联势力并存的双重政治权力结构（图4-2）。

图4-2　新疆双重政权结构（1934-1942）



来源：笔者制作。

苏联势力与当地民族势力的接近

在1934年时，尽管日本已经暴露出了发动全面侵略中国战争的野心，然而是否会直接侵略新疆，却仍然是一个谜。但是，就是靠着这个谜团，盛世才堂而皇之地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而实际上苏联也正是靠着这个谜团，提出了新疆的民族解放必须与反帝国主义斗争相结合的根据。这一理论，遮盖了它在口号上支持民族平等、而事实上却在新疆支持汉族军阀进行统治，两者之间相互矛盾的问题。

1934年5月2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斗争》第73期发表了《中国的民族问题》一文。笔者没有能够找到中文原文版，但该文被收录在日本兴亚院政务部调查报告里。对新疆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中能够发挥的作用，该文做了如下解释：

新疆居民的三分之二是属维吾尔、厄鲁特等民族的蒙古人、哈萨克族准噶尔人，而新疆省作为汉人的殖民地，在军事封建剥削基础上受他人管理。……中国共产党无条件承认新疆各民族享有自由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但现在，汉族剥削者上层分子和帝国主义代理人正在利用民族间关

系的复杂性来挑拨离间各民族以谋求自身利益。最为积极的英帝国主义不断掠夺新疆的石油、煤炭、矿山的丰富资源，利用人民不断滋长的对汉族压迫的不满情绪，意欲将新疆变成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边界上的不稳定因素。日本帝国主义同样想把新疆纳入其领土，已被纳入武装干涉的计划内。中国共产党反对新疆民族那样的“民族自决”。在这样的“民族自决”下各民族继续受到封建寄生虫的领导，成为互相压迫的帝国主义的帮凶，是在从事冒险活动。中国共产党主张新疆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把民族解放斗争和中国革命结合起来，同时对已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国必须采取亲善友好的态度。[4-64]

考虑到当时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能够推测出这种说法其实具有为苏联的新疆政策辩护的意识。但是从这篇文章的整体思想中，又能听出这样的意思：在新疆支持汉族统治者未必意味着放弃支持新疆当地居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事实上，在新疆的双重政治权力结构下，苏联也在不断强化它和当地民族势力之间的关系。

如图4-3所示，秘密警察的民族部门都由共产国际人员或经历苏联留学的人掌控。在当地民族人口集中地区、如哈密行政区的公安局长和喀什噶尔行政区的公安局长等都由来自苏联的共产国际人员出任，维吾尔文化促进会的会长也是苏联派来的曼苏尔先生（Mansur Apandi）担任。据说这位曼苏尔先生和喀什噶尔公安局长卡迪里・哈吉（Kadir Ghaji）都是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出身，他们向维吾尔人宣传“民族革命”的思想，并且召募了许多情报人员。[4-65]这位曼苏尔先生，之後还会在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中大显身手。

而对盛世才来说，苏联与当地民族势力之间越来越亲密的关系，当然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其原因有两条：一是许多情况表明，苏联似乎对当地民族势力仍抱有某种期待。维吾尔族领袖和加・尼亚孜在苏联驻迪化总领事的调解下就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後，他的周围常有许多共产国际人员，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也与和加・尼亚孜联系密切，并定期教授他“革命理论”。[4-66]二是在苏联军队的追击下逃往新疆南部的回族军阀马仲英，後来通过苏联驻喀什噶尔领事馆改善了与苏联之间的关系。1934年7月，马仲英率280名军官进入苏联，开始在军校学习军事指挥。[4-67]而马仲英与和加・尼亚孜的部队分别驻扎在和田和喀什噶尔地区。曾有传言，从1935年冬起，十名苏联军官和马仲英开始一起讨论中国西北地区的地理状况、国民政府军队的兵力配置，红军进入新疆时可利用的路线等。[4-68]综合以上事情，盛世才怎敢轻易断定苏联就没有抛弃自己、而在伊斯兰居民的地区——新疆另选一位伊斯兰教民族领袖的可能？

图4-3　盛世才时代的警察机关中民族部门的沿革图

新疆省政府政治监查总管理局第4科（民族科）：1934年成立。监视、揭发、检举当地民族居民的言论和行动。 科长——李山巍 副科长——卡迪里·哈吉（Kadir Ghaji，苏联来的共产国际人员）
新疆全省保安局第4科（民族科）：1934年改名。新疆全省保安局在各地设立保安分局。
新疆全省公安管理处第2科第4办公室（民族办公室）：1936年5月改组，下设文件处理、情报分析、审讯、翻译小组。 副处长、第2科科长——刘贤臣（苏联来的共产国际人员） 副科长、第4办公室主任——萨义德·哈吉（Sayyid Ghaji，苏联来的共产国际人员） 办公室第1副主任——亚萨维（Yasavi） 办公室第2副主任——巴扎尔·巴伊（Bazar Bay，苏联来的共产国际人员）
新疆全省公安管理处第6科（民族科）：1938年9月共产国际人员杂凑姆·哈吉（Hashim Ghaji）来到新疆为契机重建，下设6个办公室，第1办公室以维吾尔人和塔兰奇人为对象、第2办公室以乌兹别克人和鞑靼人为对象、第3办公室以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为对象各自从事情报收集和监视活动，第4办公室负责邮件的审查，第5办公室负责审讯，第6办公室负责翻译。 第1办公室主任——图尔苏·萨比托夫（Tursun Sabitow，有苏联留学经历的维吾尔人） 第2办公室主任——图尔苏·塔里约夫（Tursun Tariyow，有苏联留学经历的维吾尔人） 第2办公室第2任主任——艾比江（Abijan，1946年任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伊犁区公安局长） 第3办公室主任——巴扎尔·巴伊（Bazar Bay，苏联来的共产国际人员） 第4办公室主任——阿不都克里木（Abdukirim，有苏联留学经历的维吾尔人）

来源：笔者据赵剑峰：《新疆全省公安管理处的产生和没落》整理。

第三节　盛世才的政治转向

1937年的第一次大清洗

盛世才在1967年时辩解说，30年代时自己之所以与苏联建立关系，是出于当时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4-69]但事实并非如此。[4-70]据称，盛世才在接纳共产国际人员进入新疆时，曾对苏联提出三点要求：1，在新疆要优先发展经济、普及教育，不搞阶级斗争；2，军队统率权和地方行政权要保持一致；3，他会尊重共产党的意见，但不能在新疆建立共产党的组织。[4-71]简而言之，盛世才之所以借助苏联力量，不是出于信仰，而是为了确立并维持自己的统治。[4-72]

但是，在新疆之所以能够形成双重的政治权力结构，也说明苏联同样不是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国家利益才开始支持盛世才的。於是，随着苏联势力对新疆政权的渗透和接近民族领袖，盛世才和苏联之间在这种双重权力机构中的矛盾也就渐渐暴露了出来。

1937年12月，中国共产党干部徐梦秋，在经新疆前往苏联途中遭到盛世才的挽留，并于1938年1月被任命为新疆省教育厅副厅长。徐是第一个加入盛世才的迪化政权的中共干部。之後，1938年内至少有70人以上的中共干部，进入新疆并到盛世才的迪化政权中任职。[4-73]

很多评论家分析盛世才之所以在1937年启用中国共产党干部，是因为他大量驱除了（盛世才以前的）旧政权时代的官僚，所以出现了许多空缺需要人来填补。[4-74]从1938年设立“新疆省政治干部人员培训班”以培养干部一事中看出，干部不足确是事实。但是，驱除旧官僚决不是启用中共干部的唯一原因。因为中共势力，早已在1937年4月得到盛世才的同意而进入新疆，并且为维护盛世才的政权做出过贡献。[4-75]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後，中国共产党还在迪化设立了“八路军代表处”，和盛世才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76]而盛世才驱除旧官僚，是在他1934年取得政权以後就开始的。所以，盛世才到1937年11月时才因驱除旧官僚而出现空缺因此以中共干部进行填补的说法，显得不合情理。

盛世才对中共干部加入迪化政权的邀请，据说是在与1937年11月从莫斯科经由新疆返回延安途中的王明、康生等中国共产党“国际派”领导人会面时发出的。[4-77]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见也因为王明、康生向盛世才诬告王寿成等共产国际人员是“托派分子”而为人所知。[4-78]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中共干部被邀请加入盛世才的迪化政权一事，和新

疆进行的“肃清托派分子”之间存在某种关系。

就在1937年，盛世才捏造了“国际暴动阴谋案”，8月里以“汉奸”之名逮捕了一部分汉族官员，10月里以“托派分子”的名义逮捕了和加・尼亚孜等当地伊斯兰民族领袖，12月时又以同一名义逮捕了王寿成、万献庭、张义吾、刘贤臣等中国籍的共产国际人员。[4-79]盛世才之所以敢于在1937年後下半年进行数次政治大清洗，一部分原因也在于1937年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7月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让盛世才借“肃清日本间谍”的名义消灭异己的行动带上了正当性的色彩。随着8月12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苏联将中国国民党看做是抗日力量开始帮助他们增强力量”，[4-80]因此暂时避开了对新疆的干预，这给盛世才的大肃清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但是，盛世才发动政治清洗的目标，主要是政权内部的实权者。从这里可以看出，盛世才进行肃清的目的不外乎是要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政治独裁体制。逮捕由共产国际派来参加盛世才的迪化政权的共产国际人员，不一定都是因为盛世才和被捕者个人之间不和，当然带着盛世才从苏联势力那里夺回政治权力的性质。毫无疑问，盛世才在1937年进行政治大清洗的原因，首先就是他对因苏联势力的存在而形成的新疆双重政治权力结构的强烈不满。盛世才的这一想法，也可以从同一年时他又说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在庇护新疆的“托派分子”，要求斯大林将其召回一事中看出。

当然，在1937年的政治大清洗之前，盛世才也并不是没有觉察到双重权力结构的威胁。例如，为了掌握秘密警察，盛世才和苏联势力多年以来一直进行着斗争。先于1934年将苏联籍副处长遣返苏联，後于1935年11月又将王立祥遣返。之後，又利用各种手段限制秘密警察的权限，最终在1936年把保安总局改组为公安管理处。通过将普通警察合并入公安管理处的方法，使苏联势力掌控的秘密警察变成了普通的公安警察。[4-81]

值得注意的是，大批中共干部进入到盛世才的迪化政权，是从1937年12月大批中国籍共产国际人员被捕後开始的。特别是中共干部被任命的职位，几乎都是被逮捕、革职的共产国际人员原来担任的职位。从这一事实来看，盛世才之所以邀请中共干部，只能是想用他们来替代中国籍共产国际人员的位置。

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它的行动还是要遵照苏联的指示。那麽，盛世才用中国共产党来取代共产国际势力的意图到底在于何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1937年时，盛世

才虽然图谋从苏联势力手中夺回权力，但同时他又不想彻底放弃苏联的支持。[4-82]

一部分史学家注意到了盛世才1937年政治大清洗和斯大林1936年开始的政治大清洗之间的关系。[4-83]但不得不说，他们这是仅仅看到了政治手法上的继承关系。实际上，斯大林的政治大清洗不仅在手法上，同时在制造口实方面也给盛世才提供了借鉴。即迫害任何自己不喜欢的人时，都可以随意加以意思模糊的“托派分子”这一罪名。如果凭借这一罪名逮捕共产国际人员，不仅不会看作是对苏联的背叛，而且可能被看作是在向斯大林效忠。与此同时，由于起用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填补“托派分子”留下的空缺，就使得苏联更加无法怀疑他的“忠诚”。

向民族镇压政策的转变

1937年春，驻新疆南部喀什噶尔的和加·尼亚孜的部下麻木提师长的维吾尔族部队发动叛乱，驻和田的马仲英的部下马虎山师长也率回族部队加入叛乱。苏联通过“边务处”迅速获得情报，独自出动飞机、坦克，又组织柯尔克孜族的骑兵队镇压了叛乱。[4-84]

这场叛乱实际是为保护麻木提师长逃亡印度而发起的。[4-85]但是叛乱和镇压却有两点不明确的地方：一是麻木提师长为什么会想到逃亡？二是苏联一直同麻木提、马虎山的上司者保持良好关系，为什么这次却会出动军队进行镇压呢？

麻木提师长向南京秘密派遣代表和国民政府取得联络的事情暴露，引起了苏联和盛世才的愤怒，才是回答这些疑问的关键。[4-86]为了对付这位和南京国民政府进行秘密联络的麻木提师长，盛世才采取逐个收买其部下亲信的做法。[4-87]而苏联则对于即使已经投降的叛乱官兵，仍然实施了大屠杀。这一点可以说明：苏联对麻木提试图将国民政府势力引入新疆的行为非常不满。[4-88]

“麻木提、马虎山叛乱”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此，它还让苏联无法继续堂而皇之地与和加·尼亚孜等民族势力进行接触，失去了利用和加·尼亚孜等当地民族势力牵制盛世才的可能。同时，因为伊斯兰民族的武装势力已在镇压这场叛乱的过程中被彻底消灭，这让盛世才当初邀请和允许民族领袖进入迪化政权的理由也不复存在。

在1937年10月12日，盛世才突然逮捕了和加·尼亚孜。[4-89]以此为开端，他又逐个逮捕了维吾尔族出身的新疆省政府农矿厅长、回族出身的新疆省政府民政厅长、哈萨克族出身的新疆省政府建设厅副厅长及阿尔泰行政区秘书长、蒙古族出身的省政府顾问等许多当初加入了迪化

政权的各民族领袖。逮捕和加·尼亚孜的罪名是：他秘密派遣心腹前往绥远和日本的特务机关联络，企图在新疆建立伊斯兰国家。[4-90]但是，这完全是盛世才的捏造。[4-91]从这时开始，盛世才放弃了在“民族平等”口号下对其他民族领袖进行招抚的政策，开始对民族领袖人物进行镇压。

和加·尼亚孜当初在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的劝说下答应就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时，阿布列索夫曾向和加·尼亚孜承诺一定保证他将来生命的安全。但是，盛世才在和加·尼亚孜被捕一周後，都没有告诉阿布列索夫逮捕和加·尼亚孜的消息，[4-92]这一事实证明，盛世才对当地民族势力的大清洗，是在没有同苏联进行协商的情况下独自进行的。

1934年以来，每年由省政府派遣百名新疆青年到苏联国立中亚大学留学一事，1937年里也被突然停止。[4-93]很明显，盛世才不希望新疆当地的伊斯兰民族居民和苏联之间建立亲密的联系。1937年的大清洗中盛世才之所以同时将矛头指向以和加·尼亚孜为首的民族领袖和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为首的苏联势力，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换言之，盛世才对双重政治权力结构下苏联势力和民族领袖之间逐渐加强联系的反感，是导致他改变民族政策的最重要原因。

1940年政治大清洗的目标

但是，盛世才于1938年9月访问莫斯科。在莫斯科时，为了表示对苏联的忠诚，他直接向斯大林提出了加入苏联共产党的申请。[4-94]没有了苏联的援助，盛世才不仅无法独霸新疆，甚至难以维持新疆的经济。这就是当时盛世才仍然不想破坏与苏联友好关系的原因。[4-95]

盛世才在苏联受到了热烈欢迎，这意味着他巧妙地掩盖了在1937年的政治大清洗中迫害苏联势力的事实。但是，盛世才也没有想到，他这种欺骗苏联的表演却是作茧自缚。[4-96]也许是被盛世才的表演蒙混了眼光，共产国际在1938年9月时又向新疆派出了共产国际人员。这次是将苏联中亚突厥居民出身的哈西姆·哈吉（Hasim Ghaji）派往迪化设立省公安管理处第六科（民族科），通过曾在苏联受训的维吾尔族公安局副处长库尔班·尼亚孜（Kurban Niyaz），以及新疆各地的共产国际派遣的中亚突厥民族出身的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重新组织了侦察和分析民族动向的情报网。[4-97]不仅是在1937年政治大清洗後被盛世才任命的省公安管理处处长无法控制这张情报网，就连边务处那边的人事权也仍由陈培生掌握，盛世才依然无法过问情报机关的事务。[4-98]

为了进行对抗，1939年盛世才在公安管理处之外另设视察处，切断

了第六科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4-99]盛世才还在这一时期开始设立他个人的秘密情报组织“六星社”。[4-100]但是，苏联势力和新疆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因此而中断。1937年政治大清洗之後，许多居民出于自我防卫的意识纷纷通过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和驻喀什噶尔、伊犁、阿尔泰、塔尔巴哈台领事馆取得苏联国籍。各种苏联代表团、调查团与当地居民频繁接触。由于持有苏联国籍的人来到新疆不需要入境签证，许多苏联所属中亚地区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进入新疆，加深了在种族、文化和宗教上具有共通之处的新疆居民之间的联系。[4-101]

1940年春天，盛世才开始实施第二次政治大清洗。盛世才以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在新疆北部计划建立“哈萨克・蒙古共和国”的罪名，逮捕了以阿尔泰区专员沙里福汗（Xaripkan）为首的哈萨克族领袖；以在新疆南部的维吾尔族地区计划建立“维吾尔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罪名，逮捕了省公安处副处长库尔班・尼亚孜和哈西姆・哈吉、财政厅副厅长库尔班・赛义提（Kurban Sayit）、建设厅副厅长阿卜杜拉・大毛拉（Abdulla Damolla）等维吾尔族领袖；而且，以“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的罪名逮捕了边务处副处长陈培生。[4-102]盛世才捏造的这三大阴谋集团的成员，实际上都是和苏联有着特殊联系的人员。盛世才甚至向斯大林报告，断言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是阴谋的幕後主使人。[4-103]

1940年的政治大清洗既是以扫清迪化政权内部的苏联势力和亲苏势力为目的，又是盛世才强化民族镇压政策的象徵。新疆南部的柯尔克孜族居民，因为在1937年受苏联的指示组织了骑兵部队，协助镇压了“麻木提、马虎山叛乱”而逃过盛世才的第一次政治大清洗。他们的领袖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Isakbek Munonow），在1941年被盛世才任命为新疆的哈萨克——柯尔克孜文化促进会会长，但是1942年4月在被盛世才逮捕之前逃亡到了苏联。[4-104]此外，盛世才还在1939年冬设立了“没收枪弹委员会”，为了要挟各民族交出枪弹，他将众多的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和蒙古族领袖软禁在了迪化。盛世才的民族镇压政策，开始遭到各地民族的反抗。1940年2月，阿尔泰的哈萨克族举行了暴动。[4-105]

对中国共产党势力进行镇压的理由

在1940年的政治大清洗中，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被作为三大阴谋集团的主帅，和众多新疆学院的学生一同被盛世才逮捕。[4-106]杜重远是盛世才亲自邀请来的着名知识分子，他曾经把新疆学院的校风定为“团结、紧张、质朴、活泼”，这和毛泽东所倡导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极其相似。从此可知，杜重远具有亲中国

共产党的思想倾向。[4-107]因此许多人指出，盛世才逮捕杜重远的行动，实质上是想破坏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社会基础。[4-108]盛世才为什么会对自己邀请来的中国共产党下手呢？原因应该是他对在1937年到1940年的两次政治大清洗之间迪化政权内部中国共产党势力的发展感到了威胁。



杜重远（1898-1943）

如前所述，中共干部之所以参加了盛世才的迪化政权，是出于盛世才的盛情邀请。为了此事，1938年初，盛世才还曾向延安赠送了20台满载物资的卡车以表示感谢。[4-109]当初，盛世才的确对中共干部表现出极大的好感，他任命毛泽东之弟毛泽民为新疆省财政厅厅长，之後又将中共干部安排在教育厅厅长、边防督办公署会计处处长、哈密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田行政区警备司令官和行政长官等重要职位上。



毛泽民（1896-1943）

盛世才还曾很友善地接待了进入新疆的中共红军。[4-110]据被他从红军中选拔为反帝会秘书兼秘密审判委员会委员长的黄火青回忆说：1937年到1938年间，盛世才一切事都和我们商量，对我们的提案一概接受，尽可能地满足我们的要求。盛世才甚至提议由中共新疆代表、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和盛世才本人组成一个小委员会。而从1939年起成为中共驻新疆代表的陈潭秋，最初对盛世才的印象是：在国际问题上听从莫斯科的意见，而在国内问题上听从延安的意见。[4-111]

盛世才之所以和中国共产党联合，是以“亲苏”、尤其是“共同抗日”为“政治基础”的。[4-112]正是通过宣传这一政治基础，盛世才得以向中国社会表明了他掌握新疆政权的正当性，并且获得了动员新疆社会民众的借口，这些在盛世才维持新疆统治上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1938年初，新疆“反帝会”实施第二次改组，实际运营都被委托给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会员数在两个月间就增加了3,000人。[4-113]在王寿成指示下创建的新疆学生联合会及新疆妇女协会，1938年起也变成由中共干部负责。[4-114]包括维吾尔族学生在内的新疆学生运动的内容是“抗日宣传”。[4-115]不久，迪化就得到全国“第二延安”的美誉。从1938年到1939年，杜重远、茅盾、张仲实等许多着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先後来到新疆，参加了盛世才的迪化政权，并向全国宣传赞美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

然而，盛世才向中国共产党表现出的亲近也是有限度的。中国共产党势力进入新疆时，不得不与盛世才立下三项约定：在新疆“不宣传共产主义”、“不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当地不动员人加入共产党”。[4-116]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确实没有招收新党员，但由于新疆是通往苏联的唯一通道，中共在新疆安排了重量级的领导人，[4-117]积极致力于大众动员，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其影响力日益得到增强。[4-118]例如，中共干部林基路担任新疆学院教育长时期，新疆学院的很多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林基路反对吹捧盛世才。[4-119]他在1938年10月担任第三届新疆人民代表大会秘书长期间，擅自在大会手册上印刷了毛泽东的照片，从而激怒了盛世才，被下放到阿克苏去担任行政区的教育局长。[4-120]

但是，为了进行组织活动，进入新疆的中国共产党干部自己还是建立了党组织。[4-121]同时，在中共干部进入盛世才的迪化政权以後，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问题上一切听从共产国际指示的组织原则一直得到延续。按照盛世才的命令跟踪中国共产党新疆代表的特务曾向盛报告：“延安代表与苏联领事经常接触，据统计自［1938年］5月7日至6月2日该代表团到苏联领事馆凡11次，商洽内容不详。”[4-122]

总之，1937年大清洗以後，由于中国共产党势力在新疆的增长以及其与苏联之间的联系，新疆重新构筑起了一个将盛世才排除在外的政治权力体系，这种情况使盛世才再次感到政治上的威胁。[4-123]1939年初，盛世才开始削弱中共势力，许多中共干部逐渐被派往语言不通的新疆南部的维吾尔地区。[4-124]9月盛世才向经由新疆访问苏联的周恩来提出把中国共产党新疆代表邓发召回延安。[4-125]接着，1942年8月，盛世才趁苏德战争中苏联的一时失利之机而对苏联和中共反目，驱逐了所有苏联人员，逮捕了所有中共干部，[4-126]开始积极倒向国民政府一边。[4-127]

小　结

盛世才政权时期的政治过程，主要可分为三个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盛世才在政治路线上的转换，从时间来看，恰好与其民族政策的转换时期相一致。

1933年至1937年夏为第一个时期，这是盛世才开始采取亲苏政治路线的时期。但是，他走“反日”、“亲苏”路线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利用苏联的经济、政治，尤其是军事力量，确立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地位，其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解决对他造成最严重威胁的民族对立和民族冲突问题。

1937年夏以後至1940春为第二个时期，这是盛世才逐渐开始与苏联势力进行对抗的时期，该时期也是盛世才的民族政策由招抚转向镇压的时期。因为迪化政权内部双重政治权力结构的形成，更由于在这种双重政治权力结构之中苏联势力与民族领袖逐渐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严重威胁到了盛世才的独裁统治。所以，盛世才开始转变政治路线，并借着苏联国内进行政治大清洗的机会，反复进行以政权内部亲苏势力和民族势力为目标的政治大清洗。

1940春以後至1944年为第三个时期，也是盛世才最终走向与苏联反目、并对伊斯兰民族居民公开进行大镇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中共势力进入新疆後开始逐渐形成新的双重政治权力结构，当地的伊斯兰居民也开始抵抗盛世才的统治，而面临以上难题的盛世才之所以与苏联最终反目，是因为他已经感到再也无法继续利用苏联力量帮助自己维护统治了。

总之，盛世才的政治路线与民族政策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之所以如此，原因既在于盛世才的政治野心，也在于苏联新疆政策的自私性质。苏联在新疆的活动，基本上是出于本国的利益。所以在选择了支持盛世才的同时，一面追求新疆的政治权力，使迪化政权中形成了双重政治权力结构；一面利用这种双重政治权力结构，强化与当地民族势力之间的关系。这使得盛世才在决定政治路线时，不得不将它与民族政策联系在一起考虑。

民族镇压政策当然会招致反抗，增加民族冲突的机率。同时，与支持自己得以确立和维持统治地位的苏联反目，当然地招来了苏联的强烈反击。以此为契机，苏联放弃了支持汉族统治者盛世才的政策，改为支持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独立运动。因为这样既可以推翻盛世才的统治，又可以达到控制新疆地区的目的。哈萨克——柯尔克孜文化促进会会长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于1942年4月逃亡苏联，在其前後，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族的领袖也纷纷从新疆消失而出现在苏联并开始接受训练，阿尔泰区的哈萨克人起义势力也在外蒙古与苏联的支持之下渐渐壮大，新疆社会正在快步走向一个新的大规模民族冲突的时期。

注释

[4-1]1935年到新疆的英国驻中国大使馆馆员泰克曼就盛世才与当时省政府主席李溶的关系作出这样的说明：“省政府主席就是‘议长’，事实上就是变了名称的旧时代的总督。因此，李主席应该是盛督办的长官。但是，中国的事情不能从字面理解，必须根据事实来评价判断。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盛将军似乎统管一切，相反，李主席倒给人一个傀儡的

印象。”タイクマン着，神近市子译：《トルキスタンへの旅》（东京：岩波书店，1940），第117页。

[4-2]金国祥：《新疆陆军军官学校校史》，《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1987），第113-128页。李连升：《我在新疆战车队》，《阜康文史资料》，第2辑（1986），第53-55页。

[4-3]黄慕松：《新疆概述》（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第2页。

[4-4]1934年新疆省政府为整顿财政，制定了货币整顿计划，在18个月以内回收全省的纸币，实行“废两改元”。於是，想向中央政府要求发行一千四百万元的中央银行纸币，最终遭到否决。以上参见无名氏：《新疆の财政混乱》，《大亚细亚主义》，第二卷，10月号（1934），第26页。对于1934年新疆当时的经济混乱，斯文·赫定是这样描述的：“我于1928年春访问新疆首府的时候，1美元兑换迪化纸币25两。……1934年6月16日1美元能换迪化240两纸币”，“原则上，印刷厂一天印70万元纸币。生意好的4月能够印2,000元。1928年只有一元面值的纸币，……但是现在当五千元、一万元被印出来的时候，换成的美元却少得可怜，短时间内拥有大量纸币的人们开始觉得纸币和废纸没什么区别。”ヘディン着，福田宏年译：《シルクロード》，（东京：岩波书店，1984），下册，第26-27页。“粮食的价格开始毫无道理的上涨。3月9日布古尔的小麦粉100提（一恰提相当于600克）的价格是75元，到了5月3日提兹坎里克的小麦粉卖到了550元，6月26日迪化卖到了5,000元。之後更是涨到了14,000的高价，人们连面包都买不起。6月2日库尔勒的鸡蛋一个卖半元，三天以後在托克逊卖到了5元，6月末在迪化卖到了30元。平时很便宜的水果也开始涨价，最後变成缺货。”ヘディン：《シルクロード》，第32-33页。

[4-5]周东郊：《新疆十年》（钢板油印版，1948），第27页。

[4-6]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36。斯瓦尼泽应为斯大林的前妻（第一任妻子）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Ekaterina Svanidze，昵称Kato）的弟弟。

[4-7]新疆对外开放战略研究课题组编：《新疆对苏经贸问题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第276-277页。

[4-8]裕新土产公司独占了盛世才时代的新疆对外贸易，通过在各地

的分公司全部买下农畜产品向苏联出口，并从苏联向新疆进口工业产品。董事长由新疆财政厅厅长兼任，总经理也由新疆省政府任命。当初省政府出资总额的30%，以官民合营形式组织。1937年後，新疆政府收回全部民间股票，独占了新苏贸易的利益。

[4-9]タイクマン：《トルキスタンへの旅》，第13页。

[4-10]周东郊：《新疆十年》，第24页。宫碧澄：《回忆新绥公司》，《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79），第143-146页。

[4-11]杜重远：《盛世才与新新疆》（重庆、桂林、上海、香港、西安、昆明、成都、长沙、兰州、贵阳：生活书店，1939），第29页。

[4-12]周东郊：《新疆十年》，第23页。

[4-13]ヘディン：《シルクロード》，第30、85页；タイクマン：《トルキスタンへの旅》，第12页。

[4-14]周东郊：《新疆十年》，第27-28页。

[4-15]周东郊：《新疆十年》，第27-28页。

[4-16]当时新疆的地方行政系统分为省（政府主席即是省长）、行政区（行政长官为行政区长官）、县（县长）三级。

[4-17]赵镜元：《新疆事变及其善後》，《新中华杂志》，第1卷，第10期（1933），第4-5页。

[4-18]柴济森：《俞秀松在迪化的革命活动》，《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7辑（1984），第2页。

[4-19]郎道衡：《“新疆日报”的片断》，《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0），第175页。

[4-20]何语竹、康炳麟：《关于“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及其它》，《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4），第38-41页。

[4-21]陈培生：《新的岗位》，《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91），第15页。

[4-22]孙翰文：《新疆民族鸟瞰》，《新亚细亚》，第12卷，第1期（1936），第36页。

[4-23]文斐然：《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破裂》，《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981），第3页。

[4-24]王寿成，本名俞秀松（1899-1938），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

家，1925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留苏学生的负责人被派往苏联，1935年来新疆。时任新疆“反帝会”秘书长，并兼任边防督办公署政训处处长，新疆学院院长，新疆第一中学校长。1936年与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同结婚。1937年12月被盛世才以托派分子的罪名逮捕，1938年6月被押送到苏联杀害。以上见罗征敬：《共产主义的开拓者——俞秀松烈士》，《新疆烈士传》，第2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4-25]罗征敬：《共产主义的开拓者——俞秀松烈士》。又据何语竹、康炳麟：《关于“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及其它》第43页，1935年夏维吾尔文化促进会成立以前，是王寿成、何语竹一起制定了“以民族文化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方针。

[4-26]关于1935-1938年新疆民族学校教育的发展，据杜重远所述，新疆省教育厅设立初中以上学校10所，小学215所，成人学校（识字学校）50所。除此之外，由各地的维族文化促进会设立的维族学校达1,980多所，学生人数达到了129,649人之多（杜重远：《盛世才与新新疆》，第81-88页），这个时期也被称为“新疆民族教育的黄金时代”。以上详细情况可参照赵新亚：《回忆新疆蒙哈学校创建片断》，《新疆文史资料选集》，第20辑（1985）；刘德贺：《新疆各族文化促进会记叙》，《新疆文史资料选集》，第22辑（1987）；郭承华：《抗日战争时期玛纳斯县的文明化教育》，《昌吉文史资料选集》，第4辑（1986）；赵晏安、章定保：《奇台县教育今昔》，《昌吉文史资料选集》，第1辑（1984）；姚世俊：《吉木萨尔县教育发展比观》，《昌吉文史资料选集》，第4辑（1986）；祁寿山：《回忆干德县民国时期的教育》，《米泉文史》，第1辑（1987）等。

[4-27]王寿成：《关于新政府民族政策的报告》，《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8辑（1985年再版）。

[4-28]罗征敬：《共产主义的开拓者——俞秀松烈士》，第24页。

[4-29]盛世才于1934年开始以汉族、回族及满族为40%，维吾尔族为40%，蒙古族、哈萨克族各为10%的比例，每年输送100人去塔什干的苏联国立中亚大学留学。以上见柴恒森：《盛世才选送留学生的前前後後》，《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85），第55-57页。

[4-30]尧乐博士：《尧乐博士回忆录》（台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第115页。

[4-31]无名氏：《南疆事变之真相》，《东方杂志》，第31卷，第6号（1934），第71页。

[4-32]Hosuyin Haji, “1933-34-yillardiki Kaxkar Halik Hozgilangliri wa Kirgizlar Bilan Bolgan Munasiwiti ［1933-1934年喀什喀尔民众起义与吉尔吉斯人的关系］,”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2 (1983): p. 131.

[4-33]据刘德贺称，其兄刘德恩当时任中国驻塔什干副领事，把东突厥斯坦伊斯兰代表团的到达及当地的欢迎仪式拍照後，依此为基础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刘德贺：《马虎山，麻木提在南疆叛乱的经过》，《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0），第148-149页。

[4-34]李慧英：《我所知道的张培元的家事》，《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1987），第135-136页；兴亚院政务部：《（秘）ソ连の支那辺疆侵略・兴亜资料》（政治编），第5号（1939），第84-85页。

[4-35]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简史》，第3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第207页。

[4-36]包尔汗：《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第188-189页。

[4-37]坂本是忠：《中国の辺境と少数民族问题》（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70），第98-99页。

[4-38]村田孜郎：《辺境赤化の危机》，《大亜细亜主义》，第3卷，第2号（1935），第22页。

[4-39]田中香苗：《辺疆における英露佛の角逐》，《大亜细亜主义》，第3卷，第6号（1935），第60页。

[4-40]盛世才：《十年新疆回忆录》，台湾《自立晚报》（1952年10月29日）。

[4-41]文斐然：《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破裂》，《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981），第21-22页。

[4-42]“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章程：第一章：本会任务；第一条：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系民众自动之政治组织，遵照孙总理之民族主义，领导全新疆民众，确立新疆永久为中国之领土，决意与离间各族间之和平而企图乘机攫取为殖民地之帝国主义者相抵抗。”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第3572页。

[4-43]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432页。

[4-44]石川忠雄：《国际政治と中共》（东京：有信堂，1986），

第18页。

[4-45]笠原正明：《ソ连の新疆进出の动机（1931-1934）》，《神戸外大论丛》（1961），第93-104页。

[4-46]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p. 136.

[4-47]タイクマン：《トルキスタンへの旅》，第120页。

[4-48]黄慕松：《新疆概述》，第1页。

[4-49]ヘディン：《シルクロード》，第85页。

[4-50]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p. 137. Lars-Erik Nyman, “Sinkiang 1934-1943 Dark Decade for a Pivotal Puppet,”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Vol. XXII (1), Jan-Mar (1991), p. 100.

[4-51]陈培生：《新的岗位》，第4页。

[4-52]何语竹、康炳麟：《关于“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及其它》，第41页。

[4-53]包尔汗：《新疆五十年》，第267-268页。

[4-54]村田孜郎：《辺境赤化の危机》，第22页。

[4-55]张义吾曾在莫斯科的高级射击学校（具体名称不详）留学。见周东郊：《盛世才是怎样取得新疆统治权的》，《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1964），第238页。文斐然：《盛世才特务控制下的新疆》，《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81），第2-3页。王立祥，本名曾又福，曾在外蒙古的情报机关任职，之後被苏联派遣到新疆。周东郊：《新疆十年》，第68页。

[4-56]Lars-Erik Nyman, “Sinkiang 1934-1943 Dark Decade for a Pivotal Puppet,” p. 98.

[4-57]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简史》，第236页。

[4-58]周东郊：《新疆十年》，第68页。

[4-59]陈培生：《新的岗位》，第1页。

[4-60]李国卿：《我所知道的新疆督办公署边务处》，《隐蔽的战线》（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第31页。

[4-61]李国卿：《我所知道的新疆督办公署边务处》，第30页。

[4-62]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第12页。

[4-63]苏联红军进驻新疆，是瞒着中国国民政府而秘密进行的。进驻哈密的苏联红军第八团在新疆被称作“红八团”，实际上是师规模的机械化部队。周东郊：《新疆十年》，第84页。

[4-64]兴亚院政务部：《（秘）ソ连の支那边疆侵略・兴亜资料》（政治编），第5号，第85-86页。

[4-65]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708页。

[4-66]Hewir Tumor, “Hoja Niyaz Haji Togrisida Aslima ［关于和加・尼亚孜的回忆］,”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2 (1983), pp. 25-26.

[4-67]马霄石：《马仲英退走南疆以後》，《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79），第49-50页。

[4-68]马霄石：《马仲英退走南疆以後》，《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79），第55页。

[4-69]盛世才：《牧边琐忆》，《五十年政海风云——天山南北》（台北：春秋出版社，1967），第76页。

[4-70]1933年5月盛世才第一次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会面的时候，曾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列宁的着作作为自己的藏书展示给苏领事。但是，据张义吾对包尔汉所说，那些书大部分是没收物品，不过是为了向苏联总领事展示而装饰的。包尔汗：《新疆五十年》，第188页。

[4-71]文斐然：《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破裂》，《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1页。

[4-72]盛世才曾对部下说过，1933年如果得不到苏联当时的援助，只好放弃新疆回到中国内地。即在当时，亲苏是盛世才维持对新疆统治的唯一选择。包尔汗：《新疆五十年》，第188页。

[4-73]中国共产党新疆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在新疆活动纪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

[4-74]陈培生：《新的岗位》，第15页。

[4-75]1937年4月，在西征途中被甘肃回族军阀打败的，红军西路军268团的残余部队退到新疆东部边境，盛世才向东部边境派出部队迎其进

入新疆迪化，是以“新兵营”的名称做的。尹玉衡：《迎接西征红军来新疆回忆片段》，《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82），第2-4页。“马虎山叛乱”爆发的当时，新疆省军都上了前线，红军成为新疆东部防备尤尔乌斯进攻迪化的兵力。文斐然：《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破裂》，第7页。

[4-76]胡晓光：《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乌鲁木齐市文史资料》，第3辑（1982），第10页。

[4-77]朱培民：《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近代史研究》，第5期（1988），第189页。

[4-78]罗征敬：《共产主义的开拓者——俞秀松烈士》，第25页。

[4-79]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简史》，第237页。

[4-80]罗伯特・C□诺斯：《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东京：恒文社，1974），第264页。

[4-81]包尔汗：《新疆五十年》，第268页。

[4-82]文斐然：《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破裂》，第8页。

[4-83]Lars-Erik Nyman, “Sinkiang 1934-1943 Dark Decade for a Pivotal Puppet,” p. 100.

[4-84]据当时维族人目击者称，为了追击马虎山的军队，苏联的飞机、坦克与吉尔吉斯人部队的骑兵一直深入到和田地区。Mamtimin Tohti, “Ma Husan Kuxunlirining Hotan Halkiga Salhan Zorawanlihi wa Buzhunqilih Ixliridin Aslima ［关于马虎山军对和田地区民众的压迫和榨取］”,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7 (1986): p. 158.

[4-85]Hewir Tumor, “Hoja Niyaz Haji Togrisida Aslima,” pp. 29-31.刘德贺：《马虎山，麻木提在南疆叛乱的经过》，第153页。

[4-86]巴依艾则孜：《追随马木提师长二十年》，《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0），第142页。

[4-87]Hewir Tumor, “Hoja Niyaz Haji Togrisida Aslima,” pp. 29-31.刘德贺：《马虎山，麻木提在南疆叛乱的经过》，第163页。

[4-88]周东郊：《新疆十年》，第75-76页；刘德贺：《马虎山，麻木提在南疆叛乱的经过》，第163页。

[4-89]Hewir Tumor, “Hoja Niyaz Haji Togrisida Aslima,” p. 31.

[4-90]石元璞：《新疆秘密审判委员会解剖》，《新疆文史资料选

辑》，第1辑（1979），第62-63页。

[4-91]1938年盛世才曾对杜重远说，日本对在中国的国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新疆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在新疆周边的青海、宁夏、甘肃等地设置了情报机关，策动新疆内乱，并通过天津商人以三百万元收买了和加·尼亚孜（杜重远：《盛世才与新新疆》，第62-63页）。这与称和加·尼亚孜主动与日本有联系这一逮捕理由完全不同。

[4-92]Hewir Tumor, “Hoja Niyaz Haji Togrisida Aslima,” pp. 32-33.

[4-93]柴恒森：《盛世才选送留学生的前前後後》，第57页。

[4-94]据盛世才自己说，斯大林亲自批准他加入共产党，并发了185118号的党员证。阪本直道：《中苏边境冲突的背景》（东京：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0），第134页；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日文版，第119页。

[4-95]ラティモア：《アジアの焦点》（东京：弘文堂，1951），第99页。

[4-96]中国共产党新疆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在新疆活动纪事》，第19页。

[4-97]赵剑峰：《新疆全省公安管理处的产生和没落》，《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81），第39页。

[4-98]周东郊：《新疆十年》，第84-86页。

[4-99]赵剑峰：《新疆全省公安管理处的产生和没落》，第39页。

[4-100]李明章：《杜重远先生来新和被害经过见闻》，《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85），第139页。

[4-101]周东郊：《新疆十年》，第86页。

[4-102]Mukax Jakan Ogli, “Xaripkan Ogadayiw Togrisida Aslima［关于赛力甫汗・奥格达依的回忆］,”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8 (1986): pp. 59-60.石元璞：《新疆秘密审判委员会解剖》，第68页。

[4-103]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4099页。

[4-104]《柯尔克孜族简史》编写组：《柯尔克孜族简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第126页；刘德贺：《新疆各族文化促进会记叙》，第160页； Hosuyin Haji, “1933-34-yillardiki Kaxkar Halik Hozgilangliri wa Kirgizlar Bilan Bolgan Munasiwiti,” p. 133.

[4-105]Haji Nabi Waliyuf, “Abah Kari Halpining Tarih Ahwali［阿巴克·凯列（部族）的历史］,”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3 (1984), pp. 47-49.

[4-106]宛凌云：《参加盛世才的复审委员会的点滴回忆》，《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79），第166-168页。

[4-107]高崇民：《怀念杜重远同志》，《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0），第98页。

[4-108]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简史》，第311页。

[4-109]张伯春：《难忘的延安之行》，《昌吉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4），第1页。

[4-110]红军在新疆分为三个营，在苏联教官和新疆省军教官的指导下，分别学习了汽车、坦克、装甲车的驾驶以及火炮、飞机、无线电的操作。李志明、王崇国：《西路军在新疆》，《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79），第21页。红军在生活方面也受到了盛世才的优待。肖显清：《在新疆新兵营的日日夜夜》，《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85），第9-11页。

[4-111]朱培民：《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第187-193页。

[4-112]郭林：《西安事变与新疆抗日民族战线的形成》，《新疆历史研究》，第1期（1987），第72页。

[4-113]朱培民：《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第192页。

[4-114]张式婉：《新疆学生联合会札记》，《迪化文史资料》，第10辑（1986），第79-82页；贡秀琴：《抗战时期的新疆妇女协会》，《昌吉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6），第59页。

[4-115]Haliq Saq, “Millitaris Shing Sisay Dawrida Har Millat Ziyalilirining Surgun Kilinix Ahwali Tohursida［关于军阀盛世才对各民族知识分子的迫害的回忆］,”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ri 17 (1986): pp. 159-171.

[4-116]朱培民：《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第196-197页。

[4-117]第一任中共驻新疆代表是政治局委员陈云（1937年1月-11月），第二任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1938年1月-1939年5月），

第三任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1939年5月-1943年9月，被盛世才杀害）。

[4-118]周东郊：《新疆十年》，第84页。朱培民：《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第197页。

[4-119]方志纯：《回忆新疆监狱的斗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33页。

[4-120]唐生华：《回忆在新疆学院读书的日子里》，《昌吉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5），第8页。

[4-121]据任中共新疆代表陈潭秋秘书的吉合的回忆文章称，陈避开盛世才的监视，通过各种办法与新疆各地的中共干部进行秘密联系，指导他们的工作。吉合：《陈潭秋同志在新疆》，《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981），第29页。关于这件事情，也可参照朱培民：《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第198-199页。

[4-122]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999页。

[4-123]新疆军区政治部资料：《三区革命前新疆的经济和社会情况》（油印版），第4页。

[4-124]张源生：《抗日战争时期在喀什工作的共产党员》，《喀什市文史资料》，第2辑（1987），第1-29页。

[4-125]中国共产党新疆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在新疆活动纪事》，第36页。

[4-126]1943年4月，在盛世才的要求下，在哈密驻扎的苏联红军撤回苏联。1943年9月盛世才杀害了中共新疆代表陈潭秋，毛泽东之弟毛泽民和林基路。马肇嵩：《从入狱到出狱》，《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1982），第3页。

[4-127]据盛世才自己称，使他决心放弃亲苏政策的契机是1940年11月苏联胁迫他签署秘密条约——《新疆锡矿租界条约》。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4030-4031页。1942年5月，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德卡诺佐夫为了就新疆油田之事与盛世才进行协商，计划访问新疆。接到这一联系，盛世才立即邀请中国第八战区长官朱绍良和中国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到新疆，表达归属国民政府之意。孙越崎：《抗战期间两次去新疆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1986），第139-141页。之後8月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与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主席吴忠信一同访问迪化，商讨迪化政权回到国民政府管辖

之事。卢桂森：《国父实业考察团进新的经过》，《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86），第69页。

第五章　苏联支持的中国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圣战”

第二次独立运动爆发和伊宁起义

1944年夏，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在伊犁地区爆发。[5-1]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当时被当地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称为“十一月革命”，现在在中国被称为“三区革命”。虽然都称为“革命”，但其意味却有所不同。毛泽东在1949年8月给“革命”领袖阿合买提江・哈斯木（Ahmatjan　Kasimi）的信中说：“你们多年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将其定义为“民主革命”。[5-2]但是阿合买提江・哈斯木自己在1946年说道：“我们进行的是民族革命”，把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性质定义为“民族革命”。[5-3]

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从其性质上来看，究竟是民主革命，还是民族革命？本章主要把焦点置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前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的反政府活动上，通过分析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发源地——伊犁区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建立的秘密组织和反政府武装组织的政治主张、组织状况以及伊宁起义前的活动全貌，探讨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在1944年再次爆发的原因和“革命”的性质。本章依据资料主要为秘密组织的传单、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公文及当事者的回忆，以及笔者对当事者的采访等。

第一节　民族主义秘密组织及其政治主张

“Why we are fighting”和《我们为什么要奋斗》

关于20世纪40年代新疆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组建民族主义秘密组织的研究几近空白。虽然这有点不合常理，但是也可以反映出由于文献资料的不足等所造成的研究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美国驻迪化领事提瓦（Tihwa）在1945年9月25日递交给国务卿的报告书“Rebel Objectives in Sinkiang”应该具有特殊的价值。[5-4]因为，这个报告书後面附了四份民族主义秘密组织的传单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文件的英文译本。其一为署名“The National Freedom Group”（民族解放组织）、标题为“Why we are fighting”（我们为什么要奋斗）的文件。

这些传单的存在以及内容的真实性，可从未公开出版的《吴忠信日记》得到确认。[5-5]在1944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当时的新疆省主席吴忠信摘录了由新任伊犁专员平戎所带来的“民族革命委员会”的《我们为什么要奋斗》的概要。[5-6]此摘录和“Why we are fighting”的内容大体上一致（参见表5-1）。从吴忠信1945年1月11日的日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天提瓦还曾向吴忠信询问伊宁起义现况，之後表示想通过传媒引起国际社会对此事的关注，向吴忠信提出请求，希望能够提供与新疆的政治形势有关的资料，并得到了吴忠信的同意。[5-7]总之，不能否认存在着英文的“Why we are fighting”即是汉语的《我们为什么要奋斗》的全文译本的可能性。

表5-1　“Why we are fighting”与《我们为什么要奋斗》比较表

"Why we are fighting"	《我们为什么要奋斗》
构成分为三部分： 1. 成立民族解放组织的理由 2. 民族解放组织的斗争目标 3. 呼吁大众加入组织	构成分为三部分： 1. 成立民族解放组织的理由 2. 民族解放组织的斗争目标 3. 呼吁大众加入组织
成立理由： 1. 东突厥斯坦是我们的故乡 2. 我们的同胞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鞑靼斯坦的突厥居民 3. 中国人入侵，掠夺和迫害，被蔑称为新疆或中国西部，许多亲人死于反抗 4. 从1937年开始，在盛世才的镇压下，以和加·尼亚孜和赛里甫汗为首的许多民族领袖被杀害 5. 中国统治者向新疆殖民地移民中国人和东北人共计100万 为了反抗而成立秘密组织 组织名称为"民族解放组织"	成立理由： 1. 东突厥斯坦是我们的故乡 2. 我们的同胞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鞑靼斯坦的突厥居民 3. 中国人入侵，掠夺和迫害，被蔑称为新疆或中国西部，许多亲人死于反抗 4. 从1937年开始，在盛世才的镇压下，以和加·尼亚孜和赛里甫汗为首的许多民族领袖被杀害 5. 中国统治者向新疆殖民地移民中国人和东北人共计100万 为了反抗而成立秘密组织 组织名称为"民族革命委员会"
目标： 1. 驱逐中国人的统治 2. 实现民族平等 3. 建立议会制民主政府 4. 实施地方行政长官选举制 5. 发展民族文化教育 6. 恢复各民族文化协会 7. 废除警察政治 8. 实施政治自由 9. 建立与苏联的友好关系 10. 减轻税费 11. 保障宗教信仰自由 12. 驱除中国殖民者 13. 发展农业 14. 废除无偿劳动	目标： 1. 驱逐中国人的统治 2. 实现民族平等 3. 建立议会制民主政府 4. 实施地方行政长官选举制 5. 发展民族文化教育 6. 恢复各民族文化协会 7. 废除警察政治 8. 实施政治自由 9. 建立与苏联的友好关系 10. 减轻税费 11. 保障宗教信仰自由 12. 驱除中国殖民者 13. 发展农业 14. 废除无偿劳动

（续上表）

来源： 美国驻乌鲁木齐领事提瓦： "Rebel Objectives in Sinkiang" （1945年9月25日）	来源： 新疆省政府主席吴忠信： 《吴忠信日记》 （1944年12月16日）

来源：笔者制作。

报告书和日记的记载有差异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在“Why we are fighting”上署名的是“The National Freedom Group”（民族解放组织），在“我们为什么要奋斗”上署名的是“民族革命委员会”。“解放”和“革命”的差异可以被认为是因为将维吾尔语翻译为汉语时出现的错误而造成的。



Azadlik Taxkilati（解放组织）成员

其实，在许多维吾尔语文献中，伊犁地区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秘密组织都被直接称为Azadlik Taxkilati（解放组织），其中很多文献的维吾尔语表述中没有“民族”一词。当然，其中许多维吾尔语文献写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尤其是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後，边境民族反对汉族统治者的“民族解放”，被改造为阶级解放的“解放”，甚至表述为“革命”都并非不可思议。正如模仿“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名称也相应地变为“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一样，得到了许多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参加者的普遍默认。总之，尽管各种文献对这个由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成立的秘密组织的名称有各种不同表述，但其正式名称应该就是Milli Azadlik Taxkilati（民族解放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之所以应该引起注意，是因为它日後成为了领导第二次东突厥独立运动的核心组织。

汉族政权的“非法性”和“野蛮性”

从内容上看，《我们为什么要奋斗》（以下简称《奋斗》）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说明成立民族解放组织的理由；第二部分提出民族解放组织的斗争目标，即东突厥斯坦未来理想的社会、国家面貌；第三部分呼吁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要关注到自己的民族已濒临生死存亡境地，因而应该积极参加民族解放组织的活动。

《奋斗》实质上就是“民族解放组织”的政治宣言。这一政治宣言最令人瞩目的，是它非常强调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和塔塔尔族等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和地域（“东突厥斯坦”）之间的联系：

我们的祖先把我们居住的地方称做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维吾尔人、塔兰奇人、[5-8]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和鞑靼人都居住在这里，现在这里依然是他们居住的地方。这里有四百万人口，而这些民族占到三百万人以上，因为这个理由，这个地区——突厥斯坦——曾经被称为突厥民族的心脏。……我们的故乡是东突厥斯坦，我们是突厥民族的东方部分，其它的部分在苏维埃联邦。

主张民族和土地之间的一体关系，实质上就是主张民族对领土的权利。《奋斗》文中的“故乡”（英文版本为native place），应该就是维吾尔语watan的翻译。watan不仅仅是“故乡”，同时具有祖国的意思。“奋斗”之所以主张东突厥斯坦是维吾尔族等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生长养育之地，就是为了说明这片领土的所有权仅仅属于突厥系各民族居民。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对于土地所有权的主张，同时建立在“民族自立”的认识之上：“居住在东突厥斯坦的十四个民族中，有十个民族在任何时期都和中国没有民族的、种族的、文化的关系，也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也就是说，中国无权统治这片土地，换言之，就是主张这片土地和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应该从中国独立。

在《奋斗》中，“东突厥斯坦”被用来指新疆全境。因为《奋斗》提到，“东突厥斯坦”被中国“占领”後，“我们的地域开始被称为中国西部或新疆”。“东突厥斯坦”等於新疆全境的说法，这是在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中首次出现；而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柯尔克孜和塔塔尔等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都被当做“东突厥独立运动”的主体，这也是与参加者都是维吾尔族人的“第一次东突厥独立运动”所不同的地方。《奋斗》的起草者显然明白，如果不把维吾尔族以外的其他突厥系伊斯兰民族都包括进来，“东突厥斯坦”就无法涵括整个新疆地区。

为了主张独立运动的正当性，《奋斗》除了将对领土的权利作为民

族独立的最大的理由之外，还激烈谴责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社会实施了残暴的统治：

中国人从戈壁沙漠对面遥远的中国入侵我们的东突厥斯坦，利用我们渴望和平的心理和诚实，用军队和皮鞭获得统治权。他们压迫我们比对待家畜还要残酷。他们是世界上最落後的民族，不能带给我们幸福快乐的生活，不能提高我们的文化教育［水平］，不能改善人民过去的生活状况。相反，他们掠夺我们，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我们，把我们当成文盲推入黑暗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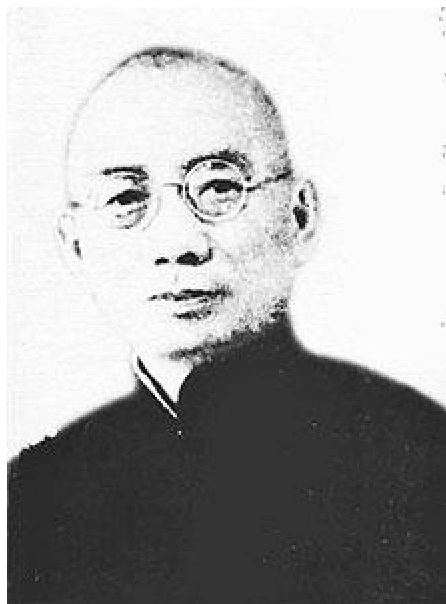
《奋斗》在这里不仅提出了在政治层面的压迫和在经济层面的压榨，还特别提出了文化教育的问题。这说明，在促使运动发生的诸多原因之中，的确有对民族文化衰退的危机感在内。在这里，让人想起浦野起央在《民族独立论》中对民族问题发生原因的分析：“少数民族的存在，常常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生少数民族问题。‘少数’（被统治者）民族由于‘多数’（统治者）民族的攻击和同化政策而产生民族灭绝的危机意识，提高民族自觉意识时，就会要求与‘多数’民族的平等，以及要求恢复权利、自治和独立等，由此开始产生少数民族问题。”[5-9]民族解放组织的建立的确有这样的背景：“我们组织民族解放组织的目的，是从残酷的中国统治中解放我们的人民，使这些被中国压迫、屠杀、压榨的民众，重新恢复作为拥有自由、平等、财富、教养和幸福生活的民族。”

就这样，继承了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思想，以颠覆中国在新疆地区的统治为根本目标的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逐渐兴起。只是，运动的中心地域不再是天山南部，而是天山北部的、位于中苏边境地区的伊犁地区。

从盛世才到吴忠信

由中国国民政府任命的第一位新疆省政府主席吴忠信，于1944年10月4日来到迪化上任。[5-10]但是就在仅仅三天之後的10月7日，巩哈（即今尼勒克，Nilka）县城就被当地伊斯兰民族居民的反政府游击队攻陷。所以，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导火索毫无疑问是在前任主席盛世才的统治时期留下的。

正如前一章探讨的那样，盛世才的民族政策之所以从招抚转向镇压，原因在于他对因苏联势力的存在致使新疆政权形成双重政治权力结构现象的强烈不满。但是因为这种双重政治权力结构不仅表现在政治权利上，同时也表现在民族问题中。因此盛世才的反苏政策不仅损害了苏联在新疆的利益，同时给新疆当地各个民族带来了灾难。



吴忠信（1884-1959）

盛世才与苏联的反目，导致苏联停止了向新疆出口工业产品。而商品供应上出现的短缺，又使新疆经济很快到了面临崩溃的境地。当地的伊斯兰民族居民也因而遭受巨大灾难，据说，当时死了人，“甚至连一块遵照穆斯林习惯包裹尸体的白布都找不到”。[5-11]

由于1942年开始统一新疆货币与内地货币，新疆的物价开始急遽上涨。例如面粉，如果以1940年的价格指数为100的话，1942年末达到了865，1945年甚至达到75,000，就是说增长了750倍。而据记载，1944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200%。[5-12]《奋斗》针对经济的崩溃指责中国政府：“东突厥斯坦的人民自古以来就与苏联保持亲善关系，在通商贸易中也保持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突然被中国政府破坏，给我们带来生活和生产上的巨大困难。”当然，这里的“苏联”其实更多地可以理解为苏联的中亚地区部分。

在如此困难的经济状况下，盛世才对人民的掠夺也变得更加残酷。1943年，盛世才为组建新的骑兵部队，命令向当地游牧民族居民征收战马一万匹，这更激起了民众的不满。[5-13]

而从民族解放组织的政治宣言《奋斗》中可以看出，盛世才违背自己制定的“六大政策”，反复对当地伊斯兰民族居民实施镇压，是引起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1937-38年，盛世才转向民族屠杀政策，开始法西斯主义统治。这种法西斯主义把所有热爱和平与自由的人们都看作敌人，盛世才和他周围的人认为东突厥斯坦民众都是敌人或下等民族，使用各种残暴的方法压迫我们。1937-38年，以及以後的年代，和加・尼亚孜、赛里甫汗等大约四百位领袖被逮捕、审讯、杀害。……为了终止其残暴的统治，为了我们民众的自由，战士们在友情和正确的指导下应该团结起来。因此，秘密组织——民族解放组织在各地相继成立。[5-14]

这里应该提到的是，伊宁的秘密组织——“民族解放组织”的领导人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Abudukarim Abbasow）本人也是盛世才实施民族镇压政策的直接受害者。他的父亲哈斯木（Hasim）因与和加・尼亚孜之间的关系而被捕，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自己也被作为“反叛者子弟”而被流放到沙湾县（Sawan）。[5-15]

从1943年年初开始，国民政府势力从军事、行政、政党三个方面逐渐进入新疆，开始威胁到盛世才对新疆的独裁统治。[5-16]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盛世才在1944年发动了“八月政变”，逮捕了以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省建设厅长林继庸为首的国民政府派遣来的所有人员。[5-17]“黄林案”的发生，促使国民政府下定了直接控制新疆的决心。[5-18]为了预防盛世才的反叛，国民政府开始在新疆东部边界集结军队，并在8月29日公开宣布，任命盛世才为国民政府农林部长、吴忠信为新的新疆省主席。[5-19]这时的盛世才，再也找不到像当年的苏联那样来自外部的支援，在大兵压境、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盛世才不得不于9月11日黯然离开新疆，结束了他对新疆长达12年的独裁统治。

但是，国民政府势力进入到新疆後，也无法马上解决盛世才政权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反而因为鼓励内地汉族向新疆移民，强化警察机关，在新疆设立相当于秘密警察的中央统计局（中统）、军事统计局（军统）的办事机构——省督组、公警第二组等，更加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不安。[5-20]另外，新疆省代理主席、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的部下，利用新疆和中国内陆的物价之差，使用军队的卡车、飞机进行商业投机活动，也给新疆的物价安定带来消极影响。[5-21]到1944年5月，大量的“中央军”被派遣到新疆。由于大批人的到来，更加剧了新疆经济的混乱，[5-22]这从吴忠信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

查新疆现有中央军四个师，共36,350人。每师月米8,000担，计共需30,000担之上。新疆实无能力负担，其不足之数，势需从甘肃省运补。[5-23]

和蒋介石私人关系不错的吴忠信在就任新疆省主席之後，倡导重

视“天理”、“国法”、“人情”，作为当务之急而提出三项具体政策：“清理监狱”（释放被投入监狱的无罪者）、“宣抚地方”（向当地的民族居民说明新政府的政策，平息他们的不满）、“敦睦邦交”（与苏联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5-24]於是，被盛世才关进监狱的许多民族领袖被释放。另外，他还设立了由各民族上层的一些人组成的安抚委员会，奔赴各地平息民族居民的反感情绪。

但是，1936年起一直担任蒙藏委员会——国民政府处理民族问题的最高机关——委员长的吴忠信推崇民族同化思想。据担任吴忠信秘书的曾小鲁说，吴忠信就任新疆省主席後发布通告，修缮各地的孔子庙、关羽庙并规定定期祭祀。吴忠信还支持国民政府的移民政策，鼓励向新疆迁徙汉族农民。[5-25]同时，他还反复强调：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与汉族之间存在血缘关系。他对当地各民族领袖们这样说道：

过去有很多人把汉回强分为二，认为汉族和汉回是两个不同的种族。这种论调细细考究，实在是不合理的。我可以明白告诉你们，我们的祖先都是一个种族，一个血统。[5-26]

哈萨克为突厥族的一个支系，……而突厥的祖先是匈奴，匈奴的祖先，却是夏禹王，大家都知道，夏禹王也是汉族的祖先。[5-27]

据历史的考证，维族的祖先是匈奴，匈奴是夏禹王淳维的後裔。由此看来，夏禹王是维族的祖先。夏禹王的祖先为黄帝轩辕氏，故维族同汉族一样为黄帝的子孙，……从而可知，汉族维族同是一个祖先。[5-28]

很明显，吴忠信希望通过说明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让大家知道新疆当地的突厥系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进而通过强化国家意识来抵制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中可能出现的独立思想。

然而，“作为统治民族，如果只通过强调凝聚力以消除离心力，反而可能造成多民族国家的崩溃”。[5-29]国民政府在同化当地居民的目的下诱导大批内地居民涌入新疆，以及各种政策中表现出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从心理上给当地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对此，伊宁的民族解放组织的政治宣言《奋斗》如此控诉：“残暴的中国统治者，为了最终把这些孩子踩在自己的脚下，把东突厥斯坦民众从亲生父母（苏联）身边夺走并寄放在义母（三民主义）那里。”因为没有维吾尔语原件，很难说这句译文是否尊重了原义。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他们根本就不愿承认自己与中国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并控诉中国也并没有把他们看做是自己亲生的孩子而真正加以爱护。

第二节　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反政府秘密组织和武装

伊宁的“民族解放组织”

根据《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以及许多其他的资料来看，[5-30]伊宁的民族解放组织指挥部是由12名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出身的成员构成的（表5-2）。主席伊力汗・吐烈（Ilhan　Tora）是十月革命以後从苏联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逃亡到伊宁的乌兹别克族宗教领袖。

表5-2　伊宁“民族解放组织”指挥部成员

姓名	民族	资料
伊力汗・吐烈（Ilhan Tora）	乌兹别克	30多岁时从苏联中亚地区移居新疆，有影响力的宗教人士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Abdukarim Abbasow）	维吾尔	出生苏联，20多岁时举家移民到新疆，毕业于新疆学院附属高中
哈斯木江・凯木巴尔（Kasimjan Kambiri）	维吾尔	诗人，也被认为是一位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物
穆罕默德江・买合苏木（Mahmautjan Mahsum）	维吾尔	出生在苏联，十几岁时全家移民新疆，知识分子
加尼・约尔达苏木（Jani Yoldaxup）	维吾尔	出生在苏联，20多岁时移民新疆
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Rahimjan sabir Ghaji）	维吾尔	伊宁的大商业资本家萨比尔家族成员
阿不都鲁普・买合苏木（Abdurup Mahsum）	维吾尔	宗教人士，商业资本家
萨里曼・巴依（Salman Bay）	乌兹别克	出生于苏联，后移民新疆，大商业资本家、大地主
祖农・塔约夫（Zunon Tayof）	塔塔尔	留学苏联，拥有苏联国籍的知识分子
奥马尔江（Omarjan）	维吾尔？	不明
木希姆丁（Muhimdin）	维吾尔？	不明
努尔丁・别格（Nurdin Beg）	维吾尔？	不明

来源：笔者根据《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等编制。

然而，宗教领袖成为领导人与政治宣言《奋斗》中表现出来的民族解放组织的形象并不一致。尽管包括维吾尔族在内，新疆所有突厥系民族都是伊斯兰民族，民族解放组织在《奋斗》中也明确表示要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根本没有提及伊斯兰教在他们将要实现的东突厥斯坦国家中应该占据何种地位，《奋斗》本身也没有使用伊斯兰教式的书写方法。由此至少可以知道，民族解放组织政治宣言《奋斗》的执笔者不是一位伊斯兰教领袖。

但是在《奋斗》的第二部分中，却明确地提出，民族解放组织将“建立与强大的、自由的、幸福的友人——邻邦苏联之间紧密的、友好的、互相信赖的关系，并为建立我们的商人与苏联人之间更广泛的贸易关系而努力”。由此也可以知道，不是伊斯兰教领袖的《奋斗》的执笔者，具有明显的亲苏倾向。

另外，因为《奋斗》中有“我们［维吾尔族］与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鞑靼人等民族有最亲近的血缘关系”这种表述，可以认为民族解放组织是以维吾尔族人为主体而组织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知道，民族解放组织主席伊力汗・吐烈不是政治宣言《奋斗》的执笔者，甚至不是确定内容之人。但是，关于民族解放组织的创立时期及创建人，各种资料、包括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回忆，都是说法各异。据哈吉姆・加帕尔（Hakim Jappar）的说法，民族解放组织是1943年末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的提倡下，由他和他的战友们创建的。[5-31]但是，据当时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组织的领导人安瓦尔・汗巴巴（Anwar Hanbaba）回忆，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并不是民族解放组织的创建人，由于这个组织以前就已存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是1942年从沙湾县移居到伊宁市之後加入该组织的。[5-32]

然而这些说法中都存在一个问题，即把民族解放组织的前身——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秘密组织与民族解放组织本身混为一谈。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以前就在伊宁成立了秘密组织，从其它当事者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确认，这个组织在1944年以前就已经存在。按照赛福鼎・艾则孜（Saypidin Azizi）的说法，仅是由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成立的秘密组织当时就有两个。一个是由以赛都拉・赛甫拉约夫（Saydulla Saypullayow）为中心的、由从苏联中亚地区的塔什干留学回来的留学生们建立的组织，另外一个是以安瓦尔・汗巴巴为中心的、由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留学生们建立的组织。[5-33]但在此之外，据说还有另外一个

秘密组织，那就是由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建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5-34]但是，这些组织都不是“民族解放组织”。

阿不里米提·哈吉约夫（Ablimit Ghajiyow）的说法与《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的说法最为接近，即民族解放组织创建于1944年4月9日，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是创建人之一。[5-35]另外，按照参与了创建民族解放组织的赛福鼎·艾则孜的说法，也是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在1944年初将伊宁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组织统一到了一起：“阿巴索夫向大家提出，必须建立一个纲领明确、观点正确的革命组织的设想”。他还屡次亲自劝说伊力汗·吐烈，在得到伊力汗·吐烈的同意和帮助的基础上成立了以伊力汗·吐烈为主席的民族解放组织。[5-36]

综合以上材料，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是以居住在伊宁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为中心，并且从1943年末就已经开始兴起的；在民族解放组织成立以前伊宁市已经存在着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秘密组织，它是民族解放组织的前身；在创建伊宁民族解放组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是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而不是主席伊力汗·吐烈。

从以上事实中还可以看出，与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相比，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具有了一些新的因素和性质：虽然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仍然由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主导，但这些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是对苏联抱有亲近感的知识分子；参加者也由维吾尔族扩大到其他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而民族组织的政治宣言《奋斗》，应该就是由这些亲苏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执笔，并且反映了他们的思想。

关于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主动吸收伊力汗·吐烈加入民族解放组织的理由，1944年参加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亚森·胡达巴尔迪（Yasin Hudabardi）这样说道：“那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东突厥斯坦社会的］历史，是为了动员民众以实现革命战略目标的策略。”[5-37]民族解放组织是一个以“民族解放”为目标而创建的组织，[5-38]但维吾尔社会的现状却是：如果没有宗教领袖的帮助，就无法动员民众参加民族革命。因此，“极擅辞令，语言生动，很有吸引力。以宗教身份出现在群众中有一定感召力”的伊力汗·吐烈这位宗教领袖，引起了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注意，并被推选为了民族解放组织的主席。[5-39]

但是，尽管伊力汗·吐烈被选为了主席，事实上民族解放组织的活动几乎都由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决定，其指挥部会议也由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主持召开的。[5-40]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就是《新疆三区革命史》指出的那样，民族解放组织“是由苏联驻伊宁领事馆

领事达巴申和副领事波列索夫直接领导的。”[5-41]也就是说，1944年4月成立的民族解放组织，实际上是由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领导，而宗教领袖伊力汗·吐烈之所以成为主席，不过是为了向维吾尔社会扩大影响力而被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树起的一面旗子。

巩哈游击队

1944年8月中旬，在伊犁区巩哈县的乌拉斯台山（Ulastay tag），当地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成立了反政府游击队（以下称“巩哈游击队”）。8月17日，巩哈游击队袭击了进入乌拉斯台山的警察队伍，杀死了10名警察。9月15日他们又击退了前来镇压的300名军人和警察。接着在10月6日至7日，游击队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发起进攻，攻陷了巩哈县城。至此，巩哈游击队发展成为由三个大队构成的拥有800多名队员的大部队。[5-42]

巩哈游击队也是一个追求东突厥斯坦独立的组织。10月14日，为侦察当地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动向，被派往伊犁区的新疆省警务处副处长刘秉德在给吴忠信电报中报告说：

匪徒自9月2日由苏籍法提哈携带苏方供给武器潜入巩哈［即今尼勒克县］乌拉斯台倡乱以来，用挑拨离间宣传，离间其他各族反对汉人，复以布疋、茶糖收买贪民，更以现品金提取牲畜，遂使初不过三十余人，占地不过五十方里，但为时不过一月，竟能统六七百之众，占领巩哈，揭起东突厥斯坦伪国之旗帜，使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5-43]

正如刘秉德指出的那样，得到苏联的支援是巩哈游击队得以壮大的重要原因。因为没有关于巩哈游击队的文字资料，所以我们无法搞清巩哈游击队在思想方面受苏联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但巩哈游击队的形成和活动内容清楚地反映出了它与苏联之间的密切关系。

游击队的指挥部成员都是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出身。主要领导人有塔塔尔族的法提哈·穆苏里莫夫（Fatih Muslimow），哈萨克族的埃克巴尔（Akbar）和赛义提（Sayit）兄弟，维吾尔族的加尼（Jani）、哈米提（Hamit）、奥斯曼（Osman）等。[5-44]一般认为，巩哈游击队是埃克巴尔兄弟为了获得武器去苏联的途中，与法提哈等偶然相遇，双方得知对方具有武装反抗政府的意愿後共同发起成立的。

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埃克巴尔兄弟与法提哈·穆苏里莫夫及其组织相遇的地方，不是在新疆，而是在与新疆接壤的苏联边境城市因塔尔加（Iyintalga）地区。[5-45]另外也有人说，他们的联合是由苏联边防部队促成的。据未出版的《尼勒克暴动回忆录》汉译本记载，苏联的边

防部队的军官对前往苏联购买武器的埃克巴尔兄弟承诺会将法提哈・穆苏里莫夫的组织和埃克巴尔兄弟一起派到伊犁地区，并为他们每人提供手枪和步枪各一支。[5-46]由以上资料可以断定，反政府的巩哈游击队的确从形成时期就得到了苏联的支持。



法提哈・穆苏里莫夫

但是，也有人说巩哈游击队只是从苏联边防卫队购买武器。而另一说法是，苏联边防卫队最初向埃克巴尔兄弟提出要求，让他们从新疆方面带来马匹以交换武器。但却向法提哈·穆苏里莫夫的组织无偿地提供武器。[5-47]也就是说，埃克巴尔兄弟和法提哈·姆斯里莫夫的组织开始时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组织，苏联方面对待法提哈·穆苏里莫夫的组织和埃克巴尔兄弟的态度是有区别的。

埃克巴尔兄弟曾经以偷盗家畜为生，因而多次被中国地方政府逮捕。[5-48]据说1944年7月，他们从监狱逃出，由于无处可去，才决心拿起武器反抗政府。[5-49]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不是出于反抗民族压迫的理由，而是纯粹出于生活上的理由，才自发地走上武装反抗道路的。人们说苏联最初并没有支持他们，也许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由于埃克巴尔兄弟的出现，巩哈游击队就被政府方面称为了“六个盗贼”。然而，法提哈·穆苏里莫夫在1943年以前是尼勒克县政府的土特产商品贸易公司（Yarlik Mahsulatlar Xirkit Ix Baxgurux Orini）的副经理，因为得知盛世才政权要逮捕他的消息而提前逃入苏联。另一种说法是，1944年初法提哈·穆苏里莫夫突然消失，实际上是秘密进入了苏联。[5-50]也有人说法提哈·穆苏里莫夫到苏联是在1943年9月。[5-51]《新疆三区革命史》虽然没有提供具体证据，但却直接指出法提哈·穆苏里莫夫等人是从1943年夏天即开始在阿拉木图接受苏联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训练结束後，于1944年8月被派回发动武装暴动的。[5-52]

总之，可以肯定，巩哈游击队的总指挥法提哈·穆苏里莫夫是个从过去就与苏联方面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在苏联期间，以他为中心，哈米提、奥斯曼、巴依丘林（Baychurin）、努尔（Nur）、乌舒尔（Uxur）等从新疆秘密出国到苏联的维吾尔族人已经形成一个组织，[5-53]这些人後来几乎都成为了巩哈游击队的负责人。

推翻统治的共同手段

伊宁的“民族解放组织”在其创建之初，就与苏联有关。伊宁的“民族解放组织”实际上是作为“过渡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而建立的，[5-54]因此网罗了从各个社会阶层出身的成员。如表5-2所示，“民族解放组织”的指挥部也是由三种类型的人构成的。即，以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为首的亲苏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以伊力汗·吐烈为代表的宗教领袖阶层，另外商业资本家和大地主也进入了民族解放组织的指挥部。

就像传统的维吾尔社会里有“阿克萨卡尔”（Ak Sakal，原意为“白胡须”，即长老之意）一样，尊重长者的习惯贯穿于维吾尔社会的各个领域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族解放组织指挥部当中，阿不都克里木·

阿巴索夫年纪最轻，尽管如此，他却成了该组织事实上的负责人。[5-55]如果没有某种幕後的支持，很难想像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能够具有如此政治权威。从各种资料中能够看出，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的权威应该和苏联有一定的关系。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并没有留学苏联的经历。但是在13岁以前，他一直生活在苏联。1942年移居到伊宁以前，他还在沙湾县担任过苏联技术员的翻译，有过与苏联人亲密接触的经历。[5-56]尤其令人惊讶的是，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最初建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中甚至有苏联的情报局人员加入。根据伊犁地区公署科长文斐然（它是组织初期成员之一）的回忆，在最早的组织成员中，除了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的汉族恋人杨凤仪，还有两名苏联领事馆职员，其中一人——瓦西里同时也是大使馆的情报人员。应该注意的是，这位瓦西里後来成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的军事顾问，[5-57]并被任命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的上校。[5-58]前文已经提到，《新疆三区革命史》指出民族解放组织“是由苏联驻伊宁领事馆领事达巴申和副领事波列索夫直接领导的”。但是由于该书没有提供资料依据，所以无法确认瓦西里是否就是其中一位。[5-59]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1921-1949）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的组织中有苏联领事馆的情报局人员加入，说明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经常与苏联领事馆保持着联系。这也同时可以说明，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的活动可能是在按照苏联的意图。据安瓦尔·汗巴巴说，按照民族解放组织指挥部的分工，阿不都克

里木·阿巴索夫的任务是负责“革命的准备”。因此，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经常秘密去到苏联。[5-60]据此可知，从1943年末到1944年初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再次爆发，在以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民族解放组织的活动中，苏联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943年，也正是苏联在与德国的战争中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的一年。换句话说，以当年2月的胜利为契机，苏联再次有了将目光转向东方的可能。为了恢复在新疆的影响，苏联开始支持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

实际上，参加了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组织的反政府秘密组织和武装组织的每个人，尽管他们民族出身、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以及过去与苏联的关系都各有不同，但在为推翻中国统治这个共同目标下，绝大多数人都会乐意接受苏联的支援。与在新疆南部爆发的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比较而言，在中苏边境地区爆发的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接受了苏联的支援。

虽然苏联愿意支持新疆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进行独立运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为什么新疆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不是去向日本，也不是去向英国和美国，而是一致寻求苏联的支援，以他们为推翻中国统治的手段呢？这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地理方面看，苏联紧邻新疆，是与新疆交通最为便利的国家。因此，盛世才转向民族镇压政策以後，许多少数民族领袖和精英，特别是在盛世才与苏联的蜜月时期有过留学苏联的经历、对苏联抱有亲近感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都集中到了与苏联接壤的中国边境城市伊宁。[5-61]

其次，从时间上看，当时正是盛世才与苏联反目的时期。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盛世才之所以改变民族政策，对各民族实施镇压，其实是对苏联势力向新疆政治、社会领域的渗透进行反击。在这种形势下，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对盛世才的厌恶情绪，也就很容易转化成为亲苏的思想。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新疆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因为与苏联中亚地区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之间在民族、文化上的接近，使他们对苏联式的“民族解放”——设置各民族的加盟共和国抱有浓厚的兴趣。关于这一点，已经明确表现在“民族解放组织”的政治宣言《奋斗》之中：“我们［维吾尔族］和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鞑靼人等民族有最亲近的血缘关系。在苏联，这些民族都能建立自己的共和国，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加盟共和国”的“国家”假象，的确蒙蔽了新疆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中的很多人。

第三节　伊宁起义

起义中的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和伊力汗·吐烈

从1944年10月到11月间，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达到了高潮。10月6日至7日，巩哈游击队攻陷了巩哈县城。11月7日，“伊宁起义”爆发。起义後不久的11月12日，在伊宁城内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Xarkiy Turdsitan Jumhuriyiti）。

伊宁的维吾尔族大商人塔里加特·穆萨巴约夫（Tarikat Musa-bayow），向新疆省主席吴忠信报告了伊宁起义的经过：

11月5日，伊宁已发现苏联兵及哈匪共约十余人，黑夜藏匿友人家。是日，巩哈叛匪被我包围，6日，匪北向突围，7日，匪众千余，侵入伊宁，与伏匪内外呼应，事变遂起。[5-62]

发动伊宁起义，从而将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推向高潮的组织，就是被称作“伏匪”的伊宁民族解放组织，和被称作“叛匪”的巩哈游击队。

伊宁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为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11月2日，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在霍尔果斯（Qorghas，今霍城县）附近召开民族解放组织会议，决定于11月10日在伊宁发动起义。但是，由于政府军开始在伊宁构筑防御阵地，起义提前到11月7日举行。这个决定在11月4日被送达巩哈游击队。11月6日的晚上，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从苏联带领60余人组成的武装队伍通过边界秘密进入伊宁市内，建立了指挥部，“同伊宁解放组织商定，于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举行暴动”。[5-63]但是，从已经与尼勒克游击队取得联系一点上来看，决定发动起义的时间不会是6号晚上，当时只不过是阿巴索夫通知其他组织成员发动起义的时间而已。11月7日，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率领部队进攻警察局，巩哈游击队也从郊外开始向伊宁市内进攻。[5-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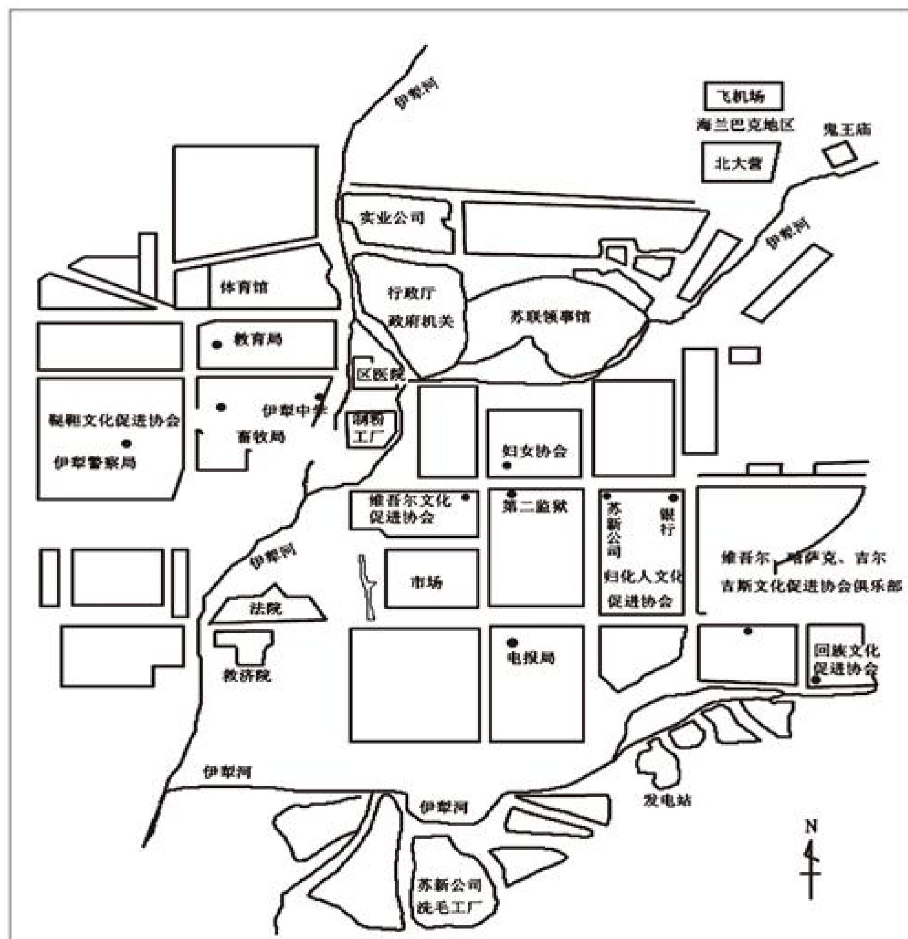
伊宁起义本身的过程看上去非常简单。在区专员机关、警察局、电报局、发电站等地反复展开攻防战之後，12日政府军残部撤退到东北部的海兰巴克（Hayranbaq）地区，[5-65]至此，伊宁城内基本上被起义军控制（参见图5-1）。但是，当地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是否参加了战斗？如果是，他们又是如何被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呢？关于伊宁起义的全过程，实际上存在着许多不甚明了之处。

在起义指挥部，除了队长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外，担任联络官

的是民族解放组织指挥部的成员、伊宁的大商业资本家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Rahimjan Sabir Ghaji）。另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是民族解放组织主席伊力汗·吐烈当时也出现在起义指挥部里。

伊力汗·吐烈的工作是唤起起义者的宗教仇恨心理。在11月6日深夜的指挥所会议中，伊力汗·吐烈做了这样的演讲：“为了神圣的伊斯兰，在安拉指引的道路上我们举行圣战。牺牲者将成为殉教者，幸存者将成为哈吉［已履行穆斯林朝觐麦加义务之人］。”[5-66]

图5-1　伊宁市街道略图



来源：笔者根据《伊宁事变市区骚乱图》（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311页）及当地调查手绘。

伊力汗・吐烈在伊宁起义中的作用一贯遭到否定。[5-67]但是“牺牲者将成为殉教者，幸存者将成为哈吉”（Olsak xiet, Hayat kalsak hazi）这句话，後来成为了起义一方的一个重要口号。[5-68]通过这点就可以知道，伊力汗・吐烈的宗教权威在动员民众参加起义上毫无疑问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伊力汗・吐烈（1885-1976）

为了民族独立的“圣战”

在12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大会上，被选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的伊力汗・吐烈发表了演讲，这里节取其中一部分：

醒来吧！醒来的时代来到了。真主是我们的信仰，穆罕默德是我们的圣人，伊斯兰是我们的宗教，东突厥斯坦是我们的祖国。醒来的时代来到了。……这些吸人血的汉人们对全人们实行着惨无人道的压迫，人们受的痛苦达到极点了。就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所以全体人民在活不下去情况下拼一死，按照真主“给暴虐以惩罚的”意志，我们相信真主无疑的诺言。我们伊犁人民整个团结起来，用棍棒铁锤杈子起来反对横暴的政权而起义了。团结起来的伊犁群众，家群众的力量，就是真主的力量的诺言一样，很短期间内把横暴汉人政权推翻了之後，建立了我们的伊斯兰政府。汉族血腥的压迫的旗帜被我们踏在脚下变成了灰了。我们举起了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有宗教意义的有月芽、星星标志，上面写着宗教口号大公无私的白色旗帜，我们保持这神圣旗帜的声誉、尊严和庄严。为了保全以上这些我们所有的穆斯林，所有的军人，整顿我们的队伍，拿起武器，按照穆罕默德圣人所说的为了反对横暴的政权不惜你们的生命和财产而战斗吧。在真主的指示下战胜你们的敌人，在这一世幸福生活，到後世好进天堂，我们要实现这宝贵的遗教。[5-69]

强调伊宁起义具有伊斯兰教因素，不仅仅只是限于伊力汗・吐烈的演讲中。几份资料及证言都提到，从起义爆发之日起，起义者就开始使用写有“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样表明伊斯兰信仰的白色旗帜。[5-70]一位当时参加伊宁起义，後来长时间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司令部中任部长的人物，在笔者的采访中证实，起义爆发时最常用的口号是“伊斯兰觉醒了”（Islam azatlihi）。[5-71]毫无疑问，起义指挥部是在有意识地通过使用伊斯兰教的各种符号，让参加起义者们认为自己是在参加神圣的“伊斯兰圣战”。

另一位起义参加者，在他的回忆录中直率坦言：“否认三区革命初期提出过‘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Xarkiy Turkistan Jumuhuritini Kurux）、‘为独立而战’一类带独立性质的标语，以及‘牺牲者将成为殉教者，幸存者将成为哈吉’这样的口号，就是在掩盖事实真相。提出这些标语，是由当时的内外形势、历史条件决定的，我认为是它动员民众以实现革命战略目标的一种策略。”[5-72]

“为独立而战”（Mustakkillik Uqun Kurax），当然指的是脱离中国

的独立。为了强调“独立”的正当性，伊力汗·吐烈在演讲中曾经激烈地攻击中国对“东突厥斯坦”（新疆）地区的统治：

所谓“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谬论，制造假历史的骗子们，应该听清楚，和永远记住以下的事实：他们不要忘记，东突厥斯坦英雄的儿女们，用棍棒攻击他们，他们忍受不了这种打击。中国的官吏和帝王为了自己的土地和政权，建筑了三千五百公里的万里长城，像害怕鹰的兔子一样跑到长城里面。这些事实虽然被汉族政府的历史学家们所隐瞒，但是全世界历史可以证明这一事实。太阳是不能被衣襟遮盖住的。……汉人政府最好除去对东突厥斯坦领土的野心，而是想办法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下来解放自己的本土中国。不要把自己最富有、最美丽的土地、花园、山河，交给日本帝国主义，而来压迫东突厥斯坦的人们，侵略东突厥斯坦的领土。[5-73]

亲苏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领导形象，在伊宁起义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被强调。这大概是因为当时这些人在新疆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社会中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力。其领导人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当时只不过是一位23岁的青年。与此相反，伊力汗·吐烈作为一位权威宗教人士站到了第一线，它突出了伊宁起义的“为了使祖国东突厥斯坦从残暴的中国统治下独立出来的全民族的战斗”和“履行作为穆斯林的义务的圣战”的性质。很明显，起义指挥部这样做，就是为了动员更多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参加起义。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一策略，使得起义的规模迅速扩大，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对汉族居民的屠杀

但是，正是源于上述原因，伊宁起义中发生了对“异教徒”——汉族居民的屠杀。也许是出于对盛世才政权的痛恨，据说特别是与盛世才同乡、出身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人遭到大量杀害。[5-74]但是还是有许多资料可以证明，参加起义者不仅屠杀政府军俘虏，甚至许多普通的汉族居民也遭到同样命运。[5-75]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後担任内务部长的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针对伊宁起义中发生的这种情况说过以下的话：“我们犯过许多错误。我们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没有区别压迫民族中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是将他们［被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分子等同视之。”[5-76]

东突厥斯坦临时政府後期的另外一位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也这样说过：“关于民族问题，我们在民族解放运动开始时期，即在民族解放运动进入武装起义阶段，不能说没有犯过错误。我们的民众拿起武器参加战斗，在伊宁、绥定以及其它地区推翻国民党政权、歼灭其武装势

力的时期，把汉族人民和国民党反动分子等同视之，没能把汉族民众与少数派的国民党政府的官僚、压榨人民的国民党军，以及压迫民众的国民党警察区分开，持有汉族全部是敌人这样的错误思想。结果，我们把汉族同等对待，没能区分敌友，错误地对我们的朋友——汉族民众也进行了攻击。”[5-77]

从以上发言中也可以断定，在伊宁起义中屠杀汉族居民的做法，并不仅仅是一部分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所为，而是出于运动整体的一种共识。而参加起义的部分维吾尔族当事者，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强调，警察当局对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屠杀行为才是诱发屠杀汉族居民的理由。他们的理由是，警察当局在从伊宁城区撤离之前，杀害了大量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并把遗体投进警察局的厕所和井中。因为屠杀伊斯兰教徒，并把遗体抛弃在不洁的地方，强烈地刺激了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对汉族居民的仇恨，所以发生了对汉族居民的屠杀。

由于不只一人提及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被虐杀的事件，所以说它不可能是完全捏造。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尽管这些回忆文章的作者都是伊宁起义的直接参与者，然而他们对发现遗体的场所和遗体数量的描述却不相同。

根据亚森·胡达巴尔迪和伊斯玛依尔·买合买提（Ismailow Mahmmut）所述，屠杀事件发生在绥定县警察局。但是，关于遗体数目，亚森·胡达巴尔迪说是35人，[5-78]而伊斯玛依尔·买合买提却说是80人，[5-79]两者之间相差数字很大。而据赛福鼎·艾则孜说，遗体是在伊犁区警察局被发现的，将近100具。[5-80]在1989年出版的曹达诺夫·扎伊尔（Sawdanow Zayir）的着作中，屠杀地点虽然和赛福鼎·艾则孜的说法相同，但遗体数量却被上升到238具这样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5-81]值得注意的是，曹达诺夫在其1985年出版的另一本回忆录却记载说：屍体是在伊宁市警察局被发现的，数目是70具。[5-82]

这些记述上的差异，让人很容易察觉到这些曾经参加了伊宁起义的维吾尔族作者急于将起义中汉族居民被屠杀一事进行正当化的心理。但是，考虑到苏联军队也直接参与了伊宁起义的因素，旧政权的警察、苏联红军、甚至还有起义一方，究竟是谁该对那35名或238名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死负责？在没有确切资料的情况下，今天我们尚且不能轻易做出结论。但在当时，起义指挥部却马上开始大肆宣传对维吾尔族居民的屠杀，死者的照片也被公布于众。由此可以看出，起义指挥部是在利用这次事件，煽动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仇恨心理，从而动员他们参加起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伊宁起义中之所以出现对汉族居民的屠

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起义指挥部的煽动。

第四节　伊宁起义的胜利与苏联的支援

伊宁起义计划与苏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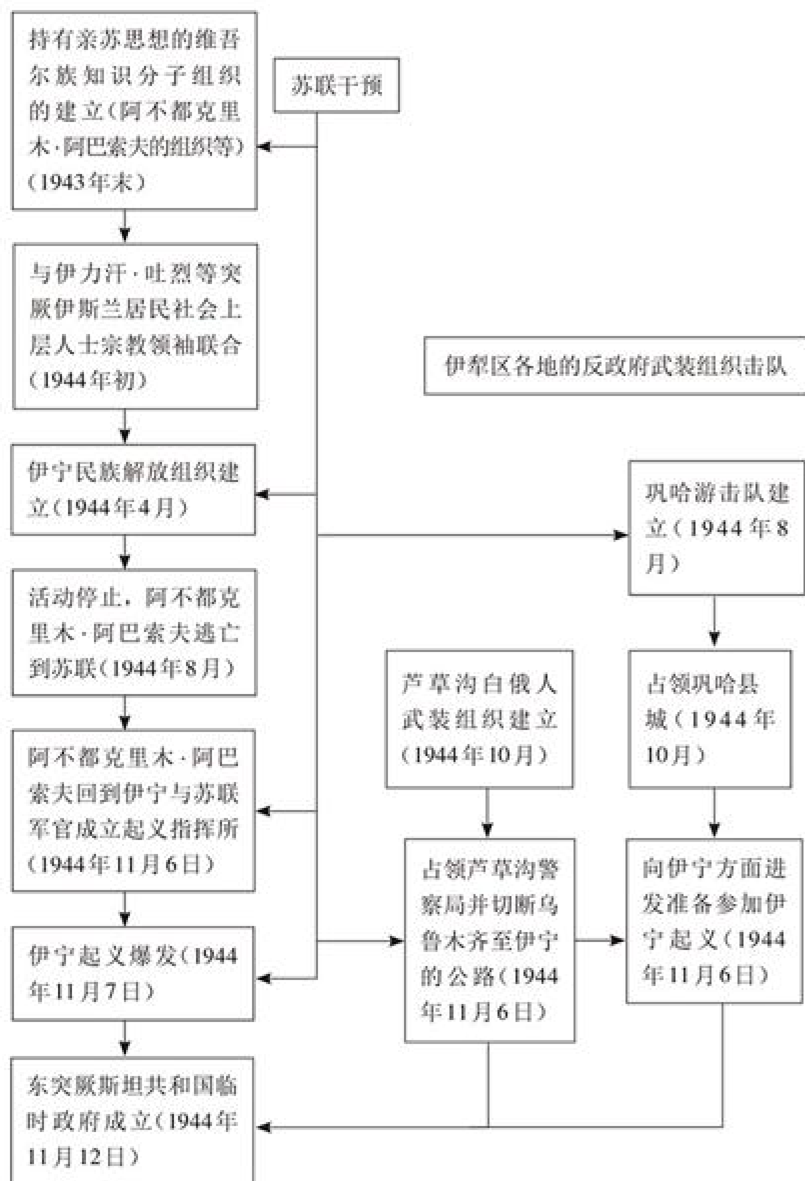
巩哈游击队与伊宁的民族解放组织，虽然同样致力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但两者在起义之前未必就有组织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确，参加过伊宁起义，1945年4月成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民族军）政治部干事的曹达诺夫·扎伊尔在其回忆录中提到过："尼勒克［即巩哈］的各族民众，在伊宁的民族解放组织的直接的指导和支持下，在埃克巴尔和法提哈的指导下，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发动起义，建立了武装组织。"[5-83]但是除此此外，曹达诺夫对于伊宁的民族解放组织"指导"巩哈游击队的上下级关系，并没有举出任何具体的事例。

笔者曾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就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过程采访过几名当事人。在接受采访者中间，有人指出曹达诺夫回忆录的大部分可信，但在关于苏联的部分上却隐瞒了一些事实。事实上，除曹达诺夫的回忆录外，没有任何直接或旁证资料可以证明在起义发生之前，巩哈游击队和伊宁的民族解放组织有过组织上的联系。由于这两个组织创建于不同地区，组成人员也各自不同，所以当然可以认为，只有在对双方来说都有权威的第三者从中联络斡旋，双方才能够在伊宁起义中做到互相配合。尤其是对于巩哈游击队来说，伊宁城并不是他们曾经活动过的地区。

从维吾尔语文献中可知，这个斡旋者正是苏联方面。据一些文献记载，11月4日，三个苏联人来到乌拉斯台山中的巩哈游击队的驻地，交给了法提哈·穆苏里莫夫十三把自动步枪，"传达了上司的命令，即尼勒克的游击队进攻伊宁。而且传达说当武装组织从东面进攻伊宁时，伊宁的革命家们将从西面发起进攻"。[5-84]《新疆三区革命史》的观点也与此相近，提出是苏联驻伊宁领事馆派人来要求游击队进攻伊宁以便配合伊宁民族解放组织的暴动。[5-85]

另外应该注意的是，10月时在芦草沟地区，亲苏的俄国流亡者创建了武装组织。在伊宁起义前夜，即11月6日，这个武装组织攻击了芦草沟的警察局，截断从乌鲁木齐到伊宁的交通线，从而使政府军无法向伊犁地区派遣支援部队。[5-86]三个原本来源、组成和活动地域都不同的组织，如果不是有一个对三者都具有权威的一方从中撮合和周密安排，无法想像它们能够如此周密地策划和配合起来发动伊宁起义（图5-2）。

图5-2　在伊犁行政区东突厥斯坦民族主义势力的联合



来源：笔者制作。

其实，1944年10月中，就有迹象说明苏联正在新疆策划进行一个大动作。当时，喀什区警察局向吴忠信报告了一件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情报，而吴忠信也对情报中所提之事感到蹊跷：

苏联驻喀什领事返苏前，曾诫领馆职员不要说话，怠新领事到任，亦曰不要多话，过两月就好了等情。按喀什新旧领事同作此语，意义何在甚堪玩味。[5-87]

从时间上看，这似乎是在暗示不久後就要发生的伊宁起义。另外，也有证言说，为了购买武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在起义前曾数次进入苏联。[5-88]从以上各种证言和事实中，完全可以推测出苏联方面在伊宁起义的策划阶段就已经参与其中。

苏联军队直接介入伊宁起义

至今不为人知的一个事实是，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的部队里就有苏联人存在。实际上，伊宁起义指挥部的总指挥官是苏联人亚历山德洛夫（Alesanderow）。但是，据说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从苏联带来部队的人数仅有66人，[5-89]大量的部队要潜入到政府军严密戒备的伊宁是极其困难的，因此，这一数字是可信的。但是，以仅仅66人的部队就想发动起义，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取得成功的。这自然让人联想到，伊宁起义之际，究竟是否有苏联军队直接加入了起义一方的军事行动？

亲身经历了伊宁起义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出身者们，在他们写的回忆文章中都没有涉及苏联军队是否直接介入“起义”的问题。据一些人民共和国时代的官方人士的见解，伊宁起义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政府军数量少，而起义一方强大，在人数方面胜过政府军。[5-90]为了搞清这一问题，应该首先比较一下在伊宁地区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方面的兵力与政府军方面的兵力。

9月12日，即盛世才离开新疆的第二天,新疆省代理主席、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就立即将第128师副师长杜德孚派遣到伊犁区，让他直接指挥这里的军事行动。据说，当时在伊宁的政府军人数至少也有2,500人以上。[5-91]其中一部分被派遣去清剿巩哈游击队确是事实，但是从伊宁到尼勒克距离仅为100公里，部队随时能够从尼勒克返回伊宁。而且与此同时，应杜德孚的要求，128师的一个营已经前往增援伊宁。[5-92]

那麼当时起义者一方的实力呢？如前文所述，10月时巩哈游击队的人数达到800人，另外根据11月4日刘秉德的报告，当时巩哈游击队的人数为1,500人，枪支300枝。[5-93]按照曹达诺夫的说法，进攻伊宁的巩哈游击队的人数是1,500人，武器不过500枝。[5-94]况且，在伊宁起义爆发时按计划到达伊宁的，仅是巩哈游击队的第二队而已。按照这样的实力，根本不可能对政府军形成压倒性的强势。所以说，如果说起义的确完全是由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方面自己来进行的话，实施起义的另一个主体组织——伊宁的民族解放组织就需要具有相当大的实力。

但事实是，伊宁的民族解放组织早在8月间就因为被政府察觉已经停止了组织活动。8月17日政府军与巩哈游击队在乌拉斯台山交战之後，新疆省政府察觉到伊犁区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活动猖獗，於是派遣新疆省警务处副处长刘秉德来到伊宁。刘是出生於伊犁的回族人，精通维吾尔语。他利用自己的语言能力及在当地的人际关系，马上探查到了民族解放组织的活动情况。民族解放组织感觉到危险，马上按照伊力汗・吐烈的意见，决定停止组织活动，很多成员逃到外地或苏联，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本人也跑到了苏联。

吴忠信10月到新疆就任後，又把预备第7师参谋长曹日灵派遣到伊宁。由于曹日灵在伊宁为应对暴动而修筑阵地，逮捕反政府分子，对民族解放组织来说，伊宁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伊宁几乎不可能进行任何秘密活动。总之，比起政府军方面，事实上发动起义一方的力量极为有限，如果仅仅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取得伊宁起义的胜利。

而数名在伊宁当地负责指挥战斗的政府军将校，在发给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的报告中，全都指出苏联军队直接参与了对政府军的攻击：

［1944年］11月9日。午後，於［参谋长］复报称，刻接伊宁情报，该区匪徒中发现双重国籍分子，并新式机枪二十架，显有苏联背景等语。[5-95]

11月13日。贼匪弹药充足，无非苏联领馆供给。……行署後面汽车不少，均系老毛子［即俄国人］。[5-96]

《新疆三区革命史》也称："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曾任盛世才军事顾问的颇利诺夫（白俄）率60多名武装人员（全系俄罗斯人）分乘两辆卡车从苏联进入伊宁参加进攻国民党军警的战斗。"[5-97]但苏军实际参战人员数量可能更多。11月13日，政府军团长姜宣铨率领政府军部队从巩哈回到伊宁，在苏联领事馆的後面突然遭遇约100多名穿苏联军装的人，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据此，姜宣铨在给上司的电报中提出："此并非土匪问题，而系苏联与我军正式冲突开始。"而且同一天，伊宁地区政府军最高指挥官曹日灵在发给朱绍良的电报中说到："名为剿匪，实为国际战争"；"市区土匪全为归化人和塔塔尔族，以其领馆周围作根据，所获武器均系苏联制造者"。因此，他建议："用外交方式作妥协性请其作友谊协助，但不许苏俄派遣军队。"[5-98]

关于苏联军队直接介入了伊宁起义的军事行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的汉族朋友文斐然也说到："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得到苏联红军的支援，在伊宁发起了革命。"另外，文斐然还曾回忆道，阿不都克里

木·阿巴索夫担心起义时在对汉族居民的屠杀中文斐然遭到不测，向来到伊宁的苏联红军提出请求，要红军保护文斐然。[5-99]

针对伊宁起义的详细过程，1991年8月时，前文所述及那位曾经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司令部中担任部长的人物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了如下一段话：

伊宁起义实际上是苏联直接参与的革命。苏联方面不仅提供人员、武器、物资的援助，还动用部队，甚至投入大炮、坦克、飞机等直接参加作战。由於在盛世才时代连小刀都被没收，居民们根本不可能拥有武器。但是，国民党军［即政府军］却拥有所有的武器。

另外，他对自己参加运动做了以下描述："在伊宁起义爆发当时，起义指挥部有很多俄国人。来到伊宁的苏联军人也需要懂俄语的翻译。我因为懂俄语，所以被邀请参加了革命。"有俄国学者认为，关于伊宁起义，苏联不仅在组织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还从物资、战术行动和指挥战斗上对伊宁起义进行了全面帮助，伊宁起义的胜利正是由于得到了苏联积极全面的支持才取得的。这种评价应该并不为过。[5-100]

小　结

伊宁起义爆发的11月7日，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的纪念日；更巧的是，11月12日宣告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立，而在十二年前的这一天，"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在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中宣告成立。如果说，两个日子中一个意味着与苏联之间的特殊关系，另一个意味着独立运动的历史，那麼，这两个日子象徵的意义恰恰就是伊宁起义乃至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最主要的两个性质。

关于第一次与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间的关系，"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机关报《解放的东突厥斯坦》总编辑维吾尔·赛拉姆曾作出如下的论述："近十多年来两度爆发起义，其目的都是民族解放。成为起义对象的都是所有的殖民者和独裁者。"[5-101]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也给予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中"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成立以高度的评价："早在12年前，当我省掀起伊斯兰人民民族解放暴动的时候，就提出民族平等、清廉、建设等几条，使我们人民获得了和平。"[5-102]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後逐渐形成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基本目标就是推翻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的统治，继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後，这在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兴起中再次得到证明。

与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相同，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也打出了伊斯兰圣战的旗帜，采用了利用宗教领袖权威的方法，以便动员

更多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参加起义。但是，由亲苏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主导，并且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支持，成为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区别于第一次东突厥斯独立运动的重要特徵。以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为代表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知识分子的组织，从一开始就得到苏联的援助并与苏联联手策划起义。在伊宁起义的过程中，苏联直接出兵到中国境内，动用了坦克、大炮、飞机等，给在当地的中国政府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一位中国学者曾经确认前苏联内部档案中有以下内容："在苏联的指导下，成立了以内务部人民委员会特务司长伊古那洛夫将军及其副手内务部人民委员会第一局第四处处长拉古凡古为首的特别行动组。这个行动组的司令部设在阿拉木图和边境小镇霍尔果斯。另外，在乌兹别克斯坦和柯尔克孜斯坦境内也有指导新疆南部的大规模活动，在那里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会展开了行动。"[5-103]根据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以上特点，也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是"一场由苏联支援的中国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为推翻中国统治为目标而进行的圣战"。

注释

[5-1]当时新疆分为10个区。即迪化、和田、莎车、喀什、阿克苏、喀拉沙尔（今焉耆）、哈密、阿勒泰、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及伊犁。伊犁区管辖11个县，即伊宁、特克斯、霍尔果斯（今霍城）、巩哈（今尼勒克）、巩留、昭苏、温泉、博乐、精河、绥定、宁西（今察布察尔）各县。

[5-2]毛泽东：《给阿合买提江的信》，1949年8月18日。昆仑网、新疆党建网：http://www.xjkunlun.cn/dswx/dszl/2010/2003786.htm

[5-3]阿合买提江：《在伊宁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人民俱乐部的讲话》，1946年8月24日，未出版。

[5-4]Enclosure No.1, to dispatch no.23, dated September 25, 1945, on the subject "Rebel Objectives in Sinkiang" from the American Consulate, Tihwa. C.I.A XL32642-19.提瓦是当时的乌鲁木齐总领事，中国名叫华瑞德。他被乌鲁木齐政府、军队的相关人士称为"华领"，可见关系密切。

[5-5]《吴忠信日记》，又称《主新日记》，是吴忠信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时的日记，笔者所见为未出版复印件。

[5-6]从1943年行政区的名称改为专区，行政长官的职务名称也改为专员。

[5-7]《吴忠信日记》，1945年1月11日："旋华领表示愿聘三月来余

之政治重要措施，以便公诸彼邦报章杂志，籍以引起世人注意与同情。余允所请，奈内容复杂，非顷刻可以尽言，复嘱省府沈秘书外交署水科长随时供给材料。惟请华领择其可发表者发表，不可发表者暂缓发表，以免外人误会。”

[5-8]塔兰奇，蒙古语的“在土地上劳作的人”的音译。17世纪中叶，由蒙古准噶尔部以新疆北部的伊犁地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准噶尔汗国，在占领新疆南部之後，把这里的一部分维吾尔族农民押送到伊犁盆地，奴役他们从事农业劳动，称这一部分维吾尔人为“塔兰奇”。

[5-9]浦野起央：《民族独立论》（东京：群出版，1982），第31页。

[5-10]《吴忠信日记》，1944年10月4日。

[5-11]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67.

[5-12]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65-167.

[5-13]Sawdanow Zayir, “Xinjiang Uq Wilayat Inkilawiga Ait Ahwallar Hakkida Aslima ［关于新疆三区革命的回顾］,”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6 (1985): p. 68.

[5-14]沙龙：《新疆民族运动真相》，《解放日报》，1946年3月28日。

[5-15]Haliq Saq, “Millitaris Shing Sisay Dawrida Har Millat Ziyalilirining Surgun Kilinix Ahwali Tohursida ［关于军阀盛世才对各民族知识分子的迫害的回忆］,”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7 (1986): p. 166.

[5-16]国民政府势力是从1943年开始进入新疆的。当年1月份重建了国民党新疆省党部，5月在美国留过学的黄如今和林继庸被派往新疆。6月以中央统计局局长为团长的“国父实业考察团”进入新疆，为国民政府军的两个军进驻新疆做准备。卢桂森：《国父实业考察团进新的经过》，《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86），第70-71页。盛世才强烈反对国民政府军进驻新疆，国民政府为不直接惹恼盛世才，让一个师伪装成难民秘密进入了新疆。杜学增：《兰新公路上的地雷声》，《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1982），第28-30页。

[5-17]李帆群：《1944年盛世才在新疆的最後一次大逮捕》，《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1981），第277-282页。

[5-18]黄建华：《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第77-79页。

[5-19]《吴忠信日记》，1944年8月29日。

[5-20]霍殿清、谢海：《整编国民党迪化市警察局始末》，《新疆地方志》，第3期（1991），第45-46页。

[5-21]金绍先：《忆述国民党元老吴忠信》，《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1989），第93页。

[5-22]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p. 168.

[5-23]《吴忠信日记》，1944年12月6日。

[5-24]曾小鲁：《吴忠信主政新疆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1964），第290页。

[5-25]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p. 165.

[5-26]《吴忠信日记》，1944年11月4日。

[5-27]《吴忠信日记》，1944年12月2日。

[5-28]《吴忠信日记》，1944年12月9日。

[5-29]浦野起央：《民族独立论》，第31页。

[5-30]《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1页。这本资料是关于伊犁地区"三区革命"情况的原始资料集，没有出版，为叙述方便，本书称之为《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有1988年和1991年两种版本，两者之间有部分内容相异。

[5-31]Hakim Jappar, "Yaxlarning Uginix Olgisi Abdukirim Abasow ［青年们的模范——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26 (1989): p. 197.

[5-32]Anewar Hanbaba, "Abdukirim Abasow Hakkida Aslima ［关于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25 (1988): p. 32.

[5-33]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第45页。

[5-34]尤力：《阿巴索夫印象记》，《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9辑（1985），第40页。

[5-35]Ablimit Hajiyow, “Olmas Jangqi, Xanliq Tohpa: Yingi Zhonggo Kurux Yolida Kurban Bolganlar ［永生的战士，辉煌的功绩］,” Yinge Jiongguo Kurux Yolida Kurban Bolganlar (Urumqi: Xinjiang Halik Naxriyati, 1991), p. 95.

[5-36]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第46-51页。

[5-37]Yasin Hudabardi, “Uq Wilayat Inkelawi Haqqida ［关于三区革命］,”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6 (1985): p. 25.

[5-38]Hakim Jappar, “Yaxlarning Uginix Olgisi Abdukirim Abasow,” p. 197.

[5-39]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第47-49页。

[5-40]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第51页。

[5-41]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第36页。

[5-42]尼勒克的游击队的总指挥是塔塔尔族的法提哈·穆苏里莫夫，第一队是300名哈萨克人，队长是哈萨克族的埃克巴尔，副队长是赛义提；第二队有250人，主要是维吾尔族人和部分蒙古族人，队长是维吾尔族的海尼；第三队主要是白俄人，队长是俄国人伊万。

[5-43]《吴忠信日记》，1944年12月12日。

[5-44]Saypidin Azizi, “Aslima 2 ［生命之诗（二）］,” Omur Dastani (Beijing: Millatla Naxiriyati, 1990)， p. 39.

[5-45]Saypidin Azizi, “Aslima 2 ［生命之诗（二）］,” Omur Dastani (Beijing: Millatla Naxiriyati, 1990)， p. 38. Kurban Imin Osman, “Uq Wilayat Inkilawining Baxlinix Hakkida Aslima ［关于三区革命开始阶段的回顾］,”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6 (1985): p. 261.

[5-46]《尼勒克暴动回忆录》（抄本，没有着者及写作年代），第20-21页。向笔者出示这本抄本的是中国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的一位教授，在此特致谢意。

[5-47]Kurban Imin Osman, “Uq Wilayat Inkilawining Baxlinix Hakkida Aslima,” pp. 261-262；《尼勒克暴动回忆录》，第20-21页。

[5-48]《尼勒克暴动回忆录》，第8页。

[5-49]Kurban Imin Osman, “Uq Wilayat Inkilawining Baxlinix Hakkida Aslima,” p. 261.

[5-50]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第6258页。

[5-51]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 31.

[5-52]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史》，第30页。

[5-53]Kurban Imin Osman, “Uq Wilayat Inkilawining Baxlinix Hakkida Aslima,” p. 261.

[5-54]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第46-47页。

[5-55]Hakim Jappar, “Yaxlarning Uginix Olgisi Abdukirim Abasow,” p. 195.

[5-56]Anewar Hanbaba, “Abdukirim Abasow Hakkida Aslima,” p. 31.

[5-57]杨宗禹、李占林：《访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巴索夫夫人吕素心同志纪实》，《伊犁文史资料》，第5辑（1989），第17页。

[5-58]《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6号决议》，1945年3月1日。

[5-59]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史》，第36页。

[5-60]Anewar Hanbaba, “Abdukirim Abasow Hakkida Aslima,” p. 32.

[5-61]周东郊：《新疆变乱纪略》，《观察》，1946年11月30日号，第10页。

[5-62]《吴忠信日记》，1944年12月21日。

[5-63]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史》，第37页。

[5-64]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第67页；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简史》，第3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第359页；《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88），第16-17页。

[5-65]关于伊宁事变的具体过程，参考Sawdanow Zayir, “Xinjiang Uq Wilayat Inkilawiga Ait Ahwallar Hakkida Aslima,” pp. 13-19；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p. 56-63；陈力：《伊犁事变记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影印版），第17-19页；周东郊：《新疆变乱纪略》，第12-14页等。

[5-66]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第68页。

[5-67]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第70页。

[5-68]Yasin Hudabardi, “Uq Wilayat Inkelawi Haqqida,” pp. 24-25.

[5-69]《东土耳其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伊力汗的讲话》，1944年11月12日，未出版资料，为尊重原资料，此处不做文字处理，照录汉文译文原文。

[5-70]关于伊宁起义中使用的旗帜，参考邓力群《关于伊犁悬挂旗帜问题给中央电》（1949年10月7日）。“此间过去的旗子有两个，一为绿色的东土耳其斯坦国旗，一为白色的伊斯兰教宗教旗。当给军队授旗时，全体将士曾宣誓，即使牺牲一切也不能把旗子让别人拿去。”以上见《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381页。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政治部编：《新疆和平解放》（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第292页。

[5-71]此人为锡伯族出身，因父亲曾为中国驻阿拉木图领事，幼年在苏联度过，所以精通俄语。

[5-72]Yasin Hudabardi, “Uq Wilayat Inkelawi Haqqida,” pp. 24-25.

[5-73]《东土耳其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伊力汗的讲话》，同前例，照录译文原文。

[5-74]《吴忠信日记》，1944年11月13日；周东郊：《新疆变乱纪略》，第13页。

[5-75]枪杀汉族俘虏一事，根据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第74-75页。另外，在伊宁起义中汉族居民被杀、财产被抢的情况在《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37页；《吴忠信日记》（1944年11月13日）及其它许多着作中都有记载。据说绥定县6,000名汉族人，除了5家之外，其余全部被杀害。此见陈力：《伊犁事变记略》，第18页及柴恒森：《汉族人民的挚友——阿巴索夫》，《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

10辑（1985），第39-40页。

[5-76]阿巴索夫：《目前的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5年5月11日，未出版资料。

[5-77]阿合买提江：《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些错误》，1949年6月6日，未出版资料。

[5-78]Yasin Hudabardi, “Uq Wilayat Inkelawi Haqqida,” p. 35.

[5-79]Ismailow Mahmmut, “Uq Wilayat Milli Armiya 1-Suydung Piyada Polkining Duniyaga Kilixi wa Uning Bisip Otkan Yoli Togrisida Aslima ［三区民族军绥定第一步兵团的诞生及其发展道路］,”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6 (1985), p. 202.

[5-80]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第74页。

[5-81]Sawdanow Zayir, 5-korpusning Bisip Otkan Inkilawiy Musapisi ［第五军走过的革命里程］ (Urumqi: Xinjiang Halik Naxriyati, 1989), p. 17.

[5-82]Sawdanow Zayir, “Xinjiang Uq Wilayat Inqlawiga Ait Ahwallar Hakkida Aslima,” p. 72.

[5-83]Sawdanow Zayir, “Xinjiang Uq Wilayat Inqlawiga Ait Ahwallar Hakkida Aslima,” p. 71.

[5-84]Kurban Imin Osman, “Uq Wilayat Inkilawining Baxlinix Hakkida Aslima,” p. 283.

[5-85]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史》，第37页。

[5-86]无名氏：《1944年的武装起义》（未出版），第13-14页。

[5-87]《吴忠信日记》，1944年10月19日。

[5-88]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50.

[5-89]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 57.

[5-90]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 55; Sawdanow Zayir, 5-korpusning Bisip Otkan Inkilawiy Musapisi, p. 14.《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26页。

[5-91]这个数字出自《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15页。详细内容如下：第一二八师中第三八三团420人、第四保安团961人、空

军教导队约500人、保安大队285人、第一营285人等合计2,551人。但其中部分人没有武器。又据Sawdanow Zayir, “Xinjiang Uq Wilayat Inkilawiga Ait Ahwallar Hakkiaida Aslima,” p. 14及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 57，当时在伊宁市内的政府军有1,500人。

[5-92]Sawdanow Zayir, “Xinjiang Uq Wilayat Inkilawiga Ait Ahwallar Hakkida Aslima,” p. 14.

[5-93]《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88），第14-15页。

[5-94]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 55; Sawdanow Zayir, 5-korpusning Bisip Otkan Inkilabiy Musapisi, p. 14.

[5-95]《吴忠信日记》，1944年11月9日。

[5-96]《吴忠信日记》，1944年11月13日。

[5-97]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史》，第38-39页。

[5-98]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269-6270页。

[5-99]杨宗禹、李占民：《访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巴索夫夫人吕素新同志纪实》。文斐然的回忆收录于其中。

[5-100]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日文版，第148页。

[5-101]维吾尔·赛义然：《“东土耳其斯坦”革命报总编辑维吾尔·萨依然在伊宁“新盟”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5月11日，未出版。

[5-102]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知识分子目前的任务和即将到来的选举》，1946年9月25日，未出版。

[5-103]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48页。

第六章　　权威与权力

战时体制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治结构

1944年11月12日，伊宁的民族解放组织结束秘密活动阶段，在伊宁市内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俱乐部召开大会，宣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Xarkiy Turksitan Jumhuriyiti）临时政府成立。之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大，至1945年3月几乎控制了伊犁行政区全境（图6-1）。在扩张势力范围的同时，成立伊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也开始着手完善各种制度并陆续设置了各种行政机构。1945年4月8日，各地反政府武装组织被改编成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民族军”（Milli Armiya）。至此，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治结构全貌也逐渐清晰起来。本章以这一时期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势力扩张为主线，通过追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初期的政治过程，来分析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治结构的特徵及其形成的背景。

第一节　基于传统性权威的权力正统性

两个“九条政治纲领”

正如第五章中所述，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许多维吾尔语文献都使用了“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但事实上，直至共和国临时政府濒临灭亡前的1946年6月，它所制定的文件上的署名都是Xarkiy Tuksitan Jumhuryiti，即“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也就是说，在1944年，以新疆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社会为基础建立的国家，绝对不是像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立大会会场

1944年11月12日，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大会上公布了“九条政治纲领”（Tokkuz Maddlik Siyasiy Programma，以下简称《1944年纲领》），由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没有制定宪法，“九条政治纲领”事实上就是起着宪法的作用。其内容主要如下：

（一）根除汉人各种虐政；（二）政府定为民主政体；（三）军队属於人民；（四）各民族一律平等；（五）尊重宗教；（六）各级官吏由人们选举；（七）实行亲苏政策；（八）发展教育；（九）定维吾尔文为临时政府通用文字。[6-1]

但是，《1944年纲领》不久便被修正。1945年1月5日的临时政府委员会第4号决议，公布了新的“九条政治纲领”（以下简称《1945年纲领》）。《1945年纲领》具体内容如下：

（一）彻底消灭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国土上的汉人凶手；

（二）在东突厥斯坦境内所有人们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真正自由独立的共和国；

（三）要全面发展东突厥斯坦的经济，包括工业、农业、牧业、私人商业、交通等事业，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四）由於居住在东突厥斯坦境内的绝大多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所以特别支持这个宗教。同时也保障信奉其它宗教的自由；

（五）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及卫生保健事业；

（六）要和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尤其是东突厥斯坦的邻邦建立政治和经济的联系；

（七）为了保卫东突厥斯坦和保卫和平，要吸收所有的民族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八）银行、邮政、森林等以及一切地下宝藏都收归国家所有；

（九）在国家事务中要禁止谋取私利、官僚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受贿等坏作风。[6-2]

据1945年3月就任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长的赛福鼎·艾则孜所言，此次修改是“以临时政府制定的旧的政治纲领为基础”，由各县选出的民众代表所组成的民众代表大会实施的。[6-3]然而，笔者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证明1945年1月实际召开过民众代表大会的史料。由于这个时期也没有明显的人事变动，所以可以认为《1945年纲领》是由临时政府委员会自己修改制订的。关于修改的原因，赛福鼎·艾则孜解释说是订正“错误的地方”。那麽，赛福鼎·艾则孜所说的错误到底是指什么？这就需要比较一下两个政治纲领的内容。

《1944年纲领》和《1945年纲领》都表明了反对中国统治，实施亲苏政策的基本政治立场。但是二者内容的确有所不同，最为明显的有两处。一是在《1944年纲领》中原有建立民主政府、创建民众军队、官员实行民选、保证民族平等、发展教育等真正保障国民政治权利的民主主义的内容。而《1945年纲领》删除了这些保障国民政治权利的具体内容。另一是在《1944年纲领》中曾经规定将维吾尔语作为官方语言，但在《1945年纲领》中此条规定被删除，取代它而提出来的政策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特别支持伊斯兰教，同时保障其它宗教信仰的自由”。

总之，此次修改的最大特徵就是：减少了民主政治因素，规定了伊斯兰教的特殊地位。在1945年1月时，因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还刚刚建立不久，还没有精力就自身民主政治制度展开讨论。因此，这次修正的最大特点，其实就是赋予了伊斯兰教的宗教权威以根本法上的保障。

构建一个民族命运共同体

赛福鼎·艾则孜在其回忆录中，记载1945年5月里修改了“九条政治纲领”。事实上，《1945年纲领》的制定是在1945年1月，而5月13日公布的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通过的另外两个重要法令——《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刑事诉讼暂行规定》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刑法》。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刑事诉讼暂行规定》明确了“九条政治纲领”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地位，规定遵守“九条政治纲领”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每个国民的义务。其第七条为：“每一个政府的公民都有拥护临时政府委员会上批准的、政府临时要采用而向全体人们公布的九条宣言”，第八条为：“破坏和违反政府九条宣言的任何一个公民都要受到处分”。

随着根本法对伊斯兰教权威性的保障，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议事规则逐渐完善的过程中，伊力汗·吐烈的权威同时也在不断得到加强。

在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大会上公布的《1944年纲领》，并未提及政府的组织构造。1944年11月12日，正式选举了临时政府委员会，并在临时政府副主席阿奇木别克·和加（Hakimbek Hoja）的主持下，于当天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并通过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号决议》。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号决议任命了数名部长、宗教部成员及最高法院的院长，规定了关于国家财政税收的若干事项。

不久，又出台了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号决议。但从决议所涉及内容上看，除国家财政税收问题外，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号决议简直就是第1号决议的重复。甚至连内容项目的排列顺序都是一样的。但是从形式上来看，两个临时政府委员会决议案却有着若干不同点。

首先，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号决议的书写方式与第1号决议完全不同。第2号决议在开头即说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由政府主席伊力汗·吐烈主持并决定以下问题”，在决议的最後有“政府主席伊力汗·吐烈”的签名。通过对此後各次决议案的调查看出，在此之後，这种格式成为所有“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决议”的正式格式。

其次，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号决议与第1号决议在内容上也存在差异。在人事任命上，第2号政府委员会决议虽然按原样再次任命由第1号政府委员会决议任命的教育部长、畜牧部长、农田水利土地部长、最高法院院长，但由第1号决议任命的财政部临时部长被正式任命为财政部

长，并任命了第1号决议中并没有出现的宗教事务部长一职。另外，第1号政府委员会决议规定，临时政府掌管国家财产的管理和军服供给的最终决定权，而在第2号政府委员会决议中，这些权限被变更为归临时政府主席掌握。

也就是说，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号决议的意义，并不重在从内容上补充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号决议，而重在它要确立的这种公文形式，因为这种公文的形式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权力体制的诞生。那就是，只有在临时政府主席的主持下，临时政府委员会会议才能够决定重大人事任命，制定重要政策；有关重大问题的政策，只有临时政府主席才有做出最後决定的权力；只有临时政府主席在决议案上署名後，临时政府委员会决议才能够生效。虽然从表面上看来，这只是一个临时政府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和政策决定程序，但是如果具体到个人来看，这个规则和程序当然意味着临时政府主席伊力汗・吐烈个人权力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证。

然而，从国家性质上来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非伊斯兰国家。其根据如下：首先是两个“九条政治纲领”都在国家体制问题上没有明文规定伊斯兰教的政治地位；其次是由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号决议规定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税法原则，也与伊斯兰教的税法原则不同。

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号决议中规定的税率为：不论是否为穆斯林（伊斯兰教徒），商业税税率是资本价值的5%，农业税税率为农产品价值的3%。这一点根本不同于伊斯兰法规定的欧舍尔（ushr，什一税）、札卡特（zakat，天课）。另外，关于运输税、住宅不动产税的征收，规定“暂时沿用中国政权（时代）的征收办法”。应该注意的是，在伊力汗・吐烈主持下出台的政府委员会第2号决议中，完全没有谈及国家的财产税收。也就是说，伊力汗・吐烈也承认了第1号决议所规定的非伊斯兰教的征税方法。

但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国旗却采用了中间点缀新月和星星的设计，以及象徵伊斯兰教的绿色。[6-4]从共和国成立之日起，作为宗教领袖的伊力汗・吐烈的政治权威渐渐强化。这说明，尽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不是伊斯兰教国家，但它的领导人仍然希望在政治上利用伊力汗・吐烈的宗教权威和社会知名度，给予新疆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以一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为倡导伊斯兰教国家的形象。

根据赛福鼎・艾则孜的说法，临时政府的人事在1944年11月8日的民族解放组织的会议中就已事先决定。但是，临时政府委员会中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人数非常少，相反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社会的上层人士，不

仅有宗教人士，还有伯克、千户长、大商人、大地主等，都进入了临时政府委员会（表6-1）。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他们大多都没有参加过民族解放组织，也没有参加过伊宁起义。清王朝时期最後一任伊犁最高行政长官“阿奇木伯克”的女婿之一阿奇木伯克・和加，甚至也被选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副主席。总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开始有意识地拉拢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社会的上层人士。

这种政府人事组成，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立的阶段，具有两个实际的作用。首先，通过将各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纳入共和国临时政府领导层的方法，可以向民众强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一个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民族命运共同体。第二，像政府主席伊力汗・吐烈这样具有宗教权威、政府副主席阿奇木伯克・和加这样具有政治权威，或财政部长安瓦尔・穆萨巴约夫（Anwar Musabayow）这样因其经济地位而具有社会权威的人物的存在，可以起到强化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权力的正统性及正当性的作用。而这两点在动员民众和进行统治上，当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表6-1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成员

姓名	民族出身	职务	
伊力汗·吐烈	乌兹别克	临时政府主席	伊宁民族解放组织主席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	维吾尔	内务部部长，后任宣传部部长、民族军政治部主任	伊宁民族解放组织指挥部成员
穆罕默德江·买合苏木	同上	最高法院院长	同上
加尼·约尔达苏木	同上	监察委员会委员长	同上
阿不都鲁甫·买合苏木	同上	临时政府秘书长	同上
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	同上	军事部副部长，后任军事部部长、内务部部长	同上
萨里曼·巴伊	乌兹别克	农业部部长	同上

（续上表）

祖农·塔约夫	塔塔尔	监查委员会副委员长，后任军事部长、民族军副总指挥	同上
阿奇木伯克·和加（Hakimbek Hoja）	维吾尔	临时政府副主席	清王朝最后的伊宁阿奇木伯克别克（地方行政长官）的一个女婿
安瓦尔·穆萨巴约夫（Anwar Musabayow）	同上	财政部长	有名的大商业资本家穆萨巴约夫家族成员
阿不里米提·阿里·哈里发（Abulimiti Ali Halipa）	同上	宗教部长	宗教人士
阿不都拉·哈尼（Abdulla Heni）	同上	军事法庭庭长	巩哈游击队领导人之一
哈比卜·约奇（Habib Yuqi）	塔塔尔	教育部长	有苏联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
奥布尔哈里·吐烈（Ubulhari Tora）	哈萨克	游牧业部长	
亚历山德洛夫（Alesanderow）	俄罗斯	民族军总指挥官、军事部长	苏联来的伊宁起义的指挥者
马斯古（Maskolyow）	同上	内务部长、后任民族军总参谋长	住在伊宁的白俄人
普扎·阿巴尔（Puja Abal）	蒙古		蒙古民族社会上层人士

来源：笔者依据“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各种文件制成。

第二节　　知识分子与“共和国”的政治权力

集中于内务部和军事部的知识分子

担任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长的赛福鼎·艾则孜用“城池攻破以後，英雄就多起来了”这句维吾尔人的谚语，批判伊力汗·吐烈担任临时政府主席是篡夺了起义果实。[6-5]这一尖锐指责的另一层含义是，只有组织、指挥了伊宁起义的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才是临时政府主席最合适的人选。

但事实上，作为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中亲苏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核心人物，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也在临时政府中担任了极其重要的职务：政府委员（Hokumat Azasi）兼内务部长（Iqki Ixlar Nazariti）。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内务部显然是模仿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建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务部暂定工作条例》总则第一条规定：“东突厥斯坦内务部担当着为确保国家和民众的安全与各种犯罪行为作斗争，并解决民众中一些个别问题的任务。与此同时，内务部还担负惩罚引起各种政治犯罪及刑事犯罪的人的任务。”[6-6]也就是说，内务部同时相当于公安警察、政治警察以及检察机关，是一个具有生杀予夺大权、举足轻重的部门。

1945年1月16日的临时政府委员会，“听取并通过了中央内务部宣传局关于1944年的工作情况报告”。[6-7]这说明，掌管意识形态也是内务部的工作之一。即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既是公安警察、政治警察及检察机关的最高负责人，又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最高负责人。所以有人认为，共和国几乎所有的重要文件都是经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之手制定的。[6-8]

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人事安排中还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特点：军队和内务部的要职，都是由亲苏知识分子中的临时政府委员和拥有苏联国籍的临时政府委员来担任的。

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组织结构上来看，内务部和军队原本不属于同一个系统（图6-1）。但是，1945年4月29日临时政府委员会第46号决议中明确写道：“3，［关于军队的组织、军阶、制服等内容的］临时政府委员会6号决议规定的级别标志也适用于内务部。4，内务部工作人员的帽徽使用军帽徽。”另外，同年6月14日发布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务部暂行工作条例》开门见山地规定：“第一条，凡东突厥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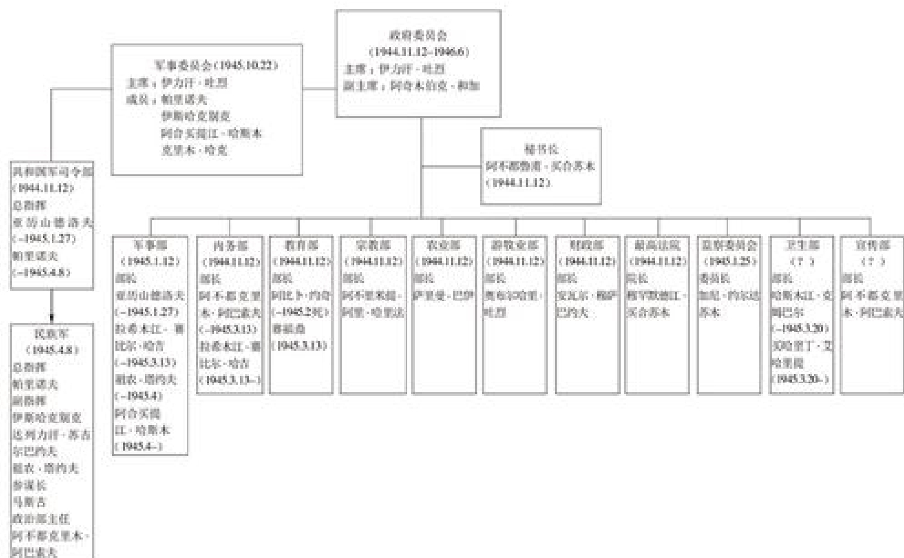
坦共和国内务部工作人员均和在部队工作的人员一样，要遵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队的纪律和暂行工作条例的规定”；“第二条，要按军队卫戍区军官所穿的服装样式，进行军训”。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知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内务部，从行政体系上来看虽然和军队不属于同一个系统，但同样采取军事化管理。这也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同其他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

1945年1月，苏联籍的军事部长亚历山德洛夫回到苏联。[6-9]内务部副部长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接替他成为军事部长。後来，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又接替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而成为内务部长。而接替他担任军事部长的是曾留学苏联并拥有苏联国籍的鞑靼人祖农・塔约夫。[6-10]总之，军队和内务部的人事变动，实际上是在与苏联有关系的人之间以内部交替的形式进行，与军事部、内务部的人事有关的政府任命不过只是一道形式上的手续而已。



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

图6-1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机构图



来源：笔者依据“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各种文件制成。

特别是在政权建立初期，军队和内务部这样的部门毫无疑问是新政权中最重要的部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中，部长与副部长同时由政府委员担任的中央政府机构只有内务部和军事部。也就是说，尽管进入临时政府委员会的亲苏的或拥有苏联国籍的知识分子人数不多，但因为他们占据着军队与内务部这样重要的部门，也就掌握了临时政府委员会的实权。

军队系统与苏联势力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人事的另一特徵是，还有很多苏联红军军官也加入到军事部和内务部中。军事部和内务部，正是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内部，亲苏的知识分子与苏联进行合作的接点。

与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一起从苏联进入新疆的亚历山德洛夫，首先成为军队的总指挥，在1945年1月军事部设立之後他又担任了临时政府军事部部长。而当时的军事部副部长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是与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及亚历山德洛夫一起组织了伊宁起义的战友。

军队最初与政府系统没有组织上的关系，只是作为独立单位而独自采取行动。直到1945年1月7日，临时政府委员会第5号决议才决定设立临时政府的军事部门——军事部。1月12日的第6号临时政府委员会决议又决定，将各地的反政府武装组织改编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正规军。

[6-11]这两项任务的负责人都是亚历山德洛夫，他还被1月15日的临时政府委员会第7号决议授予了可以向下级军官授予军衔的权力。[6-12]

1945年3月1日的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6号决议，决定晋升两名上校、两名中校和一名少校。在这份任命名单中，可以看到两位俄国人的名字：一位是被任命为上校的瓦西里·莫古特诺夫（Mugotnof），另一位是被任命为少校的波尔德里古夫·伊万诺维奇·克苏孔。通过这个决议，可以断定有苏联人直接进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队系统中担任高级军官。

刚刚经由军事部长转任内务部长的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也出现在这份名单中。但是，他的军衔不过是中校。[6-13]那麽，如果这位名为瓦西里的上校是当地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他一定是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诞生作出过比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还要大的贡献，至少当事者们在後日的回忆录中不敢完全无视他的存在。但是事实却是：在任何一位当事的维吾尔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中，的确看不到有关这位“瓦西里上校”的记述。因此可以肯定，“瓦西里上校”不是当地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很有可能，他与曾经加入“伊宁民族解放组织”的前身——“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後来成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事顾问的苏联领事馆情报员瓦西里为同一人物。[6-14]

根据《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可以知道，1944年11月中旬，即伊宁起义不久，苏联红军将军科兹洛夫就担任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游击军总指挥部”的军事总顾问。11月下旬，各地武装组织都先後接纳了苏联军事顾问。[6-15]事实上，苏联军人不仅作为军事顾问加入各武装组织，也作为指挥官直接指挥了军事作战。据多名东突厥斯坦军士兵的回忆，他们的上司，即绥定第一步兵团团长是苏联红军上校莫古特诺夫。[6-16]

1945年4月8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军队——“民族军”宣告成立，各地的武装组织被编成七个团，四个独立营和一个独立连。[6-17]民族军总指挥官是1944年11月16日从苏联进入新疆的苏联人帕里诺夫（Palnof，根据维吾尔语文献转写）。参谋长为有苏联国籍的白俄人马斯阔廖夫（Maskolyof，根据维吾尔语文献转写）。民族军总指挥部中，设立政治部、作战部、军务部、干部部、侦查部、後勤部等部门。政治部长由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担任，侦察部长由一位精通俄语的人出任。[6-18]



民族军部队

一位曾在民族军总指挥部工作的人物在接受采访时告诉笔者，苏联人不仅大量进入民族军总指挥部，而且连民族军的团长、营长也全部由苏联方面派任，甚至各连也有从苏联派来的副连长。对此，他又列举以下事例，在伊宁步兵团里，团长巴列索夫、参谋长克里米索夫、政治部主任阿买塔洪都是从苏联派来的苏联红军；精河骑兵连的副连长也是从苏联哈萨克斯坦来的哈萨克人喀里满。也就是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军队在改组为“民族军”後，也仍然由苏联势力直接掌握着。

军队系统脱离临时政府系统而独立存在，不仅仅表现在人事方面，军事行动也同样不须经过临时政府委员会的讨论。虽然1944年11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已经在伊宁成立，但是直到1945年的1月末，伊宁的海兰巴克区的北大营、鬼王庙以及飞机场中，还有一部分中国政府军坚守在那里。另外，伊犁区各地也有部分中国政府军部队。为了消灭这些政府军残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武装力量在各地连续展开军事行动，用了整整三个月时间才扫清了残敌。

但是，从1944年11月12日到1945年2月末之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的决议案中则完全看不到有关军队活动的内容。由此可知，这些军事行动都没有通过临时政府委员会的讨论。从1944年11月12日到1945年3月末，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做出的37个决议中，一共有18个决议涉及到了军队。但是，这18个决议，绝大部分都是关于军队的後勤、补给或者对牺牲军人的家属如何进行抚恤的问题。换言之，在军事行动上，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所起的作用，不过是仅仅扮演了後勤机关的角色而已。（表6-2）

表6-2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决议中有关军队的内容（截止至1945年3月）

日期	决议名	涉及军队的内容
1944年11月12日	第1号决议	军服的供给问题
不明	第2号决议	军服的供给问题
1944年12月30日	关于组建军需供应局的决议	决定设立军需供应局
1945年1月5日	第3号决议	关于军需供应局的工作内容
1945年1月7日	第5号决议	决定设立政府最高军事机关
1945年1月12日	第6号决议	决定设立军事部及建立军衔制
1945年1月15日	第7号决议	关于晋升军官军衔
1945年1月16日	第8号决议	决定建造负伤士兵疗养所
1945年1月18日	第10号决议	决定设立负伤士兵家庭成员收容所和救济委员会
1945年1月25日	第12号决议	决定没收个人所有机动车以支持战争
1945年1月27日	第13号决议	决定免去亚历山大德洛夫的军事部部长职务
1945年1月28日	第14号决议	决定为支持圣战而征收宗教税
1945年2月3日	第18号决议	关于救助战死者家属的问题
1945年2月3日	第19号决议	公布征兵制兵役法
1945年2月10日	第21号决议	决定征收用于骑兵部队的马及饲料
1945年2月24日	第25号决议	决定最高勋章“解放勋章”的授予问题
1945年3月1日	第26号决议	授予七名军官军衔
1945年3月13日	第33号决议	关于政府军事部长、内务部长的人事变动

来源：笔者根据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历次决议内容整理。

临时政府委员会主席伊力汗·吐烈的反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内部，实际上存在两种政治势力。一种是以伊力汗·吐烈为代表的宗教领袖及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社会的上层社会势力，另一种是由亲苏的维吾尔族、塔塔尔族知识分子以及苏联人组成的苏联势力。前者主要集中在临时政府委

员会中，後者主要集中在军队以及采用军事化管理的内务部系统里。

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内，政治权力的强弱与占临时政府委员人数的多寡之间也许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虽然在临时政府委员会内维吾尔族、塔塔尔族知识分子和拥有苏联国籍的人是少数派，但是由于他们占据军事部正副部长和内务部正副部长这样重要且与临时政府委员会相对保持独立的职位，因此掌握着更大更多的实际权力。例如，在临时政府委员会会议上，“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经常明确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场，无所顾忌。无论是伊力汗·吐烈，还是其它委员，如果有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或者造成某些错误，他必定会尖锐地批判”。[6-19]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实际上与伊力汗·吐烈处于对立状态，其部下也传言阿巴索夫任何事请向来都不与伊力汗·吐烈商议。[6-20]

担任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主席的伊力汗·吐烈，对军事部门的独立也相当不满。伊宁的维吾尔族大商人塔里哈提·穆萨巴耶夫，曾作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代表，被派遣去说服政府军投降，但却叛变到新疆省政府方面。之後，他在给新疆省主席吴忠信的信中如此报告：

伪主席（主任委员）阿里汗土列［即伊力汗·吐烈］与总指挥阿列克三得洛夫［即亚历山德洛夫］、副总指挥法提哈意见不合，阿里汗土列有意自组武力，指挥维族，以为抗衡，复招塔里哈提往晤。十二日午後，走访阿於专署，阿嘱向苏领馆领枪200支组织维族军，以坐谈时久，当日未及往领馆。[6-21]

这位塔里哈提·穆萨巴耶夫之所以被伊力汗·吐烈看重，很可能就是因为他是当年发起和支持了“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的工商资本家穆萨巴耶夫家族在伊犁地区的当家人，具有一定财力和影响力。当然，这件事由于塔里哈提·穆萨巴耶夫本人的逃跑而无果而终。[6-22]但是从这里知道，在临时政府内部，人们都知道伊力汗·吐烈与军队系统严重对立的情况。

1945年1月12日的临时政府委员会第6号决议决定设立政府军事机关——军事部，这应该是伊力汗·吐烈为阻止军队系统独自行动、企图将军队的指挥权收归政府的一项行动。因为在这场争斗中，首先是副总指挥法提哈被排除出军队指挥部。[6-23]之後的1月27日的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3号决议，又免去了军队总指挥亚历山德洛夫的军事部长职务，随着亚历山德洛夫的免职和回国，2月里伊力汗·吐烈自己成为了军队的最高司令官。[6-24]

从表面上来看，围绕对军队指挥权的这次权力斗争似乎是伊力汗·

吐烈一方占了上风，但是，军队的最高司令官不过是一个名誉职位，而继任掌握军队实权的总指挥一职的帕里诺夫，仍然是一位苏联人。[6-25]亚历山德洛夫也还继续拥有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的头衔，直到1945年8月9日将其让与帕里诺夫为止。[6-26]由此可以推论，亚历山德洛夫的免职和回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人物丧失地位，不如说是为了缓解伊力汗・吐烈的反感情绪，而由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队系统内部的苏联势力自己进行了一次内部调整而已。虽然伊力汗・吐烈通过种种手段想夺取军队的直接指挥权，但是他不论做出了多少努力，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达到目的。

第三节　两大政治势力共存体制的形成

人为的共存体制

1944年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中苏联势力扩大的一年，但是，进入1945年後，伊力汗·吐烈得以扩张了他的权势。以1月5日修改“九条政治纲领”为开端，法提哈和亚历山德洛夫先後被排除出军队指挥部门，之後设立了伊斯兰宗教法庭（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时担任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宗教部长的人被任命为庭长），并在3月间改革了政府组织。由于这次改革，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被剥夺了内务部长一职，成为宣传部部长，而这个部过去不过是内务部下属的一个部门而已。

但是应该注意到，与此同时，既是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的战友、又有亲戚关系的赛福鼎·艾则孜，从教育部副部长被提拔为部长。[6-27]4月时，在民族军成立之际，伊力汗·吐烈就任名誉职位的民族军最高司令官，政府决议决定各政府部门均须安排一名阿訇担任宗教顾问，军队各团均须安排一位阿訇担任宗教副团长。而同时，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也被任命为民族军政治部长，成为军队的最高政治负责人。

尽管部队的宗教副团长根本不懂军事，不久就变得有名无实，[6-28]但是他们仍然被授予高级军衔。例如，伊犁第二步兵团宗教副团长的军衔是中校，据说是这个团中最高的军衔。[6-29]

与军队不同，在政府的各部，苏联顾问（Sowet itttpakqi maslihatqisi）和宗教顾问（dinniy maslihatqisi）共同掌握权力。据教育部长赛福鼎·艾则孜称，当时他下达任何命令时，都必须得到两位顾问的同意。[6-30]但据从1945年到1946年在宣传部任职的人称，在宣传部里苏联顾问的权力极大，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曾经交代部下，如果他不在时，大家都要遵从苏联顾问的决定。[6-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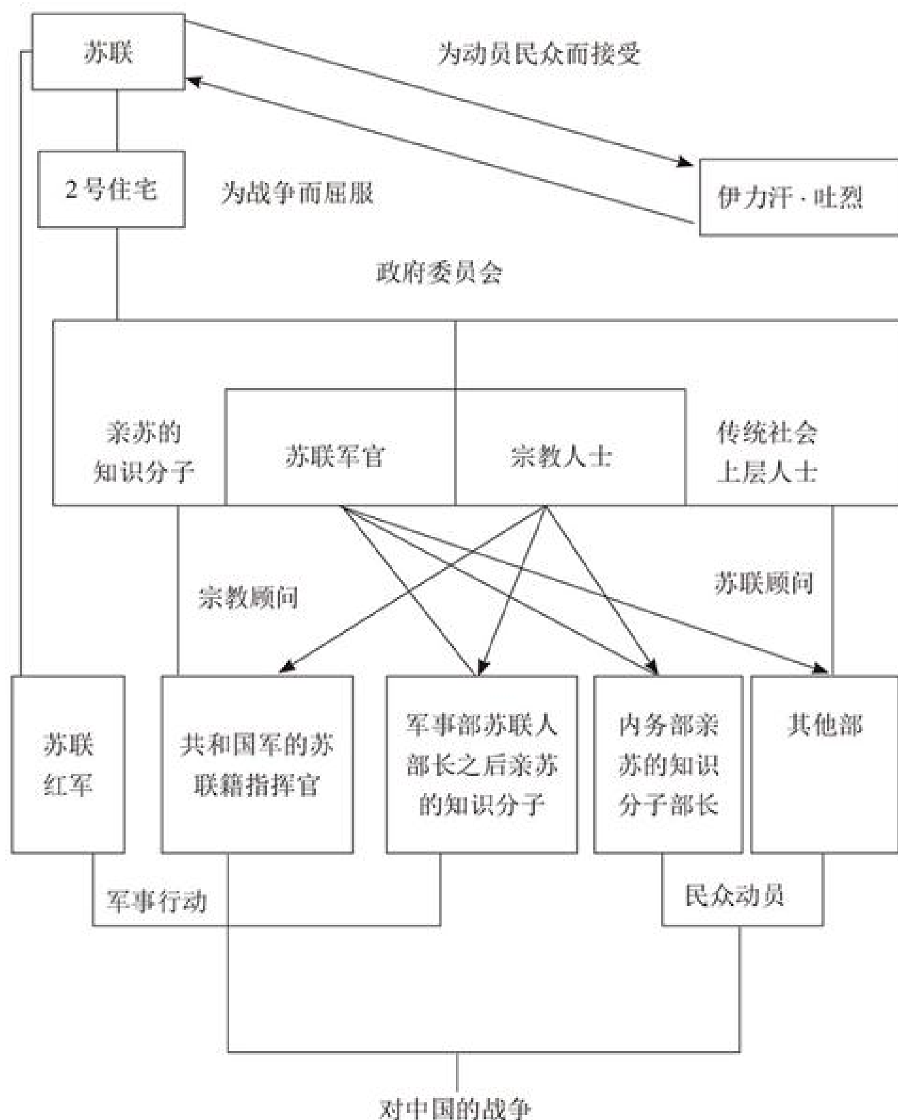
1945年5月13日，临时政府委员会公布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刑法》。《临时刑法》在关于“政治罪”的部分中有如下内容：“第50条第一款，搞间谍为目的，暗杀政府重要成员者，依刑法50条第一款被起诉，直到处极刑；第二款，搞间谍为目的，几人勾结起来，暗杀政府重要成员者，依刑法50条第一款被起诉，直到处极刑。”这些内容，可以说是从法律上对伊力汗·吐烈的生命安全做出了保证。

从以上这些内容中可以看出，在两大政治势力之间，虽然围绕政治权力的分配双方争斗不停，但是从苏联势力的做法来看，他们也并不是

一定要把对方完全排除出权力中枢才肯罢休。伴随着两大政治势力的一进一退，到1945年4、5月间，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内部，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权力并不均衡状态中的两大政治势力共存的体制（图6-3）。应该注意到的是，这种共存体制决不是随时间的推移而自然形成的。在其确立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许多人为的因素。

临时政府的军事部，是到1945年1月才设立的。与其不同，内务部是与其它的中央政府机构一起，在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当天（1944年11月12日）就设立的。但是应该注意到，与其它部的部长都是由临时政府委员会的决议任命的不同，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就任内务部长却没有临时政府的任何正式任命。

图6-3　东突厥坦共和国内部两大政治势力共存的构造图



来源：笔者依据“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各种文件制成。

在1944年11月1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大会上，为了统一指挥参加起义的各地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武装组织，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武装组织总指挥部”，由苏联人亚历山德洛夫担任了“武装组织总指挥官”。亚历山德洛夫在1945年1月12日通过政府决议被任命为政府军事部长，但是，没有任何临时政府委员会决议涉及亚历山德洛夫的“武装组织总指挥官”的任命。因此可以认为，苏联势力单独掌控的军

队系统和内务部人事，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临时政府委员会一样，都是在成立大会之前就已经被决定下来的。

没有经过政府委员会的任命，并且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立大会之前已被决定的职位，除军队指挥官和内务部部长之外，还有伊力汗·吐烈的临时政府主席和阿奇木伯克·和加的临时副主席。赛福鼎·艾则孜证实，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初的人事都是依据事前的商议而决定的。因此完全可以认为，亚历山德洛夫任军队最高指挥官、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任内务部长、伊力汗·吐烈任临时政府主席、阿奇木伯克·和加任副主席，这些人事都是由包括伊力汗·吐烈在内的伊宁起义组织者们在伊宁起义之前已经同意了的。换言之，就是两大政治势力自身其实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内部应该形成两大政治势力的共存体制。

苏联的支持与战争

对于双方来说，形成如此共存体制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也许亚森·胡达巴尔迪所指出的："一切为战争、为了前线"（Hamma piront uqun aldinki sap uqun）这一句话可以成为这个问题的答案。[6-32]分析当时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刚刚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无论是对于伊力汗·吐烈来说，还是对于亲苏的知识分子势力来说，当时最大的最为紧要的课题就是如何赢得这场战争。

1944年12月3日，为了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进行交涉，蒋介石派遣国民政府外交部西亚局局长卜道明来到新疆，令他交给吴忠信一封亲笔信，主要内容如下：

如果目前形势仍难改观，则我军应决定方略如左：一，尽现已集中伊宁附近之兵力，积极进攻，以期收复伊宁、绥定。如不得已时，则应在伊宁竭力对峙，作持久之计。如某国出面干涉，亦不必顾虑。……三，对俄外交，应就地进行，如有一线希望，则关於经济合作方面，必作尽量迁就，以期保全领土与主权也。至於全疆各地，必竭尽一切政治与军事手段与能事，设法维持为要。

……再者汽车与汽油，已令西北运输局与後勤部拟具整个办法接济矣，并饬其另行详报。

……关於新省财政、经济，亦已令各主管部积极筹备，总勿使新疆增加负担，军费一切自应由中央担负，请勿念。[6-33]

很明显，国民政府当时打算不惜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上作出一切努力，收复伊宁，以平息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在蒋介石的旨意下，残留在伊宁海兰巴克的飞机场、鬼王庙、北大营的政府军残部一直进行了殊死的抵抗，直至最後出现许多饿死者。政府军的支援部队从1944年11月13日开始向伊宁方面进攻，很快就到达了名为二台的地方。[6-34]11月15日，新疆的最高军事长官第八战区司令朱绍良任命第七预备师师长李禹祥为指挥官，以第七预备师和新编第45师为主力，开始了“打通果子沟增援伊宁战役”。[6-35]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卫伊宁，苏联的军事支援不可或缺。正如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立时担任过临时政府委员、监察委员会副委员长，後又担任了军事部长的祖农·塔约夫在其回忆录中记载的那样，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成立时就已经认定：对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最为重要的就是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6-36]

伊力汗·吐烈也非常清楚形势的严峻。1944年11月24日，伊力汗·吐烈本人也向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发出请求，呼吁帮助解决武器问题。[6-37]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本身的武装力量并不具备战胜政府军的实力，这个现实使得伊力汗·吐烈不得不向苏联势力妥协。



祖农·塔约夫

从1944年11月开始，集结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名下的各个武装力量在果子沟的松树头子、二台等地与政府军的增援部队持续进行激烈的争夺战，同时对残留在伊宁的海兰巴克地区的政府军实施昼夜不断的攻击。此外，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武装组织还向伊犁行政区各地派出部队，于1944年11月中旬占领了昭苏，下旬占领了察布查尔，20日占领了霍尔

果斯，12月20日占领了温泉，12月25日占领了绥定，12月31日占领了惠远，1945年2月20日占领了塔尔塔拉等地。没有政府军驻扎的巩乃斯、巩留、特克斯等县的国民政府官吏们，看到大势已去，纷纷自动放弃政权，越过山脉逃到了迪化即乌鲁木齐。

但是，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仅靠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本身的武装力量，无论如何也承担不起。简而言之，中国政府军的失败，除天气恶化的因素外，最重要的还是因为苏联红军的直接参战。

11月28日的《吴忠信日记》记载："该地距我甚近，其六寸口径钢炮射程可及。故今後飞机不能再于该机场降落。至我援军，因沿途公路积雪，运输车辆毁损甚多，现正等待精河集中部署，再行总攻。"机场应该指的就是伊宁海兰巴克的飞机场，这里的守军已经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2月4日，回到乌鲁木齐的前线指挥官谢义锋师长向吴忠信报告："前方气候严寒，士兵艰苦备尝。谢师一团冻死战死大半。另有兵一营曾一度进攻至距伊宁三十里地带，不幸误入歧途，为匪包围，全军覆没，亦云惨矣。匪方人员众多，武器锐利。且不仅其军事策划指挥全由某方主持，又有某方正规军加入作战，实力非可小观。"[6-38]

一位受访者曾亲自参加过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对驻扎在伊宁海兰巴克的政府军的攻击战斗，他在回答笔者的采访时证实："伊宁的国民党军的最後据点海兰巴克被包围之後，两、三个月都未能攻陷。於是，苏联红军甚至动用了大炮。伊宁离苏联的国界线仅有70公里，苏联方面借助卡车夜来晨归，他们的战死者的屍体也全部带回了苏联国内。"

"打通果子沟增援伊宁战役"在12月9日以失败告终後，朱绍良于12月26日计划从精河南部的登努斯达瓦通过伊犁河谷增援伊宁方面，并派遣二十九集团军长官李铁军、四十五师师长谢义锋等作为前线指挥官，但这次作战也最终失败。1945年1月31日，残留在伊宁海兰巴克地区的政府军及在此避难的汉族居民约数千人不得不开始撤退，然而途中被全部消灭，至此伊宁全部陷落。[6-39]到1945年3月，战斗前线转移到了精河，除精河外，整个伊犁行政区都成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统治区。

伊力汗·吐烈的宗教权威和民众的战争动员

前述被采访者同时指出："在苏联给我们的武器中，以德国造（Garmanika）的居多。"苏联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不愿给中国留下指责其干涉中国内政的证据，所以想尽力掩盖自己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间的关系。因此，对于苏联来说，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中，形成一种苏联势力与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社会的上层势力、宗教势力之间的共存体制，正好可以用来掩盖他们积极支持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事

实。“政府临时主席”为伊斯兰教“宗教领袖”一事，就能够被用来作为“说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是“民族革命”的最好事例。

而对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部的苏联势力来说，共存体制的最大价值，还是在于能够强化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强化他们的宗教使命感，从而能够动员他们参加到战争中来。

前章所述及的由美国驻迪化领事交给国务卿的报告中附带的资料之一，是伊力汗・吐烈以东突厥斯坦政府主席和军队最高司令官的名义给新疆的喀拉沙尔（Karaxahar）、库车（Kucha）、库尔勒（Korla）等地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一份告示。在这份告示中，伊力汗・吐烈是这样动员当地穆斯林民众的：

我军马上就到达你们的地方，你们从现在必须准备。为了把我们自身从奴隶主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为了保卫我们的宗教，为了解放我们的祖国，我们不惜牺牲地努力，进行战争。对於我们来说，对这个世界没有恐惧的东西，如果我们［在战争中］倒下，就成为安拉所爱的人。如果我们在战斗中牺牲，就成为殉教者［Martyrs for the Faith］。[6-40]

从1944年末到1945年前半年，伊力汗・吐烈到过很多地方进行演讲，而在所有的演讲中，他都激烈抨击中国对新疆的统治，宣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我们的祖国”。[6-41]1945年4月2日，政府发表了第39号政府委员会决议，决定成立“为了支持圣战”的“天课［自发捐助］征收委员会”。4月8日，在民族军的成立大会上，伊力汗・吐烈还亲自授予了军队一面有着星月徽记，上面写着“为东突厥斯坦的独立前进”的口号和可兰经经文的绿色旗帜。[6-42]

参加了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亚生・胡达拜尔迪的以下发言，可以用来说明伊力汗・吐烈在动员民众参加和支持战争一事上所发挥出来的巨大作用：“在革命初期，由于新疆［民族社会］的历史条件限制，与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样的民众起义一样利用了宗教作为工具，打出宗教旗号是为实现民众动员和革命目标的策略。”而且，“在革命的初期阶段，用英雄主义、爱国主义联合思想教育军队和民众，对革命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6-43]尽管在这里作者有意模糊了“爱国主义”的对象，但是只要知道这一段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他所指的决不是“中国”，而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不仅是伊宁起义，其後从伊宁到伊犁区全区，再从伊犁区发展到塔尔巴哈台区、阿尔泰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势力范围扩张一直都非常顺利。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应该归功于这种两大政治势力的共存体制。

小　结

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内部，存在着两大政治势力。一个是以伊力汗·吐烈为代表的宗教领袖及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社会的上层人士势力，另一个是以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为代表的亲苏的维吾尔族、塔塔尔族等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的知识分子及苏联人构成的苏联势力。前者集中于政府委员会中，後者集中于军队系统和内务部里。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部政治结构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两大政治势力在政权内部形成一种共存体制。

这种共存体制是基于双方的同意或默认而人为形成的。其原因就在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所面临的时代环境和社会环境，尤其是当时的战争形势。但是这种共存体制，当然会影响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政策制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共存体制的政治结构的特徵，是理解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各种政策的性质、特别是理解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自身性质的关键。

但是，这种共存体制之所以能够形成和得到维持，必须具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是在亲苏的知识分子主导下发起的，所以军事部和内务部等重要机关始终控制在亲苏的知识分子等苏联势力手里。这种政治权力的不平衡状态，其实是两大政治势力共存体制得以形成和得到维持的前提。伊力汗·吐烈一派其实很明白，如果他们想要打破这种不平衡状态，那他们的下场只能是从政权中枢中被完全驱除出去。

其次，两大政治势力的共存体制是在“革命的初期阶段”为了针对“中国统治”的斗争需要而形成的，因此形成了一个怪圈：为了推翻“中国统治”而形成的共存体制，必须有“中国统治”这个共同敌人的存在才能继续下去。只有在不断发现新的共同敌人的情况下这种共存体制才有存在的价值，共存体制存在的目的却成为共存体制的条件，这也是伊宁起义以後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不断向外部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但是，由于双方在政治理念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所以当迷失了外部目标之後，支撑这种共存体制的内部张力自然也就随之消失。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因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军事力量是否敢于不断面对敌人，说穿了就取决于苏联是否愿意对它一直进行支援，而苏联完全可以根据它在国际政治上的需要而改变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态度。日後的事态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和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从内部发生崩溃之日，正是这种共存体制失去了必要性之时。

注释

[6-1]关于1944年11月12日的“九条政治纲领”的内容，参见《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32页。

[6-2]1945年1月5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4号决议》不仅包括“九条政治纲领”，还包括其它的内容。

[6-3]Saypidin Azizi, “Aslima 2 ［生命之诗（二）］,” Omur Dastani (Beijing: Millatla Naxiriyati, 1990), p. 64.1945年3月13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33号决议》决定任命赛福鼎·艾则孜为教育部部长。

[6-4]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 64.

[6-5]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70页。

[6-6]《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务部暂定工作条例》是根据1945年6月14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务部第27号令》发布的。

[6-7]《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8号决议》，1945年1月16日。

[6-8]Hakim Jappar, “Yaxlarning Uuginix Olgisi Aabdukirim Abasow ［青年们的模范——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26 (1989): p. 199.

[6-9]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第55页称，亚历山德洛夫看到中国政府军援军即将打到伊宁，认为大事不妙，於是将缴获的战利品装上卡车，企图逃回苏联。

[6-10]《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33号决议》，1945年3月13日。

[6-11]根据《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6号决议》（1945年1月1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队的兵种共分为陆军、骑兵部队、炮兵部队、工兵部队；军阶从中将到士兵共分为14个级别，即中将、少将、高级参谋、初级参谋、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中尉、少尉、准尉、上士、下士、上等兵。

[6-12]《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7号决议》（1945年1月15日）全文如下：“伊犁地区内的所有军队将校，均由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任命，至今仍未被政府任命的将校，应尽快办理手续。此事全权

委托给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事部部长亚历山德洛夫。”决定将校升迁和薪水的权力，大尉以下的任命权归军事部部长所有，少校以上的任命权归政府委员会所有。关于其具体内容，参照《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6号决议》，1945年3月1日。

[6-13]《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33号决议》（1945年3月13日）中关于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的职位变动的内容如下："五，根据1945年3月1日的第26号政府决议，内务部部长由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担任。……七，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由于转任内务部，故免去其军事部部长之职。”

[6-14]杨宗禹、李占林：《访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巴索夫夫人吕素新同志纪实》，《伊犁文史资料》，第5辑（1989），第17页。

[6-15]《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36-44页。

[6-16]Turganow Osman, “Kandah Kilip Uq Wilayat Inkilaniga Katnaxkanligim Togrisida Aslima ［关于我是如何参加三区革命的简短回顾］,”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6 (1985): p. 247; Ismailow mahemut, “Uq Wilayat Armiya I-suydung Piyada Polkining Duniyaga Kilixi wa Uning Bisip Otkan yoli Togrisida Aslima ［关于三区民族军绥定第一步兵团的成立及其走过的道路］,”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6 (1985): p. 205.

[6-17]民族军七个团分别如下：绥定第一步兵团、伊宁第二步兵团、伊宁第四预备步兵团、特克斯第一骑兵团、特克斯第二骑兵团、二台第三骑兵团、特克斯达拉第四骑兵团（因为按出身地由各地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组成，故其团名带有地名）；四个独立营分别如下：回族独立骑兵营、蒙古独立骑兵营、迫击炮独立营和警备独立营；独立连为乌苏独立连。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军当时的人数，据Sawdanow Zayir, 5-korpusning Bisip Otkan Inkilabiy Musapisi ［第五军走过的革命历程］ (Urumqi: Xinjiang Halik Naxtiyati, 1989), p. 47，及《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82页，为15,000人左右。但是按照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 82为12,000人左右。

[6-18]Sawdanow Zayir, 5-korpusning Bisip Otkan Inkilabiy Musapisi, p. 89.

[6-19]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 89.

[6-20]Hakim Jappar, “Yaxlarning Uuginix Olgisi Aabdukirim Abasow,” p. 200.

[6-21]《吴忠信日记》，1945年12月21日。

[6-22]由于塔里哈提・穆萨巴约夫逃跑，《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4号决议》（1945年1月5日）决定没收塔里哈提・穆萨巴约夫的全部财产。

[6-23]据《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433-434页记载，法提哈从军队指挥部中被排挤出去以後，担任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尼勒克县的县长。此後，依据《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324号决议》（1946年6月27日），他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灭亡後被任命为伊犁区参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後移居苏联。

[6-24]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第78页中提到，伊力汗・吐烈于1945年2月成为元帅。但事实上是《东突厥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324号决议》（1945年6月27日）决定这件事的，所以伊力汗・吐烈于1945年2月时就任的应该是军队的最高司令官一职。

[6-25]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第78页。

[6-26]《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79号决议》（1945年8月9日）免去了亚历山德洛夫共和国的临时政府委员职务，并同时决定帕里诺夫任临时政府委员。

[6-27]《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33号决议》，1945年3月13日。

[6-28]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第84页。

[6-29]吴豪敏：《锡伯族骑兵连的战斗生涯》（手稿，1991），第24页。

[6-30]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 108.

[6-31]Hakim Jappar, “Yaxlarning Uuginix Olgisi Aabdukirim Abasow,” p. 201.

[6-32]Yasin Hudabardi, “Uq Wilayat Inkelawi Haqqida ［关于三区革命］,”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6 (1985): p. 18.

[6-33]《吴忠信日记》，1944年12月3日。

[6-34]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第6288页。

[6-35]果子沟是位于霍尔果斯县境内塔尔奇（Talichi）山中的高山溪谷地带，长约28公里，乌鲁木齐——伊宁公路从中通过，地势险要。

松树头子、二台大湾、二台三个地方是其要害部位。

[6-36]Топов З. Т, “В борьбе за своьоду,” Hayka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1974), p. 93.

[6-37]《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45页。

[6-38]《吴忠信日记》，1945年2月4日。

[6-39]《吴忠信日记》，1945年2月1日；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287-6310页。

[6-40]Enclosure No.1, to dispatch no.23, dated September 25, 1945, on the subject “Rebel Objectives in Sinkiang” from the American Consulate, Tihwa. C.I.A XL32642-30.在告示中伊力汗·吐烈使用的是军队最高司令官的职务名称，所以可以推测告示是1945年以後出台的。另外，因为其中有“我们已经占领塔尔塔拉等地，并且把国民政府军赶至精河”的内容，所以可以知道此文献是在1945年3月以後写成的。

[6-41]《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56页。

[6-42]白振声、（日）鲤渊信一主编：《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391-392页。

[6-43]Yasin Hudabardi, “Uq Wilayat Inkelawi Haqqida,” p.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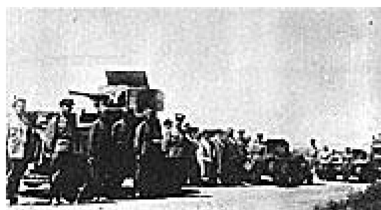
第七章　　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结合点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力扩张的苏联背景

经过在伊犁区的发展阶段，从1945年7月底开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武装进入“三线作战”——在三条战线上向新疆各地全面扩张的阶段。在北部战线，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军队攻入塔城区，于7月28日、29日、31日相继攻下托里县、额敏县以及塔城（也有人按照清代行政区划习惯，称之为塔尔巴哈台）行政区区政府所在地塔城县（今塔城市）；[7-1]到了8月下旬，又进一步向阿山区进攻，[7-2]于9月2日、7日分别夺取了哈巴河县和布尔津县、阿山区区政府所在地承化县（今阿勒泰市）。在中部战线，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军队于9月1日夺取乌苏镇的桥头堡——车排子，8日攻陷乌苏和精河等政府军的重要据点，抵达玛纳斯河西岸。在南部战线，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军队于7月翻越天山山脉，分别于8月14日、25日、9月6日攻陷拜城、库尔干、阿克苏旧城，抵达阿克苏区的区政府所在地阿克苏城下。[7-3]

在这些战斗中，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一共击溃了政府军的12个团、2个营和第二军司令部的直属部队、第四十五师司令部的直属部队；[7-4]俘虏了以精河前线最高指挥官郭岐、师长宛凌云、阿山区专员高伯玉等为首的6,000多名政府军官兵。[7-5]到9月时控制了伊犁区、塔城区、阿山区全境。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胜利，当然是因为拥有强大的兵力和武器。例如，在乌苏与精河的战斗中，虽然政府军在阵地前方埋设了地雷，修建坚固的阵地，挖掘出三米的堑壕後并注水，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军队不仅有装甲车、大炮等重武器，甚至能够出动三架轰炸机，以优势的兵力打败了政府军，[7-6]取得了此次号称为“民族军历史上最大战役”的胜利。[7-7]



民族军在进军中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在各地区同时发起进攻，

让政府军失去相互支援的能力，也是他们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在塔城区和阿山区，过去已经存在由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组成的反政府武装组织。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军队进行正面作战时，在塔城区的和布克赛尔县，由哈萨克族牧民组成的反政府武装已经数次进攻和布克赛尔镇。在新疆东部，哈萨克族牧民的反政府武装组织还截断了从迪化即乌鲁木齐到阿山区的政府军给养补给路线。[7-8]迪化周边的哈萨克族牧民中，也出现了支持阿山区反政府武装组织的活动。[7-9]在新疆南部的塔什库尔干县地区，柯尔克孜族的反政府武装组织也公然向政府举起了反旗。[7-10]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从1945年7月开始的扩大其占领地域的战役，最终呈现出反政府武装与国民政府军进行全面对决的态势。然而很明显，如果仅仅是伊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武装，它根本不具备发动如此大规模战争的军事势力、组织能力、指挥能力以及支持战争的经济实力。

本章追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武装势力从伊犁区向塔城区、阿山区扩张的经过，同时在阐述塔城区、阿山区的民族运动史以及民族主义组织特点和历史的基础上，梳理各地区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组织合并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力的过程，分析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力范围得以顺利扩展的主客观原因。

第一节　“三綫作战”的制定与“1号房子”、“2号房子”

编入民族军序列的苏联红军部队

扩大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统治区域的作战计划，是在民族军建立之後不久制定的。据赛福鼎・艾则孜称，这是一个从伊犁区出发，在北部、中部、南部三条战线上向新疆各地区发起进攻，以攻下新疆省会迪化为目标的庞大的作战计划。[7-11]

但是，“三线作战计划”所设定的目标，仅靠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军事力量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1945年4月8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将各地的反政府武装组织整编为“民族军”，当时“民族军”的总兵力最多也超不过15,000人。而且因为处于战争时期，还必须经常留有5,500兵力来负责“首都”——伊宁的防卫。[7-12]

“为解决对于战争来说最重要的问题”，1945年6月19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下达了征兵命令。按照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于1945年2月3日公布的“兵役法”，20岁至22岁（必要时至45岁）的男子须服三年以上兵役。然而，此次征兵的总数在10个县合计也不过只有500名。[7-13]据1944年的统计，当时伊犁区的人口为471,686人。即使战争迫在眉睫也只能征集区区500人，这说明在满足条件的人都已被动员之後，民间已经没有更多的适龄男子了。

即便能够征集到一定的新兵员，但是无法想像让这些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的人马上直接进行正规战。的确，伊宁建立了军官学校，由苏联红军军官与白俄旧军官任教官训练民族军军官，但应该注意的是，军官学校的建立是在作战已经开始的1945年7月间。[7-14]总之，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发动“三线作战”时，它本身能够动员的兵力最多也不会超过两万人。

然而，当时新疆的国民政府军人数已有约六万人。[7-15]另外，为了增援新疆，又从青海省回族军阀马步芳处抽调了由5,618人组成的骑兵第五军。[7-16]据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在得到这个消息後，由伊力汗・吐烈在2月12日给马步芳写信：“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请求马步芳不要为镇压穆斯林而派遣军队。[7-17]但是，骑兵第五军仍然在1945年6月间进入了新疆。[7-18]也就是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三线作战”是在知道骑兵第五军已经派往了新疆的情况下开始的。

应该说，在清楚双方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制订出的“三线作战计划”，一定是以存在“民族军”之外的兵力为基础而制定的。根据一些亲历这场

战争的人们的回忆，在北部战场与中部战场有一支名为“伊斯哈克别克骑兵旅”的部队十分活跃。[7-19]然而，至少到1945年4月，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军的序列中并不存在“伊斯哈克别克骑兵旅”这支部队。根据被政府军抓获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俘虏招供，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是名为斯喀乌伯的人率领的约3,000人的由苏联中亚地区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组成的骑兵部队。[7-20]“斯喀乌伯”（Su-ka-u-bo）的中文发音非常接近伊斯哈克别克（Isu-hak-bek），由于另外也没有发现其他发音相近的部队名称，所以可以推定，“斯喀乌伯部队”就是“伊斯哈克别克骑兵旅”。换言之，这支自称“伊斯哈克别克骑兵旅”的部队根本不是由新疆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所组成的，而很有可能是一支主要由苏联中亚地区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所组成的部队。

伊斯哈克别克就是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Isakbik Mononow）。他是在新疆南部的乌鲁克恰提（Ulughqat）出生的柯尔克孜族人，当时担任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军第一副总指挥。[7-21]按照人民共和国时代官方的说法，伊斯哈克别克的部队是他自己从新疆南部的塔什库尔干（Taxkurgan）经由苏联领土带来的部队。[7-22]但是，这种单纯的说法，无论是从当时的通讯手段和交通手段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没有任何资料证明新疆境内有过伊斯哈克别克部队、证明伊斯哈克别克之前已经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有着联系等事实来看，都令人难以置信。伊斯哈克别克到达伊宁，是在伊宁起义爆发仅仅九天後的11月16日，而塔什库尔干距离伊宁却有一千余公里之遥。在这里得知伊宁起义发生的情况，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带着3,000人的大部队赶到，考虑到当时新疆的通信和交通状况，要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哈克别克是在苏联人帕里诺夫陪同下进入伊宁的。因此可以断定，“伊斯哈克别克骑兵旅”的出现和参战，明显出于苏联的安排。



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1902-1949）

关于“三线作战计划”兵力中是否具有苏联军人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厉声研究员在前苏联档案中的发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根据这些档案指出，1945年6月，苏联共产党（苏维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为了加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军队，向这里派遣苏联红军500名军官和2,000名士官士兵。同时，火炮及弹药、运输车辆、用于军事联络和指挥的通信设备、大量武器和各种器材源源不断地运到了新疆。一些重要的战斗计划，都是由苏联的部队和临时政府的部队并肩完成的。[7-23]

除了兵力之外，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也没有足以支持这场战争的财力。从1945年5月起，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强制集体收容伊犁区的汉族居民。[7-24]巩乃斯等县的汉族人被迁到察布查尔县，察布查尔县的汉族居民又被迁到惠远。8月6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财政部和农业土地水利部发出联合通知，[7-25]农业土地水利部收割汉族居民留下的农作物，拍卖其菜地和果园，其余土地租给佃农。由此来看，所谓“对汉族居民实行集中管理”，其实不过是为了夺取汉族居民的财产用之于战争的手段而已。

据说，民族军70%的军需由政府的税收支撑，其余的据说是用没收的旧政权时代的银行及贸易公司的财产，以及民众的捐赠等来支付的。关于这一点，还没有找到能够确认的资料，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想像，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数月，就能够用在一个人口仅47万的地区数月间得到的财政收入来支撑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近代化战争。事实是，自1945年就担任民族军的军需後勤部长，并在各地建立其军需补给中心保证了民族军的军需给养补给的人，是一位拥有苏联国籍的人。[7-26]

总之，要想实施“三线作战”，在许多方面必须依赖苏联。因此，能够制定出这样一个关于具体兵力部署和军需後勤物资的详尽作战计划的，除了苏联方面恐无他人。

伊宁的苏联方面最高机关：“1号房子”和“2号房子”

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有关系的苏联人，主要分为临时政府顾问、民族军军官和苏联领事馆三个部分。苏联顾问被分配到临时政府的各部门。从赛福鼎·艾则孜的回忆录可以确认，在伊力汗·吐烈的身边也有一位名为莫合申（Muhshin）的苏联顾问。[7-27]从赛福鼎·艾则孜担心莫合申一旦掌握大权就会招致伊力汗·吐烈的权力扩大化一事来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中的苏联顾问实际上已经参与了政策的

决定和权力的运用。

张大军称苏联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为帕里诺夫。[7-28]的确，帕里诺夫的权力非常之大，直到1946年6月他一直担任民族军的总指挥。在政府军事部长的军衔不过是中校的时候，他的军衔已是中将，而且在直到1945年10月间，他都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唯一的中将。[7-29]但是，帕里诺夫却决不是张大军所说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副主席”。从1945年8月9日的第79号政府决议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只不过是一个政府委员。[7-30]而且在进攻塔城区和发动乌苏攻击战时，帕里诺夫都在最前线担任具体指挥，[7-31]从这点可以看出，帕里诺夫并不是苏联方面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有关人员中的最高负责人。

伊宁的苏联领事馆原是根据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设置的，但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立以後苏联并没有撤消驻伊宁领事馆。根据1949年8月进入伊宁的中共代表邓立群从伊宁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文内容中，可以确认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方面具有很大的发言权。[7-32]但是，这封电报是在苏联关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後的电报，所以不能完全依靠它的内容判断1946年之前苏联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部的政治势力结构。

从赛福鼎・艾则孜的回忆录中可以确定，在伊宁存在着一位负责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问题的苏联负责人。据称，1946年时，以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为首的知识分子团体决定成立“东突厥斯坦革命党”，但是由于苏联顾问强烈反对，“我们决定与苏联共产党直接对话。当时，有人因三区革命经常往来于莫斯科和伊宁之间。有次此人来到伊宁，我陪同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拜访他，毫无保留地对他阐述我们的所有情况。他在听取我们的现状与期望之後，赞成我们的想法，并回答说：‘好，就这样继续（活动）。……你们的愿望我知道了，也就是说莫斯科也知道了。’”[7-33]但遗憾的是，关于此人的真正面目和他在伊宁的工作性质，赛福鼎・艾则孜的文章却闪烁其词，没有直接触及。

在接受笔者采访的许多参加过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人中，许多人都谈到在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期间，伊宁曾经存在过一座被称为“2号房子”的苏联机关。其地址就在伊宁市内的白山河子，旧政权时代的伊犁区警察局的附近。这座宅院的主人是一个被称为“2号”（BTOPOH）的人物。此人非常神秘，因为他平常不与外界的人接触，见过他的人也很少，更是很少人知道他的名字，所以大家给他取了个绰号“白毛”。如果分析番号的意义可以感到，被称为“2号”的“白毛”，很可能就是赛福鼎所说的苏联方面负责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事务的负责

人。

由于维吾尔语对“2号宅院”和“2号”的宅院的表达方法稍有不同，有接受采访者认为“2号”可能只是一个住宅地址号码。但是，在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内部，帕里诺夫又被称为“3号”。由此可知，“2号”并不是一个住宅地址号码。虽然按照一部分接受采访者的解释，帕里诺夫的“3号”可能只是一个绰号，但是“白毛”肯定拥有超过帕里诺夫以上的权力。也就是说，帕里诺夫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绰号，也是因为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苏联势力的指挥系统中，他的权力次于“2号”宅院的主人。

对于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否也存在“1号”的疑问，接受采访者都提出了否定的意见。但是，《新疆三区革命史》提出：“11月下旬，临时政府邀请以弗拉基米尔·科兹洛夫和以弗拉基米尔·斯特潘诺维奇为首的两个军事顾问团来伊宁，代号为1号房子和2号房子，参与临时政府重大政治、军事决策的制定和实行。”[7-34]然而，为什么同时会有两个军事顾问团？如果这是事实的话，二者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关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苏联势力的组织结构，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但是有一点可以得到确认：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武装势力之所以敢于在三条战线上同时发动攻势，从伊犁区向新疆全境发展，得到过苏联方面的同意和支持。《新疆三区革命史》一书虽然没有提出证据，但却明确提出，作战计划是“在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着手拟定”的。[7-35]

第二节　“塔城区解放”与“伊米尔指挥部”

曼苏尔先生与民族主义秘密组织

政府军原本预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武装势力会向新疆首府迪化发起进攻，所以把扼守从伊犁区到迪化方面的交通要道——精河和乌苏作为防卫重点。[7-36]但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军队没有首先进攻东面的精河与乌苏，而是挥师进攻位于伊犁区东北方向的塔城区和阿山区。不久，政府军在新疆北部的防卫体系被完全击溃，被政府军视为收复伊犁和保卫迪化桥头堡的精河和乌苏反被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包围。[7-37]最终，民族军9月7日在“一定数量的苏联红军的步兵、炮兵、装甲车和飞机参战”下攻下乌苏，8日“在苏联军事人员的帮助下”占领了精河。[7-38]

挥师塔城区和阿山区的理由首先应该是胜算在握。有两位非军人政府委员——最高法院院长穆罕默德江・买合苏木（Mahmautjan Mahsum）和教育部长赛福鼎・艾则孜，随着进军塔城区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部队一起行动。两人的任务是在即将解放的塔城区和阿山区筹建新的政府和行政体系。[7-39]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是势在必得，已经事先预料对塔城区和阿山区的军事行动可以取得胜利。

对比精河和乌苏方面的情况来看，这种胜算在握的理由很简单。首先是在这两个地区，政府军布置的兵力较少，相反，却存在着强大的反政府民族主义武装势力。在更深的意义上是这两个地区和伊犁区一样，与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领土相接壤，并且设有苏联领事馆。於是，当然让人会产生联想：这两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反政府势力是否也像伊犁区的“伊宁民族解放组织”和“尼勒克反政府武装组织”一样，与苏联有着特殊的关系？

当时塔城区下属六个县：塔城（Choqak）、额敏（Dorbiljin）、和布克赛尔（Kobuksar）、裕民（Chagantokay）、沙湾（Sawan）和乌苏（Xihu）。据新疆民政厅1944年的调查，其人口总数为170,422人，其中哈萨克族103,180人，维吾尔族10,515人。[7-40]

在塔城区，1944年时陆续出现了反政府的武装组织。7月18日约有800人进攻和布克赛尔镇。和布克赛尔是塔城区通往阿山区的交通要塞，所以当时新疆的最高统治者盛世才不得不向和布克赛尔增派守备部队。7月中旬在额敏也发现反政府的传单。这些“暴民”都是哈萨克族和蒙古族

人，据张大军称，其背後有苏联的关系。[7-41]

关于塔城区的暴动，1944年12月20日的《吴忠信日记》有以下记载："苏联派遣曼苏尔到塔城区建立武装组织，表现出向全新疆扩张的野心。"总之，吴忠信认为塔城区反政府武装势力的形成是苏联推动的结果。果真是这样的吗？为了探明塔城区的民族主义组织和苏联的关系，首先需要关注吴忠信提到的扮演了二者桥梁作用的这位曼苏尔。

苏联出生的维吾尔人曼苏尔·罗兹也夫（Mansur Roziyow），被新疆的少数民族领袖称为曼苏尔先生（Mansur Apandi）。[7-42]虽然以往的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曼苏尔在新疆现代政治史和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史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第四章已经提及，他曾作为苏联政治顾问担任过盛世才政权时期的新疆省维吾尔文化促进会的会长，据说曾给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和加·尼亚孜教授过"民族革命理论"，[7-43]因而招致盛世才的愤怒而被投入监狱，由于苏联领事馆的干涉才于1942年被释放并回到了苏联。[7-44]

曼苏尔回到苏联後，依然致力于新疆的民族运动。当时还有一位与他一起活动、後被任命为塔城区政府秘书长的阿比尔米提·哈吉约夫。在阿比尔米提·哈吉约夫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曼苏尔与塔城区的反政府民族主义秘密组织的关系。[7-45]据说，曼苏尔"为了帮助意图打倒新疆反动政府的新疆民众，以阿布拉·莱姆塞诺夫的假名在中苏边境地带活动"，1944年5月，他与从塔城逃亡到苏联的维吾尔族人哈斯马洪·司马义诺夫一起在苏联境内组织建立起了"伊米尔指挥部"。[7-46]

建立在苏联境内的"伊米尔指挥部"

"伊米尔指挥部"里，除出生於苏联的维吾尔人曼苏尔以外，还有俄罗斯人顾问。[7-47]伊米尔指挥部组织指导塔城区的民族主义组织的秘密活动，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武装势力扩展到塔城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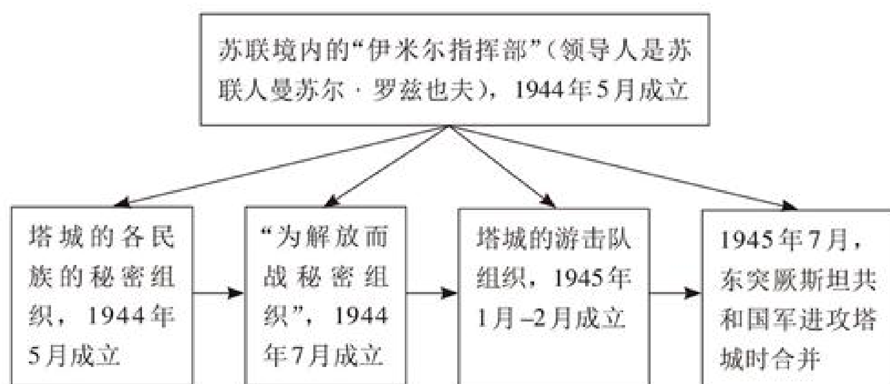
塔城区的民族主义反政府秘密组织由有苏联留学经历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被当地居民称为"塔什干人"最初创立，它也被认为是贯彻苏联领事馆方针的产物。[7-48]1944年在塔城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等各个民族建立起了若干个秘密组织，各自都与"伊米尔指挥部"有着联系。1944年7月，这些秘密组织在曼苏尔的指示下由阿比尔米提·哈吉约夫出面，联合建立了统一的"为解放而战组织"。[7-49]

为接受"伊米尔指挥部"的指示，从1944年7月至11月，"为解放而战

组织”向“伊米尔指挥部”派遣联络员约100次。[7-50]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正值伊宁起义的前夜。据说，“为解放而战组织”与伊犁区、阿山区的武装组织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为解放而战组织”还于1945年初在塔城建立了秘密的武装组织。[7-51]1945年2月，艾比湖地区建立了反政府武装组织游击队。之後，艾比湖游击队击退了政府军的进攻，建立了自己的活动据点；而游击队所用的武器弹药都是由苏联所提供的。[7-52]

“伊米尔指挥部”的活动引起了新疆省政府的注意，在国境线附近设立了监视“伊米尔指挥部”的据点。然而，“伊米尔指挥部”让苏联红军出动，潜入中国境内摧毁了这个监视据点。[7-53]这件事也可以证明，“伊米尔指挥部”根本就不是苏联中亚地区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自发组织（图7-1）。

图7-1　“伊米尔指挥部”和塔城的反政府秘密组织的关系图



来源：笔者制作。

“伊米尔指挥部”是使塔城区的反政府民族主义势力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力联合在一起的最重要因素。据说，是“伊米尔指挥部”和“为解放而战组织”于1945年7月初给民族军发信，请求进攻塔城区，并指示所属的武装组织积极地配合民族军的军事行动。[7-54]

1945年7月31日，以第三骑兵团——团长是拥有苏联国籍的亲苏的白俄人列斯坎——为主力部队的民族军，在苏联籍的总指挥帕里诺夫的指挥下攻下了塔城区首府塔城县城，翌日，曼苏尔带领“伊米尔指挥部”的维吾尔族人从苏联进入塔城区。[7-55]曼苏尔被任命为塔城区的第一副专员，哈斯马洪·司马义诺夫被任命为第二副专员，以他们为首，“伊米尔指挥部”的维吾尔族人几乎都被任命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塔城区各行政部门的负责人。[7-56]这些任命也是一种奖励，它

事实上承认了“伊米尔指挥部”从1943年到1945年的三年间里指挥了塔城区民族主义反政府组织活动的“功绩”。

第三节　“阿山区解放”和“白房子”、“蓝房子”

阿山区哈萨克族的反政府运动

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武装势力向塔城区进军时，阿山区的哈萨克族武装组织也采取行动支援了这场军事行动。当时为劝降而被派往政府军阵地的蒙古族代表就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兵力向政府军的团长做出以下说明：“从伊犁来的部队约2,000多人，军士以上的军官都是俄国人或归化人。除此，还有从（阿山区的）吉木乃县（Jiminay）来的1,000多匪徒，总共超过3,500人。”[7-57]这次军事行动表明，由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武装势力发动的这场战争，已经开始变成了在苏联军队领导下的、新疆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反政府武装联合在一起针对政府军的战争。

从七月末开始，各地战斗越来越激烈。7月29日的第79号政府决议分别任命民族军的二位最高领导人——指挥官帕里诺夫和副指挥官伊斯哈克别克为政府委员和候补委员。进入8月，北部战线的民族军从一个团扩充到三个团。[7-58]8月5日政府在“给各部各机关的第16号命令”中命令动员各部职员入伍，如果兄弟两人就征集一人。但是，在控制塔城区全境以後，帕里诺夫从北部战线率领两个团转移到中部战线的乌苏前线与伊斯哈克别克会合。这意味着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只在北部战线留下了一个团的兵力，占领阿山区的任务大部分就委托给了乌斯满・斯拉木（Osman Islam）和达列力汗・苏古尔巴约夫（Dalalkan Sugurbayow）率领的由阿勒泰的哈萨克族牧民组成的反政府武装组织。



达列力汗・苏古尔巴约夫

“达列力汗指挥阿山游击队千余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军事人员50余人”攻打阿山区首府承化（即今阿勒泰市），[7-59]1945年9月7日，承化被民族军占领。在9月23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关于阿山区的决议》中，开始宣称“阿山区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一部分”。然而我们发现，8月2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所做出的关于“发行胜利国债”的第85号政府决议已经规定了阿山区的发行数额。[7-60]也就是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事前就已预料到了在阿山区的胜利。他们之所以敢这样做，应该是考虑到了在1945年7月时全区七县中已有四个县被哈萨克族反政府武装组织所占领的事实。[7-61]但在那时，阿山区的反政府武装势力中，关于阿山区是否进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力范围之内的问题，并没有做出最後的决定。阿勒泰哈萨克人武装组织领导人达列力汗・苏古尔巴约夫的儿子帕提喀・苏古尔巴约夫在回答笔者采访时指出：“即使民族军的一个团不来，哈萨克族反政府武装组织也有能力解放阿山区”。[7-62]

哈萨克族牧民和新疆省政府的对立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1931年，就有一部分哈萨克族牧民参加了维吾尔族领袖和加・尼亚孜发动的哈密起义，[7-63]之後还有一部分阿山区的哈萨克族牧民支持了盛世才的敌人马仲英。[7-64]在1933-1939年间，为逃避战乱和盛世才政权对哈萨克族牧民的镇压，新疆东部巴里坤县的哈萨克族牧民共计11,680人离开新疆迁移到甘肃境内。[7-65]

发生於1939年的第二次移居甘肃的浪潮，起于盛世才政权的民族镇压政策和收缴枪弹运动。[7-66]而且，这次枪弹收缴运动也成为阿山区的哈萨克族牧民发动“可可托海暴动”（Koktokay　Kozgilingi）的诱因。[7-67]“可可托海暴动”在1940年和1941年曾经爆发过两次，最终都因盛世才政权表示让步而与盛世才妥协。[7-68]尽管哈萨克族牧民占到了阿山区七县总人口的85%，[7-69]但“可可托海暴动”只是“为了保卫生命和利益而发起的反抗运动”，没有发展成为民族独立的战争。[7-70]

从“阿山哈萨克民族复兴委员会”到“阿山民族革命临时政府”

1941年的“可可托海起义”中，有两位哈萨克族领导人拒绝与盛世才政权妥协，一位是率领十几个部下进入准噶尔戈壁的乌斯满・斯拉木，另外一位是当时的承化县副县长达列力汗・苏古尔巴约夫。[7-71]由于这两个人的存在，阿山区哈萨克族牧民的反政府运动的性质得到了彻底改变。

盛世才逮捕了乌斯满的家人，数次逼迫乌斯满投降就范，但都遭到了乌斯满的拒绝。[7-72]1942年7月14日，乌斯满在各地发出布告，向哈萨克族牧民宣称“自从落入汉族之手以来，他们把我们的鲜血、生命、土地全部夺走，我们反对汉族靠近我们，从苦难中拯救我们哈萨克族兄弟姐妹，我们必须自己管理自己的土地”。



乌斯满・斯拉木（？-1951）

1943年12月中旬，乌斯满在青河县的布尔津河上游的根据地成立了由25人组成的“阿山哈萨克民族复兴委员会”，自己担任委员长。并将其政治主张总结为以下八条：

（1）争取自由，挽救哈萨克族的危机；

（2）阿山区东部各县由哈萨克族人自己管理；

（3）阿山区组织哈萨克族军队；

（4）释放被捕的人；

（5）禁止政府随便动用牧民的牲畜；

（6）取消苛捐杂税；

（7）阿山区禁止汉族人居住，不许汉族军队驻紮；

（8）从前做亲善的邻居国家仍要用土产换布匹，迅速运到此地，并准许商人经商。[7-73]

到1944年初，乌斯满实际控制了青河县、可可托海县和布鲁尔托海县。就在这种形势下，达列力汗在1944年6月从外蒙古回到青河，与乌斯满联合，7月至9月在各县发动了起义，并掌握了除布尔津（Burjin）以外阿山区各县的大部分地区。[7-74]10月，“阿山民族革命临时政府”在青河成立，[7-75]乌斯满任主席，达列力汗任副主席兼武装组织总指挥。从此，阿山哈萨克族牧民反抗政府运动的性质从反对压迫、反对剥削迅速转向了反对汉族统治的民族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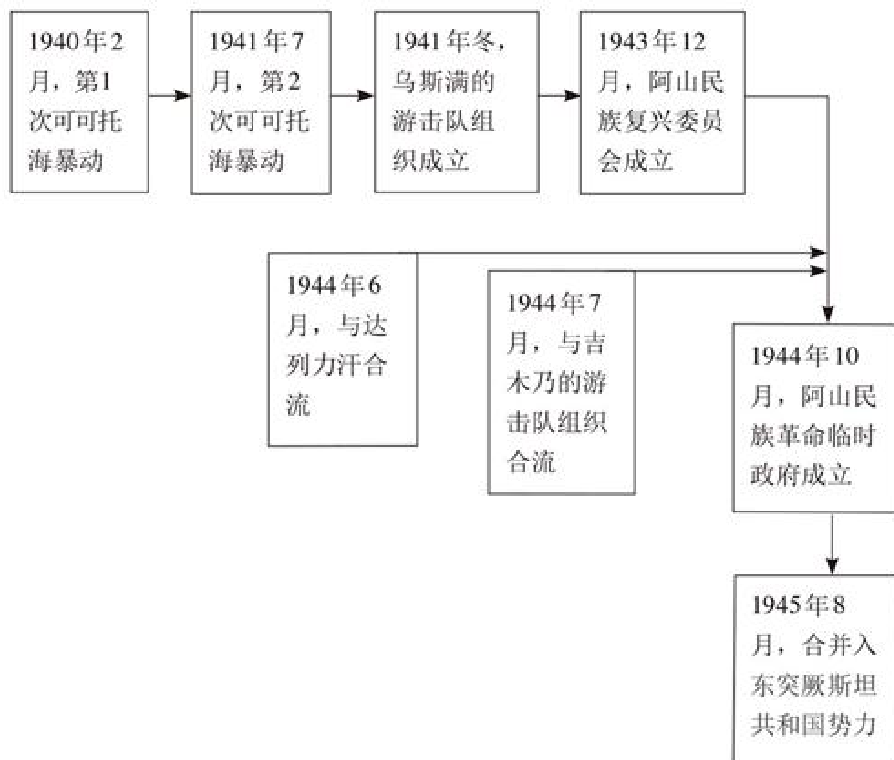
在由乌斯满和达列力汗所领导的运动性质转变的过程中，苏联及外蒙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1941年失踪的达列力汗实际上是在苏联驻阿山副领事的策划下，一个人到苏联接受政治、军事训练。[7-76]1943年时，乌斯满也能从苏联“购买”武器，外蒙古也亲自派代表承诺与乌斯满建立友好关系并开始支援武器弹药。蒙古为乌斯满的部队提供避难地和训练基地，还向其管理下的哈萨克族游牧民提供牧场，所以，乌斯满就以中蒙边境地带作为根据地与政府军周旋对抗。[7-77]《新疆三区革命史》甚至提到，1944年4月下旬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乔巴山等军政领导人在中蒙边界地区会见了乌斯满，答应在枪支弹药、通讯器材和参谋人员方面对乌斯满部进行大力支援。[7-78]

“乌斯满和达列力汗率领的武装力量在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援助下日益强大。”[7-79]阿山地区的民族运动前後经过三个阶段逐渐联合在一起（图7-2），从这些联合过程中也可以看出苏联以及外蒙与阿山民族运动之间的联系。第一阶段的联合，即达列力汗和乌斯满的联合，开始源于双方具有共同的接受苏联和外蒙古支援的背景。与达列力汗同行进入乌斯满的根据地的是14名苏联顾问和外蒙古顾问。[7-80]作为暗号称呼，苏联顾问和外蒙古顾问分别被称作“白房子的人”（Ak Uyning

Adamliri）和“蓝房子的人”（Kok Uyning Adamliri）。[7-81]

第二阶段的联合，是青河的武装组织与吉木乃的武装组织的合并。这两个组织成为阿山区民族运动的两个起源，但是其行动方式上却各有特点。在青河县及其周边活动的武装组织主要是领导人通过部族来动员哈萨克族游牧民，[7-82]而吉木乃的武装组织则没有使用这样的动员手段。这种差异是因为组织领导人具有不同出身。青河的武装组织的领导权由乌斯满、达列力汗等哈萨克族人掌握，而吉木乃的武装组织的领导人是一位维吾尔族人。哈萨克与维吾尔虽然同为突厥系伊斯兰民族，但是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以农业为主的维吾尔社会里不存在部族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尽管吉木乃的武装组织中有大量的哈萨克族成员，然而其领导人却没有部族的背景。

图7-2　阿山的哈萨克族民族武装势力发展略图



来源：笔者制作。

但是，与青河县接壤外蒙古一样，吉木乃县也属于一个与苏联接壤、通往苏联交通便利的边境地区。[7-83]吉木乃的武装组织的维吾尔

族领导人同时也属于前述设在苏联境内的“伊米尔指挥部”，[7-84]该武装组织在1944年8月进攻吉木乃镇失败以後，曾组织吉木乃的牧民暂时移居到了苏联境内。[7-85]当时，苏联和外蒙古都对武装组织无条件地开放了边境。

吉木乃武装组织的维吾尔族领导人最後也进入到“阿山民族革命临时政府”中，而来自苏联和蒙古的顾问——“白房子的人”、“蓝房子的人”也出席了在1944年10月上旬召开的“阿山民族革命临时政府”成立大会（表7-1）。[7-86]这再次说明，无论是在这两个民族主义武装组织实现联合的过程中，还是在“阿山民族革命临时政府”成立的过程中，苏联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表7-1　阿山民族革命临时政府的组成成员

姓名	民族出身	职务	代表地域
乌斯满·斯拉木 （Osman Islam）	哈萨克族	政府主席	
达列力汗·苏古尔巴耶夫 （Dalalhan Sugurbayow）	同上	政府副主席、军事总指挥官	
拉提夫·穆斯塔法 （Latip Musutapa）	同上		青河县
科克赛干·恰阔夫 （Kok sagan Chakow）	同上	法院院长	同上
瓦特甘·阿穆尔 （Watkan Amur）	同上		同上
阿迪尔坎 （Adilkan）	同上		可可托海县
加马尔 （Kamal）	同上		同上
艾斯哈特·麦盖伊 （Ashat Makay）	同上		承化县
吉列斯 （Kilis）	同上		不明
卡力普 （Kalip）	同上	政府安全部长	布鲁尔托海县
拉马赞 （Ramazan）	同上		吉木乃县
毛拉·伊斯拉姆·伊斯马伊尔 （Molla Islam Ismayil）	维吾尔人	吉木乃武装组织的领导人	同上

来源：笔者据《阿勒泰的“革命临时政府”的成立及其他》第179页等制成。

进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势力范围

在1945年9月合并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力范围以前，阿山区的民族运动并没有举起“东突厥斯坦独立”的旗号。作为其原因，首先可以举

出的是达列力汗・苏古尔巴约夫之子帕提喀・苏古尔巴约夫曾向笔者说过的一句话："在我们哈萨克族人头脑中并没有东突厥斯坦这样的概念"。另一个原因是阿山区的反政府武装组织在1945年8月上旬前独自进行反抗政府的活动，与伊犁区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没有发生过直接的联系。实际上，阿山区哈萨克族发起的民族运动发生在伊犁区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前，"阿山民族革命临时政府"的成立时间也比"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更早一些。而且，在1945年9月并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力范围以前，阿山区的武装组织就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尤其是乌斯满和达列力汗的部队在1945年夏季之前已经占领了阿山区东部的四个县，还数次进攻了阿山区区政府所在地承化县城。[7-87]

1945年8月，吉木乃的武装组织与从塔城区前来进攻吉木乃县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力会合。这次会合被哈萨克族人意味深长地定义为"来到阿山区的伊犁革命军与阿山革命军的首次联系"。9月3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部队与正在攻打承化县城的达列力汗的部队会合。但是哈萨克族人一直强调：当时来到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兵力仅仅195人，或不到200人。[7-88]



达列力汗・苏古尔巴约夫和阿勒泰民族军成员在一起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後期的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也认为阿山区哈萨克族人发起的民族运动要先于伊犁区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而且两者的起源也不同。“我们的确发起民族革命，这个革命最初是在阿山区爆发的。由于独裁的、吸取民众鲜血的统治者的残暴行为，在伊犁区也爆发革命，塔城区的民众加入其中。伊犁、阿勒泰两个地方的民族部队最後合并。”[7-89]

1946年9月，在苏联顾问和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的陪同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主席伊力汗·吐烈首次访问了阿山区，并在承化召开了共和国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宣布“阿勒泰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一部分”，并公布了关于阿山区政府的人事安排。[7-90]由此，拥有与维吾尔族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甚至本来没有东突厥斯坦这一意识的哈萨克族被纳入到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力的旗帜下，尽管他们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立很早以前就已经发起了民族运动，甚至建立了自己的临时政府。

与第一、二阶段以哈萨克族为中心的联合不同，阿山区反政府运动第三阶段的联合实际上是以维吾尔族人为中心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力吸收了阿山区哈萨克民族运动势力。这也成为以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力内部分裂的诱因之一。毫无疑问，如此复杂的联合过程之所以能够得到实现，就是因为各种势力的背後都有着苏联的因素。与塔城区的人事安排模式相同，就任阿山区第一副专员的阿尔甫拜·阿里木江（Arupbay Alimjan）原是“白房子”的人。换言之，就是一位长期以来指导当地民族武装组织进行活动的苏联顾问。[7-91]

小　结

本章确认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中的“1号房子”和“2号房子”、塔城区反政府活动中的“伊米尔指挥部”、阿山区反政府活动和民族运动中的“白房子”和“蓝房子”的存在及其指导地位。通过以上可以确认，塔城区、阿山区的反政府活动和民族运动的发展以及伊犁区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力向这两个地区的扩展，都是利用了国境地带的地域特点以及在人事、军事和财政各个方面得到了苏联有组织的指导和支持而得以实现的。

各地的反政府活动和民族运动中，的确都有拥有留学苏联经验的人出现。然而，包括这些留苏学生在内，运动的领导层都决不是共产主义者，由他们建立的组织，其性质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反政府活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组织。尽管各地的反政府活动和民族运动组织不一定都会赞成苏联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然而，要想通过武力对抗中国的统治以达

到民族运动的目的，来自国外的支援又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各地的民族主义反政府组织能够接受苏联的领导、甚至是积极寻求苏联支援的理由就在于此。

但是，通过追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力各个发展阶段的全貌可以看出，苏联对新疆突厥系伊斯兰民族运动的渗透程度的确令人震惊。可以说，如果不是苏联进行指导，就没有各地的民族运动势力的联合；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援，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势力就无法得到扩张，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队的胜利是由苏联的部队所保证的。"[7-92]但是应该注意到，在这个时期，彻底摧毁了苏联当年在新疆辛辛苦苦构建起来的特殊地位的盛世才已经离开了新疆。所以说，苏联支持民族运动的目的，已经不单单是为了摧毁盛世才的新疆政权，而是为了摧毁中国国民政府对于新疆的统治。

然而，虽说在摧毁中国政府对新疆的统治这一政治目标上，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的民族主义组织可以与自我标榜为共产主义国家的苏联找到共同的语言，但是因为苏联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并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所以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性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策制定，甚至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命运，无法摆脱苏联势力的左右，最终成了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注释

[7-1]Saypidin Azizi, "Aslima 2 ［生命之诗（二）］," Omur Dastani (Beijing: Millatla Naxiriyati, 1990), p. 97.周东郊：《新疆十年》（钢板油印版，1948），第207-208页。另根据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335-6343页，民族军对塔城的攻击情况如下：7月18日切断乌鲁木齐到塔城的道路，20日占领道路的重要据点庙儿沟和汉三台，22日大举进攻，29日攻陷额敏，31日塔城区的专员和驻扎部队的团长带领政府官员和士兵从驻地塔城县城退往苏联境内。8月2日从塔城县城到阿山区途中必经的和布克赛尔镇被攻陷，驻扎在和布克赛尔县政府所在地果斯托洛盖镇的政府军团长于8月22日弃城逃往乌鲁木齐。

[7-2]阿山区解放的经过，各文献略有不同。本章主要参考《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121-127页。

[7-3]关于民族军进军新疆南部的经过，本章主要依据Sawdanow Zayir, 5-korpusning Bisip Otkan Inkilawiy Musapisi ［第五军走过的革命里程］ (Urumqi: Xinjiang Halik Naxriyati, 1989), pp. 90-95.在不同文献中，各地陷落日期略有不同。例如，陈力：《伊犁事变记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影印版），第36页认为拜城是8月11日、阿克

苏旧城是9月6日陷落的。

[7-4]这是根据Saypidin Azizi, “Aslima 2,”pp. 55-89.在北部战线，塔城区的额敏县、塔城县、和布克赛尔县有三个团，阿山区的布尔津县有一个团，承化县有两个团；在中部战线，精河有四个团和第四十五师直属部队，乌苏有两个团和第二军司令部直属部队；在南部战线，拜城县、阿克苏老城各有一个营。

[7-5]这个数字是根据《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101-128页，及Sawdanow Zayir, 5-korpusning Bisip Otkan Inkilawiy Musapisi, p. 41推测而来的。具体清单是塔城区1,100人，阿山区1,846人，精河和乌苏战斗中是3,000人，阿克苏区是220人。

[7-6]关于精河和乌苏的战斗经过，本章主要参照了《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85-96页。但据陈力：《伊犁事变记略》，第32页所述，在精河和乌苏有政府军的第四十五师的两个团，暂编第三师的三个团，预备第七师的两个团，骑兵第一师的两个团，特务团的一部，坦克部队的一部，总兵力约两万人左右。根据当时作为民族军士兵直接参加精河和乌苏战斗的吴豪敏：《锡伯骑兵连的战斗生涯》（手稿，1991），第37页所述，战斗後伊犁第二步兵团的政治部主任这样概括精河和乌苏的战斗：“这次精河战斗和乌苏战斗是帕里诺夫和伊斯哈克别克将军亲自指挥的。我军参战部队除了伊犁步兵第二团外，还有伊斯哈克别克将军亲自指挥的骑兵旅一部。特克斯第一骑兵团，伊犁第四团等约4,000人。而且两架轰炸机也从空中支援作战。”另外，根据当时政府军的无线电技师佟沛：《国民党军队乌苏溃退记》，《昌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5），第58页所述，由于战斗中每天都有三架轰炸机轰炸政府军的阵地，阵地大部分被摧毁，许多政府军士兵死亡。一位当年参加战斗者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飞机是苏联的，仅仅是涂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标志而已。

[7-7]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80页。

[7-8]因为也在迪化周边展开了游击战，新疆省政府主席吴忠信估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力将会进攻迪化。蒋介石也命令他：“迪化附近工事，尤其原飞机厂及各飞机场，应着手从速防御工事，务使勿失为要。”见《吴忠信日记》，1945年12月3日。据说吴忠信曾经抱着赴死的决心对部下说，为保卫国家而战死是光荣的。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767页。1945年4月中旬，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调整了新疆军事，不仅是为了收复伊犁和支援塔城地区和阿勒泰地区，主要为

了保卫乌鲁木齐，将防卫的重点放在了精河和乌苏。以上见《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84页。

[7-9]据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320-6321页所述，当时在奇台县的政府军指挥部得到了情报说，南山区的哈萨克人区长扎拉班与乌斯满游击队的干部召开共同会议，决定将奇台县的所有哈萨克人迁移到阿山区，并参加乌斯满的革命行动。

[7-10]塔什库尔干的起义，是由当地的吉尔吉斯人和塔吉克人等伊斯兰居民发起的。关于此次起义，在Sawdanow Zayir, 5-korpusning Bisip Otkan Inkilawiy Musapisi, pp. 102-107的“Taxkorgandiki Partizan Urux”（塔什库尔干的游击战）一节以及在Saypidin Azizi, “Aslima 2,”pp. 136-166的“Taxkorgan Inkilawiy”（塔什库尔干革命）一节中有详细记载。

[7-11]据赛福鼎·艾则孜所言，作战计划如下：“切断从乌鲁木齐和精河到塔城地区和阿勒泰地区的通路，解放塔城和阿勒泰地区。控制从伊犁地区到新疆南部的各山路，解放［新疆南部的］焉耆与阿克苏［Ahsu］等地区。与塔什库尔干方面的游击队会合，破坏从喀什到和田［Hotan］的道路，威胁喀什及和田等地。在乌苏、玛纳斯、精河、吐鲁番［Turpan］等地加强武装游击活动，威胁来自乌鲁木齐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通道，将前线推进到玛纳斯河一线，最终解放乌鲁木齐。”见Saypidin Azizi, “Aslima 2,”p. 85.

[7-12]《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89-90页。

[7-13]其详细人数为：“（一）伊宁县220名，（二）绥定县40名，（三）霍尔果斯县40名，（四）博尔塔拉县50名，（五）温泉县20名，（六）克孜尔科尔（特克斯县）40名，（七）昭苏县40名，（八）特克斯达拉县50名，（九）尼勒克县20名，（十）巩乃斯县20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关于征兵的命令》，1945年6月1日。

[7-14]《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104页。

[7-15]1944年12月那时新疆的政府军包括中央军和盛世才时期的军队。“新疆现有中央军四个师［第四十五师，第四十六师，第一二八师，第七预备师］，共26,350人。”见《吴忠信日记》，1944年12月6日。盛世才时期的新疆省军为六个师、四个保安团、一个炮兵团、一个特务团、一个坦克营，共计34,000人（第一二八师约8,000人，暂编第三师8,000人，第一骑兵师3,000人，第二骑兵师3,000人，第十一骑兵师3,000人，第十二骑兵师3,000人，四个保安团3,000人，一个炮兵团

3,000人，特务团1,500人，坦克营300人）。以上见陈力：《伊犁事变记略》，第15页。

[7-16]1945年1月25日，蒋介石命令青海回族军阀马步芳向新疆派遣两个师。见《吴忠信日记》，1945年1月25日。马步芳在2月8日发电通知吴忠信将派遣骑兵第五军。根据电报，骑兵第五军"有官兵5,618人，马6,230匹。"《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70页。骑兵第五军本是马步芳的兄长马步青的部队，後被马步芳吞并。以上参见王继善：《马呈祥在新疆》，《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9辑（1985），第65页。

[7-17]《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70页。

[7-18]骑兵第五军进入新疆的日程根据韩有文：《"北塔山事件"及其经过》，《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85），第100页。骑兵第五军由第五师和暂编第一师组成，当时，韩有文任暂编第一师师长。

[7-19]吴豪敏：《锡伯骑兵连的战斗生涯》。

[7-20]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548页："斯喀乌伯部（苏俄哈萨克族，称为将军），其部队系苏俄、哈、柯、乌等民族组成，骑兵团约3,000人，枪马齐全，附有重机枪，迫击炮，小炮、山炮、战防枪及手提机枪等甚多，并每兵有战刀一把。名义上为伊伪部队，据判断系以红八团为基干而改编者，自精河战役後，行踪不明。"

[7-21]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1933年参加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其後接受苏联的援助成立吉尔吉斯人部队，致力于扑灭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7年马仲英的部下马虎山在和田叛乱时，他率领从苏联来的吉尔吉斯骑兵部队成为镇压的先锋，为盛世才政权的维持立下功劳。随後他被任命为乌鲁克恰提设治局长（地区最高行政长官）。1940年转任"新疆哈萨克柯尔克孜文化促进会"会长。1941年逃亡苏联。之後，他在苏联境内训练游击队，1944年10月组织了新疆南部的"塔什库尔干暴乱"（蒲犁革命）。1944年11月16日，他与苏联人帕里诺夫一起率领部队进入伊宁，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武装力量拿下海兰巴克机场攻击战和伊犁区做出了巨大贡献。以上参见Saypidin Azizi, "Aslima 2,"p. 69及《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40页。1945年4月8日，伊斯哈克别克以少将军衔就任民族军第一副总指挥，与中将军衔的民族军总指挥苏联人帕里诺夫一起指挥三线作战，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力的扩大做出很大贡献。1945年10月14日，依据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委员会第107号决议晋升为中将，1946年6月帕里诺夫回苏联後，就任民族军总指挥。

[7-22]Saypidin Azizi, “Aslima 2,”p. 69.《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40页。

[7-23]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日文版，第149页。

[7-24]1945年5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决定发布命令将伊犁区的博乐县、特克斯县、尼勒克县、巩乃斯县的汉族居民全部迁入察布查尔县；将察布查尔县、绥定县、霍尔果斯县、伊宁县的汉族居民迁入惠远，并允许汉族居民迁回中国内地。以上参见《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87页，及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伊力汗·吐烈的布告。

[7-25]《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111页。

[7-26]民族军在伊宁、精河、乌苏、沙湾、额敏、阿勒泰、霍尔果斯、特克斯、特克斯达拉、绥定等各地均设有补给中心。此据佚名：《民族军的供应和後勤工作的情况》（未出版，1959），第112-114页。

[7-27]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 97.

[7-28]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532页。

[7-29]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将军总共只有三名。除了帕里诺夫，其他两人是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少将（1945年10月14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07号决议》晋升其为中将）和1945年9月任命的达里力汗·斯古尔巴约夫少将。

[7-30]帕里诺夫和伊斯哈克别克由1945年8月9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79号决议》任命为政府委员和候补委员。

[7-31]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 95.

[7-32]邓力群在1949年9月11日发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关于去迪化会见国民党军政当局有关事宜》的电文中写道：“中央：关于我的乌鲁木齐之行，与友人、伊犁当局商谈的的结果如下：……”。“友人”就是驻伊宁的苏联领事，在此我们可以看出苏联领事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具有影响力。见中共中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新疆和平解放》（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第225页。

[7-33]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 115.

[7-34]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史》，第44

页。

[7-35]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史》，第71页。

[7-36]《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84页。

[7-37]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526页。

[7-38]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史》，第79-80页。

[7-39]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 95.

[7-40]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326-6327页。

[7-41]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328-6330页。

[7-42]Hawir Tomur, “Hoja Niyaz Haji Togrisida Aslima ［回忆和加·尼亚孜］,”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2 (1983): p. 26.《新疆三区革命史》称此人真名为阿不拉·热玛扎诺夫。见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史》，第28页。

[7-43]Hawir Tomur, “Hoja Niyaz Haji Togrisida Aslima,” p. 26.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708页。

[7-44]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 98.

[7-45]Abilmit Hajiyow, “Uq Wilayat Inkilawining Aldi-kayindiki Tarbagatay ［三区革命前後的塔城］,”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26 (1989): p. 35.

[7-46]“伊米尔”（Imir）是从塔城地区的托尔比里津流向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阿拉湖（Oziro Alakol）的河流名称，其中一段是中苏国境线。

[7-47]Abilmit Hajiyow, “Uq Wilayat Inkilawining Aldi-kayindiki Tarbagatay,” p. 35.

[7-48]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 479.

[7-49]Abilmit Hajiyow, “Uq Wilayat Inkilawining Aldi-kayindiki Tarbagatay,” pp. 8-14.

[7-50]Abilmit Hajiyow, “Uq Wilayat Inkilawining Aldi-kayindiki Tarbagatay,”, p. 15.

[7-51]Abilmit Hajiyow, “Uq Wilayat Inkilawining Aldi-kayindiki Tarbagatay,” pp. 20-21.

[7-52]哈吉耶夫：《三区革命中塔城的地下活动和武装斗争》，《伊犁文史资料》，第4辑（1998），第38页；《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93页；Abilmit Hajiyow, “Uq Wilayat Inkilawining Aldi-kayindiki Tarbagatay,” p. 29.

[7-53]Abilmit Hajiyow, “Uq Wilayat Inkilawining Aldi-kayindiki Tarbagatay,” p. 22.

[7-54]Abilmit Hajiyow, “Uq Wilayat Inkilawining Aldi-kayindiki Tarbagatay,” pp. 28-32.

[7-55]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p. 96-98.

[7-56]《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流动会议决议》，1945年8月6日。

[7-57]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341页。

[7-58]《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106-107页。

[7-59]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史》，第77页。

[7-60]《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85号决议》规定的“胜利国债”的发行额为伊犁地区一亿五千万，塔城地区一亿，阿勒泰地区五千万。

[7-61]阿山区由阿勒泰县（Altay）、可可托海县（Koktokai）、布尔津县（Borjin）、吉木乃县（Jimniy）、卡巴县（Kaba）、布鲁尔托海县（Burultokai）、青河县（Qinggil）共七个县组成。当时，被哈萨克人反政府势力控制的是可可托海县、吉木乃县、布鲁尔托海县、青河县。

[7-62]哈提汗・苏古尔巴约夫生於1927年，14岁时跟随父亲加入游击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作为新疆哈萨克人的代表从1955年9月到1968年9月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第三、四届副主席，现在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其夫人是在1937-1938年盛世才的第一次大清洗中被杀害的阿勒泰行政区秘书长曼卡依（Mankay）的女儿。

[7-63]Kurban Ali Ospanow, “Barikol Wakaliri Tohursida Aslimilar［关于巴里坤事件的真相］,”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8 (1986): p. 128.

[7-64]包尔汗：《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4），第204-206页。

[7-65]这个数字是参考苏北海、李秀梅：《在盛世才残酷统治下，新疆哈萨克族逃迁甘肃、青海及国外的经过》，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吉回族自治洲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昌吉哈萨克族的变迁》（昌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吉回族自治洲委员会，1989），第46-65页得出的。另外，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概况编写组编：《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概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第49页为大约15,000人；何俊芳：《民国时期哈萨克族向甘肃的迁徙》，《西北史地》，第1期（1989），第17页为10,579人；祁向阳：《新疆哈萨克族东迁甘青记略》，《昌吉文史资料选集》，第4辑（1986），第88页为9,455人。20世纪30年代巴里坤县哈萨克游牧民向甘肃迁移有两次高潮，即1935年到1936年间的第一次高潮和1938年末到1939年初的第二次高潮。关于本次移民，本书主要参照了Kurban Ali Ospanow, “Barikol Wakaliri Tohursida Aslimilar,” pp. 127-169；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哈萨克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未出版，1963），第42-43页；《哈萨克族简史》编写组编：《哈萨克族简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第231页；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概况编写组编：《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概况》，第46-51页；库勒巴提：《哈萨克族东迁甘肃》，《奇台县文史资料》，第26辑（1990）等。

[7-66]Kurban Ali Ospanow, “Barikol Wakaliri Tohursida Aslimilar,” p. 137.

[7-67]阿勒泰的哈萨克人起义是由可可托海县的哈萨克人部族首先发起的，因此被称作“可可托海起义”。

[7-68]在盛世才释放被逮捕的起义者、撤消警察局、不追究起义领导者责任以及停止没收武器等条件下，1941年的第一次阿勒泰哈萨克族起义终于平息。参见Muqash Jakeugli, “Xaripqan Ogdayup Tohursida Aslima［关于夏力甫汗·奥格太的回忆］,”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8 (1986): pp. 99-100.但是由于盛世才没有遵守约定，1941年又发生了第二次暴乱。由于残酷的镇压以及起义者内部产生纠纷，在与盛世才约定不追究领导者责任的前提下，起义者交出武器与盛世才妥协。“Koktokai Kozhulingi Tohursida Yadimda Kalhan Bazi Ixlar［关于可可托海起义的若干回忆］,”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8 (1986): pp. 122-124）。

[7-69]根据新疆省警务处中华民国三十二年的调查，阿勒泰地区的

人口总数当时是63,040人。其中哈萨克男性27,469人，哈萨克女性25,883人。参见陈澄之：《新疆伊犁事件之分析》，《新中华》副刊，第4卷，第11期（1946），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新疆历史资料集》，第5辑，影印版二版，第131-138页。

[7-70]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5198、4345页。

[7-71]Haji Nabi Walyow, “Abaq Kari Halipning Tarih Ahwali［阿巴克·凯列（部族）的历史事件］,”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8 (1986): pp. 56-57.

[7-72]Haji Nabi Walyow, “Abaq Kari Halipning Tarih Ahwali［阿巴克·凯列（部族）的历史事件］,”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8 (1986): pp. 58-60.

[7-73]关于“阿勒泰哈萨克民族复兴委员会”的成立时期，据《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427页称，是1943年12月中旬。但是，Kadis Janabil, “Altay Wilayiti Inkilawi Kuruxi wa Dalelhan Sugurbawef［阿山区的革命斗争和达里力汗·苏古尔巴约夫］,” Yingi Junggo Kurux Yolida Kurban Bolganlar (Urumqi: Xinjiang Halik Naxiryati, 1991), pp. 152-172等，认为是1944年4月。

[7-74]莎列吾西：《回忆爷爷达列力汗二三事》，《伊犁文史资料》，第3辑（1987），第71页。

[7-75]关于政府的名字，在笔者的采访中，哈提汗说是“阿勒泰民族革命临时政府”。但“阿勒泰革命临时政府”这一说法也在当事者的回忆文章中屡屡出现。例如Ashat Makay, “Altay Wakitlik Hukumiti Ning Kuruluxi wa Baxkilar［阿勒泰的“革命临时政府”的成立及其他］,” Yingi Junggo Kurux Yolida Kurban Bolganlar (Urumqi: Xinjiang Halik Naxiryati, 1991), p. 179.

[7-76]在笔者的采访中，哈提汗明确了达列力汗当年逃亡苏联的过程：“达里力汉首先通过住在阿勒泰的苏联塔塔尔人艾山与苏联驻阿勒泰领事馆取得联系，伪装後秘密进入领事馆。然後，鞑靼人副领事亲自制定计划，把达列力汗装进一个没有底的桶中，再装上苏联地下资源勘察队运送汽油桶的卡车，1941年10月10日经由吉木乃边境送到苏联。”关于达列力汗逃亡苏联的具体日期有很多说法。据卡迪斯·贾那比尔说是9月26日（Kadis Janabil, “Altay Wilayiti Inkilawi Kuruxi wa Dalelhan Sugurbawef,”p. 157），而达列力汗的孙女则称是在1941年2月（莎列吾西：《回忆爷爷达列力汗二三事》，第71页）。但都提到是在苏联领事

馆的帮助下经吉木乃边境流亡到了苏联的。

[7-77]Ashat Makay, “Altay Wakitlik Hukumiti Ning Kuruluxi wa Baxkilar,”p. 180.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史》，第21-22页。

[7-78]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史》，第21-22页。

[7-79]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史》，第76页。

[7-80]在笔者的采访中，哈提汗明确了外蒙古的顾问都是苏联人或是外蒙古的哈萨克人。关于此点，另外参照了张国杰：《从反清斗争到三区革命——阿勒泰历史调查》，《新疆历史研究》，第1期（1987），第79页。

[7-81]Haji Nabi Walyow, “Abaq Kari Halipning Tarih Ahwali,” p. 66.

[7-82]特别是达列力汗（他本人也是部族首领），经常使用通过部族首领来动员游牧民的手段。他在回阿勒泰之前给各部族首领写信，呼吁得到各部族的帮助（Ashat Makay, “Altay Wakitlik Hukumiti Ning Kuruluxi wa Baxkilar,” pp. 175-176）。为了获得兵力和孤立政府军，他在1944年9月通过部族首领将阿山县、布尔津县、布尔托海县的游牧民都迁移到了青河县（Kadis Janabil, “Altay Wilayiti Inkilawi Kuruxi wa Dalelhan Sugurbawef,” pp. 160-161），并且规定成为革命临时政府委员会成员的条件为：本人是能够代表各县、各部族的首领（Ashat Makay, “Altay Wakitlik Hukumiti Ning Kuruluxi wa Baxkilar,” pp. 178-179）。

[7-83]从吉木乃城到苏联的斋桑市只有50公里，两地之间有公路，国境也只是一条小河。从青河城到外蒙古国境有60公里。周东郊：《阿山区概况》，《新疆论丛》，创刊号（1947），该文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新疆历史资料集》，第5集，第343-344页。

[7-84]Abilmit Hajiyow, “Uq Wilayat Inkilawining Aldi-kayindiki Tarbagatay,” pp. 12-13.

[7-85]Kadis Janabil, “Altay Wilayiti Inkilawi Kuruxi wa Dalelhan Sugurbawef,” p. 160.

[7-86]Ashat Makay, “Altay Wakitlik Hukumiti Ning Kuruluxi wa

Baxkilar," p. 178.

[7-87]张国杰：《从反清斗争到三区革命——阿勒泰历史调查》，第79页。

[7-88]Kadis Janabil, "Altay Wilayiti Inkilawi Kuruxi wa Dalelhan Sugurbawef," p. 163. Ashat Makay, "Altay Wakitlik Hukumiti Ning Kuruluxi wa Baxkilar," p. 185.

[7-89]阿合买提江：《在伊宁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人民俱乐部的讲话》，1946年8月24日，未出版。

[7-90]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 105.

[7-91]《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关于阿山专区的决议》，1945年9月23日。

[7-92]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49页。

第八章　　国际政治游戏和“共和国”的悲剧

“新疆和平谈判”的前台幕後

1945年9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方针突然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武装在距离新疆省会乌鲁木齐仅仅137公里的玛纳斯西岸突然停止进攻，与政府军形成对峙；接着从1945年10月开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以“新疆暴动地区民众”的名义与中国政府开始进行和平谈判，并于1946年1月签署了和平条款。但是，对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来说，停止进攻而形成对峙，进而放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名称，开始进行和平谈判并最终签署和平条款，这一连串的举动，很明显都有悖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初衷。更何况就在仅仅一个多月之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武装力量还发动了“三线作战”，气势凶猛，分头并进，大有一举拿下全新疆的气概。然而，就在国民政府方面慌乱忙于对付之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却出现这样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方针变化，的确存在着许多令人不解的地方。那麽，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种改变？这种改变是受到了他方的指使还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如果说这个重大的改变是受到了他方的指使，那他们为什么能够甘心接受这个指使呢？而接受了这种指使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内部又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政治过程？

1945年是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一年。以各种国际形势的剧变为背景，在美英两国的调解下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苏联的对华政策因此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那麽，与苏联有着密切关系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出现的方针转变，是否也与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有关？本章将通过追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从停止进攻到签署和平协议的政治过程，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内部动向，以及国际政治方面探讨苏联政策转变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治所造成的影响。

第一节　苏联援助民族独立运动的本意

围绕“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中苏外交

由于与盛世才的关系破裂，苏联在1942年後不得不暂时退出了新疆省的政治舞台。但就在此之後不久，美国（1943年3月）和英国（1943年9月）在迪化先後开设了领事馆。[8-1]以抑制苏联势力为目的，“新疆”成为了中美英三方合作的新接点，这对于一向将新疆看作自己势力范围的苏联来说，当然是一个不愿接受的事实。[8-2]

1943年6月，苏联在谴责盛世才向苏联采取敌对行动的同时，向重庆国民政府公布了1942年与盛世才之间签订的一份密约，想依此挑拨中央政府与盛世才反目。[8-3]也就是在这时，苏联开始支持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组织发动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以图通过另一个途径恢复它在新疆的影响力。[8-4]

1944年盛世才发动“八月兵变”时，也曾试图恢复与苏联的友好关系，但却为苏联所拒绝。[8-5]苏联拒绝盛世才的理由，据说是因为他们认为盛世才不守信用。但是不能忽视的是，此时，受苏联支持的“阿山民族革命政府”业已成立，伊犁区、塔城区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的居民中也都已经成立了民族主义秘密组织和反政府武装组织。所以，可以想像当时苏联拒绝盛世才的理由，主要还是因为苏联的新疆政策已经由过去的支持正统的政府领袖，转变为支持反政府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8-6]

国民政府当然知道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的背後有着苏联的支持。吴忠信在1944年11月催促国民政府出面解决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问题时对外交部长宋子文说：“此间问题与苏联有关，增进邦交消弭误会实属迫不容缓之图”，指出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新疆问题的重要性。[8-7]1945年1月7日在收到伊宁机场陷落的消息後，他和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联名向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致电：“新疆军事已到严重阶段，其成败在于後方勤务与对苏外交。”[8-8]

对于中苏外交与新疆问题之间的关系，吴忠信表达了如下的见解：“余谓新苏外交，决非单纯新省之对苏外交，其重心当在重庆与莫斯科。盖苏方对新之态度，足以代表苏联对整个中国之国策。如中苏两国外交部，能商得一真正和善合作之办法，则新疆对苏关系，必可改善无疑。”[8-9]

当时，国民政府“考虑到盟国反法西斯的战略全局，所以不希望当时

中苏边界的纠纷影响与同盟国家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8-10]由于不想煽动国民的反苏情绪，国民政府甚至没有向外界公开“伊宁事件”。[8-11]很明显，国民政府也倾向于通过与苏联之间的外交交涉，寻找解决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问题的方法。

1945年12月3日，外交部西亚局局长卜道明奉蒋介石之命抵达迪化，就“经济合作问题，以及在边境地区合作以维护治安问题”，与当时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进行会谈。[8-12]在12月5日开始的会谈中，卜道明问道：“关于这次伊宁事件，阁下已经知道了吧，其爆发的动机和原因，想必阁下也是知道的吧？”然而面对这一提问，苏联总领事却坚决否认苏联与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间的关系：

本人所得之消息，谅与阁下所知者相同。因本馆与伊宁领事无联络，日前曾先後三次由中国电报局设法与伊宁领事通报，均以无法拍出而退回。最近，莫斯科方面曾通知本人，中国军队曾向伊宁苏联领事馆发炮数十发，一部房屋被毁，领事馆秘书一人炸毙，另有馆员一人负伤，苏外长已向中国大使馆提出抗议，苏方现正准备撤退该地苏领馆妇女及小孩。此外，苏方并曾通知中国大使馆，前拟经苏驶华之美卡车500辆，现因伊宁变乱，暂缓通过。另据本人所知，伊宁区住民共约40余万，除少数汉族（包括政府官员），及归化族白俄约7,000余人外，其余均系哈萨及回族。此次暴动，似系全民性质之暴动，谅白俄非暴动主力，近闻该地区已成立共和国。至变乱之动机及原因，本人无所悉。[8-13]

对此，吴忠信这样分析道：“日前我湘桂战事失利，战事已移独山，苏联重视利害，必然淡视我国。”[8-14]之後，国民政府为维护中苏和平和出于对新疆安全的考虑，于1945年1月19日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向苏联驻中国大使代理提交了一份“关于新疆省内的中苏贸易以及经济合作的提案”，希望能够通过合作起到抑制苏联在新疆制造事端的作用，但没得到苏方的任何回应。[8-15]

“民族革命”之名

苏联正式承认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间的关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後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之时。当时担任过毛泽东俄语翻译的师哲，後在其回忆录中有如下纪录：

在一次谈话中，斯大林主动提出，在盛世才时代，他们帮助新疆人民建立武装力量，训练干部，以对抗国民党的势力，并在那里建立有相当大的军火库，储存了一部分武器弹药，现在决定将这部分全部移交给中方，望中方指定专人负责接洽、接收人员接收。主席当即委托周总理

办理。[8-16]

但是在1944-1945年当时，苏联却拒不承认他们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间有任何关联。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应该是出于想维护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为“民族革命”名义的考虑。因为在当时，苏联不仅极力主张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为新疆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自发掀起的“民族革命”，而且为了制造这种形象还煞费了一番心机。

首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队和政府中的苏联顾问，尽可能挑选出身于苏联中亚地区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的人担任。因为他们与新疆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在种族、语言、习惯上完全一致，外部的人无法察觉他们就是苏联人。例如，塔城区的苏联顾问都是苏联中亚地区出身的维吾尔人，阿山区的苏联顾问都是苏联中亚地区出身的哈萨克人，他们既没有与当地的突厥系居民之间存在语言交流上的障碍，在当时户籍制度不完备的新疆，不知道详情的人是无法从相貌和习惯上将他们与新疆当地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区别开来的。

其次，是让苏联人假扮为居住在中国的白俄人，甚至将苏联红军部队假扮为由居住在新疆的白俄人组成的部队。俄国十月革命以来，许多白俄人逃亡到中国新疆。之後中国虽将取得中国国籍的白俄称作“归化族”，但其中仍有许多拥有双重国籍或无法确认国籍之人。在作者的采访中，当年民族军总指挥部的一位部长证实，1945年8月由帕里诺夫率领、从塔城区赶赴精河前线的被称为“塔城归化军”的民族军部队，其实就是苏联红军。即使是苏联国籍，如果他本人自称是居住在新疆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或者是白俄人，若没有具体的说明资料，其他人根本无法从外表上进行辨认。这一情况，不仅为苏联辩解自己没有介入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提供了方便，实际上也成为我们今天研究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性质和过程的一个极大障碍。

最後是将各级政府的头把交椅都交给当地少数民族社会中的上层人士来担任，而来自苏联的人员则只担任顾问，最多也就是像在塔城区、阿山区那样担任第一副专员。从发生在塔城区和阿山区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苏联想掌握实权的企图。但是，担任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主席、塔城区、阿山区专员的人，既不是苏联顾问，也不是亲苏联的当地伊斯兰民族居民中的知识分子，全都是少数民族社会的上层人士。这种做法，不仅有利于动员民众参加运动，而且还可以起到维护运动是当地民族居民所发起民族革命之名义的作用。[8-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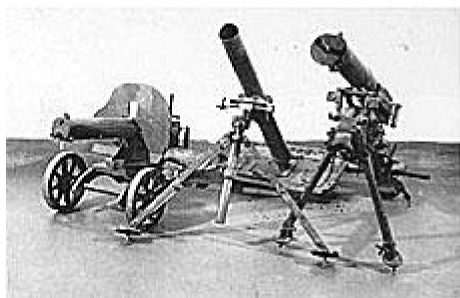
从苏联注意主张、制造并极力维护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民族革命”的形象一事来看，苏联将控制新疆的希望寄托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的想法十分清楚。石井明曾仔细研究过苏联战後安全保障体系，指出它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国境之外寻求更大的安全空间”。[8-18]苏联当初在新疆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利用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以当地民族居民的“民族革命”的名义，在新疆地区建立一个从中国独立出去的民族国家——例如像蒙古人民共和国那样的苏联卫星国，这样就可以保持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地位。对于这点，一位曾在民族军总指挥部任过职的人在笔者的采访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

第二节　　苏联政策的转变

人为的停战和对峙

在1945年9月上旬取得占领阿山区、精河地区和乌苏地区作战的胜利後，东突厥斯坦方面的军队在玛纳斯河的西岸与在玛纳斯河东岸的政府军隔河对峙。虽然有人主张造成对峙的原因是双方军力相等，但事实上，在精河与乌苏的战斗结束後，追击政府军的东突厥斯坦方面武装的先头部队已经渡过了玛纳斯河并进入了位于玛纳斯河东面的玛纳斯镇。一位当时曾经担任民族军总指挥部部长的人物，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甚至肯定地说："其实三区革命军已经占领了玛纳斯镇。"



民族军的武器装备

另一方面，以军事专家们的眼光来看，玛纳斯河并不是一条能够用来进行防卫的天然屏障。[8-19]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部队没有接到停止渡河在西岸设防的命令，他们绝对有能力渡过玛纳斯河，或者突破政府军之後才在东岸建设起来的防线。

曾参加这次战斗的一位民族军士兵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们到达了玛纳斯河西岸，在玛纳斯镇驻紮的政府军部队及在精河和乌苏战斗中逃跑的政府军部队一起向乌鲁木齐方向撤退。在玛纳斯镇，我们的侦察兵为侦察敌情已进入城内并和当地的居民接触。之後由於我们的部队接到不许渡河的命令，国民党军从呼图壁（Kutubi）返回玛纳斯，并重新在玛纳斯构筑了防卫体系。[8-20]

9月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已经在玛纳斯河前线集结了大约一万人的部队，[8-21]并在玛纳斯河西岸修筑了宽55公里、长60公里的战斗工事，[8-22]同时，为支援新疆南部的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族发起的"塔什库尔干起义"，经由苏联境内向塔什库尔干地区派遣了300名士兵。[8-23]很明显，东突厥共和国方面兵力充足，隔河对峙的局面

只是由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队一方的选择而造成的。

玛纳斯河距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中心伊宁约532公里，但距新疆省首府迪化仅仅137公里。[8-24]9月13日，在新疆的国民政府军最高指挥官朱绍良向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报告了当时的军事状况：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势力已经到达距迪化仅两日行程的玛纳斯河西岸，任何时候都可能开始对迪化的攻击。相反，迪化的政府军仅有六个营，而增援新疆的骑兵第五军和第四十六师一部抵达迪化至少需要八到十天的时间。[8-25]

实际上，从1945年9月起，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武装势力已在迪化周围展开了游击活动，一些游击队甚至已到距迪化市内不足七八公里的地方。[8-26]这一形势使迪化的汉族商人纷纷逃往中国内地，当地物价飞速上涨，甚至迁移省府也被提上新疆省政府的议事日程，一时之间，迪化城内人心惶恐。[8-27]

前文述及的那位民族军总指挥部的部长做出以下证言："三区革命军如果继续进攻的话，肯定能够占领迪化。当时我们的部队不仅在玛纳斯地区，而且还在迪化地区、库车地区，都截获了政府军的情报。"如果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武装势力拿下了玛纳斯镇，就等於打开了通向迪化的大门，问题只是他们没有采取行动而已。

对此，一位当时参加精河和乌苏战斗的政府军方面的无线电通信技师也提出过疑问："当时，如果三区革命武装势力继续追击的话，应该能够一鼓作气进入迪化，但三区部队到达玛纳斯河西岸後停止了进攻。所以原来驻扎在库车的政府军第四十六师紧急赶到玛纳斯镇并构筑了防卫体系，双方才形成对峙。"[8-28]

停止追击并在玛纳斯与政府军隔河对峙，实际上就是放弃进攻和占领新疆省会迪化市。但正如前文所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武装力量在制定三线作战计划时，曾将占领迪化和解放新疆（东突厥斯坦）全境作为此次战役的最终目标。那麽，在此时此刻下达停止追击的命令，究竟是出于谁的意志？而这个人之所以发出这个命令又是出于何种目的？

可以确认的是，停止追击的命令并不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主席伊力汗・吐烈下达的。因为他一直在宣称要击溃汉族人的统治，将汉族人从新疆驱逐出去，并攻占迪化。[8-29]1945年5月5日的《关于军队供给问题的决议》记录了伊力汗・吐烈在政府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现在我们虽然还在伊宁，但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东突厥斯坦所有人的事业。从现在开始我们还要向新疆南部、新疆东部进军，占领迪化。必须承担进攻迪化方面部队的供给任务。"开始三线作战时，伊力汗・吐烈还任命了出身

于喀什附近阿图什县的临时政府教育部长赛福鼎・艾则孜为“喀什噶尔团团长”。[8-30]从中可以看出，虽然伊力汗・吐烈没有掌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武装势力的实权，但他却一直坚持主张要拿下新疆全境。

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苏联政策的转变

停止继续攻击的命令实际上是由苏联方面下达的。据那位民族军总指挥部的部长说：“我们在渡过玛纳斯河後，突然收到不许渡河的命令。命令据说是当时任民族军总指挥官的苏联人帕里诺夫下达的。於是，已经渡河的部队返回西岸，所持的苏联武器也全部收回，换成了中国制的武器。”

同时对于苏联的真实意图，他做出这样的推测：“当初，虽然斯大林承诺如果占领了迪化就会承认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一个独立国家，但到了这时他认识到根本不可能让新疆从中国独立出去，於是就不再希望进攻迪化。”

这一推测并非没有事实根据。进入1945年以後，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对苏联的国际战略也造成了很大影响。在2月的雅尔塔会议中，美英为促使苏联早日实现对日作战，同意在苏联实施对日作战後再次考虑苏联在中国的利益要求，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换来了苏联的合作。即在“关于日本的决定”的部分中规定：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变大连港为国际港口，承认苏联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恢复苏联租借旅顺口为苏联海军基地的权利，设立中苏合资公司共同经营东北铁路和以大连为出口的南满铁路，并保证苏联的优先权益。[8-31]

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後，为了签署中苏友好条约和实现美国杜鲁门总统催促苏联早日出兵的愿望，中国国民政府派遣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前往苏联，6月3日在莫斯科开始与苏方进行会谈。双方最初在外蒙古的独立问题上互不相让，最终经请示蒋介石同意宋子文做出让步，在外蒙古问题上达成了如下协议：以苏联不向中共和新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提供任何援助、承认国民政府在东北地区的主权、向中国的援助必须以国民政府为对象这三项要求为条件，同意战後在外蒙古就关于独立的问题实施国民投票。[8-32]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于1945年8月14日签署，在同时签署的外交换文中还有一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莫洛托夫外交人民委员给中华民国政府王［世杰］外交部长的信笺》，其中关于新疆问题有如下一节：“关于最近在新疆发生的事件，苏联政府如友好同盟条约第五条所规定那样，确认自己没有干涉中国内政的意思。”[8-33]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为了获取更大的国家利益，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当做苏联国家利益的牺牲品，也就是说不仅向中国国民政府承诺不再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进行援助，也默认了中国国民政府具有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平叛权。

停战綫和新疆的地下资源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中苏友好条约的签署是在8月14日，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进攻则持续到了9月上旬，即直到在中部战线上最终占领乌苏县、在北部战线最终占领阿山区後为止。那麼，占领乌苏县和阿山区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武装势力停止进攻之间有没有关联？或者说苏联为什么会选择占领乌苏县和阿山区之後为东突厥斯坦方面武装势力攻势的终结点？

为查明这一原因，笔者注意到了一份名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关于乌苏县、精河县、独山子油田的决议》的文件。从这份文件中可知，独山子（May tah）油田和炼油场就在乌苏境内，而乌苏又东邻玛纳斯县。这一文件是在1945年9月15日，即占领乌苏仅仅一周後下达的。从这份政府决议要求早日实现油田的恢复生产可以看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军事进攻之所以持续到最终占领乌苏、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势力范围扩展到玛纳斯河西岸之後，其原因应该与争取控制独山子油田有关。

独山子油田是20世纪上半期苏联在新疆经营的最主要的经济项目。该油田由苏联从1935年开始挖掘，1939年开始正式运营。以盛世才的口头同意为依据，直到1942年前独山子油田的经营和利益都是由苏联一方独占。1942年时，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估计，独山子油田拥有当时苏联最先进的开采设备，当时的石油产量即使已经达到月产二至三万加仑，今後还有相当大的增产余地。当时油田有俄国职员140名，包括家属达到200名。但由于与盛世才的关系的破裂，苏联才不得不放弃了这座油田。[8-34]

通过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于10月15日所作的第111号决议，可以看出独山子油田被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力占领之後的管理体制：

（一）石油生产在当前战争年代有着重要的军事意义。因此管理石油工业任务交给军队後勤处。（二）石油工业需要的专家、工人，由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事部负责解决。（三）石油工业的工人、工作人员的供应问题，由军事部出面予以解决。（四）关於生产的石油交给工商部的问题，由供给处领导请示军事部领导决定。（五）生产的汽油由军事

部负责安排，并向国家机关、财政部、工商部等有关单位供应一定数量的汽油。

这项决议说明，石油生产是由军事部进行管理的。而前文已经述及，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军事部实际上控制在苏联势力手中。所以可以推测，独山子油田的石油生产事实上是由苏联方面掌握的。如果不是这样，决议中油田的技术人员和资金由本来毫无这些资源的军事部门进行调配的内容就毫无意义了。

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946年年度预算中可以看出，独山子油田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最大的经济独立预算单位。也就是说，油田的巨大利益都掌握在了苏联势力手中（表8-1）。

表8-1　财政部计划局制定的1946年独立预算机关预算表（单位：元[8-0]）

机关名	年度收入	生产经费	实际收入
农业水利土地部	17,510,500	17,510,500	0
邮政电信	4,459,200	20,046,049	-15,586,849
职员商店	25,400,350	179,977,500	-154,577,150
独山子油田	183,640,000	138,447,680	45,192,320
不明	8,100,000	7,989,500	110,500
运输	6,254,800	2,635,910	3,618,890
法院	4,785,000	6,341,570	-1,556,570
商业局	412,916,860	29,452,184	383,464,676
合计	663,066,710	402,400,893	260,665,817

来源：根据1946年4月20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第269号决议》制成。

从1946年3月14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第241号决议中可以看出，共和国的1946年年度预算总支出是2,790,388,000元，其中仅军费就约占67.3%,约1,879,106,000元（表8-2）。毫无疑问，在战争期的1945年，所花费的战争费用应该更多，赤字也就更大。

表8-2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946年度预算支出部分（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军事费用	1,879,106,000
行政费用	584,949,000
职员商店赤字填补	196,333,000
国债利息	60,000,000
道路建筑费	50,000,000
货物费用	20,000,000
1946年支出合计	2,790,388,000
1946年收入合计	2,679,031,000
赤字	101,357,000

来源：笔者根据1946年3月14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41号决议》制成。

因战争而产生的军费赤字，由苏联的财政援助得以填补。但是苏联的军事援助并不都是无偿的。根据一位在民族军总指挥部任职的人士的说法，停战以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用农产品、畜产品、原材料进行了偿还。从共和国的塔城区第一任秘书长阿布里米提·哈吉耶夫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为了偿还军事援助，许多原材料品都经过塔城运往苏联。[8-35]将这一事实与独山子油田在地理上属塔城区一事联系起来，可以推测出在东突厥斯坦军队系统管理下的独山子油田生产的石油，至少有一部分是作为对军事援助的偿还而被运往了苏联。

不仅仅是石油，当时所发现的新疆丰富的地下资源、矿产大部分都集中在伊犁区、塔城区和阿山区。[8-36]1940年11月26日，盛世才和苏联政府代表巴库林曾经签署了一份密约——《租借条约》，规定“新疆政府予苏联政府以在新疆境内探寻、考查，与开采锡矿及其副产有用矿物之特殊权利”，其中包括承认了苏联对阿山区可可托海的钨矿和铅矿的无条件开采权等，“本条约之期限自签字之日起，定为50年”。[8-37]但是在与盛世才的关系破裂之後，苏联失去了以上所有特权。

由于这些地下资源都位于玛纳斯河以西地区，所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在中部战线上的军事进攻进行到占领乌苏县为止、在北部战线上进行到占领阿山区为止，完全可能让人联想到是因为苏联希望掌握新疆的地下资源所致。

第三节　　苏联与新疆和平谈判

“共和国”政治主体性的丧失

从政治方面来说，苏联给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支持，也不是无偿的支持。俄国学者认为，如果没有与苏联的外交官和顾问进行协商，临时政府的任何一个人、包括伊力汗・吐烈，无论是军事问题或国家建设问题，都无法做出决定。[8-38]临时政府这个与生俱来的弊病，在最终决定停战并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的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在乌苏和精河的战斗失败之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派遣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参谋长郭寄峤于9月10日到达迪化，辅助朱绍良重新调整在新疆的政府军的配置。[8-39]之後又派遣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于9月13日到达迪化，调查新疆问题的现状以及寻找可行的解决办法。

但是，由于政府军的配置调整要等到从青海省调来的骑兵第五军到达後才能开始，於是挽回新疆局势的愿望只能寄托在与苏联的外交谈判上。[8-40]张治中在到达迪化的当日，即9月13日，就要求与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叶谢也夫会面。在其回忆录中，张就14日举行的会谈作了如下的记载：

在9月14日我和叶谢也夫见了面，问到他的意见，他表示：这是中国内部的事情，苏联不便干涉中国内政。就他个人的看法，这件事最好是设法和平解决。我当时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并问他愿不愿代为疏通阻塞和平解决的道路，首先是使伊宁方面停止军事行动，以便双方派代表商谈。他答应把我的意见传达莫斯科，并表示他个人愿意从旁帮忙，但是在没有得到本国政府指示前，他不能有所行动。还说：最好由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较易有效。[8-41]

之後，在9月17日，驻中国的苏联大使彼得洛夫向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发出了以下备忘录：

据苏联伊宁领事转报苏联政府称：由回民数人，自称新疆暴动之人民代表，向该领事声请，并暗示希望俄人出面为中间人，担任调停彼等与中国当局所发生之冲突；并声称：暴动人民无意脱离中国，其宗旨在使回民在新疆占多数各地如：伊宁、塔尔巴哈台、阿勒泰、喀什各区，达到自治之目的，该代表并列述过去新省当局对彼等之种种压迫。苏联政府因关切与新疆接壤地区之安定与秩序，如中国政府愿意，则准备委

派驻伊宁领事，试对中国政府提供可能之协助，以便调停新疆已造成之局势。[8-42]

国民政府外交部在请示蒋介石後做了回复，在对苏联政府表示感谢的同时也希望苏联政府能够通过苏联驻伊宁领事向新疆“事变分子”传达如下信息，即国民政府希望他们能够派出代表与国民政府派往迪化的代表张治中就和平解决的办法进行商谈。[8-43]

但是，苏联大使所述的由新疆暴动民众代表所提出的和平谈判要求，在当时是否存在实在值得怀疑。能够确认的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945年10月2日在共和国政府委员会会议上作出政府决议，回应中国政府和平谈判建议。这里选取了该决议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真理在我们这边，胜利属於我们。但是我们是人道主义者，看到了自11月份以来的流血事实，从人道主义出发，共和国的前途绝不能单靠流血手段去解决，而不考虑同国民党政府谈判。因此东突厥斯坦临时政府作出如下决议：一，建议中国政府采取非武装手段，即谈判方式解决东突厥斯坦独立问题。二，中国政府如同意谈判，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决定由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阿卜都拉·吐烈、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人组成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谈判代表团。三，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代表团在谈判中要求独立，并在此基础上解决问题。[8-44]

应该注意的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此项决议明确表示要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独立”作为和平谈判的根本原则。10月1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代表团”到达迪化，“他们来时都佩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证章，并且对招待人员说：他们是代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来和中国政府代表进行谈判的，届时将出示证明文件，中国政府代表方面也应交验证件”。[8-45]

是否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来与中国国民政府的代表进行谈判，这一身份对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来说，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其命运的问题。很明显，此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代表团”的要求是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100号政府决议所制定的和平谈判原则相一致的。但是，它却明显与9月17日苏联政府提交给中国国民政府的备忘录内容不同。

根据苏联大使的备忘录，请求苏联调停的是新疆暴动地区民众的代表，因此中国政府也委托驻伊宁领事将新疆暴动地区民众代表送到迪化。於是，张治中向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叶谢也夫传达说无法实现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代表团的会谈。之後，经过苏联代理领事的“劝说”，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代表最终同意放弃“国家代表团”的身份，以“伊宁地区民众代表”或“伊宁方面代表”的名义，从17日起与张治中开始了会谈。[8-46]

从理论上来看，“共和国代表团”最终放弃“国家”的名义而接受了“民众代表”的名义一事，不仅意味着他们放弃了临时政府委员会100号决议所规定的谈判原则，更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国家”地位和“独立”。从和平谈判得以实现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代表之所以能够接受和平谈判，完全是由苏联方面一手策划和推进，并按照苏联设定的路线实现的。而本该作为当事者本人出现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却在这个重要的政治过程中完全丧失了它的政治主体性。

“共和国”的人事变动和苏联的政策转变

在和平谈判中崭露头角的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原来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部并没有很大的名气，在和平谈判代表团的三位代表当中，他的年龄也最小。[8-47]但是他给张治中的印象却是：他才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事实上的发言人，也是事实上的负责人。[8-48]

代表团团长由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担任，而事实上的领导者却是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代表团的这一双重结构，与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界中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地位的急剧上升有关。

关于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的生涯，笔者曾数次采访了其家庭成员和当年参加过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相关人士。据称，在伊宁起义爆发时期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不过是伊宁报社的一名普通职员。从1945年2月开始，他在教育部官员的介绍下出任政府秘书室的秘书，参加了许多法案和文件的起草，[8-49]於是他优秀的政治才能被伊力汗·吐烈发现。[8-50]1945年4月3日的临时政府委员会第47号决议决定：“授予军事部部长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中校军衔”。联系到1945年4月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民族军的创立和前军事部部长转任民族军副指挥官等情况，可以确认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的确就任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军事部部长。从此，阿合买提江·哈斯木进入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领导层。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1914-1949）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政治地位的急剧上升，与和平谈判的实现紧密相关。在1945年10月2日被任命为和平谈判代表团的成员之後，他又在9日的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03号决议中被任命为政府委员，更在22日的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44号决议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晋升为上校，[8-51]被任命为决定“战争的进行、防御、撤退以及军队的调动、军队的装备”的由五人组成的最高机关——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又于1946年1月13日在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00号决议中，被授予“共和国最高勋章”——“解放”。[8-52]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的政治权威，首先体现在他与亲苏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关系上。据赛福鼎·艾则孜称，阿巴索夫非常敬重阿合买提江·哈斯木。赛福鼎·艾则孜也称自己“从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那里受到很多启发”。[8-53]但是，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与伊力汗·吐烈不同，并不拥有宗教权威所赋予的权威性，也不像阿巴索夫那样一开始就是领导民族革命的功臣。他能够进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领导层并且能够在集中了苏联势力的军事部门中树立起政治权威的原因，唯一能让人联想到的就是他曾经长期身处苏联的经历。



左起：阿巴索夫、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赛福鼎・艾则孜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是1914年出生於伊宁的维吾尔族人。11岁时由于父亲亡故，母亲改嫁，他只好寄身于在苏联哈萨克斯坦的叔父家中。他在这里的高中毕业後，又进入喀山的列宁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1938年又进入了位于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8-54]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在喀山的列宁学院加入列宁青年团。[8-55]但他是否加入了苏联共产党，不论是接受笔者采访的人，还是记载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在苏联履历的维吾尔文献中，都对这一点避而不谈。

1941年8月，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回到了新疆，据说理由是自己对“祖国”和亲人的想念。[8-56]但是他选择回国的时期，正是盛世才与苏联关系对立并最後决裂的时期，他不久就被新疆省政府逮捕。[8-57]逮捕的缘由，据说是因为从事“革命活动”。[8-58]但是，关于他所从事的“革命”的内容和性质，任何文献、包括维吾尔语文献也都没有记载。

如前分析，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苏联势力，大部分集中于军队系统中。而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中担任军事部长时间最长的就是阿合买提江・哈斯木。这也说明，他应该属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内部的苏联势力方面。[8-59]由于“亲苏”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政治路线的核心，是否具有苏联的支持就是一个是否具有政治正统性的标志。而对于亲苏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来说，苏联支持的力度又成为

判断一个人政治权威的标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部亲苏的知识分子们之所以服从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应该和这方面的原因有关。

据阿巴索夫的好友文斐然所言，他本人曾从阿巴索夫那里听说，苏联顾问当年曾经计划用当时任伊力汗·吐烈秘书的“苏联共产党员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代替伊力汗·吐烈出任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主席。[8-60]苏联的目的，无疑是想通过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加强它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影响力，以便使苏联的意愿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得到更彻底的贯彻。而事实上，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正是通过参与新疆和平谈判，其地位上升到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高度。换言之，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个人地位的变化，正是苏联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策变化的真实写照。

《十一条和平条款》的签署

随着和平谈判的实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全面停止了与政府军的战斗。经过三十多次会谈，1946年1月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和中央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签署了《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民众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8-61]即《十一条和平条款》，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政府给予新疆人民选举彼等相信之当地人士为行政官吏之选举权；（二）给予人民以宗教信仰之完全自由；（三）行政、司法机关的公文要以国文与回文并用书写；（四）小学和中学阶段用本族语言进行教育，中学阶段列国文为必修科目；（五）保证民族文化的自由发展；（六）保障出版、集会、言论的自由；（七）视人民生产能力确定税率；（八）保障商人内外贸易自由；（九）组织新疆省联合政府（Birlaxma Hukumat），25名政府委员中中央政府指定10人，新疆各区推荐15人，其中6人由“伊宁方面”推荐；（十）准许组织民族军队，并改编成政府军（具体讨论另行商议）；（十一）双方立即释放逮捕的对方人士。[8-62]

如果将《十一条和平条款》看作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它确实是给予了少数民族许多的政治权利。但是如果将接受和平谈判看作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直接结果，那麽就不得不承认《十一条和平条款》本身的内容却是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最初的精神——在新疆排除中国的统治，实现东突厥斯坦的独立——背道而驰的。换言之，《和平条款》的签订实际上意味着“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失败。关于这一点，作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被派往迪化、结果却是作为“新疆暴动地区民众代表”签署和平条款的“共和国代

表”们，当然是心知肚明。

1月10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乘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伊宁，团长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对到机场前来送行的新疆省政府的官员留下这样一席意味深长的话：“这次的和平谈判很顺利，也很成功，不过伊犁民众和军人恐不满意，我们要向他们解释中央政府谋和的决心和愿望，期望能圆满地解决。”[8-63]

谈判之所以最终产生如此结果，原因之一是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叶谢也夫对谈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谈判的步骤为：张治中首先提出草案，之後双方在此基础上讨价还价，最後双方相互让步妥协。会谈中曾两度出现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感到无法独自决定而中断会谈中途返回伊宁，之後再带着他们的要求返回迪化的情况。[8-64]苏联驻迪化的代理总领事叶谢也夫在幕後积极活动，在促使双方相互让步和妥协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叶谢也夫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其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这一头衔，时而站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一方，要求张治中做出让步；但是张治中也同叶谢也夫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注意让叶谢也夫意识到自己扮演的不过是一个“中间调停人”的角色上大下功夫。

据张治中称，他在谈判中就民族军改编为政府军的方式、以少数民族语言发行政府文书、在政府人事上增加当地居民代表的比例等问题上向“伊宁代表”方面做出了让步，但是他也因会谈遇到困难而四次拜访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第一次是要求苏联方面做工作，让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自己放弃了“国家代表”的身份；第二次是就确定不能宣称从中国独立为会谈前提一事，与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之间达成一致；第三次是让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认可“伊宁方面民众代表”同意在与国民政府代表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实现和平；第四次是通过代理总领事让“伊宁方面民众代表”撤回他们所提出的废除政治警察、全部撤回为镇压民族解放运动而进入新疆的政府军、地方警察由当地的伊斯兰居民组成的所谓“三项要求”。[8-65]

就在《十一条和平条款》签署三天後的1946年1月5日，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

小　结

苏联在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发展阶段就开始积极参与并给予大力支持。这是因为在与盛世才的亲密关系破裂後，苏联改变了方针，开始利用新疆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通过支持“民族革命”以保持其对新疆的影响，进而将新疆变为一个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地区。厉声根据

前苏联档案，得出有关“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策以及其中出现的问题，都报告给了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贝利亚，甚至有的报告给了斯大林本人的结论，[8-66]可见新疆问题当时确实得到了苏联政府的极大重视。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英美为促使苏联早日实现对日作战，强迫中国做出牺牲，在承认外蒙古独立和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各种特权上作出了让步。於是，为了追求更大和更加实际的利益，作为一种交换，苏联承认了新疆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即不承认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有从中国脱离的权利，并停止了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援助。从此可以看出，对苏联而言，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只不过是它在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上的一颗棋子而已。

毫无疑问的是，苏联的援助对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的形成、存在和发展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因此，搞清苏联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对自己进行援助，这对东突厥独立运动势力来说，本来也是一个决定其未来命运的重要问题。但是，由于以伊力汗・吐烈为首的“共和国临时政府”将摧毁中国的统治作为最重要的课题，因而对这一点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将从中国独立这一愿望寄托于苏联的援助，反而造成了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致命伤。1945年9月以後的事实充分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苏联援助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动机和最终目标，并不是支持新疆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独立。

由于苏联对中国政策的突变，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方面也不得不放弃也许可以称为唾手可得的胜利——占领新疆首府迪化，而同意与中国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以“新疆暴动地区民众代表”的名义签署了和平条款，最终放弃了建立独立国家的梦想。事实说明，任何民族独立势力，如果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其他大国身上，企图通过获得大国的支持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其结果必然是在国际形势的变化中不得不成为大国间国际政治游戏的牺牲品，这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都必须承认的事实。

注释

[8-0]元，维吾尔语发音为dollar。

[8-1]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19-320.

[8-2]1942年，受蒋介石密令的何应钦、程潜、徐永昌、张文伯、贺

跃祖、周至柔成立讨论收复新疆问题的小组，提出“关于恢复新疆主权的方针”。其实施要领中的一项如下：“乙，为抑制苏联的行动，同意使用让英美的基督教徒深入新疆进行传教活动这样的方法。……在此问题的更深层次，其实是促使两国开设领事馆这一问题，能够取得成果的不用说是後一种方法。”从1942年9月28日开始，国民政府以苏联对新疆过分关心为由要求开设美国领事馆，美国也开始对新疆给予关心。1943年起，相继开设了英美领事馆。香岛明雄：《中ソ外交史研究1037-1946》（京都：世界思想社，1990），第109-110页。

[8-3]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社，1957），第88页。

[8-4]John W. Carwer,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76.

[8-5]潘荣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赴新疆干部团的遭遇》，《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1982），第35页。

[8-6]John W. Carwer,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p. 176.

[8-7]《吴忠信日记》，1944年11月22日。

[8-8]《吴忠信日记》，1945年1月7日。

[8-9]《吴忠信日记》，1945年1月15日。

[8-10]石井明：《新疆をめぐる中ソ交涉——一九四九——五〇年》，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科编：《教育学科纪要》，第14号（1981），第63页。同论文也被收录在石井明：《中ソ関系史の研究：1945-1950年》（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0）。

[8-11]《吴忠信日记》，1945年1月23日。

[8-12]《吴忠信日记》，1944年12月3日。

[8-13]《吴忠信日记》，1944年12月5日。

[8-14]《吴忠信日记》，1944年12月5日。

[8-15]石井明：《新疆をめぐる中ソ交涉——一九四九——五〇年》，第63页。

[8-16]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450-451页。

[8-17]阿勒泰区专员是乌斯满·斯拉木。成为政府官员的哈萨克人

大多都是哈萨克人的部族首领。张国杰：《从反清统治斗争到三区革命——阿勒泰历史调查》，《新疆历史研究》，第1期（1987），第80页。尤其是塔城区的情况，就任专员的都是没有参加秘密组织的地方少数民族社会名人。

[8-18]石井明：《中ソ関系による旅顺、大连问题》，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第95期，《中ソ関系と国际环境》（东京：有斐阁，1990），第46页。

[8-19]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第6556页。

[8-20]Ismailow Mahmut, “Uq Wilayat Milli Armiyisi 1 Suydung piyada Polkining Dunyaha Kilixi wa Yning Besip Otkan Yoli Tohursida Aslima ［关于民族军绥定第一军团的诞生及其走过的革命历程］,”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6 (1989): pp. 219-220.

[8-21]《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140-141页。

[8-22]Sawdanow Zayir, 5-Korpusning Bisip Otkan Inkilabiy Musapisi ［第五军走过的革命历程］ (Urumqi: Xinjiang Halik Naxtiyati, 1989), p. 81.

[8-23]《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106页。

[8-24]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556页。

[8-25]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418-419页。

[8-26]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557-6558页。

[8-27]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558-6559页；陈力：《伊犁事变记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修订版），第139页。

[8-28]佟沛：《国民党军队乌苏溃退记》，《昌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5）， 第59页。

[8-29]《吴忠信日记》，1945年2月5日。

[8-30]Saypidin Azizi, “Aslima 2 ［生命之诗（二）］,” Omur Dastani (Beijing: Millatla Naxiriyati, 1990), p. 90.

[8-31]艾德沃德·R□斯特切尼斯着，中野五郎译：《雅尔塔会谈的秘密》（东京：六兴出版社，1953），第83-85页。

[8-32]蒋君章：《宋子文莫斯科会谈追记》，《中国一周》，第100

期（1952）。蒋当时出任总统机要室《总统事略》编纂室秘书，能够阅览作为国家机密的资料。但他在该文章发表後即被解除了职务。对此，可以参阅香岛明雄：《中ソ外交史研——一九三七——一九四六》（京都：世界思想社，1990），第190-192页。

[8-33]石井明：《新疆をめぐる中ソ交涉——一九四九——五〇年》，第63页。在另外交换的一份《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王世杰外交部长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莫洛托夫外交人民委员的信简》的文件中，有这样一节："中国政府多次表明对外蒙古人民对于独立之愿望的关注，在日本战败以後，在这一愿望由外蒙古人民经国民投票确认之时，中国政府愿意在现在的边境线内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中ソ有効同盟条约、交换公文および付属协定，一九四五年八月一四日》，载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部编：《新中国资料集成》，第1卷（东京：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1963），第104-105页。

[8-34]1942年，苏联外务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认可今後与盛世才利益均沾的基础上，想使盛世才打消与苏联脱离的念头，但失败了。之後，苏联倡导中苏两国就独山子油田的中苏石油合作谈判，也由于中苏两国的政治至上主义而以失败告终。之後，苏联拆除了油田的设施，一部分运回苏联。1942年，中苏之间达成将剩余的设备以170万美元卖给中国的协议，油田归属中国。香岛明雄：《中ソ外交史研究——一九三七——一九四六》，第98-111页。

[8-35]Ablimit Hajiyow, "Tarhabatay Wilayitining Igilik Terekkiyat Tarihiga Dair Aslima ［关于塔尔巴哈台区经济发展的回忆］,"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25 (1988): pp. 292-293.

[8-36]石井明：《新疆をめぐる中ソ交涉——一九四九——五〇年》，第69页。

[8-37]中国边政协会编：《盛世才怎样统治新疆》（台北：中国边政协会，1954），第21-27页。

[8-38]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日文版，第149页。

[8-39]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561-6575页。

[8-40]张治中就当时自己的想法，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记述道："伊犁事件的解决，以军事行动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只能采取政治方式。在政治解决中需要中间人，最合适的中间人就是苏联。"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419页。

[8-41]张治中就当时自己的想法，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记述道：“伊犁事件的解决，以军事行动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只能采取政治方式。在政治解决中需要中间人，最合适的中间人就是苏联。”参见包尔汗：《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第268页。

[8-42]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420-421页。

[8-43]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421页；包尔汗：《新疆五十年》，第286-287页。

[8-44]《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00号决议》，1945年10月2日。

[8-45]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422-423页；包尔汗：《新疆五十年》，第287页。

[8-46]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423页；包尔汗：《新疆五十年》，第287页。

[8-47]根据《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第100号决议》，东土厥斯坦共和国代表团的成员是三个人，团长是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不是资格最低的成员，从和平谈判的最後文书——1946年6月签署的和平条款附属文件——的署名可以看出。

[8-48]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449页。

[8-49]铁衣甫江·阿迪：《三区人民敬爱的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伊犁文史资料》，第3辑（1987），第56页。

[8-50]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p. 84-86.

[8-51]1946年3月5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35号决议》规定，中校在任职六年後才能升为上校。

[8-52]关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勋章，1946年3月19日制作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勋章”、“解放”、“忠诚”、“独立”四个种类。“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勋章”只授予了伊力汗·吐烈（1946年1月9日）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总指挥官帕里诺夫及副指挥官伊斯哈克别克（3月2日）。1945年5月制作的“解放勋章”（金质）也仅授予了极少部分人。据笔者的调查，被授予这一勋章的有政府主席伊力汗·吐烈、副主席阿基姆别克·霍加（1946年1月9日）、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政府委员及财政部长安瓦尔·穆萨巴约夫、政府委员及民族军参谋长马斯考廖夫、政府委员及阿勒泰专员乌斯满·斯拉木、政府委员及阿勒泰骑兵团团长达列力汗·苏古尔巴约夫、政府委员阿卜杜拉·海尼、尼勒克起义的领导者发提哈等

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是第四个受勋者。1946年3月5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35号决议》规定“解放勋章”的受勋者有以下特权：（一）受领者受到共和国和国民的尊敬；（二）没有受领者的同意不得逮捕；（三）受领者犯罪的情况，必须得到共和国临时委员会的许可才能逮捕；（四）领取特级工资；（五）子女的学费由国家承担；（六）免费观看电影；（七）每年提供一回免费国外旅行；（八）优先享用温泉疗养；（九）有优先购买用于工作的电影、戏剧、飞机票的权利。

[8-53]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 87.

[8-54]以上关于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的履历的部分，基本是基于笔者对与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以及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有关人士的采访。还参考了Yusupjan Aysa, “Uq Wilayat Rahbiri Ahmatjan Kasim Tohursida Aslima ［关于三区革命的指挥者阿合买提江·哈斯木］,”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25 (1988): p. 68. 铁衣甫江·阿迪：《三区人民敬爱的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伊犁文史资料》，第3期（1987），第54-55页。

[8-55]Yusupjan Aysa, “Uq Wilayat Rahbiri Ahmatjan Kasim Tohursida Aslima,” p. 67.

[8-56]铁衣甫江·阿迪：《三区人民敬爱的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第55页。Yusupjan Aysa, “Uq Wilayat Rahbiri Ahmatjan Kasim Tohursida Aslima,” pp. 71-72.

[8-57]据Yusupjan Aysa, “Uq Wilayat Rahbiri Ahmatjan Kasim Tohursida Aslima,” pp. 71-72，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是在通过海关时被捕的。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于1942年被捕，被监禁在乌鲁木齐第二监狱（包尔汗：《新疆五十年》，第293页）。释放时是1944年10月，正值盛世才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的农林部长，吴忠信就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之时（铁衣甫江·阿迪：《三区人民敬爱的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第55页）。

[8-58]包尔汗：《新疆五十年》，第293页。

[8-59]出任军事部长官的有四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从1945年4月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灭亡，在任一年多时间，是在任时间最长的军事部长官。

[8-60]杨宗禹、李占民：《访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巴索夫夫人吕素新同志纪实》，《伊犁文史资料》，第5辑（1989），第22页。

[8-61]Hawir Tomur, “Xinjiangda 11bitim ning Tuzuluxi wa Buzuluxi ［新疆《十一条和平条款》的签署和废除］,”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5 (1984), p. 3.

[8-62]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437-441页。包尔汗：《新疆五十年》，第288-292页。Hawir Tomur, “Xinjiangda 11bitim ning Tuzuluxi wa Buzuluxi,” pp. 4-9.

[8-63]《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172页。

[8-64]会谈一共举行了三次。第一次是从1945年10月13日到22日，第二次是从11月14日到27日，第三次是从12月26日到1946年1月2日。

[8-65]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423-437页。

[8-66]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49、150、154页。

第九章　“民族独立”还是“民族解放”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消亡

通过以上各章的探讨，可以看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治过程实际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1）政权建立阶段（1944年8月至11月）；

（2）第一发展阶段（在伊犁区的发展期，1944年12月至1945年6月）；

（3）第二发展阶段（在塔城区和阿山区的发展期，1945年7月至9月）；

（4）停滞阶段（从停战到和平条款签订，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

（5）消亡阶段（从和平条款的签订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解散，1946年1月至6月）。

以1946年1月的《十一条和平条款》的签订为起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和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实质上进入了它的消亡阶段。在这个阶段，“共和国”内部的各种政治势力各自采取了什么行动？各种政治势力相互之间可曾发生或发生过怎样的政治斗争？接下来的第二阶段的和平谈判又经历了怎样的进程？另外，在以上各种问题上苏联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以什么方式发挥了它的政治影响？本章将通过分析以上问题，试图搞清“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消亡阶段中的政治过程。

第一节　“民族革命”目标的分裂

“共和国”政权内部关于和平谈判的纷争

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方面来看，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其实开始得并不顺利。首先是围绕是否应该进行和平谈判，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内部就出现了严重的对立。以政府主席伊力汗·吐烈为首的一部分政府委员强烈反对和平谈判，伊力汗·吐烈还在临时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激烈谴责和平谈判是“出卖革命成果的行为”、“出卖维吾尔民族利益的行为”、“为了博取中国人欢心的行为”。[9-1]

就在这一时期，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还通过政府决议作出多项规定，以强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作为独立国家的性质。例如，1945年10月15日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10号决议规定11月7日为“东突厥斯坦革命纪念日”；10月22日的第113号决议规定“烧毁残酷的中国政府的国旗，树立伊斯兰教共和国旗帜的11月12日”为“建国纪念日”；1946年3月28日的第249号决议规定4月8日为“民族军诞生纪念日”。

通过政府决议的形式，各种行政制度也被迅速完善。1946年1月5日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85号决议制定了公务员工资制度；1月12日的第197号决议规定了国家税收的税种和税率；1月13日的第199号决议决定组建国家剧团；1月13日的第203号决议决定建立国家行政系统；2月29日的第231号政府决议决定成立妇女协会；3月5日的第235号决议制定了军人晋升军衔标准，并全面禁止中国货币在市场上流通。这些可以说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过去在完善行政制度方面并没有做出应该的努力，而现在却急于采取这些行动，理由很可能就是共和国内部反对和平谈判的势力为了牵制和妨碍和平谈判的进行。

1946年4月4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机关报——《解放的东突厥斯坦》（Azatlik Xarki Turkistan）刊登了一篇《谈判正在进行》的社论，其中措辞激烈：“如果中国政府不按照我们的条件把全部权力都交给我们，继续推行殖民主义制度的政策的话，那麼，我们还要继续进行斗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通过流血牺牲和战争，解放整个东突厥斯坦建立自己永久性的国家。”可以看出，这些内容完全是冲着《十一条和平条款》而来的。[9-2]

但是，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和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赞成和平谈判的亲苏知识分子委员，[9-3]却强烈反对伊力汗·吐烈的观点。4月4日以後，形势逐渐发生变化。4月7日的《解放的东突厥斯坦》刊登了一

篇名为《我们希望谈判胜利结束》的社论，强调了和平谈判的意义：“现在武装斗争已经暂停了，政治斗争正在进行，在一个时期内进行谈判，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是谈判的目的。”[9-4]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和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

4月17日的《解放的东突厥斯坦》社论《一切为了胜利》，更是具有分水岭的意义，因为它明确主张和平谈判和“民族革命”的目标一致：“我们所有的行动，不是为了反对汉民族，而是反对殖民主义者的独裁政府的行动。所以，在我们的革命的光辉胜利基础上建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目标是反对一切黑暗势力，维护人道主义，使各民族获得解放。”[9-5]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通过公开方式，在共和国内第一次明确宣布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并不以汉族为敌，这在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史上，不可不谓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接着，1946年5月25日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上做了《关于和平谈判结局的汇报》，以强硬的口气谴责了反对和平谈判的论调，从而给这场争论划上了句号。在这里节选其一部分：

现在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务必考虑当前的整个形势和具体情况。要麽，为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自由和自治持续地进行长期的流血斗争，如果这样，战争还得继续打下去，人民将会蒙受更大的灾难。或者，鉴於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对於问题的解决应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立即停止战争。总之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两种：1、用武装斗争来解决问题；2、在和平谈判的基础上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

鉴于国民中央政府的首脑蒋介石先生关于边疆地区和对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讲话做出了对边疆地区各民族要给予充分的自治的保证之後，我们的人民当然认为存在不经过流血斗争就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从目前整个的形势来考虑，应在和平谈判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可以采取第二种办法，而不需要用第一种方式去解决问题了。[9-6]

民族运动的目标由同到异

伊力汗·吐烈和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亲苏知识分子之间之所以围绕是否应该进行和平谈判而产生对立，理由在于此时双方在对民族独立运动的目标的认识上发生了差异。

毫无疑问，在和平谈判开始之前，双方都以推翻中国的统治，使东突厥斯坦（新疆）从中国独立出去并建立一个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组成的民族国家为目标。例如，1945年2月24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第24号决议曾经提出："东突厥斯坦解放革命的最重要目标就是推翻残暴的汉族统治，消灭凶残的国民党军队，实现我们的民众数世纪以来的心愿，驱除汉民族殖民者，建立一个关心民众之事、真正的各民族平等和富强的国家。"

当时因为双方具有共同的目标，所以在"九条政治纲领"和许多初期的政府公文中，能够看到都是将推翻中国统治、驱除中国（或汉族）统治者规定为"共和国"最根本的任务。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过去协助"汉族政权"的人被当做政治犯受到处罚。[9-7]1945年8月13日公布的《暂定刑法补充条文》第289条甚至从法律上对汉民族进行歧视和迫害："在革命战争时期，军人犯下抢夺汉族居民财产的罪行，在追究刑事责任时，可以从法律规定的量刑减刑四分之一，四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

建设民族国家这一目标的模式就是外蒙古。1946年1月政府委员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关于外蒙古的独立曾经发表如下言论：

蒙古是地处我国东北部的近邻，它有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将近100万人口，直到1921年，它一直是欧洲国家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专制政府的殖民地。现在赶走了中国殖民主义者的蒙古人民，於1924年宣布建

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但是，不愿让蒙古人民过自由解放生活的中国专制政府，一直不承认蒙古人民的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後，由於民主国家的胜利以及在全世界一贯奉行真正的民主政策的苏联政府对被压迫人民所采取的政策，迫使中国专制政府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作为我们的邻国，并同我们有过历史关系和共同命运的蒙古人民得到了独立，这使我们东突厥斯坦人民感到无限的欣慰。[9-8]

共同的政治目标成为早期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内两大政治势力共存的政治基础。然而，和平谈判开始、特别是1946年1月的《十一条和平条款》签订之後，亲苏的知识分子们改变了态度，放弃了实现独立的目标。签订和平条款，实际上就是“承认全省是属于中国的领土”。[9-9]这种路线上的剧变，不仅引起了他们在政权内部和伊力汗・吐烈一派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也在民众中引起了很大的思想混乱。关于这一点，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做了如此记述：

在革命开始时，是为东突厥斯坦民族独立而开始的。革命的目的和方向是“民族独立”。但自和平条款签订後，革命的目的和方向在形式上有所变化。这也就是我们的青年一代以及某些边远地区的教师们所不了解的问题。他们把“自由”、“解放”和“民族独立”联系起来，认为有“民族独立”的地方才有“自由”，没有“民族独立”的地方就没有自由。和平条款签订了，我们获得了自由，而放弃了“独立”，这是怎麽回事呢。因而产生了“没有民族独立怎麽会有自由”的疑问。[9-10]

显然，伊力汗・吐烈一派及许多参加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一般民众，一直认为民族独立运动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民族的独立。但是，亲苏的知识分子们从被压迫民族这样的自我认识出发，将民族运动定义为“民族解放”，在开始进行和平谈判以後又将“民族解放”的目标具体解释为实现“民族平等”。阿合买提江・哈斯木认为“我们的运动就是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是反对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也就是求得与其他民族平等。”[9-11]“我们不去统治别人，也绝对不允许别人统治我们。”[9-12]

由于“民族解放”的目标是实现“民族平等”，所以实现“民族独立”也就不再是实现“民族解放”的唯一途径。例如，阿合买提江・哈斯木说道：“假如管辖我们的汉人政府能放弃殖民主义政策，切实实行平等、民主的政策，那麽，没有民族独立，人民也是可以得到政治自由权利的。”[9-13]於是，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实行民族的“自治”，也被认为是实现“民族解放”的一种方法：“如果能把和平条款中所规定的权利全部交给人民，我们也就满意了。如果能给我们这些权利，我们将能够自治，

从而拥有永远的自由。”[9-14]

“民族解放”的目标是实现“民族平等”，而实现“民族平等”也可以通过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实行“自治”的方法实现。这就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内部的亲苏知识分子们随着苏联的政策转变，而放弃了自己当初提出的“民族独立”的目标，接受了与中国政府的和平谈判的思想理论依据。

但是实际上，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内部的亲苏知识分子们提出的“自治”，与“民族的”自治之间也有一定距离。阿合买提江・哈斯木说：“我们所要求的自治，并不是仅仅一个维吾尔族掌握全省的行政权力或者让突厥语系民族掌权的问题，而是让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实行民主政治的问题。如果把我们所要求的民族自治，只看成是谋求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民族集团的利益问题，那是不对的。”[9-15]他坚决否认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政治共存的可能性，认为“民主政治时代”的民族主义主张是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制度服务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是不能并存的，或者是站在民主阵线上为解放本民族而斗争，成为民主主义者；或者是站在帝国主义阵线上，为维护殖民主义制度和奴役本民族而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走。”[9-16]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主张“民族主义”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存在，因此“民族革命”目标的转变就有着其必然性：“我们民族被歧视、被压迫，完全丧失了生存的权利，会使我们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我们的民族如果获得自由、平等，就会消除狭隘民族主义。”[9-17]总之，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内部的亲苏知识分子们主张，在与中国政府的和平谈判开始以後，民族解放运动就进入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阶段。而且，随着和平条款的缔结，建立起了民主政治制度，因此必须完全放弃极端民族主义——“民族独立”的思想。很明显，这些亲苏知识分子提出的“民族主义阶段论”，和伊力汗・吐烈一派将“民族独立”视作民族运动最终目标的思想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此在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和对立也就不可避免。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在视察

第二节　从“革命青年组织”到“革命党”

“革命青年组织”

在苏联政策转变的影响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内部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地震。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特别提及的事件是以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为首的亲苏知识分子成立了“东突厥斯坦革命青年组织”和“东突厥斯坦革命党”。在此，根据“东突厥斯坦革命青年组织纲领”和“东突厥斯坦革命党章程”以及“组织”和“党”的重要成员的回忆，尝试还原事件的经过，探讨成立这两个政党组织的原因及意义。

“东突厥斯坦革命青年组织”（Xarki Turkistan Inkilawi Yaxlar Taxkilati，以下称为“青年组织”），是在1945年11月15日的第一届东突厥斯坦青年大会上成立的。[9-18]关于青年组织的成立理由，青年大会决议的说明如下：

1945年11月15日我们全体青年听到了我们共和国主席、元帅伊力汗·吐烈阁下的训示以後，更加深刻地了解到目前新省解放革命的责任和使我们年轻的政权永远继续下去的责任重要部分担负在我们青年肩上，同时我们听到我们青年应深刻了解我们光荣的国家，执行我们国家的一切命令，端正我们的品德，同时应广泛地研究、认识和学习□□□［原文无法辨认］的发展、政治、科学知识，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最高级的、文明的□□［原文无法辨认］的自由的幸福国家道路上用极大的努力和积极性工作，是我们青年所担负责任。……为了完成战斗的任务，经过政府批准，团结和组织东突厥斯坦的青年成立了东突厥斯坦青年组织。[9-19]

可以看出，青年组织是作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中最大的青年动员组织而成立的。青年组织制定了严格的章程和规章，[9-20]加入手续正规严谨，[9-21]而且拥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图9-1），因而是一个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政党性组织。

如果从青年大会决议来看，青年组织是在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指导下成立的，当然也就是在伊力汗·吐烈或者政府的领导下展开活动的。[9-22]但是事实上，发起成立青年组织并不是根据临时政府的决议，其筹划者、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临时政府委员、宣传部长、民族军政治部长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这一点，可以为数名青年组织中央执行委员的回忆文章所证实。[9-23]据与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关系密切的文斐然所述，为解决青年组织的运营经费问题，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

夫甚至考虑过抢劫银行，但在文斐然的劝说下最後决定印刷伪钞。[9-24]当然，这一说法是否真实还需要确认，但是，从“青年组织纲领”第54条中的“组织的运营经费由会费支付”一文来看，可以确定青年组织并不接受临时政府的援助而是靠自身财力进行各种活动。

图9-1　“东突厥斯坦革命青年组织”的组织结构图



来源：笔者根据《伊犁全体青年第一次大会决议》和《东突厥斯坦革命青年组织暂行章程》第四章制成。

事实上，青年组织由亲苏知识分子掌握，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保持着一定距离。其主席和副主席都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在由11名委员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维吾尔族和乌兹别克族知识分子占了多数（表9-1）。

表9-1　第一届“东突厥斯坦革命青年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

主席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Abdukarim Abbasow）	政府委员、政府宣传部长、民族军政治部主任 新疆学院高等学部毕业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
副主席	赛都拉·赛甫拉约夫（Saydulla Saypullayow）	有苏联留学经历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
执行委员	赛福鼎·艾则孜（Saypidin Azizi）	教育部长、有苏联留学经历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
	安瓦尔·汗巴巴（Anwar Hanbaba）	有苏联留学经历的乌兹别克族知识分子
	阿不都拉·扎吉洛夫（Abdulla Zakirow）	伊宁出身的维吾尔族人，其他不详
	纳比江（Nabijan）	内务部副部长、拥有苏联国籍的乌兹别克人
	阿斯汗·沙吉洛夫（Asilhan Xakirow）	不详
	布克拉·提什卡·尼巴约夫（Bukara Tixika Nibayow）	不详
	阿力姆·艾托瓦洛夫（Alim Aytowarow）	不详
	伊里奇·扬奇（Irikqi Yonqi）	不详
	波波夫（Popow）	不详

来源：笔者根据《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450-459页，及《伊犁青年第一次大会决议》制作。

青年组织的政治主张也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九条政治纲领”相差甚远。这一点可以从《青年组织纲领》中规定的青年组织的“任务”部分中看出：

第二章：任务；第五条：革命青年组织为了保持并壮大东突厥斯坦的人民特别是青年用热血换来的十一月革命的胜利而活动，为了实现这

一点，（一）提高东突厥斯坦人民的政治觉悟，以民主集中政策为基础，拥护人民政权，在任何地点都为正义进行斗争。（二）加强生活在东突厥斯坦的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为保障他们的平等而斗争。（三）动员青年们的团结力量，对一切阻碍整个祖国建立和扩大民主制度的顽固分子，和专制政权的残余，进行坚决的斗争。（四）为发展我国真正的民主教育和提高文化而奋斗。（五）提高民族革命军人的政治觉悟，加强他们对祖国的责任心。并时时刻刻准备为真正的民主而战斗，使他们成为为人民的解放而牺牲的战士。（六）使他们成为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倡导者。（七）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提高文化的各种事业。（八）帮助为改善职员、工人、农民的生活而进行的斗争。（九）坚决拥护宗教、文化和民族间的平等的原则，并为保护这些而斗争。”[9-25]

《任务》之外，《第一条：总则》的内容也与此大致相同。[9-26] 和临时政府的“九条政治纲领”相比，首先不同的是青年组织的任务几乎都不是对外、而是关于发展共和国内部的社会经济状况、提高生活水平、重视文化教育以及建设民主政治等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这些内容都可以让人感到青年组织就是为了解决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部的问题而成立的。

在政治问题上，青年组织提出“建设民主制度”、“培养具有民主精神的人”、“强化民众的政治意识”、“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等。从“民主”、“民主制度”、“民主集中制”这些政治主张来看，青年组织当然有尽量靠拢以苏联为首的“世界民主主义阵营”的色彩，但是如果将以上主张与他们提出的“宗教的平等”、“发展民主的教育和文化”、“反对独裁政府”、“培养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用的青年”等口号，及其主张实现共和国政治的民主化，主张民众是共和国政治主体综合来看，可以明显感到青年组织的政治主张是为了对抗伊力汗·吐烈的宗教权威而提出的。



هفتده بر چقادر
№13 سان
شنبه
21
دیکابر
1946 یل

انقلابچیل یاشلار

بتون شرقی توركستان انقلابچیل یاشلار تشکیلا

خلق دوستلغی وه یاشلار

青年组织机关报

从“民族革命”到“第二次革命”

青年组织的领导者和发起者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曾是当年发起成立“民族解放组织”的核心人物。据说，在成立青年组织时，他已经开始认为“民族革命并不是我们唯一的革命”。[9-27]根据三位青年组织中央执行委员的说法，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成立青年组织的动机是“保卫并扩大革命成果”，[9-28]“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9-29]“集结知识分子势力”，“为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向青年教授新民主主义”。[9-30]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毛泽东在1940年开始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阶段的理论。它主张，推翻来自外部的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内部的封建主义统治的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设资本主义社会为目的的旧民主革命阶段；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由革命的各阶级联合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革命阶级对传统社会上层进行阶级斗争的革命。

的确，《青年组织纲领》中没有出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的词语。但是许多关于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的回忆文章都指出，曾在新疆学院高中部学习过、精通汉语的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曾有机会接触到“新民主主义”这一词语。[9-31]除赛福鼎外，青年组织的副主席赛甫

拉约夫也提到同一事情，[9-32]因此，以阿巴索夫为首的亲苏知识分子在青年组织成立时很可能参考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但是，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统治范围内进行阶级革命，其对象自然就是以伊力汗·吐烈为首的民族传统社会上层和宗教人士阶层。

亲苏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思想的转变也意味着共和国体制内部的亲苏知识分子们的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应该也与当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面对的内外环境的变化有关。

如前所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部政治结构的最重要特徵，就是两股政治势力的共存体制，即以伊力汗·吐烈为代表的宗教领袖及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社会的上层人士势力，和以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为代表的亲苏的维吾尔族、塔塔尔族等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的知识分子及苏联人构成的苏联势力。在这样的体制中，“激进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活动是无法顺利开展的。在三区革命政府指挥部中，封建统治阶层、地主阶层和宗教人士阶层对他们的活动和提案十分冷淡。宗教部干预所有的事情。由于伊力汗·吐烈本人也是宗教人士，他用宗教价值观来判断所有的事情”。[9-33]

但是，这种体制是一个为了进行“民族革命”的体制，是一个为了动员民众参加“民族战争”的体制。当苏联方面改变了它在新疆的方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方面也最终同意与中国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民族战争被中止後，“民族革命”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也就淡化了下来。在这种形势下，亲苏知识分子和以伊力汗·吐烈为首的传统社会上层两大政治势力之间共存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治权力结构，自然就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而亲苏知识分子们长期以来忍耐以伊力汗·吐烈为首的传统社会上层的理由也就随之消失，长期积攒在他们胸中的不满也就突然迸发出来。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建立青年组织的目的，正是为了集结这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建立独自的阶级政党集团，以发动“第二次革命”，把以伊力汗·吐烈为首的传统社会的上层和宗教人士势力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领导层中驱除出去。[9-34]

在青年组织的建立过程中，没有看到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的身影。所以，可知由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领导的建立阶级政党的工作，是与阿合买提江·哈斯木负责的（和中国政府的）和平谈判在不同的路线上进行的。但是，在对“民族革命”的认识上，能够看到两人的思想变化轨迹上的共同点。1949年时，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如此评论民族运动：“在帝国主义时代产生了两种民族运动，即革命的民族运动和反动的民族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就

是革命的、进步的民族运动。……在形式上也提出‘民族自治’、‘民族自决’等漂亮的口号，但实际上，却为加强和巩固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统治，而严重地打击着人类的解放事业，所以它是属于反动的民族运动。”[9-35]到此时，按照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阶级论的观点来看待民族运动性质的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已经否定了从已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的正当性。

亲苏知识分子们的政治意识从“民族革命”到“阶级革命”的转变，也是与他们仇视汉族的民族主义感情得到缓和同时实现的。1946年2月，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和汉族女性吕素新结婚。这次，他故意使用配备给伊力汗·吐烈的汽车迎接汉族新娘。针对这件事，伊力汗·吐烈气急败坏地说道：

安拉为了拯救穆斯林，赐予我们富有才能的人，那就是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但是很遗憾，他的一半已经被汉族夺走。如果他的全部都被汉族夺走，他就会变成我们的敌人。[9-36]

“东突厥斯坦革命党”

东突厥斯坦革命党（Xarki Turkistan Inkilawi Partiyisi，以下称革命党）是于1946年4月26日秘密成立的。[9-37]关于革命党的名称，不同的资料中记述各异。[9-38]但是，笔者得到的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手书（复印件）的党的章程名称为《东突厥斯坦革命党章程》（Xarki Turkistan Inkilawi Partiyisining Nizamnamisi），党章中第一章“党的名称”内容如下：“我们党是以最进步的知识分子为基础而建立的，党的名称根据当今的国际形势和东突厥斯坦现在的历史发展阶段，规定为东突厥斯坦革命党。”[9-39]因此，革命党的正式名称应该就是“东突厥斯坦革命党”（简称SH. T. I. P）。



阿巴索夫手稿《东突厥斯坦革命党党纲》

革命党实际是以青年组织为基础建立的。[9-40]以主席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为首，七名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中有五人是青年组织中央执行委员（表9-2）。随着革命党的建立，青年组织变成革命党的青年部。[9-41]革命党纲领的第八条确认革命党从组织上领导青年组织："把青年人培养成为战士、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

表9-2　东突厥斯坦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要成员

姓名	党内职务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Abdukarim Abbasow）	主席
赛都拉·赛甫拉约夫（Saydulla Saypullayow）	农村部长
赛福鼎·艾则孜（Saypidin Azizi）	宣传部长
艾萨特·伊沙科夫（Asat Ishakow）	组织部长
阿不都拉·扎吉洛夫（Abdolla Zakirow）	秘书长
安瓦尔·汗巴巴（Anwar Hanbaba）	商业部长
买合买提明·伊敏诺夫（Mamatimin Iminow）	军事部长

来源：笔者据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p. 112-113，及Anwar Hanbaba，"Abdukirim Abbasow Hakkida Aslima," p. 36制作。

实际上，“东突厥斯坦革命青年组织”在发展组织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9-42]既然如此，在青年组织之外成立革命党的必要何在？按照当时担任青年组织中央执行委员和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安瓦尔·汗巴巴的说法，由于青年组织的力量较小，而且在若干方面受到了限制，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为指导革命，才决定成立政党。[9-43]即成立革命党的目的是通过比青年组织更有凝聚力的政党，以保证获取革命的主导权和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领导权。

那麽，青年组织是在哪些方面受到了限制呢？据担任青年组织中央执行委员和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长赛福鼎·艾则孜所称，是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和依此开展教育的活动受到宗教人士阶层的阻挠。赛福鼎·艾则孜还说，党的纲领章程在制定过程中参照了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9-44]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农村部长赛甫拉约夫也指出，革命党的纲领章程是“参考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而起草的”。[9-45]这种说法，可以通过党的纲领章程得到证实：

第二章：党员；第二条：和第三国际［3-intirnatsional］的纲领章程一样，可以成为党员的人，必须无条件遵守、执行第三国际和我党的一切决议，不得拖欠党费，并且以生命和财产为代价而努力遵循党的路线；第三条：我党是革命的党，我党为各民族的解放和独立，为全体无产者的政治、经济、社会平等，无私地、彻底地战斗。作为党员必须为正确的革命理想和最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intirnatsionlchiliq roh］不惜牺牲，努力奋斗。[9-46]

革命党的七位中央执行委员，各自具有一个代名，在决定七人的代名时，他们有意识地让七个代名的第一个字母可以组合成为“列宁主义者”（Lininchi）一词（维吾尔文字中ch为一个字母）。这也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照共产主义政党的性质来组建革命党的（参照表9-2）。可以看出，革命党的性质来自于亲苏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的彻底转变，它也完全不同于“民族革命”结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性质。所以说，革命党的成立，同时意味着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内部两大政治势力共存结构的彻底瓦解。

和青年组织不同的是，革命党不仅对社会，而且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也没有公开。[9-47]在笔者采访中，一位1946年参加民族军的人证实，当时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军人甚至不知道革命党的存在。[9-48]关于这点，赛福鼎做出过如下说明：“不仅要避免遭到政府内部宗教人士和反动分子的破坏和攻击，另一方面也必须对苏联顾问保密。”[9-49]

据说，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最初成立的组织名为“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之後他又成立了“哲学学习小组”，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这样做的原因，据说是打算通过共产主义思想联系和组织知识分子。但是，苏联顾问认为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开始进行“阶级斗争理论的教育”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教育”还“时机尚早”，命令这些组织自行解散。为避免被冠以“反苏”的罪名遭到追究，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最终只能选择了秘密建立革命党的方式。[9-50]

苏联方面反对建立革命党的理由，可能是因为它当时正在促成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和中国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如果这时被发现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存在一个共产主义政党的话，就有可能被认为是毫无诚意，甚至被用来作为指责苏联对新疆存在领土野心的证据。当然，革命党的存在最终还是被苏联共产党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问题上的负责人认可，但是依然被要求作为一个秘密组织而存在。[9-51]

第三节　“共和国”的消亡

第二阶段的和平谈判

1946年3月，张治中在和周恩来、马歇尔一起到各地视察中共军队和政府军的途中，收到苏联大使馆转达的“伊犁民众代表”的意见：张治中部长何时能来迪化，“我们认为张治中部长不来就等於放弃和平谈判”。[9-52]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之所以拿出这种态度，是由于从1945年11月已有政府军的三个军进入新疆，这给“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造成了威胁。[9-53]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准备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的张治中，于1946年3月28日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国民政府随即在29日公布免去吴忠信的新疆省主席职务并由张治中兼任新疆省主席，张治中于4月4日再次来到迪化，开始了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代表的第二阶段的和平谈判。[9-54]

第二阶段的谈判主要围绕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民族军改编为政府军的问题。由于都关注停战後在新疆地区的政治主导权，在谈判中双方就改编军队的数量和驻扎地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初，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要求改编为13个团，分别驻扎在喀什噶尔、伊宁（以上各2个团）、阿克苏、库车、焉耆、迪化、乌苏、阿勒泰、塔城、额敏（以上各1个团）、绥定和惠远（此两处合起来1个团）。但张治中则提出改编不能超过4个团，驻地也不能超过现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控制范围。[9-55]

由于双方的分歧太大，张治中只好找到苏联新任驻迪化总领事萨维利也夫，要求他出面调停。但是与在谈判第一阶段时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叶谢也夫主要支持张治中不同，在谈判第二阶段中萨维利也夫重视维护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利益，处处为其辩护，建议张治中民族军最少应该改编为6个团，并主张应该让他们在现在控制范围以外的地区驻扎。

4月21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首席代表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为向共和国临时政府汇报，乘飞机赶赴伊宁。根据张治中的回忆录，张治中会晤了出发前的拉希木江，传达说民族军可以改编为6个团，但这是最大的让步，并希望尽快提出参加新疆省联合政府的人员名单。但是，25日回到乌鲁木齐的拉希木江，在26日再次开始的谈判中又要求改编为10个团，且要求在喀什噶尔和阿克苏驻扎。张治中断然拒绝，并对东突

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实际负责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表达了其心情："我是负了和平的使命来的，自信对和平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负责到最大限度，如果和平不能获得，我只有引咎辞职。"[9-56]

苏联总领事馆的意图

5月1日，苏联驻迪化新任总领事萨维利也夫提出了"最终调停方案"：民族军改编为7个团，并在迪化和喀什各驻扎1个团；并告诉前来访问领事馆的张治中，如不能接受这一方案，苏联方面将不再出面调停。[9-57]

在5月3日的谈判中，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代表团提出了新的方案。其主要内容如下：（一）民族军改编为7个团，在迪化、喀什、阿克苏各驻扎1个团；（二）设立统一指挥改编的民族军部队的总指挥官，并兼任新疆省的军事副长官，其人选由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推荐；（三）政府军禁止进入伊犁、塔尔巴哈台、阿勒泰三区；（四）废除政治警察，各地警察由当地居民组成；（五）在新疆的政府军人数减至1944年1月时的水平。[9-58]

应该注意的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代表团提出的方案的内容和苏联代理总领事提出的"最终调停方案"基本上一致。这只能认为，要么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代表团接受了苏联总领事馆的意见，要么是代表团和总领事馆共同合作制定了谈判方案。总之，这件事可以清楚证明，苏联通过驻迪化总领事馆，仍然操纵着"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谈判代表团。

然而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是，在此之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会议已经决定接受张治中提出的关于改编民族军为6个团的方案。4月22日，即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从迪化回到伊宁的第二天，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就做出了第271号决议，内容如下：

听了拉希木江关於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情况後，作如下决议：

（一）关於军队问题，按照国民党和我们的代表所达成的协议，革命军队的数目为12,700人，组建6个团，对於省政府委员和各厅可按以下所指定的人员进行任命：

①新疆省政府委员、副主席：阿合买提江·哈斯木；

②省政府委员、民政厅副厅长：拉希木江；

③阿勒泰方面，省政府委员：达列力汗；

④省政府委员、（阿勒泰区专员）：乌斯满·斯拉木；

⑤省政府委员、（伊犁区专员）：伊力汗·吐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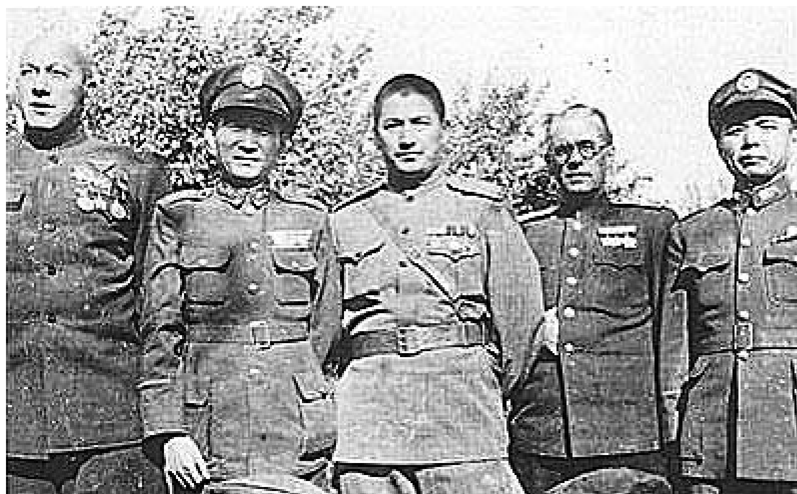
⑥省政府委员、（喀什专员）：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将军；

⑦省政府委员、副秘书长：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

⑧省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赛福鼎·艾则孜；

（二）授权我们的代表拉希木江、阿合买提江、阿不都海伊尔·吐烈与国民党政府在达成的上述协议上签字。

尽管政府决议已经决定同意改编民族军为6个团，但拉希姆江等人回到迪化後却改变口径要求改编为10个团，之後又要求改编为7个团，提出了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意见一致的方案，这一切只能说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谈判代表们又听从了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的意见。



张治中视察民族军

张治中认为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之所以一改过去协助支持自己的态度，是出于他们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反苏政策进行反击的需要。[9-59]当时，在东北问题和中共问题上，国民政府与苏联严重对立，“亲美反苏”的路线越发明显。於是，苏联与在撤销“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阶段中积极协助中国政府相反，和平条款签订後，开始致力于支持保存和扩大“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势力（例如要求民族军部队驻扎在原“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所控制地域以外的地区），目的就是为了在撤销“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以後依旧能够保持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力。

张治中没有同意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提出的方案，而是提出对抗方案继续与苏联总领事萨维利也夫进行

接触。由于资料的欠缺，这期间的谈判内容难以确定。之後的结果是，虽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代表团最终同意了张治中方案的原则，但根据当时任张治中秘书的陶天白的说法，张治中也在几个问题上做出了让步，即废除新疆省政治警察，警察由当地居民组成并以《会谈记录》形式向社会公布此项内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参加联合政府的省政府委员人数由六人增加到八人等。[9-60]之後，双方于1946年5月22日深夜预签了和平条款附属文件（二）草案（正式签订是6月6日）。

和平条款附属文件（二）的主要内容如下：[9-61]

（一）参加事变的民族部队改编为6个团，人数为11,000人到12,000人。

（二）指挥官由三区方面推荐并兼任新疆省保安副司令。

（三）民族军部队在伊犁、塔尔巴哈台、阿勒泰三区驻紮，负责维持治安。

（四）民族军部队的指挥官和政府一起改编喀什和阿克苏的保安部队。

（五）民族军部队的武器装备将来由政府补充。

（六）民族军部队的改编由民族军部队的指挥官执行，对政府负责。

伊力汗・吐烈政治生命的末日

随着和平条款附件（二）的预签，包括民族军总指挥帕里诺夫和塔尔巴哈台区第一副专员曼苏尔等苏联顾问全部撤回了苏联。[9-62]与此同时，在新疆政治舞台上，伊力汗・吐烈的政治生命也走向了终结。

和平谈判开始以来，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内部一度出现过强化伊力汗・吐烈的政治权威的动向。1945年10月22日通过的第114号政府决议授予伊力汗・吐烈以元帅称号；接着，1946年1月9日通过的第193号政府决议授予伊力汗・吐烈尚未制作的最高级勋章——“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勋章”。[9-63]第193号政府决议如下：

为表彰东突厥斯坦革命的组织者、领导者伊力汗・吐烈在革命时期的伟大功绩，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特作出如下决议：

授予使整个东突厥斯坦内生存的几个世纪以来受压迫的各族人民获得解放、平等、幸福的新生活，为维护祖国、民族、宗教的尊严而发动革命斗争并正确领导、英明指挥的，不可战胜的作出历史性重大贡献的东突厥斯坦革命的组织者、领导者、解放组织主席、共和国政府主席元

帅伊力汗·吐烈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特级奖章。

但是，伊力汗·吐烈却在1946年4月给阿勒泰地区的哈萨克族领袖乌斯满·斯拉木的信中预测到自己将从苏联逃亡到新疆，到最後恐怕又要被苏联势力驱逐的命运：“果尔奇特［Qorqit，民间传说中出现的有名的占卜师的名字］从墓中逃出，40年间东奔西逃，最终还是被投入到最初挖掘的墓穴里。”[9-64]就是说，到了1946年4月时，伊力汗·吐烈已经意识到自己将会被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内部的亲苏的知识分子势力所摒弃。

1946年6月4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提出了他们省政府委员及所担任具体职务的名单。6月18日，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公布新疆省联合政府人事任命。

过去几乎不为人知的是，当公布新疆省联合政府的人事任命时，名单上列为政府委员兼伊犁区专员的伊力汗·吐烈实际上已经不在新疆了。1946年6月6日，即和平条款附件（二）正式签订的当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主席伊力汗·吐烈和他的几名亲信一起被驻伊宁的苏联领事馆押送到了阿拉木图。[9-65]关于这次扣押，笔者在对几名相关者的采访中进行了确认，一名与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关系很近的人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这样说道：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赛甫拉约夫等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给伊力汗·吐烈写了一封内容为要求他迅速离开伊宁的匿名信，并用弓箭射入了伊力汗·吐烈的住宅内。伊力汗·吐烈读了之後，急忙要求与苏联驻伊宁领事会面。苏联领事劝他暂时到苏联国内避难，於是出动了两台卡车，当天就将他和家人一起送往苏联。到达苏联後，伊力汗·吐烈立即被软禁。本来知识分子们打算，如果伊力汗·吐烈不离开伊宁就将其暗杀，这次押解、软禁，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最好的方式。



苏联驻伊宁领事馆

6月27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做出了第324号政府决议，也就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最後一个决议，决定从6月28日起，“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改组为伊犁区参议会，塔城区政府和阿勒泰区政府的人事也由新疆省政府进行重新调整。至此，“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历史落下了帷幕。有趣的是，大体上与新疆和平谈判结束及“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消亡同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最终破裂，6月26日中国内战再次爆发。[9-66]

小　结

伴随和平谈判的进展，“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部，以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为首的亲苏知识分子集团和以伊力汗·吐烈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上层这两大政治势力，各自使用不同的政治手段，展开了激烈的内部斗争。“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消亡时期的政治过程最终显现出了这样一组景象：新疆和平谈判的实现——和平谈判代表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的政治地位的上升——亲苏知识分子倡导的“第二次革命”的胜利——伊力汗·吐烈的失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自动消亡。

从表面上来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消亡与实现和平谈判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但是实际上，无论是新疆和平谈判的进程，还是“共和国”政权内部各政治势力的消长，苏联的方针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共和国”政权内部的抗争和“共和国”的最後灭亡，也是遵循了苏联的意图。

1945-1946年时，在外国势力的调停下，中国同时进行着两个和平谈判。一个是由美国出面调停的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和平谈判（“国共和平谈判”）。另一个就是以苏联出面调停的国民政府和新疆省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反政府势力（“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和平谈判（“新疆和平谈判”）。有趣的是，在这两个谈判中，作为国民政府代表的，都是“以善于妥协而着名”的张治中。[9-67]而张治中在这两个谈判中的对手，都是和苏联保持密切联系的政治势力。但是，两个谈判的结局却让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结果：在“国共和平谈判”中，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拒绝接受苏联的意见，之後仅仅三年就取得了掌握中国全境的伟大胜利；[9-68]而在“新疆和平谈判”中，“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力按照苏联的指示行动，却走上了自己断送自己命运的道路。可以看出，无论是对哪一个“和平谈判”，苏联都是完全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进行是非判断的。两个谈判的两种不同结果，都能够反映出苏联支持他国“革命”的利己本质。

注释

[9-1]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114页。

[9-2]《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190页。

[9-3]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第114页。

[9-4]《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191页。

[9-5]《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192页。

[9-6]阿合买提江：《关于和平谈判结局的汇报》，1946年5月25日，未出版资料。

[9-7]根据1945年9月25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内务部第82号命令》（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务部职员手册），其拘捕证内容如下：“（犯人的姓名），中国政权时和官员有密切关系，帮助警察逮捕我们的无辜民众，因而依据与‘帮助中国政权’相关的法律，决定实行逮捕”。

[9-8]阿合买提江：《我们的喜讯》，《解放的东突厥斯坦》，1946年2月3日。

[9-9]阿合买提江：《汲取过去的教训、改正我们的缺点——在塔城人民俱乐部举行的欢迎会上的讲话》，1948年1月18日，未出版资料。

[9-10]阿合买提江：《在伊宁维、哈、柯俱乐部对伊宁各学校教师的讲话》，1949年1月13日，未出版资料。

[9-11]阿合买提江：《和平条款与我们目前的任务所在》，1946年7月16日，未出版资料。

[9-12]阿合买提江：《在伊宁维、哈、柯俱乐部对伊宁各学校教师的讲话》。

[9-13]阿合买提江：《在伊宁维、哈、柯俱乐部对伊宁各学校教师的讲话》。

[9-14]阿合买提江：《和平条款和我们目前的任务所在》。

[9-15]阿合买提江：《在省维吾尔文化促进会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关于国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及近来一个时期我省情况的讲演》，1947年2月17日，未出版资料。

[9-16]阿合买提江：《我们的民族解放革命和同盟》，1949年8月，未出版资料。

[9-17]阿合买提江：《知识分子目前的任务和即将来到的选举》，1946年9月25日，未出版资料。

[9-18]Hakim Jappar, “Yaxlarning Oginix Olgisi Abdukirim Abasow ［青年们的模范——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26 (1989): p. 202.

[9-19]《伊犁市全体青年第一次大会决议》（1945年12月），载《三区革命资料汇编》（革命组织活动资料）（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译，油印版），第57页。

[9-20]《东突厥斯坦革命青年组织暂行章程》详细规定了组织规则。其第40条如下：“会员一定要参加本组织各级机构的各种会议。虚心接受本组织交给的任何任务，并且无条件地执行。”以上见《三区革命资料汇编》（革命组织活动资料），第65页。

[9-21]《东突厥斯坦革命青年组织暂行章程》第9条：“接受为候补会员的人，由两个正式成员的介绍，经过基层组织审查後，交区或者县以及专区委员会审查，通过该组织主席团的决议，然後接受为候补会员呈中央委员会批准。”第15条：“每一个候补成员转正时，必须要宣誓。各级组织在自己范围内在自己主席团监视下进行宣誓。誓词：我情愿和衷心地加入东突厥斯坦革命青年组织，无条件地遵守和执行这个组织的章程，无条件地接受和执行本组织的一切决议和命令，在科学的基础上

发挥民主的精神和发展各民族的事业上不怕一切困难进行斗争。假若违背了誓词，愿受本组织最严厉的处分。宣誓人××××。（各民族根据他的宗教习惯来宣誓）。”

[9-22]大会决议的第3条为：“革命青年组织成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的直接战斗的机构。”

[9-23]Saypidin Azizi, “Aslima 2 ［生命之诗（二）］,” Omur Dastani (Beijing: Millatla Naxiriyati, 1990), p. 108. Saydulla Saypullayow, “Kaysar Jangqi ［勇敢的战士］,” Xinjiang Tarih Matiryalliri 25 (1988): p. 10. Anwar Hanbaba, “Abdukirim Abbasow Hakkida Aslima ［关于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25 (1988): p. 35.

[9-24]杨宗禹、李占民：《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巴索夫夫人吕素新同志纪实》，《伊犁文史资料》，第5辑（1989），第23页。

[9-25]《东突厥斯坦革命青年组织暂行规定》，《三区革命资料汇编》（革命组织活动资料），第59-60页。

[9-26]《东突厥斯坦革命青年组织暂行规定》的总则如下：“第一章：总则；第一条：这个团体定名为东突厥斯坦革命青年组织。第二条：东突厥斯坦革命青年组织是以团结生活在东突厥斯坦的一切青年，并以民主精神培养他们，使他们为东突厥斯坦人们光明的前途和发展及先进的科学基础进行斗争为目的。第三条：东突厥斯坦革命青年组织是一个政治组织，他站在民主的前线进行独立活动。第四条：东突厥斯坦革命青年组织在实现自己目的的时候，以希望解放的人民的民主运动为基础，依靠全体成员的力量和坚强的意志以及其他同情民主人民的拥护。”《三区革命资料汇编》（革命组织活动资料），第59页。

[9-27]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 111.

[9-28]Saydulla Saypullayow, “Kaysar Jangqi,” p. 10.

[9-29]Anwar Hanbaba, “Abdukirim Abbasow Hakkida Aslima,” p. 35.

[9-30]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 109.

[9-31]据赛福鼎·艾则孜说，1945年夏，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一边亲自翻译毛泽东的论文《新民主主义论》一边给同志们解释。那篇论文据说是从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以前的恋人，汉族人杨凤仪那里得到的。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第109-111页。

[9-32]Saydulla Saypullayow, “Kaysar Jangqi,” p. 13.

[9-33]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 107.

[9-34]“第二次革命”一词，据赛福鼎·艾则孜说，最初是由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使用的。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第83页。

[9-35]阿巴索夫：《目前的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9年5月11日），《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6辑（1983），第3-4页。

[9-36]关于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的结婚（仪式），参照杨宗禹、李占民：《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巴索夫夫人吕素新同志纪实》，第28页。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在新疆学院高等学校部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教育，也接受过中国共产党员林基路的授课。1945年5月，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在伊宁听到林基路被盛世才杀害之事，为悼念恩师写了这首诗：从乌鲁木齐传来噩耗，我的泪水如喷涌的洪水一样流淌。恩师的革命勇气永远鼓励我，他的精神永远闪耀光芒。培育的幼苗茁壮成长，伊犁区的正义旗帜高高飘扬。从三区奔腾而出的成群的赛马向着赛马场，革命的烈火燃烧直到山脚。把一切恶魔赶入深渊，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挺起胸膛，奔向战场，我们的血染旗帜，使她四射光芒。据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p. 87-88，笔者译。由此可知，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并没有对汉民族抱着深深的仇恨。之後他被撤销内务部部长职务的原因据说是下令处死两名强奸汉族女性的军官。

[9-37]无名氏：《民主革命党简史》（1948年），《三区革命资料汇编》（革命组织活动资料），第 53页。

[9-38]3约夫说党的名称是人民革命党（Khalikning Inkilawi Partiyasi）（据Saydulla Saypullayow, “Kaysar Jangqi,” p. 14），安瓦尔·汗巴巴也说党的略称为H. I. P（据Anwar Hanbaba, “Abdukirim Abbasow Hakkida Aslima,” p. 36）。

[9-39]Abdukarim Abbasow, Xarki Turkistan Inkilawi Partiyisining Nizamnamisi［东突厥斯坦革命党章程］（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手书维吾尔文，复印件）。

[9-40]Ablimit Hajiyow, “Olmas Jangqi, Xanlik Tohpa ［永生的战士、光辉的功绩］,” Yingi Jonggo Kurux Yolida Kurban Bolganlar (Urumqi: Xinjiang Halik Naxiriyati, 1991), p. 97.

[9-41]Saydulla Saypullayow, “Kaysar Jangqi,” p. 14; Anwar Hanbaba, “Abdukirim Abbasow Hakkida Aslima,” p. 37.

[9-42]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 109.

[9-43]Anwar Hanbaba, “Abdukirim Abbasow Hakkida Aslima,” p. 36.

[9-44]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p. 109-112.

[9-45]Saydulla Saypullayow, “Kaysar Jangqi,” p. 13.

[9-46]Abdukarim Abbasow, Xarki Turkistan Inkilawi Partiyisining Nizamnamisi.

[9-47]Ablimit Hajiyow, “Olmas Jangqi, Xanlik Tohpa,” p. 54.

[9-48]这次采访是在1991年8月14日进行的。采访对象于1946年参加民族军，後来升任团政治部主任，20世纪80年代担任新疆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所长。

[9-49]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 113.

[9-50]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p. 110-113.

[9-51]Saypidin Azizi, “Aslima 2,” p. 115.

[9-52]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446页。

[9-53]余湛邦：《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张治中机要秘书回忆录》（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122页。

[9-54]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445-446页。

[9-55]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447-448页。

[9-56]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449页。

[9-57]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449页。

[9-58]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450页。

[9-59]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449页。

[9-60]陶天白：《张治中与三区革命》，《伊犁文史资料》，第4辑（1988），第70页。

[9-61]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452-453页。

[9-62]《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428、445页。

[9-63]3月19日的第245号政府决议首次决定“为了表彰为共和国做出显着贡献的人，设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勋章”。20日的第246号政府决议

决定将这一勋章授予帕里诺夫和伊斯哈克别克。

[9-64]Patihan Sugurbayow, “Osman Zadi Kandak Adam［乌斯满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 Ili Tarih Matiriyalliri 6 (1992): p. 123.

[9-65]《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203页。

[9-66]姚夫等编：《解放战争纪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第121页。

[9-67]ラディモア：《アジアの焦点》（东京：弘文堂，1951），第120页。

[9-68]关于这点，1948年斯大林说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後，我们把中国的同志召集到莫斯科，讨论中国局势。我们认为中国的起义是没有希望的，直接告诉他们应该谋求和蒋介石的临时协议，参加蒋介石政府，军队也应解散。但是中国同志在这里赞同苏联同志的意见，回到中国之後却做了别的事情。他们集结自己的力量，组织自己的军队，然後就像我们现在知道的那样逐渐击败了蒋介石的军队。对于现在中国的情况，我们承认我们错了。事实证明不是苏联同志而是中国同志是正确的。”见ロバード・C□ノース：《モスクワと中国共産党》（东京：恒文社，1974），第316-317页。而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如是说：“那是1945年时候的事情，斯大林想要阻止中国革命，不许我们内战，必须和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将有灭亡的危险。当时没有执行［这一命令］，之後，革命获得了胜利。”《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载东京大学近代中国史研究会译：《毛泽东思想万岁》，下册（东京：三一书房，1975），第52页。

第十章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对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深入分析

毫无疑问，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尤其是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那段无法抹去的历史，无论是对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社会的前途，还是对多民族国家中国的现代政治进程，都留下了巨大的难以消除的影响。但是，尽管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持续时间如此之久、形成规模如此之大，最终却仍然没有取得成功。这个结局究竟可以给後人们留下什么样的启示？在中国社会仍然不断受到东突厥斯坦独立思想困扰的今天，分析这个问题，无疑有助于加深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实质的理解。

在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以及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治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接受了现代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具有亲苏倾向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因此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具有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双重性质。但是，由于在当时新疆地区的维吾尔以及其他民族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民众基础薄弱，知识分子阶层根本无法期待能有多少人直接认同他们的领导权。於是，知识分子阶层除了对内继承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传统、与民族传统社会上层及宗教阶层联合之外，从外部谋求并得到了别有用心的苏联的支援。然而，在严峻的民族社会现实和冷酷的国际政治局势面前，不仅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民族革命性质受到改变，事实上，亲苏知识分子提倡的社会革命的理念也无法得到彻底实现。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

第一节　　苏联的意向和不民主的政治体制

1945年1月5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4号决议》，即1945年的"九条政治纲领"的第2条如此定义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国体："在东突厥斯坦境内所有人民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真正自由独立的共和国。"然而，尽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标榜主权在民及共和制，但是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治中，却存在着诸多不民主的因素。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实际上把民众排除在政策制定过程之外。的确，1945年5月13日公布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刑事诉讼暂行规定和临时刑法》正式承认了公民的选举权："凡居住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国土上的各民族男女都是国家的国民"，"作为国家公民的人（依据暂行规定，各族男女）都有选举权"。此外，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也是在1944年11月12日的民众大会上遵循民主的程序选出的。但是，在这唯一的一次民主选举以後，再也没有进行过一次实质性的选举。由于选举制度的不完备，对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各项政策，民众几乎没有能够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这也是造成苏联能够左右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治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制定政策过程，具有浓厚的密室政治色彩。从政府决议的内容来看，所有重要政策的制定或者人事任免的形成，都好像是通过政府委员会的商议之後才决定下来的。但实际上比起表面的政府委员会决议，不如说在幕後的、由包括亲苏知识分子在内的苏联势力主导的密室政治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例如，在最初的共和国政府人事安排、从伊犁区向塔城区和阿山区的军事进攻，以及决定同中国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等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如前文中所论述的那样，实际上在提交给临时政府政府委员会讨论之前已经有了决定，临时政府决议只是走一个过场而已。同时，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领导层里存在着实质的和表面的两个政策制定系统。宗教领袖和民族传统社会上层尽管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社会统合和战争动员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在制定政策问题上却没有具体实际的发言权。



共和国的领导人们（前右一为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右二拉希姆江・萨比尔・哈吉，右三达列力汗・苏古尔巴约夫，右四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右五安瓦尔・穆萨巴约夫，右六赛福鼎・艾则孜）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治体制绝非社会主义体制，在发挥宪法作用的两个“九条政治纲领”中，都没有写入任何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有关的内容。但是，由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从各个方面都强烈依赖苏联，所以在它的政治权力构造中可以看到有模仿苏联的地方。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临时政府委员会。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号决议》的内容可以看出，临时政府委员会是一个集行政、立法、司法以及关于宗教问题的最高权力于一身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其之下设立各部（参照图6-1）。虽然也设立了监察委员会，但它只是政府内的一个机构，其作用也只不过是“为促进政府各部门正确执行政府的命令”而已。[10-1]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没有议会制度，也没有人民代表大会那样让民众表达意见的机构。总之，没有确立权力分立的原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都属于临时政府委员会这点来看，它和当年苏联的苏维埃相似。

由于苏联对其境内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和伊斯兰教实行镇压政策，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中间，有很多人对苏联抱有一定反感。一部分民族运动领导人在与旧政权斗争的时期曾经接受过苏联的支持，但在实现初期目标之後，对于苏联势力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治领域内的专横跋扈也迸发出不满情绪，阿山区的哈萨克族领

袖乌斯满·斯拉木便是一例。

乌斯满是最早领导阿山区哈萨克族牧民开展反政府武装活动的，他一度被哈萨克族牧民称作为“乌斯满·巴图尔”（英雄乌斯满）。但在1945年9月阿山区合并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力范围後成立各级政权时，就任了阿山骑兵团长、警察局局长、各县县长等要职的，却都不是乌斯满的亲信，而是从苏联来的人或者亲苏的哈萨克族人。所以他即使被任命为阿山区专员，也一直不肯前去赴任。10月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和平谈判开始以後，为了不给中国政府留下干涉内政的口实，苏联又强行收回了过去支援哈萨克族反政府武装组织的武器。这件事也引起了乌斯满的强烈不满。[10-2]

乌斯满的反苏情绪首先与他的伊斯兰教信仰有关。1930年代从苏联逃亡到新疆的一位哈萨克宗教人士曾告诉乌斯满“苏联消灭宗教”，据说这件事极大地影响了乌斯满的思想变化。[10-3]乌斯满的反苏情绪，也和苏联的哈萨克人的反苏倾向有关。据乌斯满自己的说法，由于苏联曾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哈萨克人实施过残酷的镇压，所以中国新疆的哈萨克族人本来就对苏联抱有严重反感。[10-4]所以，当阿山区被合并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力范围後，乌斯满的许多部下就很快投降了国民政府。[10-5]

和平谈判开始後，在阿山区政府部门和阿山骑兵团中的苏联顾问都被撤走。[10-6]之後的1945年11月4日，乌斯满才来到承化就任了阿山区专员。[10-7]据说，他就任之後要求遵守伊斯兰教的沙里亚法，下达命令：“对不做礼拜者［namazni okumigan］处以鞭笞50鞭、不封斋者［roza tutmigan］处以鞭笞100鞭，不禁酒者［harak iqkan］处以鞭笞30鞭的刑罚。”[10-8]由于乌斯满采取的政策与他到任之前的政策完全不同，乌斯满很快就和亲苏的哈萨克族领导人之间发生了冲突。於是，乌斯满在1946年3月19日离开了承化，来到可可托海县境内重新组织了自己的部队。[10-9]从5月开始，乌斯满又在阿山区东部的青河、可可托海、福海等数县开始独自征税，表示不再承认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权威。[10-10]



乌斯满·斯拉木

1946年5月，苏联采钨队根据1940年时与盛世才签订的协议，进入乌斯满的根据地——可可托海县开始采掘。[10-11]乌斯满强烈主张以武力驱逐采掘队：“我不会给侵略我们领土、我们宗教的任何人敞开任何道路。”[10-12]但是他的做法，遭到亲苏的阿山区副专员和阿山骑兵团长

特列力汗的强烈反对。面临两位领导人的对立，阿山区哈萨克族各部落有影响的人物聚集在乌斯满居住的库韦（Quw Oy）地方商讨对策，但是最终也未能达成共识。於是，阿山区的哈萨克族终于分裂为亲中国国民政府和亲苏的两派。[10-13]

毋庸赘言，对于弱小民族发动的独立运动而言，来自大国的支援是其走向成功的最重要条件。但是，这本来应该以不丧失本民族在政治上的主体性为原则。其理由很简单，就是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任何一个大国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基于本国的国家利益而采取行动的。在此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除了苏联以外，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没有和其他任何国家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接触，没有进行过任何寻求外交承认的活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将实现独立的愿望完全寄托于苏联，这就使得苏联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为所欲为地利用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

由于对苏联的依赖，苏联对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具有极大的发言权，而当地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政治主体性也因此被极度削弱。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建立以後，权力体系中不仅存在很多不民主的部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目标也变得模糊起来，这些都与苏联所拥有的强大发言权有关。从1945年下半年时苏联改变新疆政策开始，领导层中的亲苏知识分子们遵从苏联的意旨，积极赞成与中国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放弃了民族独立和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这是从最初就完全依赖苏联的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所无法逃脱的历史命运。从此意义上来说，埋葬了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成果——“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正是最早发动了运动，并且直到最後都一直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主角的亲苏知识分子自身。

第二节　近代化的目标和传统社会之间的矛盾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很重视教育。1945年10月15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08号决议》曾经如此论述教育的重要性：

目前，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彻底推翻汉人政府的殖民统治，解放全国。第二个重要任务就是发展教育事业。因为文化教育是促进我国军事、政治、经济发展的动力。从前，吸人血的汉人统治者，实行反动教育，为自己的反动统治培养走狗。结果，东突厥斯坦的广大人民受不到正常的教育，许多学龄儿童不能入学。自从爆发了反对汉人政府的革命以後，我们不断取得了胜利。现在，全国即将解放，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培养我国未来的主人青年一代。

把教育同民族解放和建设民族国家联系起来考虑，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教育思想的特徵，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中国政府的文化同化政策所带来的民族文化被毁灭的危机感。“我国人民拿起武器反对汉人政权斗争的原因之一，就是殖民主义者对东突厥斯坦人民教育事业采取充满野心的政策。”[10-14]同样，在教育部设立语言文学局，实行对优秀民族文学作品创作的奖励，也应该是基于同样的考虑。[10-15]

特别是在培养教员方面，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做了最大的努力。1945年3月5日的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9号决议、8月1日的临时政府命令、8月2日的第78号决议、10月15日的第108号决议，反复命令在战争时期脱离本职工作而成为军人、政府职员、商人的教员回到原来的教育岗位上。而且，临时政府委员会还在1945年3月、12月、1946年5月分别做出决议，决定开设教员培训班。[10-16]另外，临时政府委员会还曾专门作出决议，命令将已经成为军队驻地的学校校园归还给学校。[10-17]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教育不是传统的伊斯兰教育，而是现代学校教育。从中学教师培训班的学科科目可知，中学的课程有语文、物理、数学等。[10-18]特别应提及的是，设立了城市七年、农村四年的义务教育制度，免除了学习费用。应该指出的是，不论它是否真正得到执行，从时间上来说，它甚至早于中国政府制定的义务教育制度。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制定了教育纲领，并以苏联的教育体制为现代学校教育体制的范本，采用了苏联的十年学制。据说，因最初没有课本，在维吾尔族学校、乌兹别克族学校、哈萨克族学校、塔塔尔族学校

里，都使用了苏联中亚地区未废除阿拉伯文字时代的旧课本。[10-19]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建立了近代的法律体系。先後制定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县级法院组织机构和临时办事守则》（1945年4月18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刑事诉讼暂行规定和临时刑法》（1945年5月13日）、《临时政府最高法院经济诉讼法临时手册》（1945年6月6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刑法暂行规定》（1945年8月23日）等法律。

《刑事诉讼暂行规定》确定建立具有警察、检察、法院三者的现代司法体系（第14条、第38条），反复要求贯彻重视证据（第22条、第33条）和实行司法公正（第45条、第46条）等原则。《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县级法院组织机构和临时办事守则》中，也规定了法院院长的选举制度（第2条）以及人民陪审员制度（第4条）。《刑法暂行规定》中刑法条例第260条，甚至还确立了律师制度。

《临时刑法》中将刑事犯罪分为政治罪、盗窃罪、渎职罪、不服从政府法令罪、伪造文件罪、侵害人身罪、强奸妇女罪。确立了将加害者造成的伤害程度作为量刑标准的原则，刑罚的手段也主要是惩戒意义上的监禁刑罚。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虽然也存在死刑，但下达死刑判决的权限仅限于最高法院，并且承认被判死刑的犯人有在72小时以内上诉的权利。[10-20]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法律体系的最重要特徵，是从刑事犯罪审理中排除了宗教因素。1946年4月10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58号决议》，规定政法干部培训班的讲习科目为“国家政策、司法的权力和义务、东突厥斯坦历史、国际形势、刑法及刑罚的具体运用、审判程序、民事诉讼”。由此可以看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法律没有将伊斯兰教法沙里亚作为法律根据。根据《最高法院经济诉讼法暂定规则》第5条规定：“哈萨克族同胞之间发生的诉讼案件，如果有关人命案，须根据法律追究责任。不允许在本地双方达成协议或索命等自行处理解决。”也就是说，伊斯兰法中一个重要的刑法原则——“基沙斯”（报复），在共和国的司法体系中也受到禁止。

1946年3月颁布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关于宗教的政府决议》的第1条规定：“保护各教派的宗教自由权利。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领域的各教派协会，一律予以登记。”也就是说，尽管临时政府主席是一个伊斯兰教人士，政治领域中许多方面都有伊斯兰教的色彩，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最终拒绝成为一个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国家。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具有追求社会近代化的目标，其原因就在于亲苏的知识分子阶层才是“共和国”的政治主导力量。据说当初

伊力汗·吐烈反复主张把《古兰经》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导入以伊斯兰教的沙里亚法为基本法律的伊斯兰国家的政治体制，但由于遭到亲苏知识分子们的强烈反对而最终没有成功。[10-21]

但是，在传统社会结构基本上不可能被解体的时代，亲苏的知识分子们推行的社会统合和民众动员方式显然是力不从心。所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教分离原则，传统的社会经济体系也被保留下来。1945年1月5日的“九条政治纲领”声明：“银行、邮电、森林等及一切地下资源都归国家所有。”但是所有的政府委员会决议都没有触及到关于土地所有的问题。从1946年3月3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34号决议》第4条中可以看出，农村的传统领导阶层、如千户长、百户长，以及旧的社会构造被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所完全继承。

关於在伊宁市、县征收国家公粮问题：伊宁市和伊宁县征收公粮问题向广大农民宣传教育工作做得不太好。在政府主席、元帅伊力汗·吐烈的领导下召开了各县的千户长、百户长以及民间有名望的人士座谈会，会上强调了征收公粮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了把征粮工作很快地完成，除农村的千户长、百户长等人外，县上又从国家机关（如财政部、内务部等单位）抽调了得力干部，深入农村向广大农民进行宣传教育。[10-22]

为了控制社会，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承认了伊斯兰教进行社会统制的权利。如1946年2月29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31号决议》，虽然允许成立妇女协会，但却附加了诸多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条件：“三，由宗教事物部和教育部负责监督和管理；……五，严禁穆斯林妇女同男人一道看电影、看戏；……六，妇女的服饰要符合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根据1946年5月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第277号决议》，酒类的贩卖也遭到了禁止。

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司法系统中，法院和伊斯兰宗教法院同时存在，它表明了当时由知识分子主导的社会革命的局限性。当然，由于刑事犯罪必须通过法院进行审判，宗教法院并没有成为司法系统的主流。[10-23]但是，遗产继承、婚姻纠纷、孤儿和寡妇问题、宗教问题等民事案件的审理，都属于宗教法院的权限。甚至可以看到伊斯兰教介入学校教育的现象。财政部为完备学校设施、印刷教材而拨出了特别经费，[10-24]但教育经费基本上是用宗教部征收的宗教税——欧舍儿以及由宗教部和教育部从民间收取的札卡特来充当的。[10-25]

第三节　“共和国”的大维吾尔主义倾向

在新疆有五个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它们分别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兹别克族和塔塔尔族。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权中，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都拥有自己的代表。例如，临时政府主席伊力汗·吐烈是乌兹别克族，副主席阿奇木别克·和加是维吾尔族，教育部长哈比卜·约奇是塔塔尔族，民族军副总指挥伊斯哈克别克是柯尔克孜族，游牧业部长奥布尔哈里·吐烈是哈萨克族。虽然也有蒙古族的政府委员，但没有被分派担任任何实际政府职务，成为了“民族平等”的一个装饰品。从临时政府委员会的这种民族构成中，可以看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实际上就是要建设一个以突厥系伊斯兰各民族为主体的国家。

但是，即使同属突厥系伊斯兰民族，也能够看出各个突厥系伊斯兰民族之间的政治地位并不平等。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境内的总人口为705,148人，其中哈萨克人约占52.1%，维吾尔人约占25.3%（表10-1）。然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指挥部的构成，并未反映出这种民族构成比例。1944年11月12日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的17名委员（Wakitlik　hokumiti　azasi）中，维吾尔族占了10名，俄国人2名，塔塔尔族2名，乌兹别克族1名，哈萨克族1名，蒙古族1名（参照表6-1）。仅从人数和所担任职务上来看，也可知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主要由维吾尔人构成。

新疆的乌兹别克族和塔塔尔族的人数一直都很少。根据1944年时新疆民政局的调查，当时的新疆省总人口中，乌兹别克族仅占0.26%，塔塔尔族仅占0.14%。[10-26]尽管如此，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主席是乌兹别克族，另外担任政府要职的塔塔尔族政府委员也有两名。与此相比，占当地人口半数以上的哈萨克族仅有一名被任命为游牧业部长的政府委员。据此可以想像，哈萨克族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重大政策决定几乎不起任何作用。

表10-1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境内的总人口以及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居民比例

	总人口	哈萨克族（居民比）	维吾尔族（居民比）
伊犁区	471,686	210,672（44.7%）	165,416（35.1%）
塔城区	170,442	103,180（60.5%）	10,515（6.2%）
阿山区	63,040	53,352（84.6%）	2,596（4.1%）
合计	705,148 人	367,204 人（52.1%）	178,527 人（25.3%）

来源：笔者根据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327页；周东郊：《新疆十年》，第312页制成。

1944年11月12日以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一共任命了九名新政府委员（表10-2）。除被任命为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的塔塔尔族人瓦哈什・哈吉、从苏联率军而来的俄国人帕里诺夫和柯尔克孜族人伊斯哈克别克、被任命为和平谈判代表的维吾尔族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之外，在塔城区、阿山区相继进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势力范围之後，临时政府又任命了五名哈萨克族政府委员。但在五人中，一人本无就任可能，三人是地方政府和地方武装领导人，剩下一人虽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首都伊宁，但没被安排任何实际的职务。总之没有一位哈萨克族人能够真正进入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制定政策的领导层中。[10-27]

表10-2　1944年11月12日以後任命的政府委员

姓名	民族	职务	革命前本职	任命决议
瓦哈什·哈吉（Wakax Haji）	塔塔尔族	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不详	1945年3月13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33号决议》
帕里诺夫（Palnof）	俄国人	民族军总指挥	苏联军官	1945年8月9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79号决议》
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Isakbik Mononow）	柯尔克孜族	民族军副总指挥	在苏联流亡	同上
亚布克拜·阿克拉奇（Jabukbay Aklakeqi）	哈萨克族	无	千户长	1945年8月2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84号决议》
乌斯满·斯拉木（Osman Islam）	同上	阿山区专员	游击队领袖	1945年9月23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有关阿尔泰地区的决议》
达列力汗·苏古尔巴约夫（Dalalkan Sugurbayow）	同上	阿勒泰骑兵团团长	在苏联流亡	同上
艾力木（Alim）	同上	无	郡王	同上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Ahmatjan Hasim）	维吾尔族	政府军事部长	留学苏联	1945年10月19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03号决议》
巴斯拜·楚拉克（Basbay Qulak）	哈萨克族	塔城区专员	大地主	1946年1月29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16号决议》

来源：笔者根据所有《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决议》内容制成。

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相对于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人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来说，哈萨克族人之所以地位偏低，其理由能够列举出以下两点：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哈萨克族人自身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就没有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人那样的热情。在历史上，阿山区和伊犁区曾是各自独立的行政单位。伊犁区的中心伊宁，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成为过阿山区的行政中心。[10-28]维吾尔族人基本居住在伊犁区，哈萨克族人大量集中在阿山区和塔城区。本来，在哈萨克族人中就没有东突厥斯坦这一意识。就像1930年代的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所表现出的那样，“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原本是由维吾尔族居民所发动并以维吾尔族居民为主体的运动。阿山区或者新疆北部的哈萨克族地区，只是在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时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时代才开始被包含到“东突厥斯坦”的范围之中的。因此事实上，即使在同来自伊犁区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力合流之後，阿山区的哈萨克族游牧民们也没有和在伊犁区的共和国政府之间建立起正式的行政联系。[10-29]

但是，两者之间没有密切联系的最重要原因，还是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人对哈萨克族人的民族歧视意识。在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各族之间，由于他们的经济生产方式基本都是从事绿洲农业和商业贸易，互相之间的民族和文化的差异并不显着。[10-30]但是哈萨克族传统的生产方式为草原游牧业，人口中大多为牧民。因此，虽说同为突厥系伊斯兰民族，事实上，哈萨克族人与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和隔阂。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人对于从事草原游牧业并拥有与他们完全不同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哈萨克族人，常常有意从文化方式和经济方式上加以区别。[10-31]这种歧视意识也被反映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行政当中。

1946年4月16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62号决议》以很严厉的口气做出了以下指示：“一，财政部计划科批准阿山区制定的321,360元的预算；二，对上述款项，阿山区所属各级机关要严格审查。本部门批准的费用金额开支，各种费用应及时由机关首长和主办会计负责向专区国家银行交付办理；三，对非法挥霍国家资财者（系指开支超过政府批准预算款项的人员），要依法严肃处理。”这里所说的预算即1946年度的预算。把这一情况同1945年8月2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85号决议》命令在阿山区发行5,000万元的“胜利国债”一事相比，不难看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将阿山区的哈萨克族牧民当做经济榨取对象的一面。

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62号决议发出时，阿山区财政局局长拉提夫・穆斯塔法正在伊宁。按照1946年度预算拨给阿山区的预算经费，可能就是由他运往了阿山区。但值得注意的是，拉提夫・穆斯塔法的伊宁之行，可能成为日後阿山区哈萨克族人分裂的契机之一。拉提夫5月回到承化後

不久便投奔了乌斯满・斯拉木阵营，之後乌斯满便开始在青河县、可可托海县、福海县独自征税。税收本来是属“共和国”政府的权利，在承化的阿山区政府因此与在伊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之间开始出现对立。从围绕阿山区的税收而发展到政治对抗一事可以看出，阿山区的哈萨克族对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榨取哈萨克族的财政政策抱有强烈的反感情绪。[10-32]

第四节　“共和国”的经济

从1946年度的国家预算来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最大收入来源是同苏联的贸易（表10-3）。但正如前文述及，由于这笔预算的主要内容是以独山子油田的石油偿还苏联的军事援助，因此这笔收入可能只是帐薄上的数字，而没有实际的收入。虽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也向苏联出口家畜等，[10-33]但因为苏联的利己主义，所以这也不可能获得较大的利益。[10-34]由此可知，缺乏近代工业，而且背负庞大军费开支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可以用以维持财源的，只有没收汉族居民的财产、实行重税、发行赤字国债和发行纸币、征集捐款和征收无偿劳役等方式。

表10-3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946年年度预算的收入部分（单位：千元）

项目	金额
对外贸易收入	736,957
游牧税	545,000
商业税	402,517
土地税	146,170
烟草税	14,694
印花税	2,000
屠宰税	4,968
塔城区上缴税金	424,228
教育部收入	73,980
宗教部收入	64,359
捐款收入	50,000
油田收入	45,000
国家银行收入	25,000
农业部收入	8,875
报社收入	8,561
卫生部收入	7,432
最高法院收入	5,575
邮局收入	5,000
印刷厂收入	4,709
运输业收入	4,244
罚款	3,643
药店收入	3,000
收入合计	2,585,912
支出合计	2,780,388
赤字	194,476

来源：笔者根据1946年3月14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41号政府决议》制成。

没收旧政权和汉族居民的财产主要是在革命初期进行的。[10-35]1945年1月16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9号决议》规定：

一，汉人政府所设立的军事官僚机构坐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们是靠掠夺人民财产、行贿受贿而富裕的。这些盗贼的财富根本不是自己用血汗挣来的，而是东突厥斯坦人民辛勤劳动得来的。对於这些不义之财，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毫不犹豫地予以没收，计入国库；二，在伊犁地区，推翻旧政权而建立起来的人民共和国政权，虽然已两个月了，但那些顽固不化的拥护汉人政府的死党仍然无视新政权的一切宣传和通告，继续武装反抗人民的新政权，企图复辟。对於这些人的财产，政府决定一律予以没收充公；三，为了尽快落实以上两条决定，责令财政部负责执行；四，对於那些物主在革命时期自杀身亡、无主而归国家所有的财产，除留部分给其子女作为生活费、部分报经财政部批准，交战利品办公室外，其余财产全部转入政府经济收入帐内。

但是，没收旧政权和汉族居民的财产，其收入也是有限的。如果看1946年的年度预算，可知税收被看做是这一年的最主要的收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规定的税率很高。例如，1945年8月19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82号决议》规定土地税是收获总额的12%。[10-36]1946年1月22日的第210号决议提出：“在征收中国政权时代不缴纳的税收时，关于在经济上确实有困难的人的名单，财政部、土地水利农业部、县政府必须向中央政府报告”（第8章第3条）。由此可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甚至追收旧政权革命以前没有缴纳的土地税等。而由1946年1月12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97号决议》规定，一般商业税是每三个月流动资金总额的2%，如果转卖于其他行政区则再加征流动资金总额的2%，国际贸易税为商品价格的7.5%，家畜买卖税为价格的6%，土地买卖税为价格的10%，这些都远远超过伊斯兰法规定的年收入2.5%的税率。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采取了各种方法从民间筹集资金。例如，“为了交通管理”而对从马车到汽车的各种车辆实行登记并收取高额的登记手续费。[10-37]1945年7月还发行了“印花票”（兼作邮票）。[10-38]除此之外，还把国有土地和地主不在的土地让农民租种，从中征收高达收成的三分之二作为地租。[10-39]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发行的钞票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後，新疆省商业银行发行的纸币——“省币”一时仍被允许流通。由于1945年7月时新疆省物价暴涨，临时政府决定在省币上加盖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银行的印章。[10-40]在盖章省币流通的同时，从1945年1月至1946年5月末，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财政部还发行了三亿两千零二十万元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财政部国家银行债券”。塔城区银行截止1946年5月末已发行了五百万元的“塔城银行债券”，阿山区纸币发行委员会也发行了具体数额不明的“阿山银行债券”。1945年8月20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83号决议》决定，为解决军费的不足增发一亿元的纸币。由此可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纸币发行，并不是根据市场的货币需求量，而只是政府将其财政赤字转嫁给民众的一种手段。[10-41]

另一种转嫁方法是发行赤字国债和从民间借款。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先後三次发行无利息国债两亿元、有利息国债三亿元，总额达五亿元。[10-42]每次发行国债，便成立以政府主席伊力汗・吐烈为委员长的国债发行委员会，[10-43]并要求内务部协助。[10-44]由掌管警察和司法职能的内务部协助发行，实际上就是强制购买。从此也可以看出发行国债对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经济的重要性。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还通过宗教部和教育部大力推进筹资活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筹资活动的特徵是，它在为支持“圣战”和发展民族文化教育的“欧舍儿”（什一税）和“札卡特”（天课）的名目下进行的。[10-45]从1946年年度预算中宗教部和教育部收入的金额来看，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经济而言，民间捐款也占据重要的位置。1945年7月26日临时政府委员会第71号决议的第5条决定，各县县长都要参加征收“欧舍儿”等筹资活动；1946年1月16日的第206号决议还决定成立“捐款促进委员会”。

另外，还以“为了祖国”的名义常常要求民众付出无偿劳动。为制作军装，多次动员全国做鞋和做服装的工匠。[10-46]1945年10月27日的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18号决议命令：“动员东突厥斯坦全国的裁缝和鞋匠在一个月内到军队服役，［每个人的］工作量由军队後勤部决定。完成工作量者可以提前回家，不服从动员的人将被视为祖国的敌人而依军法处置。”

1945年12月2日的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42号决议决定：“现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所以在财政部成立‘借款回收委员会’，全部收回贷给民众的现金。”临时政府委员会决议屡次发出同样的返还借款的命令。[10-47]居民还不得不返还在旧政府时代从银行借贷的贷款。[10-48]总之，东突

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几乎是不择手段。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严格检查财政支出，[10-49]甚至让政府职员从事农业生产。[10-50]即便如此，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依然严峻，完全没有余力进行公共事业建设，对军人家庭实施的配给制很快崩溃，[10-51]甚至出现了难以支付国家公务员薪水的事态。[10-52]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经济状况的恶化日益明显。1945年2月3日的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9号决议规定下级军官的月薪为500元，但根据1946年1月5日第185号决议规定的工资制度，甚至工厂工人的第一个月工资都已上涨到3,500元，即在一年中，通货膨胀率至少达到700%。

临时政府财政部制订的《关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三区截止1946年6月1日的收支状况的报告》透露："政府资金为337,039,083元，借款为16,080,000元，国债借款为477,000,000元。现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已完全没有剩余的现金。也不可能在两年间内积聚财产。截止6月1日，账面的数字也都是从国民那里借来的。"由此可知，到与国民政府签订和平条约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财政上实际已经濒临破产。

第五节　“共和国”的历史意义

1946年7月1日，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赛福鼎・艾则孜等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同柯尔克孜族的伊斯哈克别克，在迪化分别就任了新疆省联合政府的副主席、副秘书长、教育厅厅长、新疆保安副司令等职务。民族军也被改编为13,500人规模的新疆省地方部队。但是，1947年5月19日，新疆省主席张治中辞职，被推荐继任省主席的是亲国民政府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麦斯武德・赛比力。反对麦斯武德・赛比力就任省主席的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伊犁区、塔城区、阿山区的代表于1947年8月离开迪化，返回伊宁成立名为“三区经济委员会”的政权组织，开始实施自主管理，“新疆省联合政府”由此崩溃。

1949年8月14日，访问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秘书邓力群作为中国共产党联络员，在苏联方面的协调下，从苏联抵达伊宁，会见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开通了用于同中共中央进行日常联络的“力群电台”。8月25日，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达列力汗・苏古尔巴约夫等三区的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领导人，为出席中共倡议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乘坐苏联飞机经由苏联飞往北京。但在途中，因飞机失事而在苏联境内全体遇难（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思索的事故）。9月15日，被选为新代表的赛福鼎到达北京，明确表达了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态度，之後，进军新疆的人民解放军于12月到达“三区”，曾为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根据地的“三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赛福鼎·艾则孜在出席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大会时向毛泽东献礼

1933年11月12日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仅仅存在了85天，它不仅没有制定出具体的文化、教育、社会、经济政策，甚至没有建立起权力体制和政府体系，没有真正的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权力机器，更没能明确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统治与服从的关系。总之，在严格意义上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不仅成为不了一个“国家”，甚至达不到一个政权的水准。

但是，1944年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警察力量、比较健全的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系统的教育、文化、社会和经济政策，并在其统治地域内实施了有效的行政管理，在许多领域里都起到了作为国家权力的职能。如果不是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这段特殊时期的话，“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作为第二个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的可能性，并不是完全不存在。

後排左起：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巴索夫　前排左起：伊斯哈克别克、赛福鼎・艾则孜

全國和新疆人民同聲哀悼

阿副主席遇難逝世

赴京出席人民政協途中飛機失事

阿巴索夫等四人同時遇難

毛主席致電新盟極表哀悼

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犧牲

值得全國人民永遠紀念

阿副主席遺像

刊登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人遇难的报导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出现的两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在新疆地区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无疑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作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母体的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同时参加的突厥系民族也最多的一次运动。1930年代的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参加主体，局限于维吾尔族和很少一部分柯尔克孜族，然而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动员了新疆所有的突厥系伊斯兰教民族的居民——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

当然，能够实现这种跨越民族界限的空前绝後大动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苏联的支援。但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承认苏联的支援并不是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旗帜下能够集结了众多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唯一原因。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举起了针对“异教徒”（卡菲尔）的伊斯兰教圣战的旗帜，才是能够凝聚众多伊斯兰民族居民的最重要的原因。新疆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在宗教的名义下进行的民族运动，以其强大的凝聚力、生命力及冲击力，不仅一直威胁着中国的国家统一，同时也在不断地考验着中华文明和中国国家的包容力。而对于近现代的中国政治来说，能否消除来自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影响，成为了一块真正衡量成败的试金石。

即使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以後，新疆各地的民族冲突也并未完全消失。1972年在喀什地区发生了“米吉提叛乱事件”，1981年在伽师县发生了“燎原党事件”，1981年在喀什发生了“10・30事件”，[10-53]1990年在阿克陶县发生了“巴仁乡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事件的制造者们都喊出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和伊斯兰圣战的口号。这不仅对中国政府的新疆政策，而且对中国国家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外交政策以及发展经济的国家战略来说，都构成了重大的挑战。

事实上，中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其确立的过程中，“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也曾经是其参考因素之一。1954年设置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包括伊犁专区、塔城专区、阿勒泰专区（即当年的阿山行政区）三区，其管辖地域与当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范围一致，成为在中国唯一一个管辖三个专区的民族自治州。而1955年成立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後最早设置的省级行政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是在意识到当年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基础上设置的。关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设置，周恩来总理在1957年曾经这样说道：“在解放前，有些反动分子进行东突厥斯坦之类的分裂活

动，就是被帝国主义利用了的。有鉴于此，在成立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时，我们没有赞成采用维吾尔斯坦这个名称。……党和政府最後确定成立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新疆的同志也同意。……名称问题好像是次要的，但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却是很重要的，这里有一个民族合作的意思在里面。”[10-54]可以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设置之所以成为此後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范本，就是因为它既通过“自治”形式巧妙地化解了参加独立运动者的“独立”情结，又在不动声色中保证了国家的统一。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後，随着历次政治运动带来的政治张力的消失，“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死灰复燃。为了防止事态扩大，1980年代时中国官方曾经一度禁止使用“东突厥斯坦”、“突厥斯坦”、“突厥民族”等词语。但是，独立运动的意识决不会因为更改一个词语的变更而消失。[10-55]1997年2月在伊宁市、2009年7月在乌鲁木齐市（当年的迪化）发生的大规模民族仇杀事件，说明部分维吾尔族居民依然具有强烈的东突厥斯坦独立意识。[10-56]

与新疆地区以往的战争和社会动乱不同，发生在20世纪以来的历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主导力量，都是接受了近代教育或受到近代社会影响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这也说明，一部分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对政治权力的热衷，是促使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思想绵延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1980年代以来在新疆发生的许多事件说明，一部分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仍然在怀念当年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尤其是第二次独立运动时期的辉煌，尽管那两场运动本来可以告诉他们，所谓独立运动不过是一场虚像，提倡独立本来就不现实。近年来，流亡国外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团体积极寻求国际社会中反华势力的支持，以至使“东突厥斯坦独立问题”逐渐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这也让人联想到当年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依靠外来势力而起，但最终又被外来势力所抛弃的惨淡下场。

事实上，相比当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不能不说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中国政府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不可不谓是给予了最大的支持。然而事实证明，经济发展固然可以增强一般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但对于那些将目光聚焦于政治权力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来说，中国的民族自治政策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对政治权力的渴望。所以，中国政府无论颁布多少照顾少数民族特点、推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政策，都会被他们解释为是民族歧视或抹杀民族，而鼓动一般维吾尔族居民对中国的仇恨和攻击。因此，笔者认为，要想让西陲不再烽烟重燃，当前要做的除了通过抓紧发展当地经济以提高维吾尔族居民的国家意识之外，更重要的一点还是如何让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认识到独立的非现实性，真正地彻底地抛弃对独立和独

立运动的幻想。

注释

[10-1]《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2号决议》，1945年1月25日，第3条。

[10-2]Patihan Sugurbayow, “Osman Zadi Kandah Adam ［乌斯满到底是怎样的人］,”Ili Tarih Matiriyalliri 6 (1992): p. 113.

[10-3]Patihan Sugurbayow, “Osman Zadi Kandah Adam ［乌斯满到底是怎样的人］,”Ili Tarih Matiriyalliri 6 (1992): p. 115.

[10-4]宋希濂：《北塔山事件的实况及经过》，《新疆文史资料选集》，第3辑（1997），第125-126页。

[10-5]1945年3月12日，乌斯满·斯拉木的部下马拉提向新疆省政府投降，并发表了以揭露“共产分子煽动我们独立”为主要内容的《告阿山哈萨克同胞宣言》，此见《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77-78页。乌斯满的亲友，也是同一部族出身的苏莱曼和努尔霍维扎伊也在8月投降了新疆政府。参见拉提甫：《我所知道的乌斯满》，《新疆文史资料选集》，第3辑（1979），第103页。

[10-6]《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164页。

[10-7]《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152页。

[10-8]Patihan Sugurbayow, “Osman Zadi Kandah Adam,” p. 115.

[10-9]《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188页。

[10-10]Patihan Sugurbayow, “Osman Zadi Kandah Adam,” p. 121.

[10-11]宋希濂：《北塔山事件的实况及经过》，第124页。

[10-12]Patihan Sugurbayow, “Osman Zadi Kandah Adam,” p. 125.

[10-13]《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220页。

[10-14]《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9号决议》，1945年3月5日。

[10-15]《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29号决议》，1946年2月24日。

[10-16]《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9号决议》，1945年3月5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53号决议》，1945年12月5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83号决议》，1946

年5月21日。

[10-17]《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9号决议》，1945年8月2日，第14条。

[10-18]《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53号决议》，1945年12月5日，第2条。

[10-19]安绳武：《回忆解放前塔城市教育简况》，《塔城市文史资料》，第2辑（1987），第3页。

[10-20]《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暂行刑事诉讼法》，1945年5月13日，第38条。

[10-21]Yasin Hudabardi, “Uq Wilayat Inkilawi Hakkida ［关于三区革命］,” Xinjiang Tarih Matiriyalliri 16 (1985): p. 19.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79、108页。

[10-22]《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34号决议》中的“伊宁市”估计为“伊犁区”之误。为遵重原资料，此处照录原文。

[10-23]《最高法院经济诉讼法临时守则》第1条：“宗教法院对于遗产继承，婚姻纠纷等经过调查後可以作出判决”；第5条：“关于孤儿与寡妇的问题以及抚养、赡养金问题等的纠纷，允许宗教法院依据习惯裁决”。《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刑法补充条文》序文：“属于宗教的案件由宗教部及其所属机构审理。宗教部及其所属机构下达裁决後，由执行机关公安局执行”。

[10-24]《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29号决议》，1946年2月14日。

[10-25]1945年8月2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78号决议》第3条规定：“学校的各种经费由财政部划拨”。1945年10月14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06号决议》又做出决定：“今年的欧舍儿、扎卡特必须用于教育支出，学校教职员薪水及学校的经费从欧舍儿、扎卡特支取。”另外，1946年1月1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96号决议》再次明确规定：“学校教员的薪水纳入国家预算，欧舍儿、扎卡特上缴财政部以用于教育。”即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维持和发展民族教育的名义下，由宗教部征收欧舍儿，民间向宗教部及教育部交纳的扎卡特由财政部公布後，由教育部作为教育经费支出。

[10-26]当时新疆的总人口是4,011,330人，按照这个比率计算，当

时新疆的乌兹别克族仅10,429人，塔塔尔族仅5,616人。

[10-27]未能就任的是艾里姆郡王，他是新疆哈萨克人最大的部族卡拉依（käräy）的首领，1790年其祖先被清朝册封为“公爵”。他本人于1912年被袁世凯册封为“郡王”，是居住在中国的哈萨克人中被授予最高爵位的人。1945年9月被任命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委员时，艾里姆郡王和夫人正在迪化协助新疆省政府。地方的负责人是指塔城区专员，阿山区专员乌斯满·斯拉木和阿山骑兵团团长达列力汗三人。这三人直到1946年6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消亡之前都没有去过伊宁，因此可以说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力。

[10-28]新疆省的设立是1884年，从那时起，新疆的省府从伊宁迁移到迪化。但过去阿山区一直归驻科布多（Kobdo，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

[10-29]乌斯满·斯拉木身边的拉提夫作为第一位阿山区哈萨克人的代表，为了向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报告，1946年1月2日开始从承化出发骑马去伊宁，2月3日到达伊宁，整整花了一个月时间。《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171页。

[10-30]喀什和伊宁等地的乌兹别克人“与维吾尔族农民杂居，向维吾尔人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在其它方面也受到维吾尔人的影响。一般使用维吾尔语，民族习惯也和维吾尔人没有多大区别。”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乌孜别克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未出版，1963），第3页。塔塔尔人因为拥有较高的文化与较强的经济实力而受到维吾尔人的尊敬。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塔塔尔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未出版，1963），第28-30页。

[10-31]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塔塔尔族简史简志合编》，第16页。

[10-32]乌斯满·斯拉木的叛乱不能认为仅仅是出于民族对立因素，最重要的原因是乌斯满·斯拉木的反苏情绪。关于这点可以参照第八章。但是拉提夫·穆斯塔法从伊宁回来後，乌斯满·斯拉木马上开始自行征税。因此，可以断定拉提夫·穆斯塔法在伊宁体验到的对哈萨克人的经济歧视可能是促使乌斯满·斯拉木最终反叛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一个原因。《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200页。

[10-33]1945年1月5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4号决议》第3条决定：“正值国家财政困难时期，为了保证国家经济需要向近

邻国家出售财产与家畜”。

[10-34]1945年9月2日，伊力汗・吐烈给伊宁的苏联领事馆写信，要求苏联政府取缔苏联贸易机关在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交界的地方购买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偷盗的家畜。9月4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91号决议》指出有秘密组织逃税，向境外转卖物品，命令内务部予以取缔。

[10-35]Ablimit Hajiyow, “Tarbagatay Wilayitning Iktisadiy Igilik Tarakkiyat Tarihiga Dair Aslima ［关于塔城经济发展历史的回顾］,” Xinjiang Tarihi Matiriyalliri 25 (1988): p. 291.

[10-36]根据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规定的土地税税率，1945年在伊犁区能够征收到6,492,704公斤粮食。如果按照1945年8月19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82号决议》所说，这比之前的国民政府征收的土地税总额减少了大约243,476公斤。这说明战争造成了伊犁地区农业人口的减少。

[10-37]1945年7月7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60号决议》，规定车辆登记的手续费是卡车一年5,000元、马车1,000元、自行车500元。课以一倍的罚金。

[10-38]印花税的金额根据合同金额而有区别。3,000-10,000元的合同金额是50元，10,000-50,000元的合同金额是75元，50,000-100,000元的合同金额是100元，100,000-500,000元的合同金额是200元，500,000-1,000,000元的合同金额是500元。以上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63号决议》，1945年7月1日。

[10-39]《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关于乌苏县、精河县、独山子油田的决议》，1945年9月15日。

[10-40]参见1945年7月26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72号决议》，盖章期限当时规定为一个月以内，但是9月15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77号决议》又将期限延长至10月1日。在此之後，禁止使用没有盖章的钱币。1945年10月2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99号决议》又决定，10月3日以後以10%的兑换率回收未盖章的省币。但是1946年3月10日的政府财政部发出公告，禁止未盖章的钱币流通。从以上三令五申中可以看出，尽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发出禁令，但是未盖章的省币仍在继续流通。关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发行纸币的种类，参照董庆宣：《新疆近200年钱纸币图鉴——纸币部分》（乌鲁木齐：《新疆金融》编辑部，1986），第47-49

页。

[10-41]所发行纸币的具体数量不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银行最初归财政部管辖，但依据1945年11月20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36号决议》，银行从财政部独立。

[10-42]1945年7月26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71号决议》决定发行五年期限的一亿元国债。1945年8月2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2号决议》决定再发行五年期限的三亿元“胜利国债”。1946年3月14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41号决议》决定发行还款期限为1951-1961的一亿元第二次无利息国债：“一，发行一亿元第二次无利息国债，还债期限为1951-1961年。二，国债的发行，从决议公布之日起一个月内全部完成；三，为了以最好的结果完成国债的发行，国家成立专门委员会。中央发行委员会委员长为政府主席伊力汗·吐烈。”

[10-43]1945年8月2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85号决议》决定成立以伊力汗·吐烈为主席的国债发行委员会。之後，1945年8月26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87号决议》再次决定，为了促进发行国债向各县派出指导员。

[10-44]从1946年4月25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72号决议》的如下内容中，可以看出内务部也在帮助发行国债：“一，为了加速国债的发行，命令内务部协助发行委员会”。

[10-45]1946年1月1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96号决议》中有以下内容：“二，提议宗教部和教育部将教育献金以及宗教部收取的欧舍儿和扎卡特［的金额］向财政部报告。三，决定将民间的募集资金上缴教育部和宗教部”。从这些内容中可以看出欧舍儿是由宗教部征收，扎卡特由宗教部和教育部征收。

[10-46]1945年4月24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44号决议》，决定动员全国的裁缝为军队缝制军衣。1945年10月27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18号决议》发出命令：“动员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所有的裁缝，为军队服务一个月。”另外，从1946年3月6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36号决议》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内容：“为了给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的士兵提供衣服，动员全国的裁缝和鞋匠。”

[10-47]1945年3月18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36号决议》命令在3月25日之前返还银行的借款。根据决议，超过3月25日

还没有返还的要按日收取罚金。罚款金额到31日是利息的15%，4月5日是30%，4月10日是50%，4月15日是75%，4月20日是100%。1945年9月15日政府出台借款清理决议，决定全部收回借款，停止新的贷款。另外，1946年3月21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47号决议》还决定，4月15日之前全部收回1945年时借给农民的粮食。

[10-48]《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39号决议》，1945年4月2日，第10条。

[10-49]参照1945年1月5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4号决议》第8条，1945年4月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36号决议》第6条，1945年7月2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67号决议》第1、2条。另外，1945年12月18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73号决议》决定向各县派遣专业人员调查、整理财政收支；1946年4月20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69号决议》规定：“非法支出国家资金，或者支出预算外的资金，将根据法律予以处罚。”

[10-50]《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10号决议》，1946年1月22日。

[10-51]1945年2月3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9号决议》规定，每月发给军人8岁以上的家属16公斤粮食和100元补助金。但1945年5月5日的《关于军属供给问题的决议》决定今後不再承认新的军人家属，对于已经认定的军人家属也将一家的配给对象限定为最多三人。

[10-52]1945年12月8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57号决议》有支付国家公务员的工资的内容，可知已发生不支付国家公务员工资的情况。

[10-53]1981年12月10日，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在自治区党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1981年喀什的“10·30事件”谈到：“这次破获‘中亚西亚维吾尔斯坦青年星火党’反革命组织是一个胜利，要彻底查清，特别是要乘胜追查反革命组织的幕後指挥者和策划者。要联系到以前伽师破获的‘燎原党’和其他地方反革命组织。”王恩茂：《在自治区党委员常委扩大会议上关于喀什问题的讲话》，《贯彻民族政策文件选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第135页。

[10-54]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1957年8月4

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问题理论研究室编：《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文献资料汇编》，第1辑（北京，未出版）。

[10-55]新疆革命烈士事迹编辑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编：《平暴英烈传》（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第18页。

[10-56]在1997年2月发生的伊犁“2・5事件”中，共有7名汉族居民被杀害，198名汉族居民被打伤，其中重伤50人。2009年7月发生的乌鲁木齐“7・5事件”中，共有197人死亡。其中无辜死亡的156人（汉族134人、回族11人、维吾尔族10人、满族1人），1,721人受伤。

後　记

本书是以笔者向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专业所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增补改写而成的。原论文曾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研究——中国的伊斯兰与民族问题》为题，于1995年12月在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当年获得了日本第18届三得利学艺奖，并在2009年出版了第三版。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其实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不仅在收集资料上会遇到许多困难，如何解读用多种文字手写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更重要的是，当时敢于涉及这个非常敏感的话题还需要一种勇气。我当时之所以选定这个问题为博士论文的题目，首先是因为1978年进入中国中央民族大学学习之前，我曾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活了十二年之久。在那里，我亲身体会到新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在“民族”的壁垒面前，所谓的同志、同僚、同乡、甚至同教（例如维吾尔族与回族）的关系，一切都变得那样的脆弱。从这种亲身体会出发，我感到，总有一天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会成为一个缠绕中国的噩梦。所以，我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这样说道：“忠实地还原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真相，尤其是正确认识和评价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性质，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从思想深处理解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而且对于把握多民族国家的中国的未来图景，也具有深刻的意义。”

2009年“7・5事件”发生时，我正在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姚新中教授处做研究访问。说来也巧，东京大学出版会刚刚说好出版拙着第三版，而在我动身来伦敦之前，杂志WEDGE也约我在Opinion栏写了一篇有关新疆民族问题的文章，所以在事件发生後，我又趁势检索了不少各国的评论。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许多国外的新闻媒体不是有意淡化这次事件的严重性，就是抓住“7・5”以後汉族居民的反击进行大肆攻击，以致大多数的报刊读者或电视观众都认为事件的性质是汉族屠杀维吾尔族居民。包括许多记者和撰稿人在内，许多人不仅不知道事件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间的关系，甚至不知道何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但是他们却固执己见，坚守他们幻想出来的海市蜃楼。这时，我深深地感到了用日语出版研究中国问题学术着作的局限性。所幸的是，我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甘琦社长联系後，马上得到了她的支持；在与兰州大学副校长杨恕教授联系後，他马上给我传来了他组织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的老师们的翻译稿，这是本书译稿的初稿。在这里，谨向甘琦社长和杨恕教授表示深深感谢。当然，由于我已做了增补和修

改，本书中所有错误应该由我本人负责。

本书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谢茂松先生的建议，就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对近代维吾尔社会的影响，在重新查阅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充实和改写。在此过程中，我再次感到，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它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大的动员能力和威力，其实就是利用伊斯兰教，让维吾尔族伊斯兰教徒，即维吾尔族穆斯林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再也没有什么比接受“卡菲尔”（异教徒）的统治更让伊斯兰教徒感到屈辱的了。但是，维吾尔民族进入由“异教徒”为统治者的中国，并不是发生在近代以後的事。为了探讨伊斯兰教思想为何能够成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精神支柱，本书增补了第一章“在‘乌玛’与‘中华’之间——清王朝对新疆维吾尔族社会的统治”。其实，通过这一章，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民族问题的产生与前近代国家构造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清王朝处理维吾尔社会和宗教的政策给近代以後的中国留下了什么“遗产”。

屡次由维吾尔族为主体发动的暴动，虽然时而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民族主义成分，时而又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宗教色彩，但是最终必定出现两者汇合的趋势。这是由主体民族为非伊斯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框架所规定的现实，而我们在定义维吾尔族的性质时，当然必须从民族和宗教两条线上考虑。因此我要感谢谢茂松先生的指教。本书得到两位匿名评审的审查，对于他们给予的评价，我深深感铭于心。针对他们提出的中肯意见，我在逐一修改补充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他们对学问的认真态度和深厚功力，为此本文多处都有增补改写，此处不再一一提及。本书的最後编辑工作由林骁编辑完成，她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她的工作，本书得以顺利出版。为此，我向她表示真诚的感谢。按照出版社要求格式帮助最後整理书稿的是彭程博士、王娟硕士、李丰硕士、孙若圣同学及董海巍博士，在此一并致谢。

我在出版博士论文时曾向东京大学的两位导师——山内昌之教授和并木赖寿教授表示了感激。对于我来说，能与山内昌之教授相遇是我来到日本後最大的幸运。因为我在1989年被直接接纳入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硕士课程时，不仅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甚至连语言表达能力都有问题。在五年的学习过程中，先生不仅教给了我各种研究方法，他那高瞻远瞩的气概更让我深深领会到了学问的真谛和意义所在。山内先生去到哈佛大学进行研究期间，负责指导我写作博士论文的是并木赖寿先生。并木赖寿先生堪称为人格上的完人。如今虽然先生已去，但他对待学生的那一片真诚和期待，与先生曾经为我修改初稿时留下的那一片红色墨迹一起，都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让我永远心存感激的恩师，还有我1978年在进入中央民族大学时就有幸遇到的王扶汉教授。先生对待人生的那一份潇洒，让我生出对先生的无限敬仰，而没有孩子的先生待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今天想来，不管是我的长处还是不足，到了先生那里都只是一味呵护。先生已经去世数年，我却能不断在梦中围绕在先生身边，实是不愿离开先生呵护之明证。

在支撑我的人生和鞭策我不断上进的智者和贤者之中，还有一位就是妻子门胁佳津代。每天从劳累之中回到寒舍，与在灯下静静等候的妻子夜酌深谈，其中得到的启发很多都体现在了日後的文字里。我感谢命运，感谢它让本来只知道笨鸟要先飞的我在人生中遇到了这样一位理智的妻子。

王　柯

2011年初春于日本神户六甲山麓

大事年表

年	月	事　件
1931年	3月	新疆东部哈密地区维吾尔族居民发动“哈密暴动”。
1933年	4月	迪化发生“4·12政变”，盛世才就任新疆省临时边防督办。
	5月	盛世才向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表明共产主义信仰。
	11月	12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
	12月	苏联红军出兵新疆。马仲英的部队向新疆南部败退。
1934年	4月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瓦解。
	春–夏	盛世才在苏联的支援下确立统治，逐渐形成政治权力的双重结构。
1937年	夏	盛世才进行第一次政治大肃清，清除苏联势力及当地民族出身的政府领导人。
1940年		盛世才以当地民族势力、苏联势力、中共势力为目标，进行第二次政治大肃清。
1942年	8月	盛世才转向中国国民政府，从新疆政府中清除苏联势力、中共势力。
1943年		亲苏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成立在伊宁成立秘密团体。
	12月	“阿勒泰哈萨克民族复兴委员会”成立。
1944年	4月	9日，“民族解放组织”在伊宁成立。
	6月	10日，“依米尔指挥部”在苏联境内成立。特列力汗和从外蒙古来的苏联顾问、蒙古顾问到达阿勒泰区，与乌斯满的反政府哈萨克族武装组织汇合。
	7月	8日，在阿勒泰区成立了吉木乃反政府武装组织。10日，“依米尔指挥部”指示塔城区的反政府民族主义势力合并。
	8月	11日，盛世才在“八月政变”中逮捕国民政府人士。14日，巩哈县的突厥伊斯兰居民成立反政府游击队。伊宁的“民族解放组织”暂停活动。

1944年	8月	29日，国民政府宣布解除盛世才的职务，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主席。
	9月	11日，盛世才离开新疆。
	10月	4日，吴忠信就任新疆省主席。6日，吴忠信释放在盛世才政治大肃清时期被逮捕的数百名政治犯。7日，巩哈的反政府游击队攻克巩哈县城。上旬，“阿勒泰革命临时政府”成立，与吉木乃反政府武装组织合并。
	11月	苏联顾问到各反政府武装组织和共和国政府各部门就任。伊宁的“民族解放组织”再次开始活动。7日，“伊宁起义”爆发。1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发表第一次“九条政治纲领”。15日，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决定实施第一次伊宁增援作战。16日，帕里诺夫与伊斯哈克别克从苏联带领部队到达伊宁。
	11–12月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力占领伊犁区的绝大部分。
	12月	5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全面否定“伊宁起义”与苏联有关。政府军第一次伊宁增援作战失败。
1945年	1月	4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发表第二次“九条政治纲领”。7日，临时政府成立军事部。9日，政府军实施第二次增援作战。19日，第二次增援作战失败。28–30日伊宁的政府军全军覆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财政部银行钞票”发行。
	2月	3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9号决议》制定“兵役法”。阿勒泰革命临时政府力量攻陷吉木乃县城。
	3月	13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33号决议》调整军队及政府的人事。
	4月	8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建立总兵力达15,000人的民族军。13日，蒋经国作为蒋介石的代表抵达迪化，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会谈。政府军调整防卫体制，把乌苏和精河作为重点。
	5月	13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公布“刑事诉讼暂行规定”。
	6月	阿勒泰革命临时政府势力占领清河、可可托海、吉木乃县。30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开始会谈。

1945年	7月	5日，“依米尔指挥部”请求民族军进攻塔城。民族军开始“三线作战”，在北部战线攻陷塔城。
	8–9月	民族军攻陷新疆南部的拜城、阿克苏旧城。
	8月	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
	9月	2–7日，阿勒泰革命临时政府势力与进入阿勒泰的民族军会合，占领承化县城。4–8日，民族军总指挥官帕里诺夫夺取精河。5–8日，民族军副总指挥官伊斯哈克别克夺取乌苏。上旬，民族军与政府军在玛纳斯河隔河对峙。14日，张治中在迪化与苏联总领事会谈，请求苏联调停。17日，苏联大使向国民政府传达由“新疆民众代表”提出的苏联调停要求。
	10月	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00号决议》决定进行和平谈判。17日，“新疆民众代表”与张治中在迪化开始和平谈判。
	12月	5日，“东突厥斯坦革命青年组织”成立。
1946年	1月	2日，签订《十一条和平条款》及附属文件（一）。
	3月	19日，阿勒泰区专员乌斯满·斯拉木离开承化县城。29日，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
	4月	5日，和平谈判进入第二阶段。26日，“东突厥斯坦革命党”成立。
	5月	阿勒泰哈萨克人在库韦开会，乌斯满和达列力汗围绕苏联唐古斯坦采掘队进入阿勒泰区产生对立。22日，预签《十一条和平条款》附属文件（二）。
	6月	6日，签订《十一条和平协定》附属文件（二）。伊力汗·吐烈被押往苏联。18日，国民政府发布新疆省联合政府人事命令。27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324号决议》，决定解散共和国。
	7月	1日，成立新疆省联合政府。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担任副主席，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担任副秘书长。
	11–12月	出席“国民代表大会”的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提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自治案”。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与中国共产党代表秘密会谈。

1947年	5月	19日，张治中辞去新疆省联合政府主席的职位，并推荐亲国民政府的维吾尔人麦斯武德继任。
	8月	参加新疆省联合政府的三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代表全部返回伊宁。
1949年	8月	14日，中国共产党代表邓力群从莫斯科来到伊宁。25日，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伊斯哈克别克·穆诺诺夫、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等“三区”方面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领袖，前往北京途中在苏联上空全部遇难。
	9月	15日，赛福鼎·艾则孜在北京表明态度，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2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伊宁。

更多书籍More books in the series

1.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再造的祖先

2.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辐辏与秩序

3.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中国传统智慧的真我

Search “CUHK Series” in Kindle Store for more books

More series you might be interested

1.CUHK Series: Search “CUHK Series” in Kindle store

2.Maijia Spy Series: Search “Maijia Spy Series” in Kindle store

3.HKAC Series: Search “HKAC Series” in Kindle store

4.ZBT Series: Search “ZBT Series” in Kindle store

5.EMBA Series: Search “EMBA Series” in Kindle store

6.Classic Novel Series: Search “Classic Novel Series” in Kindle store

More books you might be interested

Search “Info Rainbow LTD” in Kindle Store